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诗人毛泽东

e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编者的话

革命家和诗人，在毛泽东身上是和谐地融为一体而不能分割的。毛泽东的诗词：思想内容丰厚精深，独树一帜，艺术表现既借鉴传统精华；又富于创造性。正是凭借这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不朽之作，并为中国的诗史增添了夺目的光辉。因而，也就自然地赢得了我国人民的热爱和赞美。

在国外，毛泽东的诗词也广为各国朋友和学者的喜爱和赞赏，而且已经成为他们研究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实合著的《诗人毛泽东》（原名：《毛泽东其诗与人生》），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专著。

武田泰淳（1912—1976年）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小说家，中国文学研究家。1931年入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学习，翌年因参加进步活动反对政府而被逮捕，并被校方开除。1934年同竹内好等人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同年因接待中国学者再次被捕。战后1947年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56年参加创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任常任理事。他曾多次访华，翻译过毛泽东主席的诗词，他被称为“战后派”代表作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审判》、《风媒花》、《秋风秋雨愁杀人》、《毛泽东其诗与人生》（合著）等。

竹内实是中国文学研究家，当代中国评论家，1923年生于中国山东省，194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历任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京都大学教授，立命馆大学教授等职。他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同时撰写有关中国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评论。他多次访华。1960年，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访华时，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主要翻译著作有：《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原著）、《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传》（王力原著）。撰述著作有：《毛泽东其诗与人生》（合著）、《毛泽东笔记》、《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

《诗人毛泽东》一书，是由竹内实执笔，武田泰淳审校的。

在编译过程中，我们感到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以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力背景，研究诗人毛泽东的传记。作者认为，不了解毛泽东写每首诗的背景，那是读不懂他的诗作的。叙述历史和个人传记的目的，就在于帮助读者理解毛泽东的诗词。于是，他们要求自己把这本书写得尽可能地详细一些，以便得到日本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同时，使这本书真正成为一部读者不需要查找其他参考书就能看懂并感到亲切的诗人毛泽东传。

诗词鉴赏部分的构思也很巧妙。它包括赏析、注释和诗词大意几个部分。书中虽未注明，但却清晰可见。

第二，结合中国诗史对毛泽东的诗词进行了有益分析和探讨。作者认为，毛泽东的词在气势宏伟和感情豪放方面，继承了豪放派的体系，但是在本质上与婉约派有共同之处。可以说，毛泽东从两派最突出的长处中吸取了营养，把自己的作品精炼到更高层次的诗境。应该说，作者的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毛泽东的诗词，作者在诗词的注释上是下了功夫的。注释部分用十分通俗的语言，逐字逐句地进行了比较准确的解释。而且

常常引经据典，联络出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就是中国读者也会感到新鲜的。

第三，引用了较为丰富翔实的史料。作者在叙述历史背景和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对诗词作注释时，利用了大量的资料。据统计，作为本书的写作参考书，大致有：（一）毛泽东诗词的注释和鉴赏文章，包括单行本、报刊上的文章、日本的介绍文章、乐谱一百七十余种；（二）词的解释有词谱、文学史、诗词集的日译本和注释本十五种；（三）毛泽东著作六种；（四）毛泽东的传记和回忆录二十九种；（五）革命史、现代史、中共党史三十六种。合计二百三十余种。书中引用中国古典诗词二百余处。值得一提的是，所用资料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国内的出版物，因此，增加了史料的可靠性。这反映了作者在总体上的较为严谨的治学态度。

当然，和其他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一样，本书作者也没有避免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若干史实的叙述上的错误。另外，本书第一版写于1965年，再版是1977年。作者当时对中共党史中的某些事件的看法，不可能同我们今天的认识一致。诸如此类的问题，相信读者会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的，在此不一赘述。

本书是根据日本文艺春秋社1977年第二版第二次印刷本翻译的。除毛泽东诗词的日译和毛泽东年谱没有翻译，以及个别处有所删节外，基本上是全译的。原书中的文内注，均改成章后注。对于史实上的不准确处，只做了少量的译注，以脚注形式出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负责组织本书的翻译、校订和编审工作，石仲泉、张宁负责本书的统稿和编审工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惠才负责本书的翻译和校订工作。具体编辑工作由张宁负责。由于水平有限，本书的翻译和编审工作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92年4月

丛书出版说明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外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论著。

为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状况和动态，为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在对外宣传中有针对性地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定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供有关研究人员内部参考。

这个选辑以丛书形式出版，主要选编有学术参考价值的资料；以提供原始资料为主，其中既有专著，也包括论文汇编；既有全译的，也有节译的。形式根据编选内容而定，不强求一律，编者只作必要的编辑和评注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力求比较客观、系统地反映国外多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希望能够起到开拓理论视野、扩展思维空间、促进学术交流的作用。

本丛书编辑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主持，主编石仲泉，副主编张宁。有些译著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以合作方式参加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92年4月

一、序论

1. 诗人毛泽东的出现

很多人在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之后，都觉得毛泽东的诗兴非凡。文章虽说都是政论文，但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枯燥无味，他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容，有力地展开了文章的逻辑性。我们不仅从措词和举例，还从作者那独具风格的文体中散发出来的香味，发现毛泽东在文学上的才华和在中国典籍方面的很深造诣。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他说，26岁去北京，当看到北海公园里的冬天景色时，不禁想起唐朝诗人岑参（715—770年）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青年毛泽东对待的兴趣和他的审美观，这里也已略有表现。在上海的共产党创立聚会结束后，毛泽东回到长沙。有人亲眼见到在他的桌子上摆放着李清照（1084—约1151年）的词集。据1963年冬来日本访问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湖北省人，1915年生）讲，在1942年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时候，毛泽东曾把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叫到他的房间里座谈，在他的桌子上堆放有《太平广记》。李清照是南宋女词人，为避兵乱，背井离乡，后丈夫又病死，每日在他乡痛苦地煎熬着。所作词多写男女间的爱情，流浪生活的感伤和思乡之情，说起来作品带有一种唯美主义的倾向。《太平广记》是汉朝至五代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的一种全集，*是一部古代奇异故事的宝库。延安的窑洞式的住所，叫做窑洞，那是在干燥的黄土层上挖出的洞穴，外面安上木制门窗，据说是个冬暖夏凉的好住处。不过，想像一下在那种没有装饰的房间里借助煤油灯光对千奇百怪的故事读得入迷的作者，总觉得有些意思。

毛泽东写诗词，很早就为人们所了解。对于从幼年时代就接受古典典籍熏陶并被要求背诵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解放后的一代人另当别论），把随时的感怀用传统的格律诗表达出来，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高雅的业余消遣。不要说鲁迅（浙江省绍兴人，中国近代文学的创始人，1881—1936年）、郭沫若（四川省人，中国科学院院长，1892年生）这些著名的文学家，就是朱德（四川省人，中共中央副主席，1886年生）和陈毅（四川省人，副总理，外交部长，1905年生）这样的军人也写诗。毛泽东写诗词并非不合情理。

《沁园春雪》这首词很有名。在这首词公开发表之前只知道有赞扬长征的《七律》，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这两首在流传。《沁园春雪》的出名，是1945年10月毛泽东为了协商战后中国的重建问题从延安飞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见时候的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以前呆在与世隔绝的延安几乎传说化了的毛泽东关注之时，重庆的中立派报纸《新民晚报》*刊登了这首词。据说这张《新民晚报》卖得很快，确实由于博得了好评而畅销。这首词是毛泽东书赠友人柳亚子的，报纸给转载了。如果想公开发表的话，恐怕在重庆合法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这首词最为合适吧。

1946年访问延安的罗伯特·佩恩（诗人，传记作家，1911年生于英国，后来移居美国）把尽可能多地收集毛泽东的诗作为主要目的，但除了《沁园春雪》之外，只得到《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长征》。佩恩听说有收录70篇的毛泽东诗集《风沙集》，他到处寻找，最后连书的封面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有人讲，毛泽东在开会时经常随手写些诗，会后就扔在床上，人们竞相

去捡。不过这些纸片是很难弄到手的。见到毛泽东之后，只是说“那都是些马马虎虎的东西”。佩恩离开延安时尽了最后的努力，他向到机场送行的毛泽东死乞白赖地索取诗，但却被用诙谐话给轻松地差开了。

佩恩未能达到目的，但比他早约九年访问延安的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贫农家里，她写了一些关于中国革命的优秀报告文学。1892—1950年）以一种略微圆滑的方式看到了作为“诗人”毛泽东的真实面貌。

“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解放后，出版了诗人肖三（湖南省人，1896年生）写的毛泽东传，收入书中的《沁园春长沙》广为流传。但它与后来正式发表的在文字上略有不同，也许是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吧。说正式也好，说公开也好，发表毛泽东的韵文作品是在1957年。那年1月创刊的诗的专门杂志《诗刊》（臧克家任主编）编辑部收集了以前在人们中间传抄的8首诗词，交给作者征求同意刊载。毛泽东又附上10首，并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些以“旧体诗词十八首”为题刊载在《诗刊》上。据查，当时《人民文学》和《文艺报》都没有专门组织评论文章。但在地方的文学杂志和以教师为对象的语文教学杂志上刊登了数种注释文章。后来，逐渐出版了帮助阅读和理解的辅导书。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释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也是在这一年。但是这只是注释书的出版，并不是诗集的出版。作品的写作年代是1925年至1956年，特别是30年代的作品很多。接着翌年1月发表了《蝶恋花答李淑一》，10月发表了《七律送瘟神》。这之后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传统的线装大字本《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1962年应文学杂志《人民文学》的请求，又公开发表6首，除《蝶恋花》等3首是近作外，其余都是1929年至1931年的旧作。就是说，都是反映以江西省井冈山为中心的斗争情况的作品。

1964年1月，北京等各大城市出售包括未发表的10首在内的《毛主席诗词》单行本。同时，1月4日《人民日报》等各报，《红旗》、《诗刊》等各杂志在1月号上刊登诗词10首。据说《毛主席诗词》在中国国内受到了狂热的欢迎，第一版的印数为50万册，但很快就销售一空，又加印30万册。在海外也由于增加了对中苏论战的兴趣而引人注目。新发表的10首是1949年至1963年的作品，事实上不仅是中苏论战，也有对国内政治上的重要动向抒发感慨的。《毛主席诗词》以7种装帧出版，其中精装本从因字体美观而在中国受到推崇的宋朝版本中选择了《玫瑰先生集》，将此书的文字照相后制成铅字，没有相应文字时则利用偏旁组合成字代替。装帧也采用中国古书那种十分讲究的线装本形式，完全采用古典诗集的体裁。从这种出版的做法看，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工作像是告一段落了。

不过，诗集里缺少1937年至1948年这10年间的作品，就是说，缺少呆在延安窑洞里同日本作战、后来离开窑洞与蒋介石作战时的诗，不知为什么一首也没有。据说佩恩寻求的幻想中的毛泽东诗集《风沙集》共收录70篇。大概没有发表的作品还深藏在书箱底下吧。从以前公开发表的做法来看，与

其说作者不急于发表，倒不如说作者不肯拿出来更为合适。7种版本同时出版一齐销售，或许有人认为是夸耀权力和个人崇拜的征兆。

不过，如果意图就只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前发表的做法似乎过于保守了吧。

从诗集底页的出版年月上看，毛泽东诗集出版的时间是1963年12月。如果想到这个月的26日是作者70周岁生日的话，那么出版诗集不是也有祝贺生日的意思吗？也可以说，对作为中国革命象征的毛泽东，人们不是搞群众集会祝贺生日，而是通过出版诗集，还利用传统形式的创作和古朴典雅的装帧来祝寿，他本人可能也希望以此同群众结合。在这里面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流淌着的强烈的“传统”力量。

作者也许把出版诗集纯粹当成个人的事，但由于当时的地位和立场，加上周围的希望，才以这种规模出版的吧。不过，包含并超出这种情况，让人感到在中国文化中“传统”的根深蒂固。我似乎感到“传统”作用于文化上的力量不仅强大，而且参与创造文化的人想主动融合到“传统”中去的冲动也十分强烈。

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做准备，并同社会运动相互支援而发展起来的五四文化革命，高喊“打倒孔家店”，抨击封建思想。那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即便有人认为那意味着全盘否定的倾向，也被解释成以前是那样看的。即使如此，战胜封建思想的革命，以这种形式恢复文化的“传统”不是没有一点意外的感觉。然而，如果站在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内容与传统的形式分开的立场上来理解的话，毛泽东诗集的装帧和用字的问题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对京剧等文化遗产的政策中所体现的思想，也在这里有所反映。而且，收入作品的形式也不是现代自由诗。尽管如此，把同“传统”针锋相对的革命用“传统”形式吟咏，并编成传统形式的书，这不是宣告五四运动开始的一个时代在这里结束了吗？

所谓诗的世界，恐怕是读者根据各自的观察和体验深入钻研，自己在那里发现其意义吧。而且读诗首先要到创作的地点理解作者的语言，所以词解和对时代背景的说明需要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相互重叠，因此他吐露的诗情既是他个人内心世界对革命的憧憬，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在精神侧面的表现。探求作者个人的诗情是读诗的乐趣，这本诗集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它与历史和社会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诗（不限于诗，还包括文学和艺术）成为现实的图解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脱离现实生活去读与现实有联系的诗，那将会引起误解。人们不得不从不同于纯个人诗集的角度去把握毛泽东的诗集，这是由于诗本身和作者本人的社会性决定的。

这37首不是毛泽东诗词的全部，有的诗词大概还隐秘在未知的世界里。但是从公开发表的部分来看，已经让人感到如同作者自己解释的那样，是些“马马虎虎的东西”，就是说，是业余消遣，一个未完的“诗”的世界在这个诗集中展开并构筑起来了。试图无止境地继续革命的顽强意志和革命观存在于最深处，这与《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中散文的世界是共同的。但是充满活力的自然描写和具有强烈个性的伤感，使他高于现实生活构筑的一篇篇诗词的世界，同直接与政治实践相联系的《选集》里的散文的世界不同。它毕竟是艺术作品。

史沫特莱对毛泽东的个性，记述了如下印象：

“我们没有开口，相互凝视着，他那副阴暗而难以测度的面孔呈长型，额头宽而高，嘴是富于女性美的嘴。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审美家。我确实对他身上的女性气质和那阴暗的环境产生过反感。一种本能的敌意在我的心头油然而起。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少数和他很熟的人喜欢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

“毛泽东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讽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当时，毛泽东虚岁 46。已故冈崎俊夫对作为诗人毛泽东的直观认识，证实了史沫特莱的这一印象。

“那里有一种寂寞的余音，孤独的影子。这不限于词，而是中国的传统诗人的魂。只有见到孤独的深渊，才能产生对人民的爱，不是吗？”

为了挖掘自己的伤感，以便达到中国传统上的孤独深渊，除了同现实的革命联系之外，恐怕还需要直观、读书和思索的积累吧。把中国革命作为直接的土壤，把独特的人格形成作为核心或中心，从丰富的古典宝库中吸取营养的毛泽东的诗的世界，是被中国的文学传统所包含，同时又以独特的创造补充了一种新的作品世界。

2. “诗”与“词”

这个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不是“诗”，而是“词”。“诗”与“词”在日文里的读音是一样的，但是现代汉语则不同，前者读 shi，后者读 ci。在创作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作诗的人叫“诗人”，填词的人叫“词人”，在文学史上是有明确区分的。因而，严格他讲，毛泽东应该叫“词人”。不过今天已不拘泥于此，似乎从广义的概念都通称“诗人”，而且毛泽东也作“诗”。

“诗”与“词”怎样区分？一般来讲，确实存在着先人之见，即认为诗是正式的东西，而词是不完整的东西。在日本，把词译成“短歌”或“小曲”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吧。事实上，正如人们所说的“作为整个词作品的情调，十分类似日本江户时代的短歌集《松叶》和《松落叶》等”那样，在内容上有魅力的东西（就总体而言）很多，毛泽东填词，作为文化修养，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作为兴趣，不是也有人感到意外吗？

如果按照时代的顺序讲，首先“诗”的各种形式是在唐代（7至10世纪）固定下来的。比这晚一些，“词”在这之后的唐代中期出现，在接着的宋代（10世纪50年代至13世纪）盛行起来。如果包括诗和词，考虑广义上的诗的体裁的话，那么自然想到《诗经》是最古老的诗集。这是自周初到春秋（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把今天的陕西省中部，河南、山西省南部，山东省一带流行的民歌收集起来的的东西，而且把收集到的作品的文体称作“诗”。稍后，是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楚国的民歌，又出现了屈原（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利用这一民歌形式创作的《楚辞》。他的作品文体叫“赋”。毛泽东的词的高雅格调有与《楚辞》一脉相通的东西，如果想到《楚辞》是把湖北、湖南两省作为其地域的话，那么热爱长沙、热爱湖南的毛泽东，为屈原所吸引，爱读《楚辞》也并非不可思议。屈原在洞庭湖和湖南北部流浪之后，

在长沙北面的汨罗，湘江的支流汨水投江，恐怕也有因地理上的亲近感而给予的关心吧。据说毛泽东念书时的笔记足足装满一柳条包，但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时²，故乡的亲戚担心有后患，就在其故居的后山上给烧掉了。一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从灰中拾出一些保存起来，现在还收藏有两册，其中一册是有22页的《楚辞》中的《离骚》和《九歌》，是用工整的毛笔抄写的全文。

“诗”和“赋”都是在汉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兴盛起来的。五言（一句五字）的“诗”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在这个时候，七言（一句七字）也是在汉代以后发展的。这种诗迎来极盛时期是在唐代，在一般所谓的唐诗中，各种诗体极为发达，但是律诗和绝句作为新的格律诗固定了下来。哪一种的长度都是一定的（律诗为八句，绝句为四句），韵律是一定的（诗中不变韵）、平仄一定（遵从两种固定的排列法）。律诗进而又有第三、四两句，第五、六两句必须对仗的规则。所谓对仗，例如：“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味道《正月十五夜》）那样，两个句子暗尘=明月，随=逐，马=人，去=来，是明显地由对应的词组成。律诗和绝句是后来的，所以叫近体诗，这以前的诗叫古体诗。

“词”是在这种近体诗确立之后逐渐出现的，我们可以从句子长度相同的定型诗（律诗、绝句）发展到句子长度不同的新定型诗来考证发展的潮流。关于它的起源，众说纷坛。从诗型来看，可以认为是从“诗”演变过来的，

也可以认为同音乐史上新乐器的流行和民歌的流行有关系。也有把“词”叫作“诗余”的，这是把它看作是可以增减诗的字数，由诗派生的这种看法的别名。但是，它还要伴随音乐咏诗，在不合拍的时候，需要加进插曲，增减字数。所以还同音乐有关系。当时作为配合从外国传来的曲子的乐器，使用琵琶。但是琵琶有 28 个音调，

音律又富于变化，不能与排列同样长度的句子的“诗”合拍。因此，据说长短句的歌词成为一种要求便应运而生。这样，所谓的“词”便具有“歌词”的意义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叫作“曲子”的民间歌曲是词的起源，“曲子词”的简称叫“词”。(11)

与“唐诗”相对有“宋词”的说法，词是宋代盛行起来的，当时是有音乐伴奏的。这种音乐现在已经失传了，但在当时是很多的。与这些音乐相配合进行填“词”，即使是同一个音乐也有填不同形式“词”的情况。有人曾统计过，有 800 余种曲调，2300 余种形式的词。另外，每种形式的词长短句的一句字数、平仄排列、押韵和对仗的方法都有严格规定。在一句中只用一个字的地方，不可以排出两个字、三个字。于是便出现了表示这种固定规则的“词谱”，借助它如同镶嵌东西一样把文字填到里面去，故别名叫做“填词”。

把调或曲调的名称叫“词牌”。当初使用随调“词”的起首和语句，但是“词”逐渐脱离音乐而独立出来。为了进行“词”的创作，偶尔也选择其调，那只是一种符号了。例如，这个诗集的开篇《沁园春》，过去是在词中咏唱沁园之春的，即咏唱附有东汉明帝的沁水公主的庭园之春的歌词，故将此曲调称作《沁园春》，而且固定了这一曲调的规则。不过，与这种故事来历无关，别人可以只利用这种固定的文体咏唱别的事，为了方便把《沁园春》这一词牌作为自己使用的文体符号保留下来。

这样，了解规则的读者（不了解时参照“词谱”等）清楚字与句的段落、押韵等，所以能够较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因而，词牌不是题名。在“词”中不加题名，如果加题名是作为注释放在词牌下。词牌与“词”的内容一致，原封不动地成为题名时，把它叫“本意”（这个诗集中《满江红》或许可以说是本意）。词牌虽然有各自的由来，但是与对词的内容的理解无关，所以在这种文章中全都省略了这些说明。

“词”短的只有 14 个字，长的有 240 个字不等。根据其长度的不同又分小令、中调和长调。一个“词”有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之分，把它们叫作前阕和后阕，或前段和后段。把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变化叫“过片”，有人说这里也可以变换意思，但还是意思相关的为好。毛泽东大体采用相连接的。对偶、押韵、平仄都由词牌统一规定着，但是大体上是近体诗的延伸。也有必须用一字写成的地方，把这称作“豆”，或叫“一字豆”。如果用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来说明的话，前阕看、问就相当于“豆”。“怅寥廓”的怅也是“豆”，但是这里用三个字归拢起来好些。怅（一个字）、寥廓（两个字）的分段不是绝对的要求。所以在后阕的同一个位置用曾（一字）——记（一字）——否（一字）构成一句，后阕恰、到，是指定的“豆”。

尽管是这样烦琐的诗型，但是人们所以选择它进行文学创作，大概是因为“词”属于与“诗”不同的世界，“诗”中不能吟咏的，它可以吟咏吧。它是需要有音乐配合的，即在有歌妓娱乐的地方里咏唱，所以它可以表现男女爱情的心理和女性的姿态等在“诗”的固定世界里无法表现的东西，如果假托女性的口气，即使吐露真心话也不会被责备。今天，把中国的文学史上

的某些“词”当做不健康的作品予以排斥，然而所谓的不健康之处，恰恰就是其魅力所在。在苏轼（四川省眉山人，号东坡，1037—1101年）出现之后，把“词”男性化了，似乎更吸引着人们。由于它比近体诗的数字多，可以加进更多的事实和感想，而且由于一首词分前阙和后阙（也有不是这种情况的），可以对照比较今昔，内容有变化。毛泽东作很多词，恐怕也是为了便于充分地表达自己思想吧。

苏轼以前的“词”，作者即便是男性，内容也属于女性。说“词”是代言体，恐怕也是从说它是异性的代办这个地方来的吧。评价的标准，杜甫和李白等为代表的诗是以阳刚之气为好，词则相反，必须使用委婉。忧郁、幽深和情丽这类常用的套话。对丈夫和恋人的爱情，嫉妒，怨恨，由于季节变化的伤感，悲哀，在外地的孤独感，这类东西作为词的题材占有最大比重。

词发生大变化，应归功于苏轼。“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这种评论很好他说明了他在“词”发展历史上的地位。不受以往狭窄题材和用词的束缚，在诗和散文的领域中也注入了“词”，在思想上开拓了高境界。词从一定要有音乐伴奏才好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作为足以倾注文学创作热情的体裁确立了起来。粗略地把他以前的词的倾向当作婉约（斯文）派，把他看作是与此对立的豪放派的开山祖师也合乎道理。在“诗”的体裁上，他不仅打开了奔放的幻想、精密的观察和表现、开展诗论等新境地，而且在押韵上制定出必须用与友人诗中使用的同样但文字押韵（把它叫作和韵或次韵）的规则，以此曾试验过怎样才能从束缚自己的手脚中解脱出来，在“词”中，同样不仅谋求过题材和表现的扩大，而且试验过大量使用和韵和典故，进而把他人和自己的诗很好地纳入“词”中的技巧。在他的“词”作中，《水调歌头》和《念奴娇》特别著名。

作为苏轼以前的词人，有专门赞美女性的容貌、服饰、姿态的晚唐的温庭筠（山西省人，812？—866年），由于将受其影响的词人韦庄（陕西省人，836？—910年）编入词集《花间集》（后蜀的赵承祚编于940年），而被称作花间词派的鼻祖。在五代（10世纪）被称为南唐词人的群体抬头，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李煜（937—978年）。他是五代乱立的小国家之一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所以也称李后主。丧失皇位后，其词已不再采用充满深刻的悲哀，像以前那样借用不幸女子的口气吐露自己心境的手法，而是直接宣泄自己的心情，给后来的豪放派手法以影响。进入北宋以后，柳永（福建省人，987？—1053年）出现了，接着出现的是苏轼，在苏轼之后出现的是毛泽东也喜欢读的李清照这位女词人。她为避战祸，与夫来到江南，丈夫病死在南京后，她孤独一人在杭州一带苦度晚年。李清照身上有封建社会女子常见的那种自卑感情，她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填了浅显易懂、带有独特性的“词”。她在婉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在最近的文学史研究中，有种倾向认为，她兼有豪放派的特色。南宋（12—13世纪）受金压迫之后，爱国感情强烈，出现很多反映这种情况的词人，其中辛弃疾（与李清照同是山东省济南人，1140—1207年）很有名，与其齐名的著名爱国诗人是陆游（与鲁迅同是浙江省绍兴人，号放翁，1125—1210年）。

毛泽东的“词”，在气势宏伟和感情豪放方面，继承了豪放派的体系。但是，从各个重要处的用词上表现出来的女性式感觉来讲，在本质上与婉约派有共同之处。就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也有婉约派式的作品，所以这

并非不可思议。可以说，毛泽东从两派最突出的长处中吸取营养，把自己的作品精炼到更高层次的诗境。而且，他的个性本身具备那种复杂性，所以由个性喷涌出来的词自然具备那种格调。在用词上大胆地采用现代汉语，而且加进现代的事件和人名，这也表现出一种超越两派的延伸和综合的新鲜感。

注释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937年第一版。字佐美诚次郎译，日本筑摩书房1952年出版。

周佛海：《往矣集》，古今出版社，1943年。

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田边和一译，日本东和社，1953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高杉一郎译，日本三铃书房，1961年。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50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高杉一郎译，日本三铃书房，1961年。

冈崎俊夫：《毛泽东与词》，1957年发表。收入《天上人间》，日本同文集刊行会，1961年。

小川环树：《苏轼》、《中国诗人选集》，日本岩波书店，1962年。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1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大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二、长沙时代的毛泽东

1. 长沙

诗集开卷第一首《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 33 虚岁时之作。在公开发表的诗词中，这一首是最早的，而且是他的杰作。已进入壮年时期的作者，想通过回忆过去总结自己的前半生，因此它起到为今后诗的世界拉开序幕的作用。而且又是吟咏长沙的，就更让人感到放在诗集的卷首与作者更为相称。这是因为作者几乎整个二十多岁的时期，可以说是人格形成时期，都是在长沙度过的。青年时代的社会活动和后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员的活动，也都是在这块土地上。此后，作者也曾吟咏过长沙或湖南省，但是这第一首诗在描述青年时代的自画像这一点上是令人感兴趣的。

关于长沙时代的毛泽东，一册书中已有记述。材料虽然不多，但是书中简单地涉及了词的背景。

毛泽东与长沙的关系始于 1911 年。那一年，他跟中国的农民一样，肩上担着扁担，挑着随身携带的行李，从家乡韶山冲来到县城湘潭。然后他挤在内河轮船的三等客舱里，顺湘江而下，去省城长沙。从家到长沙只有 60 多公里，相当于我们日本长沙时代的毛泽东从平家一带到东京的距离。长沙是他很早就憧憬的城市，那里有古老的文化，又是经济中心。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长沙是座“美丽”的城市。

就在毛泽东去长沙的 4 年前，一位在中国旅行来到长沙的日本人，也曾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和生机勃勃而感叹，他作了如下记述：

“ 谚语中把湖南称作‘六水三山一耕地’，耕地虽然不多，但是却被称为。‘湖广熟天下足’的肥沃土地。其物产的丰富可想而知。长沙为省城所在地，人口约 50 万，街道只有四五米宽，极为狭窄。在披子街、南正街、太平街和青石桥这样的繁华街道上，或有轿子在疾驰而过，或有人力车在飞跑，背东西的，挑担子的，来往如梭，真有摩肩击毂之状。尽管粤汉铁路（广州至汉口间铁路，1918 年武昌至长沙间，1914 年广州至韶关间通车，全线通车是 1936 年）没有通车，但是临近洞庭，附近又有湘江，水上交通方便。实际上，长沙是湖南的一大货物集散地。” 不仅如此，当时的长沙改革之风盛行。出现了对清朝腐朽体制的不满和主张实行改革或革命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些人的活动十分活跃，常发表激烈的言论。因此，领导当时中国的是湖南省，是长沙。湖南的陈宝箴（湖南巡抚）、黄遵宪（驻日公使馆文书，后为湖南按察使，1848—1905 年）、江标（湖南督学）这些人与谭嗣同（批判儒教，因在反对袁世凯的政变中失败而被处死，1869—1898 年）、唐才常（因在上海策动“自立军”，起义失败而被处死，1867—1900 年）等湖南出身的知识分子合作成立的学校时务学堂，招聘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广东省人，1873—1929 年）为总教习（校长），实行近代教育，同时宣传爱国和救国。改革的模式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以在时务学堂里聘用了日本人教授。1906 年来长沙访问的一位日本新闻记者长沙的名胜古迹上发现有胡乱涂画的日文字母。“这当然不是日本人所为，足见风气走向。” 湖南省内掀起的学习日本热，甚至高到人们用“小日本”起绰号的程度。

梁启超等人是清朝体制内的改良派，但是从湖南省进而出现了试图推翻

清朝统治的革命派。正当各地按照他们的思想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已来到长沙的毛泽东从中受到强烈的刺激。黄兴（与孙中山等组织革命同盟，1872—1916年）、宋教仁（尽力强化国民党，被袁世凯暗杀，1882—1913年）、谭人凤（发动反袁世凯第二次革命，1860—1920年）等都是湖南出身，也被称作湖南派。十分关心并直接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北一辉（因二·二六事件被处死，1883—1937年）比起后来被称为中国革命之父的孙文（广东省人，字逸仙，号中山，1866—1925年）更对湖南派抱有同情和好感。实际上，湖南处在当时新思想的最前线。前面提到的那位日本旅行者感受到了这种空气，他作了如下记述：

“不只是贸易，历来湖南多健儿，具有慷慨气节之士亦不少。而且有‘湖南之绅士比地方官大’的说法。在北京的朝廷里，湖南人也受到重视，有隐秘的对手的印象。如果将来中国的局面有展开的时候，湖南人无疑应占有重要的地位。……有识之士，……不限于扬子江，应去长沙寻找。”

正因为“湖南多健儿”，所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在中国高涨起来后，过去被人叫“小日本”的湖南，这次站到最前列。1921年访问长沙的芥川龙之介记述了当时的气氛。

“我参观了长沙的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附属高等小学校。年轻教师板着以前少见的面孔领着我。为了排日，女学生都不使用日本制造的铅笔，所以书桌上摆着笔砚，她们正在做几何和代数。”

那时，毛泽东正担任母校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校长。如果是访问这个地方，或许“校长毛泽东先生会带领参观”吧。可实在有些遗憾，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长沙上述充满热情的空气，很快使毛泽东着了迷。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他，当时还不到18周岁。他胸中正燃烧起向往自立，试图寻找独立生活道路的梦幻之火。出去周游和反复摸索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首先入湘乡中学。在这里读孙文的革命纲领。其他的同志在广东策划起义，他在读过七十二人牺牲的报道后十分感动，把对时局的意见贴到学校的墙上（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第一篇政治文章）。他用剪子剪掉辫子。不久，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爆发了，他离开中学，作为一名士兵参加了进驻长沙的革命军。用月薪买来报纸和小册子，如饥似渴地读着。他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存在，认为这才是“救人救世”的最佳之道。清朝被推翻，北方军阀袁世凯（河南省人，1859—1916年）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后，他离开了军队。看到报纸广告后，随便订购了从肥皂制造学校到法政学校的指南书，在两个学校没呆多久，便立志自学。他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接触到西方的新知识。半年左右时间，父母不再寄生活费了。偶然在报上看到省立第一师范招生的广告，他接受代写两个朋友的作文，三个人都合格，便开始五年的师范学校的生活。说是受过三次退学处分（按照自己的计划学习，引起教师的反感），但每逢此时，总有教师为他辩护，最后经过周折才平安毕业。

师范学校是住宿制，而且不收伙食费和学费。所以，学生的最低生活是有保障的，也许他安心在这所学校的一个理由就在于此吧，至少最初这所学校的魅力之一是这样。不过，认为食宿方便就能把他留在第一师范学校，那恐怕过于肤浅了吧。他认真地与“教育救国”这一口号产生了共鸣，而且在这里遇到了良师益友。

2. 师，友，心之力

当时，在第一师范的教师中，有杨昌济（长沙人）和徐特立（1876年生于长沙附近），他们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杨昌济继承了中国宋朝的哲学理学的传统，倾倒于王船山（名夫之，湖南省衡阳人，抵抗清军失败后埋头著书，1619—1692年）和谭嗣同，经常谈论康德、斯宾塞和卢梭等人，他持有注重实践的独特的伦理观。在学校负责讲授哲学和伦理学，但是教科书是从《论语》中摘录的。在解释《论语》正文的同时，采取叙述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式。他讲课的第一篇以“立志”为题，用自己的见解对孔子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进行解释。

“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

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按照传记作者肖三的说法，杨昌济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那时对毛泽东的影响颇大。一般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不过为了避免误解，需要加以说明。杨昌济的认识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唯物论或唯心论，只不过他承认主体对外界的优势，并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伦理和价值观，从而确立了主体的优势地位，并使之能够发挥作用。没有必要把它勉强地纳入唯物论的范畴，但是在当时，以传统哲学形成人格同为社会改革信仰并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矛盾的。站在其先驱位置上的有杨昌济。而且，那未必是罕见的先例。

例如，董必武（湖北省人，现任共和国副主席，1886年生）在湖北省正同长沙的杨昌济一样，谈论起给予人格影响的人物。

“（15岁时……）来到武昌后，我住进了一个叫‘日知会’的著名俱乐部的集体宿舍。这个会原来是刘静庵创办的，……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会员中的一些人也是基督教徒。这个会虽然不大，但是影响却不小，特别是通过刘静庵的人格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会有读书会，因此扩大了知识面。”

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益阳县人，1894年生）一起议论人生的理想和理想的重要性，热心于游泳、静坐和徒步旅行，说这是散发青春的热情，没有错。但是，不可否认有杨昌济的强烈影响。如果说杨昌济是唯心论哲学家的话，那么毛泽东确实是杨昌济式的青年唯心论者。

当时，毛泽东写完《心之力》这篇文章之后，大得杨昌济的称赞。文章大概是论述“心”力的吧。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恐怕与杨昌济的讲课宗旨一样，或许《体育之研究》（《新青年》三卷二号，1917年4月）将它作了发展吧。因为据说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介绍给《新青年》的。

《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具有堂皇结构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极力主张现在学校里普及体操已经足够了，但是都流于形式，没有什么效果。首先必须强烈地打动自觉和意志，就是说，“心之力”是重要的。他说：

“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黑点为引用者所加）

有从肥皂到法政这样大振幅的毛泽东的救国理想（或空想），与杨昌济的人格汇合，首先让人感到已被汇集到自己的人格形成和主体的确立之中。而且，那种场合的自己即主体，正如《心之力》和《体育之研究》这些题目所表示的那样，自己同时包括了精神和肉体作为矛盾的侧面，其中，精神必须支配肉体。后来，毛泽东把这种精神的作用叫作“自觉的能动性”。但是，根据毛泽东自己的申明，在写《体育之研究》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讲的“自觉的能动性”与《体育之研究》中的“主观”和“动”有什么联系，与《心之力》这篇遗失的文章有什么联系，进而与杨昌济的教育和作为杨昌济的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有什么联系，依然是必须探讨的问题。然而，被说成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唯“心”论作为源泉之一予以肯定是对的，问题是怎样从源泉中摄取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参考，下面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段话：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后面叙述根据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正确思想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总之，毛泽东及其朋友们在杨昌济那里学到的不是关于哲学的知识，而是哲学本身支配生活的原理和价值观。而且大概像感到必须以此哲学制约一样认识到了奔放的生命力吧。在词中，作者为“万类”的“自由”的生命力的发展而赞叹，但是似乎在其赞叹中投影有作者那旺盛的热情和将其定向的价值观。

与杨昌济的师生关系也发展到私生活。后来去北京时，毛泽东在已转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帮助下，得到了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职务。而且，与其女儿杨开慧恋爱了，1921年在长沙结婚。遗憾的是杨昌济在1920年1月去世了。据说在北京和长沙都开了追悼会。开慧后来在毛泽东据守井冈山之后留在湖南时被国民党逮捕，强迫要求她发表离婚声明，但是她坚决拒绝，最后被枪杀了。

另一位教师徐特立，是开设国会请愿运动时割破手指写血书的热血汉。由于他生活朴素，又热心教育，因而赢得学生的尊敬。毛泽东等赞成蔡元培（与鲁迅同乡，北京大学校长，1868—1940年）和吴玉章（四川省人，现任中共中央委员，1878年生）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湖南开展运动时，徐特立以年过40岁应征，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还参加了“长征”，而且一直步行坚持到最后。1957年在庆贺80岁生日的时候，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写给他的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毛泽东的朋友数量，随着他组织的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活动扩大而增加。最初以杨昌济为中心的伙伴似乎有蔡和森和张昆弟数人。其中，蔡和森是最要好的朋友。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他与在巴黎的蔡和森互相通信坚定信念。

蔡和森与毛泽东的母亲是同乡（湘乡县人），比毛泽东大一岁。贫农出身，当过牧童，商店的小伙计，见习手艺人等。据说进入第一师范后，由于热心学习和认真勤奋，毛和蔡经常受到青年们的尊敬。他在岳麓山脚下的家像是祖的房子，毛泽东等朋友经常在这里聚会，新民学会的成立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他的母亲和妹妹蔡畅（现任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1899年生，李富春夫人）也一同前往。由于在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有实际活动，于1921年被强制遣送回国。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的要职，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

作为毛泽东的朋友，此外还可以举出陈昌（浏阳县人，1894—1930年）、郭亮（长沙人，1928年死）、向警予（淑浦县人，女，中央委员，1928年死）、罗学瓚（湘潭县人，与毛泽东是同班同学，1928年死）、夏曦（益阳县人，1934年死）和何叔衡（宁乡县人，只有他是年长者，长征开始时60岁，在福建省牺牲）这些名字。他们都是些有个性的青年，都作为中共党员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献出了生命。如果详细地谈及每一个人，将展现出具有“书生意气”的群相。这里可以从后来与贺龙一起在洪湖一带创建根据地，在那里战死的张昆弟当时的日记中看出那时他们的生活情况。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下午渡河至麓山下饮马塘民屋，蔡和森租居此也。

闲谈后，同游麓山，下山日落，遂宿蔡君家。夜与蔡君谈及日间之生活，余略谈暑假在乔市渐源寺之生活，蔡君欣然曰：余每日早四时半起，夜八时半睡。自四时半起即至天马山顶，静坐运动，至九时始下山；十时早食，早食后看书约二小时；下午或游走各处，或挖土种菜，间或看书，不以为正课焉；四时余午食，食后或静坐，或运动，或散步。每日冷水浴二次，早起后一次，临睡前一次。又于雷风雨烈之时，冒风雨而行，已练习数次，毫无风寒之感。上所言之事，已行之一月余矣；今年下半期，拟常行之，余闻之甚是之，蔡君盖锻炼意志锻炼身体者也。静坐，练心法也；运动，练体法也。冒风雨，冷水浴，练体法即练心法。大丈夫独患无身耳，体强心强，何事不可为？余知蔡君知所本也。

夜又与蔡君闲谈，不久即临床睡。床即就长凳两条，门板一块，架走廊边。蔡君云，自移居此地，未曾进房睡宿。

九月十六日。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新民学会会员）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至溁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至溁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

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九月二十三日。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

3. 初期的社会活动

毛泽东最初的社会活动是组织新民学会，它于1918年4月14日（星期日）正式成立。毛泽东制定的规章严格规定了生活上的戒律。会员资格是：“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参加成立仪式的有13个人，但是翌年五四运动时已发展到70余人，他们活跃在长沙和湖南省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中。开始他，“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于是用二十

八画生这个自己姓名的笔划数作笔名，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的广告撒到各学校去了。据说女子师范的校长怀疑广告的目的，特意访问了联络地点，查明了本人。（11）对广告做出回答的只有三个人（12），毛泽东自己记得是三个半人，所谓半个人是指后来作为中共的李立三路线而著名的李立三（湖南省人，现任中央委员，华北局书记，1896年生）。他说，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13）

新民学会成立三个月后，开展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宗旨是在法国边劳动边上学，学习欧洲新的制度和思想。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积极协助，徐特立及蔡和森全家等30多人参加了这一运动。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就是为了照料暂时集结北京的这些人，促成其愿望的实现。1919年初赴法勤工俭学者终于从上海乘船出发时，人们知道毛泽东决心不去留学都十分吃惊。徐特立再三劝他，但是他以更想了解本国的事为由拒绝了。

这次赴法留学运动，不仅使湖南知识分子向海外打开了眼界，而且也从留学生中培养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毛泽东自己没有去是耐人寻味的。他自己说：“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4）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使命感。（15）但是对长沙的强烈的眷恋和期望似乎也是事实。

据说1921年1月他和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进行4天讨论，当时在长沙的全体会员的意见是去法国留学，还要大力向东南亚发展。对此他是这样讲的：

“我不想离开长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想在这块土地上为学会打基础。”（16）

毛泽东去北京是1918年9月，但是翌年1月去上海，4月回长沙。对于北国的冬季景色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十分赞赏它的美丽。虽然贫困，但是生活上还是有基本保证的，而且与杨昌济的女儿开慧堕入爱河。不过他并非留恋北京，如果有离开北京的机会，还是以长沙为生活和活动的根据地的想法，在他从学校毕业后逐渐走进社会踏出第一步时就相当强烈和巩固了。在北京时，杨昌济想在报社为他斡旋一个职务，他似乎也很感兴趣。但是他那把自立和人生道路放在长沙进行开拓的决心，想来该是对去长沙时自己提出问题的回答。

1919年4月，自北京经上海返回长沙以后，在1921年7月作为湖南省代表与何叔衡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在长沙的活动十分出色。那不是焦躁地在暗中摸索，而是给人一种充满信心的年轻人的才华和热情爆发出来的印象。第一首诗里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他

在这两年里活动的真实写照。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游行影响到全国后，湖南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出现了排斥日货的动向。毛泽东于6月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以此为中心组织了可以说是国民统一战线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作为下级组织，有个叫救国十人团的基层组织，但是7月中旬，就发展到400人以上，10月进而又根据增加的数量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它的副总干事，就是第26首《蝶恋花答李淑一》中追忆的“柳”——柳直荀。

7月，他创办了学生联合会机关杂志《湘江评论》，每期都有著文，其中第二、三、四期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北京的《每周评论》评为“眼光远大，议论明快，确是当今之重要文章”。四川省成都的周刊《星期日》和北京的《又新日报》也都全文转载，一些杂志还发表了评论文章。毛泽东注入《湘江评论》中的热情是惊人的。在上海送走留法学生返回之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修业小学校，在高等小学部每周讲6个小时历史课，以此维持生活。同时把剩余的时间都用在社会活动上了。当时的朋友曾回忆说，《湘江评论》上刊登的文章几乎都是他执笔的，封闭后外稿没有了，他边忍受炎热和蚊子咬的折磨，边彻夜写稿子。写好稿子后还要做编辑、设计版面和校订工作，有时甚至去街上叫卖。月薪刚够支付伙食费，据说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子，旧的竹凉席，几本书兼作枕头。灰色的长上衣和白色裤子都是棉制的，而且都是破旧的了的。朋友们看不下去，想借钱给他，但是被他拒绝了。

由于军阀张敬尧（1918年3月至1920年6月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镇压，《湘江评论》在出完第五期后停刊了。虽然只有一个月的生命，但是影响却很大。毛泽东也曾就社会问题在报纸上写过评论。这一年的11月，在长沙发生花轿内嫁女自杀事件后，他第二天就在长沙的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了评论这一事件的文章，指出：“这一女子的自杀是迫于环境，所谓环境是中国社会、家庭和嫁出的地方。在这三面铁笼里她无法生存，于是死去。”其后，《大公报》上又刊登数篇关于这一事件的评论。据说由此事件引发，报纸上相继刊登了20余篇谴责封建制度的评论。毛泽东自己在14岁时，由双亲作主让他与一个20岁的女子结婚，尽管没有同居一次，但是他一定深深地感觉到那种不合理制度的弊病。已觉醒的青年都已痛感同样的烦恼和愤怒。为北京传来的五四运动的潮流和亲眼目睹周围发生的事情所刺激，在长沙的几所女子学校里也出现了加入新民学会的女学生。而且从1921年开始，男学校向女子打开了门户，毛泽东的恋人杨开慧在这一年与几个同学转入岳云中学。她因为剪短发而被迫从福湘中学退学了。第一师范和岳云中学是长沙男女同校的最早学校。

接着12月，开展了针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排斥日货游行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在学联会议上提议举行全湖南省大罢课，在长沙，包括部分小学校在内，学生一万三千余人参加了罢课。学联进而向各地派出代表团，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为了向内阁请愿，在新华门前耐心地等待了几个小时要求接见，那是1920年春的事。新华门面向长安街，在天安门西侧，现在已用朱红大漆涂抹锃亮，门的两侧有卫兵站岗。门里面可能是一些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住处吧。从过去他曾徒劳等待接见的那个大门出来，不远处就是人民大会堂。据说毛泽东只带几个卫兵步行过去。毛泽东自己讲在第二次去北京时，他热心地寻找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于他的人

生来说，来北京具有重大意义。记下他这些话的是埃德加·斯诺。日译本译成：“从此以后，从没有犹豫”，但是中文本译成“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谁都不想误译，但是考虑到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似乎可以看出这种译法的细微差别吧。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发展运动，又从北京赶到上海，与在上海的湖南省人联系。但据说生活是很苦的，他的生活费来源是为洗衣房收罗和递送要洗的东西，不过多数收入却作为收罗和递送时的电车费而支付掉了。然而，这场运动成功了，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省。当时，一位正在中国旅行的日本人出于好奇，要求会见湖南督军张敬尧，他记下了几乎有一个连的士兵到旅馆迎接，然后护送到督军府那令人吃惊的场面。这个日本人被让到一个特别的轿子上，前后各有陆军中尉骑马保镖，“我确实得意洋洋，那是在中国旅行中最得意的时刻”。然而见到张敬尧后，由于没有话题可说，因此很是难堪。“张敬尧有四大天王，其中之一是他的弟弟敬汤，……他在会见我时也坐陪了，……我得到了关照，但是在这次会见的一周后，我按预先安排，离开长沙去岳阳楼游玩时，湖南发生了兵变，首先他的这个弟弟敬汤被杀，而且将其首级示众。”（17）这作为对毛泽东的词的解释，或许是题外话了。词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万户侯”说的可能是军阀们在长沙显示威风的样子。后来，毛泽东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如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长沙文化书社等。这样，与新民学会的亲密朋友们见面谈话的机会就没有了。于是他成立了星期同乐会，约定每星期日去长沙附近的名胜古迹游玩，为的是增加亲睦和休息。他们也去水陆洲。“携来百侣曾游”这一句大概包含着对那些星期日的愉快回忆吧。据说实际上这个组织只有十余人。

4. 在中共创立时期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大会，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后来从长征结束时就开始露骨地与毛泽东对立的张国焘（江西省吉水人，1898年生）和刘仁静（后来变成托派，解放后发表声明作了自我批评，生年不明）一起，作为北京代表出席了大会。前一年3月，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代表来华，在北京会见了李大剑（河北省人，北京大学教授，1888—1927年），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安徽省人，中共第一任书记，后来被开除出党，1879—1940年），其结果是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共产党的创立作了准备。接着，在这些共产主义小组之下，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把“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的是梁启超，那以后约20年在中国开展了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李大剑和陈独秀是其中的核心人物，特别是李大剑，他克服了无知和歪曲，把俄国十月革命的正确意义传播到中国，在这件事上，他是有功绩的。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受到两人的很大影响。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时，似乎比上次有更多的机会同李大剑交谈。1920年9月，在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推进留苏运动。翌年春，刘少奇（湖南省人，现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1898年生）、任弼时（湖南省人，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1904—1950年）、肖劲光（湖南省人，现任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1903年生）、罗亦农这些人去苏联留学就是这一运动促成的。毛泽东自己同赴法留学运动时一样，也没有去留学。他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是1949年12月。但是他当时已经在考虑应该实行俄国式“彻底的全面革命”，为此必须建立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在湖南省的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了文章，在给巴黎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也强调了这些。蔡和森传来欧洲的社会运动现状，他用激烈的语言批判了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对此，毛泽东赞成说：“观点极为正确。”这种理论问题也在中国出现，恐怕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与蔡和森等人的来往书信，由毛泽东编辑成三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出版了（18）。在60年代同苏联共产党就原则问题进行论战时，考茨基、伯恩斯坦所说的中共的先例或许就在这里面吧。

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为了建立党的组织而活动。湖南地区委员会成立后，他任书记。地区的地区委员会也包括江西省安源煤矿，他不仅指导长沙的手工业工人、人力车夫、工厂工人的劳资纠纷，而且指导煤矿工人的组织和斗争。那个时候，李立三（1921年冬以后）和刘少奇（1923年秋至1925年春）住进安源，站在工人的前头参加斗争。

后来在延安任财政部长的李六如，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作家出版社，1961年）中描写的，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党开展活跃的工作情况。李六如（小说中人物名叫李交恕）是与武昌起义有关系的志士，由于对国民党的腐败失望而在长沙十分苦闷，在担任教员期间结识了何叔衡，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后加入了共产党。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留着光头，有人叫“陆军头”，身体不胖，个子相当高，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是一个开朗的青年，穿着中国式棉上衣，脚穿黑色棉布鞋。李六如为他经常手拿报纸和书籍走路那种用功的样子而吃惊和敬佩。

1922年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他参加了翌年6月在

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陈独秀对立），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上海的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1924年1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国民党合作是党的方针），被指名为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那一年冬季，因病休假回湖南省疗养。生病疗养，这也是他跟斯诺说的，但是在别的资料中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党中央里人际关系不好，被迫以生病为名离开的。据张国焘后来说，他是由于对国民党采取过于右倾的态度受到批评，被免去中央委员职务后派到湖南的⁽¹⁹⁾，生病恐怕是事实，但是与陈独秀对立也是事实。这种事情可另当别论，比起当中央委员什么的，在湖南做农村工作对于他来说或许更为畅快。

1925年春，他出现在故乡韶山之后，便马上号召农民组织起“雪耻会”。意思是，雪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遭受到的国耻。然而不仅限于此。通过“雪耻会”的活动，在故乡周围的村子里建立起共产党的支部，培养了党的干部。据说为此地主请求反动派出动军队逮捕他，于是他逃往广州。他离开上海是1924年冬，出现在韶山前的几个月是在长沙度过的。第一首词《沁园春长沙》大概就是当时之作，或许是以当时的见闻和感想为基础的作品。

5. 沁园春（第1首）

长沙 1925年

岳麓山上火样的红叶，奔流不息的湘江水，这大自然，对于青春年代在这里锻炼身心的作者来说，是多么的亲切。今天，久违了的严峻但却充满活力的秋的天与地，又在召唤作者，把他那救国理想变成富有诗意的东西。“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青年时代写在日记上的志向，书生议论天下事的志向，眼看就要压倒当权者。其意气正与大自然的气势相融合。

沁园春

长沙

一九二五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注释

【沁园春】114个字。双调。前阕13句，后阕12句，但是后阕第一句的开头加了两字，与原来的四字合成一句。相当于前阕的第二、三句的地方，后阕成了八个字一句。前阕和后阕都是同一形式。另外，这八个字一句可断为三个字、五个字，不过断成一个字、七个字的也很多。前阕的押韵字有四个，头、流、由、浮。后阕有五个，游、稠、道、侯、舟，都必须是平声。一韵到底。七字句的第五字必须是平声字，但是作者使用了仄声字。竞、万就是这样，这一点，在《雪》中也被忽视了，前阕的看、问，后阕的恰、到是一字豆，是按使用一字构成语的规则，这是必须遵守的。

【长沙】湖南省行政机关所在地。在湘江东岸，风景秀丽。毛泽东从1911年虚岁19时开始，一直呆在长沙，从这里的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独】与后半部回忆中出现的“百侣”对应，意思是说，现在没有同朋友在一起。在自己身旁，有无人影是另一回事。在杜甫（712—770年）的诗中也有独身一人与朋友对应的句子。“乱离朋友尽，……独在天一隅。”（《遣怀》）

【寒秋】虽然是秋天，但却近乎冬天一样寒冷。据说长沙10月份已变寒冷。

【湘江】也说湘水。是湖南省最大的一条河，北入洞庭湖。以河水清澈而闻名。

【去】出去后再不回来。

【橘子洲】也叫桔洲、水陆洲。湘江中的岛子，相当大，中心有海关等。东侧隔湘江与长沙城相望，西侧隔江面对岳麓山。

【万山】山峦重叠。指岳麓山。因山处在五大名山之一衡山的北麓，故此得名。

【红】霜打后枫叶变成红叶。在岳麓山上，枫树颇多。一日本人在访问此地的纪行中写道：“参观书院（岳麓书院），又见李北海碑后再入山路，在幽谷中有爱晚亭一座。这是据杜牧（803—852年）的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而得名的。满山枫树在晚秋阵雨后如同燃烧着的火焰，与亭亭耸立的翠松相映生辉，宛

如锦绣一般。”（20）

【层林】从山麓至山顶，林木层叠。进入秋季，岳麓山上的红叶有深红、浅红、金黄等各种颜色。久住长沙的人说，这层字确实用得恰到好处。

【漫江】满江。

【碧透】深蓝色而透明。湘江与长江的混浊相比，以清流著称。来自日本的旅行者认为这边风景酷似日本。“船已渐入湘江。灵均（屈原）抱石汨罗畔，孤雁哀鸣飞入云。下午二时，过湘阴，水色始如碧，两岸烟雾茅屋宛如祖国（日本）光景。”“入湘江，愈加清澈。”

【百舸】百形容数量多，同百侣的百字。舸为大船。

【争流】船在江上比赛速度，争相行驶。

【鹰击】鹰飞翔的姿势充满力量，故说“击”。

【翔】鱼在水中游的气势宛如鸟在空中飞翔。

【浅底】水清澈可见江底。湘江水清是有名的，古代地理书上有“清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傅蒲矢，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湘中记》，《水经注》）。

【鹰击以下二句】用仰视俯瞰来描写眼前的大自然。鸟和鱼对照描写的例子在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就有。“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旱麓》）。意思是说，像飞鸢、鱼跃一样培养人材茁壮成长。晋朝的陶渊明也有诗云：“望云愧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意思是说，看到自由的鸟和鱼后自己很惭愧，但是自己也有真实的理想，自己的行动不想总由别人约束。陶渊明作这首诗的年龄，一说是35岁，一说是41岁。但是前者似有力些户这样，很接近毛泽东作这首词的33岁。当时陶渊明的官职是讨伐农民起义军的幕僚，但是毛泽东是在家乡湖南省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因此两者的立场完全相反（陶渊明也许对自己的职务感到矛盾吧）。这首词虽然描写的是与《诗经》和陶渊明的同样景色，但是却开辟了更新的境界。发展到下面的句子，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心中对新革命运动的志向在起作用吧。

【万类】一切动物。森罗万象，万物，宇宙。“虽万类之众多，独在人而最灵”（梁·武帝《孝思赋》）。

【霜天】下霜的天空，秋空。古代认为霜是从天上降下的。陆游的诗中有：“陇头十月天雨霜，……”（《陇头水》）。

【自由】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性，不受其他的约束。

【怅】伤心、遗憾、忧愁。意思是眺望、等待回来人，但是没有见到而悲伤。这里讲的似乎是期望的东西未得到满足而十分悲哀，而在悲哀后面又涌出强烈的期望。

【寥廓】广远空阔。在古代楚国的诗歌集《楚辞》中有“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远游》）。是指为寻仙境，在天国旅行的屈原（也有说不是屈原的），找到虚无的理想境界，于是他升天来到天的间隙，向下望着无底谷地时的情景。“下深逮无地，上广阔无天”⁽²⁴⁾。正像“无地，出地之下也。无天，出天之上也”⁽²⁵⁾这种解释所表明的那样，是形容天空之上的天空那种宇宙之广大。毛泽东在别的诗词中也爱用这个词。“寥廓江天万里霜”、“我欲因之梦寥廓”。这首词中的“寥廓”与下面的“苍茫大地”是相对应的，但是似乎也与开头的“独立寒秋”对应。就是说，面对这样广大的宇宙，意识到只有自己“一个人”。作者爱用寥廓这个词，可以说与《楚辞》不是没有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楚辞》九卉的下述一节，这首词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屈原弟子宋玉之作。据说是代表老师心情作的）。《诗经》代表北方中国，而《楚辞》代表南方中国。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是楚国的中心，长沙是屈原自杀前流浪的地方。作者对叙述忧国至诚的同乡老前辈表示关心。

【苍茫】辽阔遥远不清楚貌。正如北周庾信的诗：“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拟咏怀二十七首》）、唐代李白的诗：“明月出天上，苍茫云海间”（《关山月》）那样，感觉有失去了光亮的暗淡，一种青黑色的色彩感。伫立在桔子洲头沉思多时，西面岳麓山一带夕阳西下，广阔的大地已变暗淡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那不寻常的伤感。

【主】主宰。

【沉浮】消长兴衰。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无数王朝兴亡。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同时作为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可是军阀混战不断。

【谁主一句】历史的舞台是中国大陆，眼前的苍茫大地是谁在决定着历史的发展？在自己提出问题的同时，开始追忆起致力中国改革的友人，后半部分也叙述了这件事。

【怅寥廓以下三句】与其说宇宙之寥廓引出作者的哀叹，倒不如把它解释成面对广阔的宇宙，作者在为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哀叹更好一些。

【百侣】许多朋友。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友和新民学会、星期同乐会的朋友。

【峥嵘】山峰险峻、耸立的姿态。这里指的是苦难的岁月垒积的样子。杜甫的诗中有“旅食岁峥嵘……”（《敬赠郑谏议十韵》）。

【稠】多。经常重叠。

【恰】正值，恰好。两方偶然相遇。

【同学】同门弟子、学友。现代汉语中是指在同一学校、同一个班学习的友人。杜甫的诗中有“同学少年多不贱”（《秋兴八首》即过去的学友少年很多人都发迹了的意思）。

【风华】风采（外部的姿态）和才华（内部的力量）。

【茂】旺盛。美丽富饶。

【书生】读书人，做学问的人。在古代中国，读书和学问都是为在科举中合格的应考学习。因此，处在合格前应考学习中的“书生”，一般为世人所轻视。把缺乏经验、不了解社会的年轻人叫“白面书生”也出于这种语感。在唐代诗人高适的诗中也有“鲁连（战国时代人）真义士，陆逊（三国时代吴人，将军）非书生”这种例子。毛泽东在这里自称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是还不懂事的“书生”，但是实际上包含有作为从事创造性事业的青年的自豪。这是把否定的、轻视的词汇反其意而用之，毛泽东经常运用这种表现方法。1960年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年轻人、不大知名的人、地位低的人和没有钱的人做了许多事情。”⁽²⁶⁾就是说，干出创造性事业的是“书生”。

【意气】激烈高昂的气概。

【挥斥】为所欲为，奔放。《庄子》里有“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田子方》）。注释中有“挥斥，犹纵放也。”

【道】遁劲，强劲有力。

【江山】国土，这里指国事。

【指点】指示、批评、评论。

【激扬】激浊扬清。浊喻恶，清喻善，攻击恶而赞赏善。

【文字】文章。大概是指刊登在《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大公报》等上的文章。1915年9月，袁世凯企图称帝时，湖南军阀予以支持，禁止反对运动。毛泽东曾制作反对的小册子，振奋了人心。

【粪土】腐烂的土。孔子在《论语》中叱责睡午觉的弟子宰予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公冶长）

【万户侯】拥有一万户人家居住领地的诸侯。这里指军阀。当时，汤萝铭、傅良

佐、张敬尧等人在湖南省称王称霸。排斥张敬尧运动，由于毛泽东的巧妙方针而获得成功。

【中流】江河中央。

【飞舟】像飞一样行驶的船。

【到中流一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振甫和臧克家的说法。游到江中央的毛泽东等逆流而上，溅起水花。因为这个缘故，甚至顺流而下的船也暂时被拦住了。另一种是邵燕祥的说法，那是来源于晋的武将祖逖（河北省人，266—322年）的故事。在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西北的异民族侵入中国北部，定都洛阳的晋（265—316年）不得不把首都迁至南方的建康（今南京），这是东晋（317—420年）。但是在向南迁的官僚地主中，只有祖逖积极主张北伐，他企图收复失地的热情很高。正在向南迁都的琅牙，王司马睿（后来的元帝）只拨给祖逖一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让其北伐。然而，祖逖毫不气馁，他率领少数部下出发，渡过长江在江苏省的淮阴招募兵力，铸造兵器。于317年、320年两次大破敌军，收复了黄河中下游以南的土地。可是东晋的朝廷反而嫉妒他的成功，因而加强了控制。后来又发生了政变。祖逖在愤慨之余病死了。祖逖渡江中流击楫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晋书》祖逖传）。因此，说“中流击水”，如同“背水一战”，是指下大战”，是指下大决心收复祖国。南宋的爱国武将文天祥（江西省人，1236—1283年）著名的《正气歌》中有“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这也在南宋文人张孝祥（安徽省人，1129？—1166？年）的词《水调歌头》中使用过，“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传说祖逖与同士一起休息时，半夜里听到鸡叫报晓，他说“这不是坏消息”，然后慷慨起舞。⁽²⁷⁾我是采用后者的说法翻译的。不过正如邵燕祥所说，毛泽东使用典故的地方，乍一看比较难懂。词本身写得通俗易懂，即使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没问题。当然，如果了解用词中的典故，那倒是很有滋味的，这也是事实。这里的祖逖因鸡鸣而振奋的传说，也许投影到毛泽东后来的作品“一唱雄鸡天下白”中了吧。

诗词大意

我今天没有跟朋友一起，而是孤身一人在寒冷的秋天站在湘江的中洲桔子洲上。眼前的湘江不停地向北流去。

当举目眺望岳麓山的绵亘山峰时，那重山中叠叠枫林如同燃烧着的火一般，红叶染红了一切。江面上呈艳绿色，好多只大船在竞相航走。

再向高处那晴朗的天空望去，鹰在空中像发射出去的子弹一样高速飞翔着。俯瞰江水，清澈透底，鱼儿在水中游着，宛如在空中飞翔

一般。啊，一切生物都在这霜后的凛然秋天，无拘无束地发挥着全部力量，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生命。

然而，中国社会的情况怎么样？人民的生活如何？仰望开阔广漠的天空，自己好像到了古代诗人说的天上天，一种悲哀和叹息同这广大的宇宙碰撞。不知不觉中，落日的余晖已把大地变成暮色，景色也渐暗淡了。我面向大地发问，过去历代王朝兴亡，现在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和买办财阀的压迫之下，究竟主宰历史的是谁？

许多朋友曾相聚一起来桔子洲游玩，当眷恋过去回首往事时，那是不寻常的岁月。当时同学们正处少年时，青春年华，风采和才能正盛。胸中燃起改革社会的热情，努力学习和锻炼身体，做事不受任何约束。

发表评论中国的形势，抨击军阀等和鼓舞人民的文章。眼中无军阀等，视他们为尘垢。

当年的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在这条江里划船的时候，离开岸边到江中央，仿效古代的爱国者用桨击水，誓为祖国的未来效力。急流的波涛汹涌，飞速直下的船也

被迫暂停航行。

注释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宇野哲人（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研究家）：《支那文明记》，日本大同馆，1912年。

德富苏峰：《七十八天游记》，日本民友社，1906年。

宇野哲人：《支那文明记》，日本大同馆，1912年。

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1925年。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尼姆·威尔斯：《红尘》，陆井三郎译，日本新评论社，1953年。

《毛泽东选集》第2卷。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11)周世钊：《湘江怒吼》，收入《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12)同上。

(1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14)同上。

(15)竹内好：《毛泽东》，日本《中央公论》杂志，1951年4月号。贝冢茂树：《毛泽东》，日本岩波书店，1956年。

(16)周世钊：《湘江怒吼》。

(17)诸桥辙次：《游支杂笔》，日本目黑书店，1938年。

(18)丁守和等：《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63年版）。

(19)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日本庆应通信，1959年。

(20)宇野哲人：《支那文明记》，日本大同馆，1912年。

(21)同上。

(22)德富苏峰，《七十八天游记》，日本民友社，1906年。

(23)一海知义：《陶渊明》，《中国诗人选集》，日本岩波书店，1962年。

(24)青木正儿：《楚辞新译》。

(25)蒋骥：《山带阁注楚辞》，1913年出版。

(26)竹内实：《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一个半小时》，收入《毛泽东笔记》日本新泉社，1971年。

(27)邵燕祥：《毛主席〈沁园春长沙〉结构试解》，《文学评论》1962年6期。

三、从长沙到武汉

1. 从长沙到武汉

《沁园春长沙》到第2首《菩萨蛮黄鹤楼》的两年间，中国的社会动荡不定，十分复杂。不仅整个社会大动荡，而且在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部，各自也都出现了矛盾和纠葛。作为社会上的大事件，首先应该举出“五卅事件”和“北伐”。在写《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的前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就总体而言，用中国革命史的语言来讲，中国革命蓬勃兴起，革命的惨重失败也在这两年间。如同《沁园春长沙》总结了以前的生活那样，可以感觉到在《菩萨蛮黄鹤楼》中，作者以这两年为背景，流露出对革命的深切感情。

正如1925年“五卅事件”所象征的那样，这个时期高涨的工人运动是惊人的。所谓“五卅事件”，是指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经营的纺织厂发生纠纷时，向工人开了枪，由此引起工人的抗议运动和反帝运动。在英国统治的香港，十几万工人撤回广州，使香港一时变成死港的“省港大罢工”也是受“五卅事件”的影响。1925年，有组织的工人为54万人，翌年达124万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工人是多么快地提高了觉悟。

从长沙别武汉以这次“五卅事件”后的工人运动的高涨为基础，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以前称大元帅府），又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为核心，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被组织到广东省农民协会中去的农民支持它。农民协会会员也从1925年仅广东省有的不到20万人，急剧增加到翌年的62万人。农民们组织起自卫军协助封锁香港，并为罢工中的工人提供资金。

另一方面，在北方，中华民国只是徒具形式，成立了执政府。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各军阀或联合或对立打内战，但是由于受“五卅事件”后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安徽省人，受孙文的影响，基督教徒，1880—1949年）把自己的军队改称国民军，并与奉系军合作大破直系军。段祺瑞（安徽省人，1864—1936年）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注北京自称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并成立了执政府。段祺瑞对外实行屈从政策，对内镇压反帝运动。向北京的反帝游行队伍开枪，枪杀四五十人的就是他的军队。鲁迅把这一天叫“民国以来最黑暗之日”（《无花蔷薇之二》，收入《华盖集续编》）。那是1926年3月18日的事。这天，一起上街游行并负责指挥的李大钊也负伤了。由于国民军的出现，在中国北方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从此走向低潮。

与北方的停滞形势相反，南方的革命正迎来高涨时期。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试图讨伐北方的反动军阀，在中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北伐军总司令是蒋介石（浙江省人，1886年生），但是他不仅把军队，而且把国民政府支配的各省的民政和财政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下，完成了军事独裁。孙文为了同段祺瑞商议，去了北京，1925年3月12日在那里病逝后，国民党右派企图赶走共产党，另立国民党中央。所以左派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承了孙文留下的政治遗产——国共合作。蒋介石此时属于左派，他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施展阴谋进行排除中共势力的工作，大肆逮捕共产

党员（当时，周恩来也遭到逮捕）。毛泽东主张给予反击，但是陈独秀却一再妥协让步。“北伐”本身虽然有这种内部的纠葛，但是前进是顺利的，罢工中的工人发挥了运输队等的作用，进入湖南省以后，毛泽东组织的农民协会的农民自卫军和安源煤矿的工人也参加了北伐，此外铁路工人破坏铁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等，北伐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北伐军的内部，由于共产党员形成了核心力量，当然应该算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据说特别是共产党员叶挺（1924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被蒋介石投入监狱，战后释放。在返回延安时，因飞机故障而死，）率领的，几乎全都是共产党员的士兵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先遣部队，英勇善战，严守纪律，深得民心。国民党中央违背蒋介石的意愿，不是在南昌而是决心把叶挺部队警备的武汉作为新首都，这可以说人们已经公认“北伐”的真正功绩属于谁了吧。

武汉也叫武汉三镇，它是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市的总称。在长江和汉水的汇合处，隔江紧密相连，现在已合并成武汉市。作为长江中游的大城市，除有美英资本的烟草工厂和日本资本的纺织工厂等外，海关和邮政都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所以“五卅事件”时，这里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英国海军陆战队用机枪向游行队伍扫射，还切断租界的电源，乘着黑暗将尸体扔入江中。在决定武汉是新首都并召开庆祝北伐胜利大会时，在上一次的同一地点，英国水兵又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60余人。对此，武汉政府立即接管了英租界。这里反映了苏兆征（广东省人，总工会执行委员长，1885—1929年），刘少奇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情况。

蒋介石与对这种革命运动感到威胁的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在南昌和九江镇压了共产党，其后又对通过三次武装起义将上海夺到手中，以此来迎接北伐军的该地工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这就是“四一二政变”。这一天之后，不仅在上海，而且在东南各省都发生了流血事件，在广州也出现了屠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并号召全国讨伐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封锁了武汉，使得武汉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动摇。在武汉政府的军队中，又出现了叛乱，在长沙，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被杀害。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名兆铭，原籍安徽。追随孙文从事革命，1940年与日本合作成立了“纯正国民政府”。病死于名古屋。1883—1944年。）一派决定赶走共产党，在进行了不亚于上海“四一二”的大镇压和大屠杀之后，与南京的蒋介石联合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结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五卅事件”时，毛泽东在湖南的农村搞农民运动，大概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吧。不久，因为有被捕的危险，他去了广州，担任了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报》的编辑。在1926年1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亲自拿起教鞭。然而在同年5月，蒋介石实行党务整理案，于是，从中央的各部长中排除共产党员。毛泽东担任了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自12月开始用约两个多月的时间考察了湖南省各地的农民运动。因为北伐战争以后，高涨的革命空气充满了农村。据同年4月的统计，湖南省的农民协会会员达518万人。在考察途中他只在家呆了三天。

出现在故乡韶山的毛泽东，受到男女老少近千名群众的夹道欢迎，他们互相坦率地交谈着。他在欢迎会上的讲话，通俗易懂。当时还是小孩子的一

个农民，记得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是：“世道变了呀！过去只有手推车，走路靠步行。但是现在已经有汽车了，早上从湘乡县去湘潭买肉，回来吃早饭都来得及。”他身着中国式的上衣，行李只有提篮和箱子，带着雨伞。他同农民边走边聊，遇到路上有杂草刺时，他就用伞拨开让农民先走，长沙的欢迎会也是盛大的。这个时候的考察报告就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明快地揭示了被谣言和误解笼罩的农村斗争的真相和意义。从湖南省委员会的机关杂志《战士》连载这个《报告》便可以想像出他的《报告》是多么让人盼望的文章。反动派到处传播农民杀人放火的谣言，然而实际上是他们屠杀了大批农民和农民协会的干部。北伐战争初期，赞扬农民参加北伐军的反动派，在农民斗争从1926年10月开始以不法地主和当地的封建富豪为对象之后，他们便集结力量进行攻击了，在各地发生了殴打事件和杀害事件。毛泽东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他甚至说“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这些话在《毛泽东选集》中被删去了）。党的机关杂志《向导》和汉口的《民国日报》中途停止连载，也是因为毛泽东的这种明快的评价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发生了冲突吧。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上没有了毛泽东的名字，似乎也说明了这段时间的情况。当然，毛泽东提交大会的《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被无视。但是，在前一年的12月，在他受欢迎的长沙举行的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一，即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于共产党大会的翌月在武汉实现了，毛泽东被选为主席，虽然受到党的主流的排斥和打击，但是可以说，自下燃起的实际运动与他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为严厉批评采取错误路线的党中央主流而写的（1927年5月，在长沙发生了反革命恐怖活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员转入地下，但是其后在长沙秘密会见毛泽东的谢觉哉记得毛泽东说“必须搞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他痛骂怀疑土地革命的同志是“黑眼晕”。“黑眼晕”是湖南方言，一种头昏目眩要摔倒的疾病），大体上在同一时期写的词是《菩萨蛮黄鹤楼》。如果说长沙是他的青春之地的话，那么有黄鹤楼的武汉则是他的革命之地了。在革命与反革命对立达到极点的形势下，如何对待令人不快的党内斗争，已经摆在他的面前。

2. 黄鹤楼

黄鹤楼在湖北省武昌县城（现在与对岸的汉口、汉阳合并为武汉市）的西面，面临长江的黄鹤矶上。关于黄鹤楼有几种传说：有的说过去一个叫子安的仙人，曾骑黄鹤经过此地（《南齐书·州郡志》）；有的说一个叫荀环的男子在修仙，一天在黄鹤楼休息，从西南上空降下一物，原来是一位骑鹤人，畅谈一会儿后又骑鹤离去（《述异记》）；有的说一个叫费祎的人修行成仙骑鹤飞去，但是当时曾在此地休息（《太平寰宇记》），说法种种。不过这些都与时代不相符，因此《报恩录》中记载的倒可以看作是神话的原型。按照《报恩录》的说法，古代在这座山上，有一姓辛的男子卖酒。一位老人白喝酒后总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半年过后，老人说用桔子皮在墙壁上画一只鹤顶酒钱。当客人拍手唱歌时，鹤便舞动起来。传出去后，辛氏成为巨万之富。十年之后的一天，老人又来了，他吹起铁笛，白云从天而降，鹤从墙壁

上下来，老人骑着鹤飞走了。辛氏在此建一座楼，取名辛氏楼。大概这个故事是原型吧。从笛子出现的年代看，估计最早不会在公元前50年以前，从《南齐书》上有黄鹤楼记载的时间上看，最迟是五世纪以前的神话，黄鹤也是与这个神话结合的说法。在南北朝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有玄鹤、灰鹤、白鹤，但是没有见到黄色的鹤。把用桔子皮汁绘画和古代长江流域桔子集市很多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令人感到这一神话的朴素味道。

游黄鹤楼的风习，是在唐朝盛行起来的，但是到了宋朝，建筑物似乎没有了。据说陆游入蜀时曾寻找过黄鹤楼，但是他连建筑物的遗址也没有看到。在宋朝的画上描绘的黄鹤楼是二层楼，分几栋，都有精美的雕刻。据说清朝建筑的是一栋三层高楼，但被烧毁了，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只有元朝的圣像宝塔，清末建立的奥略楼、抱膝亭、纯阳楼、陶公亭、涌月亭。这是词中讲的“剩有游人处”吧。这些建筑都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一侧的入口处，因有妨碍，所以暂时撤走了。有人说将改变地点重建，而且要参考宋、明、清的建筑物重新设计建造。

游黄鹤楼赞美此地的诗人很多，其中著名的是唐朝诗人崔颢以“黄鹤楼”为题的七言律诗，它已被收进日本出版的《盾诗选》中，所以日本人也是十分熟悉的。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第一句的原文也有“昔人已乘白云去”的，于是便采用第一句白云（过去），第二句黄鹤楼（现在），第三句黄鹤（过去），第四句白云（现在）对应的技巧。

传说李白为崔颢的诗而感叹，他不想以黄鹤楼作诗（讲黄鹤楼的诗很多）。后来李白以“鹦鹉洲”为题作了七言律诗。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不仅与崔颢的《黄鹤楼》十分相似，而且在第二联不对偶，违反律诗规则这一点上也很像《黄鹤楼》的第二联违反规则。李白有关黄鹤楼的诗，有收在《唐诗选》中的《黄鹤楼送孟浩然赴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作为名胜！不仅因其雄姿而被赞美，而且因古时候文人墨客在黄鹤楼留下的杰作而值得骄傲。毛泽东以“黄鹤楼”为题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说他的内心世界十分感动。比毛泽东早五六年，日本人芥川龙之介也曾来到这里，但荒废的风景令他大失所望。可以说，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沉滞需要改变了。对理解毛泽东的词也许不是什么本质的东西，但是作为参考，我引用一些日本人的见闻。

“来此地访问古迹的人，……只看到照相信和算卦摊，只好感叹，楼也驾上白云飞去了。只在一个角落里留下文余高的古石塔，以及后面高坡上奥略楼的宏伟飞檐式建筑，倒稍微消除一些不满意情绪。放眼望江上，大别山（汉阳的龟山）山麓上的晴川阁

尚存。长江正向东流去，身置孤帆远影碧空尽之中，真有成仙（羽化登仙，成仙升天）之感。“我所见到的是红砖已发黑的西式建筑。古老的砖建筑恐怕是文明开化的遗迹吧。挂在正面的匾额让人想起古代的东西。为缅怀昔日黄鹤楼的遗迹，比起西式建筑参观里面的奥略楼更好些。迎风翘起的屋顶和多角楼是雅致的中式建筑。比起红砖建筑黄鹤楼，这里更能看到黄鹤楼的风姿。然而我却不可思议地被那发黑的不很漂亮的西式建筑黄鹤楼所吸引。而且在观赏它的过程中，不禁想起武昌经历过的‘近代’一幕。这里发生过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在这里，军人义举成功，城头飘起新旗帜。……由于在政治上、军事上经常处在中心的位置上，所以容易让人想起这些事件。举目眺望汉口和汉阳，伫立在江边的黄鹤楼耸立的地方，自然感到那些风云中奋起的男子之志。……我这样的异国男儿也如此。在孕育着危机的清末的氛围中，不难想像那些排满兴汉热血沸腾的青年志士，以怎样的心情徘徊于这座楼的周围的。”

3, 菩萨蛮 (第 2 首)

黄鹤楼 1927 年春

前阕以写生的方式叙述名胜古迹的雄伟景致，后阕吟咏因想起传说中的黄鹤而高昂的心情。也许是面临反革命危机的时局的缘故吧，古人赞叹的风景也变得阴沉了。无法沉醉于仙人的梦幻和游客的娱乐之中的作者，大概心中在暗暗地发誓。当时，长江的狂涛巨浪是作者心绪的象征。

菩萨蛮

黄鹤楼

一九二七年春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注释

【菩萨蛮】44 个字。双调。前阕、后阕同型。二句一韵，共四韵。国、北、苍、江，去、处、滔、高。如果用罗马字调换韵的读音，便是 aabbc-cdd。而且 a 是押仄字韵，b 为平，c 为仄，d 为平，即仄一平一仄一平。这样支互地在音律美上下工夫，也是值得注意的。前阕和后阕的最后一句是按仄平平仄平的语调规律排列的，但是李白却打破了它，作成平平仄平并列词。有人遵循李白的，毛泽东也遵循李白的。但是前阕的“锁”是上声，不是平，所以又破了规律。根据“词律”，仄也是可以的。也有人认为，这不太正规。

【黄鹤楼】在湖北省武昌县城西部的黄鹤矶上。

【茫茫】天等无边无际，宽阔遥远。这里形容长江水流雄伟。虽然指的是从这一带到下游的景色，但是李白有赞美长江的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九派】九指数量多。派，水的支流。在湖北省和江西省一带有几条支流。*

【流】流贯。

【中国】建都于黄河南北时，开始使用处在四方之中这个意思来自称。这里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

【沉沉】宫殿等的深宅大院貌。一般认为这里指的是铁轨沉甸甸地伸向远方貌。现代汉语把重叫沉，这是活用它的新鲜形容。也有解释成铁路搭载沉重列车的。

【一线】指长江北岸的京汉（北京至汉口），南岸的粤汉（广州至武昌）两铁路。现在，由于架起了长江大桥，已经直通了。但是当时是利用渡船联络的。

【茫茫九派以下二句】从这个黄鹤矶上眺望景色，自古以来常为人吟咏。宋代诗人鲍照（414？—466 年）有诗：“东顾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登大雷岸与妹书》）。盛唐诗人王维（701—761 年）有诗：“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在王维的诗中，他赞美了一些支流连接的湘江和长江流向广阔遥远处，如同去天地之外一般的雄伟气势。在毛泽东的词中，贯通南北的铁路被进一步赞美，又把人们的联想引导到国民革命军（南方）和军阀（北方）的对立上。不仅有风景，还有令人感到革命与反革命的紧迫政治形势。即便是赞美从黄鹤楼上眺望的雄伟风景，也只是提出引来许多支流在东西流淌着的长江、横跨南北的铁路和在纵横

上最重要的东西。不偏重细微描写是作者的一个特点。

【烟雨】烟雾般的蒙蒙细雨。

【莽】宽广、辽阔、广阔貌。

【苍苍】深蓝色。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词中有“巫峡苍苍烟雨时”。（《竹枝九首》）

【烟雨一句】常去长江旅行的人会感觉到这种形容确实十分贴切。以往形容这里的景色常用“烟雨迷离”。作者如果在此处用“迷离”、“暗淡”的话，将有轻快和细腻之感，不过这一句所具有的更为宏大的妙处似乎没有表现出来。

【龟蛇】指对岸汉阳的龟山和武昌的蛇山。

【锁】封锁。龟山与蛇山在地质上是连接着的，长江的宽度在这里变得狭窄了，所以两座山把长江夹在中间相对而立，看上去如同封锁一般。虽只用一字，但却充分地表达了风景与革命的紧迫空气。与《水调歌头游泳》中的“龟蛇静”的用法比较，是耐人寻味的。

【烟雨以下二句】这是将辽阔的远景与龟蛇两山对峙的近景对比吟咏的。

【酌】作为中国古代的习俗，在饮酒礼节、请神降临之时，祭地神之时，有将酒浇在地上的仪式。这里不是仗酒礼节和祭神。面对中国的象征，历史的见证长江，作者大概想用这一酌的行为表现革命的理想和热情吧。

【滔滔】水涌流貌。指长江。

诗词大意

长江无尽头，它引来许多支流自西向东在我们中国流淌着。沉重的铁轨黑而发亮，贯通南北。蒙蒙细雨把开阔的风景笼罩成深蓝色。其中，龟山和蛇山将长江夹在中间，紧密地封锁和守卫着革命的据点武汉三镇。

古代传说中的黄鹤飞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其去向。留下来的只有散步和眺望的场所，然而这会怎样呢。我效仿古代的仪式取出酒杯，把酒浇到波涛汹涌的长江中。于是，如追逐长江那渐起的狂涛巨浪般，心中的波涛也高涨起来。

注释

毛远耀：《得到毛主席教育的韶山农民》，《中南地区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黎少岑：《武汉今昔谈》，《新观察》1956年第14、15、18期。

前野直彬：《唐诗选》，1962年。目加田诚：《唐诗选》，1964年。

藤田元春：《北支中支风物》，日本博多成象堂，1938年。

小田岳夫、武田泰淳：《扬子江文学风土记》，日本龙吟社，1941年。

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陈友琴：《读毛主席<黄鹤楼>词》，《文学知识》1959年3月号。

四、创建农村根据地

1. 井冈山

从第3首《西江月井冈山》到第12首《清平乐会昌》共十首，是创建并扩大以井冈山和瑞金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作品。《沁园春长沙》和《菩萨蛮黄鹤楼》分别是每一个时期的唯一作品，但是这十首是一个时期内的，因此可以说，作品数量相当丰富。能够按照自己的信念和方法在农村开展活动那种愉快心情，不是也反映在这些作品的数量中了吗？本来，十首中的后两首是他活动受到党中央限制时的作品，因此对词的题材也有微妙的影响。这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是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时期，作为在后来根据地延安制定各项政策原型的时期是重要的，尤其在这里毛泽东牢固地奠定了红军的基础和原型，其重要性是决定性的。红军与中国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红军的命运成为中国革命的命运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也可以说，在井冈山，中国革命重新开始了。不过，如果考虑扮演主角的毛泽东的话，显然那是过去的延续。他那以井冈山为据点在各地开展游击战的形象，与长沙时代以朋友蔡和森的家为中心进行徒步旅行的形象看不出有什么

不同。大体上可以认为，他不是那类否定过去或现在企图逃脱的人，他的成长方式是以不动的一点为中心，逐渐扩大同心圆的圈，同时多次反复。不仅圈的直径逐渐扩大，线变得更粗，而且坚定不移。作为湖南省内共产党员的工作，与在湖南省学联中活动时没有什么变化。学联的活动，不外乎是新民学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时活动的延伸。新民学会源于数名尊敬杨昌济先生的学生组成的小组。不管拿出哪个时期，好像全都不是急于清算和脱离前一时期。这样，所谓不动的一点是杨昌济呢，还是应该把他说的从1919年12月至翌年4月在北京生活期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自我的那个地方看作中心呢？不过，即便是后者，也与那以前的学生时代努力锻炼身心的他有联系。

总之，进入这个时期以后，毛泽东已经直接地担起革命命运的重担，与反革命展开了武装斗争。在与外界的框框发生抵触而散出激烈的火花之前，圈子逐渐变大并成长起来了。这个圈子变得像金属一样坚硬，但是敌人也很顽固。与初期在长沙探索自立道路和形成人格时不同，超越“立志”问题的客观世界严酷地包围着他。而且，在内部，又发生了“我”与包含“我”的更大的“我”——革命阵营、共产党的摩擦。这种“我”与作为个人的“我”一样，是一种也应该叫作“我”的存在，但那是必须经过复杂的党内斗争才能统一的“我”（我方）。井冈山（也含瑞金）时期的毛泽东处在这种内外两面矛盾的新阶段。在创建根据地的一开始，他顺利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但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主要是由于内部的“我”（我方，不是个人的“我”），不得不放弃辛辛苦苦开辟的根据地。问题的重新解决，留待后来的“长征”时期了。

关于井冈山，遗憾的是似乎至今还没有出版标出那里地形全貌的地图。那是横跨湘赣两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中段，从万洋山（望洋山）分开的一群山，但在当时市场出售的地图上，最详细的只有万洋山的名字。所以井冈山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小地方，按照文章的解释，毛泽东当时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中的一节简明扼要，然而对于只听地点还无法具体地想出地形的

我们来说，只好佩服毛泽东在写实用文章时也能运用强有力的美的艺术才华。根据毛泽东的这段叙述，井冈山地区包括山麓在内南北 90 华里（1 华里约 0.5 公里），东西 80 华里，周围 550 华里。所以大致是日本伊豆半岛那样大小。只是伊豆半岛上的主峰天城山高 1470 米，万洋山高 1850 米，井冈山周围的八面山、朱砂冲、桐木岭等高度从 1500 米到 1700 米。因此，地形相当险峻。在外围，又有永新的万原山、莲花的武功山、九龙山、茶陵的十八田、酃县的大庵等包围着井冈山。用中国的常用谚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比喻这里是恰如其分的。毛泽东选择这座山作为根据地，也许是注意到了对外可以成为坚固的城堡这一点吧，但井冈山的地形本身，确实适合坚守山寨。由于古代地震、地表的陷落和河流的侵蚀而形成的小盆地和峡谷，被高山和悬崖所包围，到处都有，其状似井。于是地名取大井、小井等用井的地方有五处，茅坪等也属于这一类。也有像走廊一样细长的峡谷。两侧是绝壁，溪流长达两公里以上，山麓入口处的道路被灌木和丛生的杂草遮挡着。而且入口狭窄，进入里面后有宽大的袋状峡谷。茅坪等地就是这样的地形。当年的士兵回忆说，分散在这种地形上的村子，利用仅有的几条羊肠小路与外界联系，山麓到山中村子要走一天时间。另外，别的士兵曾记述过井冈山的印象。

“高山数十里全是密林，遮蔽天日，必经之道才有小径穿插于树林壑壁间。山势险要异常，便于作战防守。山内虽然缺少人烟，缺棉缺盐，贫瘠荒凉，但四周二十多县却尽是产棉丰饶人烟稠密的平原。况且山内又盛产南瓜，瓜重常在百斤左右，如果部队被围粮绝，填肚皮的南瓜尽可不必恐慌。1928 年红军几次被围，大家就是天天吃瓜，顿顿吃瓜，以瓜度日。”

当时山中住有不足两千人，就是现在也只有两千二百余人。从这个数字大概可以看出山区的状况了。毛泽东在这里建有医院，被服工厂，兵工厂，各团的家属宿舍等。中心在茨坪，平地约三百亩。这里设立有湘赣边区特别委员会等党的各种机关和工农苏维埃政府。从这里到上面提到的大井、小井等地约五公里，到所谓的五大哨口的五大关门，北面的黄洋界，南面的朱砂冲、桐木岭和西面的双马石和八面山，分别约有十五公里（现在，从南昌经桐木岭到茨坪已通公共汽车）。毛泽东从 1927 年至 1929 年曾住在大井。

2. 从武汉到井冈山

7月15日武汉的革命失败后到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这段时间，曾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一个是8月1日朱德、贺龙（湖南省人，现任党中央委员，元帅，副总理，1895年生）和叶挺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另一个是8月7日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

南昌起义的总兵力约3万人，仅用了3个小时便占领了南昌，开始相当顺利。在南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成员是周恩来、李立三、吴玉章、宋庆龄（已故孙文夫人，现任共和国副主席，1890年生）、郭沫若等。起义军为了再度“北伐”开向广州，但途中在广东省北部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战，遭受很大损失。一部分与沿海的海丰和陆丰的农民军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的指挥下迂回到井冈山汇合。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在解散后原准备重整旗鼓，但周恩来得了疟疾，发烧40度，难以继续工作。可是，他们对革命的失败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关于反省战斗经过的周恩来，有点神经质的叶挺，亲人中出了内奸导致失败但依然庄严宣誓忠于革命的贺龙等人的情况，郭沫若在其短文中都有记录。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军旗和军徽上的红星都有“八一”这个值得纪念的字样。

另一方面，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瞿秋白（江苏省人，与鲁迅有深交，在文学上也很出色。1899—1935年）、邓中夏（湖南省人，创建时期中共的北方领导人，1897—1933年）等人出席了会议。据张国焘讲，失败的责任者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会上虽然集中批评了陈独秀，但是张国焘和毛泽东反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陈，否决了上述意见，所以他们的职务被解除了。“职务”另当别论，这次紧急会议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和新的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召开的。它被认为是为右倾开辟了道路^{*}，因此毛泽东也许对共产国际或共产国际代表表示了疑问吧。总之，在这次会议上，他没有当选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在湖南省的起义中，只不过是中央特派员的资格（而且是受湖南省委的委托），所以至少给人的印象不是党的主流了。然而对会议做出的在湖南、湖北、江、广东四省举行秋收起义的决定，他似乎没有反对。

毛泽东出现在驻扎在江西省铜鼓的国民革命军的部队里，并组织安源煤矿工人和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自卫军，将它组成四个部队。去铜鼓途中，他在湖南省浏阳被地主的雇佣军给逮捕了，给了钱后才逃走。尽管如此，敌人仍穷追不舍，他躺在一个水沟里才得以逃脱。后来在农民的带领下，好不容易来到江西地界。他询问那个农民的姓名，但他始终不肯说出。那以后他继续赶路，但由于衣着特别，到哪里也不肯留宿。他很恼火，走进街尾最后一家店时，索性不问了，走进去坐下，大声喊道：“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下。⁽¹¹⁾从浏阳到铜鼓一定要爬山，沿着这座山向南走是安源煤矿，再南面是与武功山、万洋山相连的山脉。也许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念头就是在这条山路上偶然闪过的吧。从9月8日开始的攻打长沙，应该是湖南、江西农村一齐起义的信号，然而这次行动由于一部分部队叛变和遭敌人的进攻而失败了。据说毛泽东决心放弃占领大城市的方针，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去井冈山的途中，又遭敌伏击，受到了损失，继续出现逃跑者。鉴于这种情况，最后只有暂时退到山寨一法。

在这次退却中，他首先考虑的似乎是从根本上重建军队的问题。有学历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师长逃走以后，部队里的一部分人在早晚说的都是“你准备到哪里去？”、“你走不走？”。有时，受命去站岗的一个排全部逃跑了。他深入到士兵中间，询问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把他误认为老百姓的一个士兵要拉他挑担子，他笑嘻嘻地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当红军里有人要求入党时，他就到场，自己领读入党誓词，主持严肃的入党仪式。⁽¹²⁾

从这种入党仪式的地点是在深夜无人去的祠堂里就可以明白，除了当时作为党代表的人在部队里公开政治面貌外，党员是秘密的。党的工作在士兵中间还没有扎下根，还没有军事指挥的发言权。尽管在北伐军和黄埔军校中党员不少，但是当国民党走向反动之后，党的工作便陷入瘫痪了。从这种痛苦的经验中，他一定决心改革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工作方法。作为第一步，恐怕就是举行这种入党仪式吧，举行这种带有宗教式气氛的仪式，无疑是把党神秘化了。这一方面带来损害政党机能的弊端，但另一方面对于处在国民党恐怖之下，没有通讯设备而又不得不分散在各地活动的他们来说，最后又往往不得不依靠个人的这种信念。誓词中说：“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这也反映了在必须同国民党进行生死搏斗的战争状态下进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三湾改编时，给想离开部队的人发5元钱路费，给留下来的意志消沉的士兵讲述“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激励人心的故事是很有名的。但这个时候，毛泽东没有白费心血，在各个连队都建起了支部，从团到班建成了党组织的纵向联络网。共产党的“前敌委员会”也成立了，毛泽东任书记。部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种党军关系从那以后至今便成了连续不断的传统。

毛泽东为了废除军队中的恶习，实现民主，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它行使部队最高的权力，可以监督和处罚军官。在这次起义之前，军官的伙食是四菜一汤，享受着比士兵高几倍的待遇，这次也要改变，伙食、衣服都是平等的。有时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平等分配。这种平均主义在农民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但为了改掉脱离军阀和国民党军队而参加革命的军官和士兵的恶习，为了“以毒攻毒”，不得不利用平均主义。这是当年参加这支部队的罗荣桓（湖南省人，1895年生）的回忆。后来在古田会议上纠正了这种平均主义的过火做法。总之，由此可以想像在红军中出现了新风气。

红军著名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在要上井冈山的一天，毛泽东在山脚下宣布“三项纪律”（后来叫“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听到这些，几天前从田地里捡到露出地面的红薯的士兵脸涨红了。1928年初，在井冈山的山麓遂川过春节时，他又公布了“六项注意”：

一、说话要和气；二、买卖要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捆卧草；六、上门板。1929年春，在开往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时，因为不了解村子里的习惯，红军的行动曾引起农民的不满。他从农民的口中听到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成“八项”。新添上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茅（厕所）”。后来由于俘虏的增加又决定了不准搜腰包、不虐待俘虏，进出要做宣传工作。进而又增加经常宣传红军政策一项共十项注意。后来又将洗澡避女人、大使

找厕所两项删掉，变为八项注意。从此，项目便固定下来，只是在新情况下，不断地在内容上进行修改，例如将“筹款要归公”改为“缴获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一个鸡蛋”，到陕北后又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¹³⁾为了成为人民的军队，红军也成了教育的场所。

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的这些措施，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在那里，不仅让人感到有对“北伐”以来国民革命军实际情况的观察，而且有一种理想。人们感觉到了他在新民学会时代就已表现出来的试图教育和感化周围人们的那种热情和才干。井冈山上有两个啸聚山林，占地为王的绿林好汉式人物、但是最后他们也被教育成都说“我要入党”的人，这里似乎也表现出了毛泽东的才干。

3. 黄洋界上的战斗

上井冈山时，部队不足千人。回想起打长沙时八千人的浩大声势，人们不禁有些寂寞之感。

“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军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还未获得暂时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工作，战士们情绪仍然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我们是什么军队。

遂川西有个市镇，名叫大汾。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便进驻这一市镇。尚未决定下一步行动时，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二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一气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已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湘南桂东一带活动，在后来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¹⁴⁾

听说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农民的武装队伍也从附近的农村上山了。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两千人和湖南的农民军8千余人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这里诞生了，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兵力约1万人，编成3个师。“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作为党、军队、政权的最高机关成立了，毛泽东任书记。

蒋介石在这一年的4月至7月，命令江西和湖南的军阀对红军发动三次进攻，但都被击退了。另一方面，在红军内一部分农村来的士兵中间出现了思乡情绪。这在封建时代农民武装暴动中是常有的事。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要惩治地主，就要惩治家乡的地主，他们担心家里人会不会遭到杀害。湖南省委员会的代表杜修经让第四军的第28、第29团向毛泽东留守的永新进发。思乡情绪严重的是宜章农民担任干部的第29团、第28团里湖南人少，即便有也是水口铅矿的工人。此外，还有南昌起义后与朱德同生死共患难的士兵们。朱德率领这些团向湖南进攻，可能也有省委的命令。但是他们恐怕不想把王牌部队轻易地拿去送死吧，果然部队在郴州大败，在这危急关头，接受了率一个营数十名士兵赶来的毛泽东的劝告，在井冈山南方的崇义和上犹迂回返回井冈山。可是在崇义，一个营长率部叛变，归途多难。

毛泽东伺机救援朱德，湖南省的敌人第八军经酃县向井冈山入口处之一的黄洋界逼进。8月28日得到报告的留守部队（一个营）以夜行军到达黄洋界，加固已准备好的阵地，没有炮弹就收集岩石代替。8月30日，敌人终于开始进攻了，但由于山路狭窄，只能走一个人。红军等敌人走到近距离时便开始射击，并投下石块。经过一昼夜，阻止了敌人四次冲锋，击溃一个团。第二天白天，从茨坪增援一门（也有说两门的）迫击炮，两发命中，于是敌

人仓皇逃走。颂扬这次黄洋界上的胜利的，就是《西江月井冈山》。

最近有人发表了访问黄洋界的文章，从中可以想像出那里的地形。笔者是 1963 年、1964 年来日的剧作家杜宣（江西省人，1919 年生）。

“山高岭削，仅有的一条羊肠小道就在陡壁间盘旋。哨口设在两峰之间，地形隐蔽，当时石垒的哨棚遗迹，现在还保留得很完好。

井冈山的特点是从山麓到山腰，都是森林，峰顶却多是巨石和茅草。黄洋界也是蔓草丛生。只有哨口的东南方高峰上，长了一棵枝叶如盖的大柯树。据说当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与战士们一道去宁冈挑运军粮，来回经过黄洋界时，都在这棵树下歇脚乘凉。

站在黄洋界哨口，纵目远眺，罗霄山脉中段的主要山峰，此起彼伏，雄壮无比。好像整个宇宙都被这些绵亘不断的千峰万岭占据着，天空中的白云伸手就可以摸到一样。气候变幻很快，刚到的时候是晴空万里，万山重叠。一忽儿就变成云雾弥漫，白茫茫如汪洋大海。据云，黄洋界又有汪洋界之称，这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毛泽东同志那首写黄洋界斗争胜利的著名的《西江月》，现在已刻在黄洋界哨口。⁽¹⁵⁾”

4. 西江月（第3首）

井冈山 1928年秋

实际上，这场战斗不是作者亲眼所见。前阕描述井冈山的留守部队沉着地等待敌军的情景。由于使用的是纯朴的赞颂手法，所以直截了当地传达了作者的乐天感情，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和红军已经成长起来了。

西江月 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注释

【西江月】50个字。双调。各4句。两个平，一个仄押韵。闻、重为平，动为仄。城、隆为平，遁为仄。闻和遁是n音，似乎与别的ng音不押韵，其实在词盛行的宋代还没有n和ng两音的区别，所以作为词，这是押韵的。况且现代的中国南方方言中这两个音也无区别。前阕和后阕都在第一句、第二句要求对偶。前阕，山下=山头，旌旗=鼓角，在=相，望=闻。后阕也同样对偶。

【旌旗】*指国民党军队。在古代，所谓旌是指有羽毛装饰之物，而旗是指无装饰之物。

【在】现代汉语，正在进行。附在动词上表达动作的继续。望，是指自己眺望，但这里是指对方接受那种动作，因而处于那种状态。

【鼓角】古代鸣鼓催促军队。角是军队中使用的笛子。这里指红军的军号声。

【围困】围是从四周包围城，困是最后的结果，城内的人们处境窘迫。

【岿然】高峻挺立貌。在《文选》中，观赏庄重的灵光殿有“灵光岿然独存”（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

【早已】很早以前，已经。

【森严】庄重而严肃。

【壁垒】防御工事。

【更加】现代汉语，越发，加上。

【众志成城】*源自春秋时代的历史书《国语》中的“众心成城”。意思是说万众一心，可变成坚固的城堡。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之一。毛泽东于1934年在江西省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16）

【隆】雷声轰响貌。

【遁】逃跑。

诗词大意

山下可以看见敌人的旗帜，山上可以听到我军的军号声。见到旗帜便可明白，敌人层层包围着井冈山，但是我军稳如井冈山高耸不动。

我们在敌人到来前加固了阵地，比任何城寨更坚固的是万众一心。我们从湖南省一回来，就听到黄洋界关卡的炮声隆隆。传令兵带来捷报说，敌人已在夜里逃走了。

注释

李伟：《井冈山》（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朱良才：《这座山，它革命1》，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1958年版）。

韩伟：《回忆井冈山》，《人民日报》，1950年8月1日。

李伟：《井冈山》。

王冶秋：《大地新游》（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兰宇：《常青树》，载于《人民文学》1964年7月号。

郭沫若：《流沙》，1948年7月执笔，收入《沫若文集》第8卷。

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日本庆应通信，1959年。

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谢觉哉：《创阳遇险》，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

(11)同上。

(12)赖毅：《毛委员在连队建党》，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

(13)陈士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

(14)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

(15)杜宣：《井冈山散记》，载于《人民文学》，1961年7、8期合刊。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五、以瑞金为中心

1. 打圈战

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说：过去这个井冈山上，有个土匪头子叫朱聋子，“军阀和反动政府围剿了他几十年，总是捉不到他。朱聋子说，他所以站得住脚，只有一条经验，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现在我们要改他一句，叫：又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根据这种战术，红军不仅在井冈山周围的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而且1929年1月又在江西省南部开辟了根据地，2月至10月三次进攻福建省西部，与该地方的党组织合作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

第4首《清平乐蒋桂战争》和第5首《采桑子重阳》，就是以这次进攻福建省为背景的作品。

前一年的7月，在平江起义的彭德怀（与毛泽东一样，生于湘潭县，朝鲜战争时任志愿军总司令，1900年生）和黄公略（在《蝶恋花》（第8首）中可见其名。1898—1931年）等占领了毛泽东上井冈山前活跃的浏阳、修水、铜鼓一带，建立了解放区。12月率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和朱德会师，这加强了进攻福建省的力量。彭德怀作为留守部队坚守井冈山，但由于以瑞金为中心受到敌人21个团的攻击，在英勇善战之后突破包围，途中又继续战斗，在瑞金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了。留在井冈山的红军家属和农民遭到屠杀，生还者受尽压迫和苦难，在一个有八十人的村子里只活下八人。然而，在1934年红军长征之后，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地区，红军和游击队五千人还在继续开展顽强的活动，捍卫了井冈山的红旗。

毛泽东进攻福建省是在1929年1月、5月和10月，这是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统治阶层各军阀间的混战间隙。军阀混战之一是“蒋桂战争”，蒋是指蒋介石，桂是指广西省，是以该省为地盘的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在1929年3月至4月进行的战争。1927年9月，武汉与南京的国民党合并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感到威胁的各国，争先恐后地承认了这个政府，因此南京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取得了代表中国的资格。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利害关系对立，所以他们扶植代表各自国家利益的军阀，试图用武力确保自己的利益。军阀又是封建势力和地主势力的代言人。这更使集中了的国民党实质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然而为了争夺国民党的正统这个名目，合并的翌月，南京派的蒋介石、李宗仁与武汉派的汪精卫、唐生智之间发生了战争。12月广东军阀与广西军阀之间也发生了战争。翌年4月至5月，广西军阀、蒋介石、阎锡山（山西省人，现在台湾，1883年生）、冯玉祥等联军与张作霖（奉天省人，统一了东北，被日本军人炸死，1873—1928年）发生了战争。日本帮助张作霖出兵山东后，美国促使蒋介石与张作霖和睦，在日本窥视的东北挂起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表明张作霖接受了蒋介石的统治。于是，以前与蒋介石联合的广西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等又举起反蒋叛旗。当时，毛泽东分析了这种变化的形势，作了如下阐述：“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

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蒋介石与桂系即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联军之间的战争又起，广西军阀战败，李、白回桂林。这以后在8月，蒋与闫、冯又发生战争，在1930年4月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战争。此外，小军阀之间的混战相继不断。据推测，在这些军阀混战中，战死者约50万人，百姓的被害更为惨重。这些战争，最后是具有中央政府这个正统派名目，并得到帝国主义和上海的浙江财阀支持的蒋介石取得了胜利。

在第一次进攻开始前，毛泽东把干部召集在一起传达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前一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方针，他还亲自写了《红军第四军进军宣言》和《布告》。《布告》是由四字一句组成的顺口溜，毛泽东自己实行了红军除作战之外必须做宣传工作的规定。进军部队的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进军的路线，首先在井冈山的茨坪和东南山麓的小衡州集结，然后沿大厦、龙南、南定、吉潭、会昌、大柏地、宁都、东固、广昌、壬田、长汀，沿途经过数十次战斗，行程约数千华里。在长汀有一条河流过，即词中“红旗跃过”的“汀江”，毛泽东在井冈山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这里得到遵守并取得了效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这从敌军俘虏的口中也得到了证实。部队在长汀驻扎约20天，打败了当地群众深恶痛绝的军阀军队之后入城，人心沸腾起来。

“当人们亲眼看到，这些衣装褴褛得卸下武器就像‘叫化子’似的红军，仍旧自觉遵守着买卖公平、借物归还、损坏东西必赔的严明纪律时，惊讶神奇观念消除了，和我们更加亲近起来。尤其是穷苦群众，对红军亲热得简直就是一家人，都说：‘红军才真正是咱穷人的队伍呀！’就连那些上层分子，这时也不得不赞叹着：‘像这样秋毫无犯的军队，可真是少有’……”

第二天，我军把郭匪的全部物资和几家豪绅的财产，除留下小部分做部队供给外，其余全部分给了穷苦人民。宣传组的同志最忙，到处贴标语、组织小型讲演会，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毛党代表和朱军长也亲自在南校场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做了两次讲演。”

而且，一个月之后红军又回到赣南，因为井冈山已经落入敌人之手，部队可能进驻了瑞金。

第二次是5月从江西省瑞金和武阳附近进入福建省。由于是在盛夏，士兵们十分疲劳。但由于在第一次进攻时，群众对红军有好感，所以“年轻人都争先恐后加入红军，老太婆烧香祈祷胜利”。在新泉休息一周之后到达龙岩西北约15公里的小池。在龙岩、上杭、永定、长汀、武平各县里曾去过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接受训练的人，1926年以来一直开展活动。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时期，所以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宣传孙文的政策。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邓子恢（福建省龙岩人，前副总理，现任政协副主席，1893年生）从江西省回来后重新开展农村工作，8月形势好转，共产党员可以在各县加入国民党组织了。驻军换防了，但是新来的土匪出身的陈国辉由于对当地不熟，在政治上表示进步的态度，企图笼络人心，因此农民运动日益高涨。陈国辉于1928年与长汀、永定的军阀联合，并与大地主相勾结开始镇压农民，但反而在各地发生了农民

起义和抵抗，各地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队。3月，红军打败长汀的军阀的消息传出后，在龙岩很快贴出欢迎红军进军的标语，使陈国辉陷入不安。当时在上杭的邓子恢立即去长汀，但红军已经返回江西省，所以他写长信给毛泽东，要求再次出击。于是才有这次攻打龙岩。

到达小池的毛泽东与朱德，从邓子恢那里得到报告后便拟定作战计划。陈国辉在离龙岩5公里的龙门部署一个连的兵力，但被得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敌人前哨”的命令的红军士兵气势所压倒，连上汽车的时间都没有，只顾逃跑了。红军猛追猛打，很快地占领了龙岩市，又立刻开展宣传工作，毛泽东对市内的中学生发表了讲演。陈国辉当时正与广东军阀交战，没有足够的兵力对付红军。在他重整阵容后，红军已经出发，他们回到龙岩看到的是一座空城。7月红军再度攻打龙岩，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苦战后取得了胜利。据说没有刺刀和手榴弹的红军用枪托和石头进行战斗。这一胜利的结果，建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各地还成立了妇女会和少年先锋队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

“打下龙岩后，邓子恢立即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根据闽西各地，主要是溪南里的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其中包括取消租债，分配土地，分青苗，男女平等，自由结婚，保护商店，肃反，赤卫队，少先队，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等问题。”

从封建地主的手中没收土地，平等地分给农民的土地改革，正像汉语中讲的“土地革命”一样，同时是一场带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结婚，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风气的大革命。这些事情不是以命令和法律强制实施的，而是启发和组织农民和市民，靠群众自发的力量来实现的。所以情况正如《清平乐》里颂扬的那样“真忙”。

第三次进军在10月。虽说是10月，但暑热尚未消除，忽而烈日当空照，忽而细雨淋身。毛泽东得了疟疾，病情严重无法随军行动，红军部队在朱德军长的指挥下，从江西省寻邬出发，经福建省武平，到达上杭东北约25公里的白沙。

“上杭是卢新铭长年盘踞的老巢，号称有一个旅（二千余人）固守。该城地形险要；城高墙厚，汀江由北环东而南，素有‘铁城’之称，易守不易攻。自古以来群众流传着这样的话，说上杭：南靠汀江，北有泥塘，东有战场无出路（有条河），西有出路无战场（小丘陵区）。”红军以各城门为目标发起进攻，在一城门用高三丈的梯子向上爬，但由于人多太重折断了，红军苦战到最后。战斗从傍晚打到翌日黎明，除卢等少数人逃走，全被歼灭，抓到千名俘虏。“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前来慰问。小伙子们踊跃参加红军。苏维埃政府迅速开始办公，打豪绅，分田地，热火朝天。这时，红军已经扩大到六七千人。”

上杭被占领后，“毛泽东还患着严重的疟疾，用担架抬着来到城里，他在病床上指挥所有的政治工作，其中包括恢复各群众组织和成立上杭苏维埃。”

2. 清平乐（第4首）

蒋桂战争 1929年秋

词分前阙和后阙两部分。前阙用凄惨风雨的比喻来表现军阀混战造成的灾难。后阙排出地名以轻快的节奏感叙述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是一首明暗对照鲜明，在技巧上也很精湛的作品。无论拿出哪一句，内容都有动态，而且用词表示出明确的形象。

清平乐 蒋桂战争 一九二九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注释

【清平乐】46个字。押韵是aaaabbbb，变、战、怨、现、江、杭、忙。

【风云】在《易》文言传中有“云从龙，风从虎”，说的是同类的东西互相感应。但后来指提供发展的机会。

【突变】突如其来的变化。指时局的急剧变化。实际上，作者已经预料到了。

【洒】瓢泼大雨。因前面有风云，接着说民众的怨恨如雨从天降般。风云是作为时局的比喻而使用的，但从作为实体的风和云进一步联想到雨，于是变成怨恨如雨样倾盆而下的表现。不禁让人想起初唐诗人被人称作鬼才的李贺诗句：“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的凄惨情景。李贺的诗大概是写实的吧，毛泽东的词是心中想法的形象化。作为李贺的爱好者，在近代中国可以举出谭嗣同和鲁迅二人。前者是清末思想家，与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等人的改革运动失败了，他说要为改革运动流血，主动接受死刑。后者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学。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加上。关于这一点，现代中国诗人、评论家何其芳也指出过：“据说毛泽东同志喜爱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在他的诗词中可以看到吸收了这三位诗人的若干特长和优点。”（11）

【人间】不是日语中讲的人间，而是人世间的意义。李白等人以厌恶的心情在俗人世界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答客诗）是说桃花瓣儿漂在水流中，河带着花瓣儿离开俗人世界去别的天地。

然而毛泽东的这首词中，用这个词是说民众的生活，憧憬别天地，而不是放弃它，表示对这种生活现实的深切关心。人间又对天上而言，在五代南唐的最后君主李煜的著名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叹息春不再来，吟咏天上世界与这个世界隔绝的忧伤。（12）在毛泽东的这首词中，说的是风云变换带给人世间的怨恨。天上与人间的相互对照关系也源于古代诗人的用例，但与李煜对自然的伤感不同，是从现实社会构思的。

【都是】现代汉语中经常使用的说法。本来词中是不避口语和俗语的，但使用“都是”这是大胆的。“军阀”和“红旗”等也是社会科学和阶级斗争的用语，这种用法是大胆而新鲜的。如果看成文言，必须读成“都是”，但即便读成现代汉语的“都是”并不显得格调低下。

【怨】军阀混战，不仅给民众带来损害，而且平时抓劳工、征重税、施暴行，破

坏了民众的生活秩序。在补充士兵和劳工时，强行拉走青壮年，因此被夺走劳力的家庭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当兵的本人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中丧命，负伤失去劳动能力而被丢弃，他们成为乞丐、路倒，下场悲惨。民众对不幸和灾难的根源军阀抱有怨恨。

【一枕黄粱】指对人生荣华的幻梦。古代，有个名叫卢生的男子，想进城发迹（飞黄腾达），途中来到邯郸的一个茶馆，一位名叫吕翁的道士告诉他，“你可如愿发迹”，然后借他一陶枕。枕端有一大空洞，他钻进去后来到一个美丽姑娘的家。他娶姑娘为妻，并当了官，立了功，发迹了。身下有5子，10余孙。后来得了病死去了，皇帝为之惋惜。他一觉醒来，发现原来是一场梦。店主在他睡前做的小米饭还未煮熟。卢生在短时间里在梦中享尽了一生五十年的荣华富贵（见于唐沈既济《枕中记》）。这里是一种比喻，是说军阀，特别是蒋介石和李宗仁等虽炫耀一时，但那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而已。

【再现】只是又演卢生的邯郸梦。

【汀江】也叫汀水、都江。发源于福建省宁化县，流向南方，经长汀、上杭，入广东省成韩江，在汕头入海。中国的江河大体自西向东流，但这条河是自北向南流，故而闻名。

【龙岩】福建省西部的一个城镇。人口约10万。占领这里是在第二次进军时。

【上杭】福建省西部的一个城镇。占领这里是在第三次进军时。

【收拾】将散乱的东西捡起集中。虽是文言表现，但在现代汉语中，用的也很普遍，已成为浅显易懂的用语。

【金瓯】黄金的瓶。指坚不可摧而又完整无缺的国家。“（武帝）独言，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见于《南史·朱异传》），这里指中国。然而，实际上南京的中央政府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各地军阀割据，也有帝国主义占领和租借的地方，中国是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尽管现状如此，作者特意用金瓯一词，让人感到作者的一份爱国热情。

【一片】一小块。这里是指通过三次进军开辟的赣南和闽西地区。把它看成是本来完整无缺的金瓯似的国家的一部分。

【分田分地】通过土地改革，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真忙】现代汉语中的口语表达方式。表示一种愉快地忙碌着的情景。

诗词大意天上的风云突然变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军阀又开始了民国以来未间断的战争。这种风和云把雨降到人世间，可是这种而是抱怨，而不是恩惠。军阀争夺天下的梦想，如同故事中书生在邯郸作的美梦一样消失掉了。

说明它的是红旗越过汀江占领长汀，进而解放龙岩和上杭。贵重金瓯般的祖国大地，从污染它的罪恶的地主和军阀手中夺了回来，整理后还给劳动农民。人们忙碌着分配这些土地，那是令人愉快的情景。

3. 采桑子（第5首）

重阳 1929年10月

古代诗人也吟咏“老人”和“重阳”节，作者虽然联想到这些，但却扬弃了。而把人们引导到作为革命者的新的伤感世界里。秋天和菊花，这些都唤起了作者的思索。虽然把自己的寂寞放在对大自然的凝视之中，但心境却是明朗的。

采桑子

重阳

一九二九年十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故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注释

【采桑子】44个字。双调。前阙，后阙各4句。平字押韵，阳、阳、香、光、光、霜。一韵到底。重阳和春光的重复，韵律匀整和谐，但这不是规则，而是作者的技巧。

【人生易老一句】毛泽东当时虚岁37，再过一个月就满36周岁，白居易的诗中有“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发垂”（见于《白鹭》）。但还不到40岁。大概把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见于《金铜仙人辞汉歌》）放在心上了。李贺的此句诗将在后面叙述。天为什么难老？因为那是无情的。天的无情是因为人们尽管依恋时光，但季节依然不断变化。而且与人的回忆无关，过去了的季节又要转回来。

【岁岁】每岁，每年。初唐诗人刘廷芝（651—680？年）的著名诗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见于《代悲白头翁诗》）令人想起给刘以影响的初唐诗人卢照邻的诗：“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见于《长安古意》）。

【重阳】9月9日的节日。9是阳数，在月日里阳数重复这样说。“登高”是全家到郊外爬小山。作为菊花节，要喝菊花酒。哪一个都有驱邪的意思。

【今又重阳】例年的重阳节又来了。重复第一句的重阳，这是诗的蝉联体或蛛丝法的技巧。后阙的春光也是同样。

【战地】据说第三次进军的出发地点是寻邬，所以留下来的作者可能就在寻邬。但对于当时的作者来说，恐怕哪一块土地都是战地了。

【黄花】菊花。重阳节时少不了菊花，所以在李白的诗中有“九日龙山仗，黄花笑逐臣”（见于《九日龙山饮诗》）。李白的诗可能是漂在杯中的菊花瓣儿，但毛泽东的一定是盛开的菊花，秋天花香浓郁。卢照邻的诗里有“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裙。”咏桂花的香味在衣服周围缭绕的情景。

【分外】现代汉语，格外，非常。

【劲】力量充沛。

【似】如，像。

【春光】春天的景色。

【胜似】胜过，优越。这种情况的“似”表示比较。相当于文言的“於”：“苛政猛於虎”（见《礼记·檀弓》）。早期的白话文章常使用“似”，“三个孩子一个强似一个。”（13）

【江天】江上天空。

【万里霜】一望无际的下霜的秋景。

诗词大意

天不具备像人那样的生命，因此不知衰老，但人的生命是容易老的，每年一次的重阳节，今年又来了。我也感到了时间的流逝。今年的重阳，从根据地出击，在临近的战地迎击了敌人，但菊花比往年都放出更加浓郁的芬芳。

一年一度的秋风劲吹着，但却与春天的景色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比起春天，眼前的景色更为迷人。看，流动的大江上一片晴空，广阔无边。地上不是也能清楚地看到万里之外霜天的秋姿吗？

4. 革命的低潮与高潮

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这是以《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决议中规定，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要在军队内建立党的组织；彻底执行民主，但不搞绝对平均主义等。这些重要原则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具有生命力的。

在这次会议期间，蒋介石的口号是“三省会剿”，他动员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的军队，向福建省新建的苏区逼进。特别是福建省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龙岩，又到达离古田只有15公里的地方，而且武平、永定、长汀也被敌之部队占领。1930年元旦，红军终于从古田出发，正如《如梦令》中吟咏的那样，北进经连城、清流、归化、宁化，向西越过武夷山进入江西省，开展游击战。巧妙地潜入敌人后方。敌人在各地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从广东省来的部队中止前进，从江西省来的部队退却了，福建省的部队因为福州发生了政变，迅速撤回。“三省会剿”以无结果而告终。与此相反，红军在各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实施土地改革，约80万人得到了土地。这样，在同年初春，闽西特委进入龙岩城办公，并于巴黎公社纪念日的3月18日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政策(14)。

《如梦令》中吟咏的进军，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退却，但从退却这两个字中想像出来的悲观样子在这首词中一点儿也见不到。毛泽东反而积极地评价这种退却战术，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战略性退却”一章，举出中国民众爱读的《水浒传》中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向后退一步的林冲把神气十足大叫“过来”的洪教头踢倒在地。在这篇文章中还讲述了著名的十六字诀这个红军的战术，那是上井冈山以来经验总结的产物。所谓十六字诀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还在作《如梦令》的1930年1月，写信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六大以后，由向忠发取代瞿秋白。但却在李立三的支配下），信中批评去年2月中央的来信，指出革命前途是光明的。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15)

这种乐观的预见，与他在两年前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陈述的情况进行比较阅读时，一定会感慨颇深。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16)

1930年上半年，在江西、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安徽和河南等省建立了大小15个根据地，一个根据地有的跨一个县，有的跨几个县。红军编成13个军，兵力达六七万人，它在1931年发展成10多万人。

越过武夷山的毛泽东，出现在江西省的富田。1930年2月7日，在当地召开了赣西、赣南特委联席会议，因此可以想像，他是在会议结束后，前往广昌的途中，写下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的吧，但详情不明。

在联席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两个字的结论：一要“分”，二要“快”。去年3月，他来到兴国县，成立了革命政权，但关于土地革命，只烧毁了田契借约，没有及时分配土地，因此做出上述结论。随着土地革命的进展，群众的武装组织也扩大了，他们配合红军进行了五次攻赣(州)，九次攻吉(安)的战斗(17)。词中吟咏的“十万工农下吉安”就是指的这里。

5. 如梦令（第6首）

元旦 1930 年 1 月元旦刚过，便伴随着敌人行军了。结束历史性的古田会议，在这里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宝贵的基石。词中的两句采用问答形式，这不也反映出作者那才华过人的形象吗？

如梦令 元旦 一九三〇年一月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注释

【如梦令】33 个字。七句（不把叠句断开，则为六句）。第五句和第六句为叠句。押韵一般为仄字。化、滑、下、下、下、画。滑字在现代汉语中念 hua，因为押韵，所以大概可以这样吧。第一句用地名排列，很有意思。这里是平仄仄平平仄，但清字是平，离开平仄规则了，这没有办法。

【宁化、清流、归化】县名。山区，地形险峻。

【路隘一句】为避开敌人，要在山间行走。那是无人走过的林中路，又有苔藓很滑。这准确地表现了红军的行动和周围的环境。这六个字每两个可以分开，分别由三个短文组成：主语（路）+ 谓语（隘），主语（林）+ 谓语（深），主语（苔）+ 谓语（滑）。读来简洁紧凑，描写急行军十分贴切。

【今日】因为限定今日，所以让人感到形势已不同于过去，发生了新变化。以下两句可一气读完，中间不必分开，这也表明行军的情况变化了。

【向何方】这是诗的一种表现技巧，采取的是自问自答形式。

【直】直向一条路。

【山下】在下句重复前句武夷山的末尾二字，格调十分优美，很有韵律。

【风】在山中路上吹来的风。

诗词大意

1930 年元旦过后便开始打仗，部队在宁化、清流、归化各县的山区急行军。山路险狭，密林幽深，因无日照，人迹罕见，林中多苔藓，故道路溜滑。

那么，甩掉敌人的追击后，现在该向何处去？命令行军直奔武夷山麓。山麓、山麓，看！昨天乘敌不备在森林的暗路上行军，红旗也放下了。但现在风从正面的武夷山那边吹来，红旗招展，迎风飘扬。在冬季的山的背景下，真如画一样美丽。

6. 减字木兰花（第7首）

广昌路上 1930年2月

白雪和红旗的色彩对照，似乎展现出一幅美丽的南画。这很适合大敌当前的紧迫感。前阕是纯朴的写生，但后阕最后一句是吟咏肉眼看不到的整个战局，眼前的叙景一转，跳到整个战线，表现出雄伟壮观的气势。

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

一九三〇年二月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注释

【减字木兰花】*44个字。双调。各四句。两仄韵，两平韵。押韵的做法是 aabbccdd。白、迫，山、关，去、处，颁、安。

【漫天】满天。

【情】在红军的军队用语中，把敌人接近说成“有情况”。大概是敌情的情吧。”

【卷】风大吹得旗子招展。

【赣江】江西省的大河流。源于该省崇义县的章水和源于福建省长汀县的贡水，在赣县北汇合成为赣江，曲折北流。经万安、吉安注入鄱阳湖。在赣县和万安间有十八处险要处，是不通船的。

【迷漫】不知方向，没有边际。

【昨】昨天。

【颁】分给。

【工农】现代汉语中，工是工人的略语，农是农民的略语，此外再加上一个士兵，说工农兵，是人民大众的意思。

【十万】指数量多。

诗词大意

天空白茫茫一片。行军时雪还下个不停，与敌交战已迫近。抬头望高山耸立，随风飘扬的红旗已过重要关口。

此次进军的目的地是哪里？把风雪迷漫的平原赣江流域作为目的地。作战命令已在昨天发布给各方面，现在十万工人、农民组成的军队和民兵正向军阀的驻地吉安涌去。

7. 在李立三路线的领导下

1930年上半年，农村根据地在各地诞生，革命又恢复了新的生命力，于是上海的共产党中央于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想通过勇敢地举行大城市武装起义来取得革命的全国性胜利，执中央委员会牛耳，强行推行这一方针的是宣传部长李立三，所以被称作李立三路线。这条路线过分地把希望寄托在城市工人的斗争上，无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力量。李立三认为农村包围城市，仅以红军夺取城市是错误的，他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建设路线。李立三嘲笑毛泽东在农村的活动说，“用这种战术，等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头发也都白了。”(18)

李立三的新方针传达到正准备召开重要会议而集结在长汀的毛泽东和朱德那里，毛泽东和朱德对李立三签发的指示深表怀疑。但是考虑到多年在偏僻的地方，对国内外的情况掌握得不够，只好同意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根据朱德后来的回忆，从上海来的使者带来的指示有两个：第一个指示是全面改编红军的计划，将分散在各地的红军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即最高的党代表。第二个指示是占领远离农村的大工业城市。毛泽东和朱德怀疑这个计划。在只有靠两条腿与其他红军取得联系的条件下；全国红军的单一指挥只不过是空想罢了。而且即使是按第二个指示占领两三座工业城市，但如果把红军的劣势装备同帝国主义各国的强大干涉相比较的话，那是无法维持的。毛泽东高度评价闽西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但为监督落实李立三指示而从福建省委派来的那个人，命令邓子恢等闽西红军向广州出击。时值夏收季节，被地主雇佣的军队和土匪们伺机抢夺粮食，因此邓子恢建议首先扫荡这些土匪，然后再攻打大城市。然而那个人愤怒地说：“我们胜利了，即使丢掉闽苏区也没有关系。”以高压的态度强迫执行命令。(19)

毛泽东根据指示，编成四个军团。按照计划，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第一军团集结在江西省西部的某镇，突破敌人势力范围后开赴南昌，占领南昌后取九江，然后攻打汉口、汉阳、武昌所谓的武汉三镇。贺龙指挥的第二军团自西，徐向前（山西省人，黄埔军校毕业生，现任党中央委员，1902年生）和张国焘的第四军团自北包围武汉，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占领长沙后加入战斗，工人从武汉内部掀起罢工活动。后来听朱德回忆当时情况的史沫特莱不加思索地叫起来：“噢，简直太富戏剧性了！”朱德两眼眯成一道缝，满脸是疑惑的表情。(20)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于7月29日占领了长沙。翌日，已经撤离长沙的美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炮舰又折回来，从湘江上向长沙市区进行了四天的炮击。8月3日，红军与支持红军的市民撤离长沙，代之进入长沙的军阀何键在一周内对市民进行了大屠杀。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被何键杀害的。另外，毛泽东和朱德于8月1日开始攻打南昌，但是瘦弱、汗流浹背的战士在敌人的炮弹轰击下，像秋天中的落叶一样，成批地簌簌落在地上。经过24小时的战斗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决定撤退，与从长沙撤退下来的彭德怀会合。红军进行改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还成立了“共产党前敌总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尽管有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还是执行了。然而，第二次攻打长沙用时半个月未获成功，最后毛泽东的劝导奏效，停止攻打长沙，转移攻打吉安。红军于1930年10月4日深夜占领了吉安。

如果根据上述史实的话，在作《蝶恋花》这首词的当时，毛泽东不在长沙，而是去了南昌，所以词题《从汀州向长沙》是不适当的*。也许是以后来整个作战经过为题吧。

以攻打长沙失败为直接契机，在共产党内对李立三的批评越来越多，在9月的中央全会上，基本停止了李立三路线。他被召到莫斯科作了自我批评。（在1945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一直呆在莫斯科。）毛泽东虽然反对攻打长沙和整个李立三路线，但是词中完全见不到悲观的调子。大概因为与红军战士们同心同德吧。据说也有人指责下命令从长沙撤退的毛泽东和朱德，而部队反倒毫无问题地接受了命令。(21)后来，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从下层支持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也是红军的指战员。他上井冈山以后，努力推进军队民主化，促进士兵觉悟，其结果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

8. 蝶恋花（第8首） 从汀州向长沙 1930年7月

把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放在一首词中吟咏，令人感到作者的宏伟展望。前阕写传统的“长缨”“鲲鹏”，后阕写国际性的“英特纳雄耐尔”。这一对照是修辞上的新方式，但实际上红军本身带有这种上著性和国际性。

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 一九三〇年七月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注释

【蝶恋花】70个字。双调。各五句（但原为第二句和第三句合并成一句，故遵从此法）。四仄韵，恶、缚、角、略，跃、鄂、曲、落。

【天兵】合天意之（正义之）师。

【腐恶】腐败凶恶。

【长缨】冠上的带子。有个故事说：汉武帝时，遣终军出使南越，欲令其王入朝，作为诸侯国向汉臣服。终军自请曰：“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这里是把这个故事放在心上了。

【鲲鹏】想像中的巨大的鱼和鸟。《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里是指进攻的目标长沙、南昌和武汉等大城市。

【赣水】赣江。

【那边】与这边相对的，是现代汉语。如果从以南昌为目标的毛泽东第一军团这一方来看，那么以长沙为目标的黄公略的第三军团便处在赣水那边了。

【红一角】红色的角落。指苏区和游击区。

【偏师】全军中的一部分，非主力，是担任侧翼的部队。在古代，如从士兵而论，意味着有50人的军队。“偏师作援”（见于潘岳《关中诗》）。

【借重】依靠他人的力量。

【黄公略】黄埔军校出身。1928年7月22日，帮助彭德怀使其部队站在红军一边起义。彭德怀是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队独立师第一团团长，但由于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刚发动了政变，所以彭德怀也遭监视。彭德怀巧妙地利用师长军阀周盘，以在士兵中进行革命教育，培养下士官为名，在部队中成立学校，学生中有少数人是在被反革命驱逐的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这个学校的校长是黄公略。1929年彭德怀上了井冈山，他继续平江，浏阳、铜鼓、修水一带坚持开展游击活动。1930年6月第三军团成立后，彭德怀任总指挥，他任副总指挥。第三军团由红八军八千人和红五军九千人组成，攻打了长沙。（22）1931年在江西省吉安的东南东固镇战死。为了纪念他，那一带改名为公略县。

【齐】聚齐，一致。

【踊跃】高兴而干劲十足。

【席卷】相继攻下，如同卷席子一般，占有压倒的优势。

【捣】捶布、臼、磨。像那样给敌人以打击。

【湘】湖南省的别名。

【鄂】湖北省的别名。

【和】现代汉语。当并列解时的“与”。

【国际悲歌】，英特纳雄耐尔。参加1871年3月18日成立的巴黎公社的工人鲍狄埃在《血的一周》中写的诗。1888年6月作曲家谱曲，从此唱起来。1912年俄译文刊登在《真理报》上，1923年瞿秋白从俄文译成中文，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同年，在苏联的诗人肖三与陈乔年一起参照俄译文，从法文将歌词译出并谱曲。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学唱这首歌，这些人回国后在各地开展活动，这首歌便广为流传。1962年11月30日，中国召开了纪念原词曲作者的集会。

【悲歌】沉痛、悲壮的歌曲。

【狂飙】大旋风。

诗词大意

在六月草木繁茂的季节，正义之师开始讨伐腐败透顶的反动派。正如古人自信地断言那样，很有一种手持长绳捆绑敌人的气魄。对手如《庄子》中所说，出乎意料的巨大。——这次出征将一举改变历史。那么，除这支部队外，在流淌着碧水的赣水一带，红军的力量正在扩大；那里有担任侧翼的红军，全军可以依靠的黄公略同志正在进军中。

对这次伟大的进军，百万工农齐心奋起，或协助或从军或当兵，都来参加。我军在江西省像卷席子一样，现在又专心向湖南和湖北进发。进发的红军队伍唱起悲壮的国际歌。随着歌声，我军的士气高昂。突然龙卷风从天而降，周围狂风大作起来。

9. “围剿”与反“围剿”

下井冈山的毛泽东和朱德等人领导的红军日益壮大，又扩大了根据地，不仅在江西省，而且在各地发生了与此相呼应的起义。看到这种情况，已将军阀战争告一段落的蒋介石，开始进攻红军的江西根据地即中央苏区，逐渐高涨起来的革命高潮，在这里面临着反革命的大举进攻。

蒋介石的进攻采取“围剿”根据地的形式，而反击它的红军则采取反“围剿”的形式。毛泽东后来指出，采取“围剿”与反“围剿”的形式，而且在长时间内反复进行，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23)实际上，蒋介石的“围剿”进行了五次，从1930年至1934年前后历时五年。

这个时期作的词，从《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到《清平乐会昌》四首，都是以当时的战斗为题材的。细分的话，《渔家傲》两首和后来的《菩萨蛮》、《清平乐》两首的色调略有不同，可以说，不是毛泽东直接从军之作，不过大体在那个时候开始写出了从词《西江月井冈山》到后来充满战斗气息的作品，它们都是与红军一起在江西省和福建省的红土地上行军过程中产生的。

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是在1930年10月集结10万兵力，自11月上旬开始进攻。红军的兵力为4万人，按照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并不严重”。也许因为看穿了蒋介石未动用直系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而是使用所谓的杂牌军进攻红军，企图坐得渔翁之利吧。针对蒋介石的“并进长追”战术，毛泽东采取的是“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歼灭敌人”的方针。

开始，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罗坊街，但却像与樟树镇和临川之敌作战一样，出现在敌人前面的蜜蜂圩、崇仁和潭坊，被诱之敌开始进攻后，便南下采取“向心式退却”战术，集结在黄陂、小布、砍柴冈一带待命。不久，敌人进入龙冈、源头、洛口、头陂一线，已经休息几天的红军决定向疲劳之敌发起进攻。据当时从军的刘亚楼回忆，出击之前毛泽东在小布附近的河原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举出六项必胜条件，大鼓了士气。

六项中的第一条是根据地的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他在其他地方也讲过同一内容的话，这里展现了建立根据地的根本思想。第二条以下是讲战术：主动地选择有利作战的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地吃掉。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在这次大会上，除一般农民外，还有农民自卫军参加。据说最后毛泽东带头高呼“打倒蒋介石！”

的口号，那声音“像万丈狂涛，震得山鸣谷应”。词中有“天兵怒气冲霄汉”一句，也许把这一情景记在心中，脱口而出的吧。

出发是12月27日深夜，首先去打谭道源师，人们挖战壕，埋伏在里面，由于冬天寒冷，冻得直打哆嗦。敌人没有出来，于是把目标改为龙冈，包围龙冈后筑起阵地。作为诱饵，派出一部分红军和民兵，要求“只能败，不要胜”，把张辉瓒军队引出龙冈。当年十六岁参加这支小部队的士兵回忆说，我们刚与敌人接触，连长就命令“撤退！”，而且准备好的雪白大米饭和萝卜炖肉也没吃上就出发了，很是生气。但越过一个山后，炊事员同样准备好了白米饭和萝卜炖肉。(24)如果是用白米饭和肉菜诱敌的话，那确是逍遥自在的战争。30日早晨就开始下雾和雨，山路很滑，但战士们边行军边唱《国

际歌》，据说歌声把枪声都淹没了。

下午四时发出总攻的信号，几百个冲锋号一起吹响，杠军战士的喊杀声震撼着龙冈城，号称“扫荡”军精锐的张辉瓒师锐气被挫败，陷入混乱状态，天黑前就结束了战斗。在灌木丛中躲藏的师长把上衣换成普通士兵服，尚未来得及换裤子，最后还是被认了出来。据说在发现他时，他脸色苍白，全身直哆嗦。这条裤子后来被送到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的战利品展览上展出了，(25)吸收到这首词里的是抓到这个张辉瓒时战士们的欢呼声。在这次战斗中，俘虏敌师主力两个旅和师部共九千人，师长也一齐当了俘虏。后来毛泽东自豪地说：“一人一马也没让逃掉。”当时，AB团这个辱革命组织在富田、东固、东韶街蛊惑群众。在群众的协助下，红军把能采取秘密行动的龙冈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取得了成功。在龙冈南的兴国有红军的独立师，对这一作战也很有利。最后向东韶街的敌人进行第二次打击，歼灭半个师。经过五天的两次战斗，国民党军队撤退了。

用这次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武装了过去扛梭标的战士，他们换上了步枪。红军又得到了无线电发报机，从此以后可以用无线电进行联络了，对待俘虏，是参加红军，还是回家，或者再回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很多人加入了红军队伍。给回家的人发三块银元，还开通行证。保卫根据地的农民对国民党军队侵入后干坏事很气愤，不让这些俘虏通过，甚至有人把通行证给撕掉了。因此红军战士护送俘虏到边界，并向农民作解释工作。(26)关于如何对待俘虏，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制定了注意事项，它被严格地遵守着。这一方针后来也在日中战争中实行了，所以也有不少日本士兵在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后都亲身体会过这一方针。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一个月，1931年2月，又发动了进攻。正如《渔家傲》里记述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那样，集中20万大军，而且任命直系何应钦（贵州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现在台湾任国府战略顾问委员长，1889年生）为总司令。同第一次一样，直系部队没有出动，动员了蔡廷锴（广东人，此后在上海抵抗日军入侵，现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896年生）和孙连仲等的部队。

迎击它的红军兵力略有减少，为三万人。但由于反动组织AB团已被肃清，所以在作战上比第一次更为有利。鉴于张辉瓒等长驱直入失败的教训，何应钦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以宁都为目标开始行动是在4月上旬，兵分四路侵入。5月15日推进到江背洞、桥头江、沙溪镇、头陂一线。与上次一样，红军待敌脱离阵地，采取运动战实行各个击破。他们把主力从边界线上撤下，集结在广昌、瑞金、古龙冈一带，利用敌人未到这段时间，边整顿部队加紧训练，边做农民的政治工作，争取在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展开军事行动。不久敌人接近了，因此决定把富田作为攻击目标，但敌人构筑了坚固的阵地，所以在东固停止前进，等敌人从阵地出来，足足等了二十五天，有人提出，敌人可能发现了，应该速战速决。但毛泽东没有改变原方针。

东固一带四面环山，西北的九层岭和观音崖尤为险峻。越过后，南面便是富田。红军在东固周围构筑了工事，附近的地方党和民兵全体动员封锁道路，日夜警戒以防情报泄露。时值插秧季节，农民很忙。但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目睹了红军胜利场面的农民热情地协助红军，集结在这小地域内的三万大军为粮食不足而烦恼。看到这些，农民们把自己的粮食拿出来。红军帮

助人手不足的农家，打山草，捞泥鳅，以补充粮食的不足，同时发起节约运动。例如，一张纸分四次使用（用铅笔写，用毛笔写，在正面写，在背面写）。“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未必局限于这些情景，但却是描绘了真实情况。不久，敌人之一部转移，在右翼 5 公里处有郭华宗军，左翼 20 公里处有蔡廷锴军进入，形成彼夹击的形势。有人批评说，没有发觉这两个军而接近王金任军是“钻进了牛角尖”。但是毛泽东不改变方针。急不可待的敌人终于在第 25 天从阵地出击，设下的圈套成功了，总共歼灭两个师（共计 11 个团）。接着立即向与福建省的交界处白沙、中村、广昌、建宁方向边战斗边闪电般的进军。正像《渔家傲》里说的那样，“七百里驱十五日”，5 月 16 至 30 日踏过 350 公里，经过五次战斗，歼灭一个整师，五个师之各一部分，缴获步枪 2 万余只。“痛快淋漓”，是毛泽东的感想。

这之后的三次反“围剿”，在词中虽无描述，但作为参考想叙述一下。

两次失败后，蒋介石亲自指挥，于 1931 年 7 月，动员 30 万大军，开始第三次“围剿”，在总司令蒋介石下面，分左、中、右三路，分别由朱绍良、陈铭枢、何应钦任司令，蒋与何在南昌。主力是直系的陈诚（浙江省人，现在台湾，任国府副总统，1897 年生）等 5 个师约 10 万人，实行“长驱直入”，企图把红军追歼到赣江东岸。

因为离上次反“围剿”只有一个月时间，红军尚未得到充分的休息与补充。红军在福建省建宁动员了群众，但即使加上这些，主力部队也只有约 3 万人，只是敌人的十分之一。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毛泽东率领驻在建宁、宁化间的部队向南方大迂回，把兵力集结到江西省南部的兴国。敌人吃尽苦头，寻找红军的踪影，最后发现红军已向西转移，于是又调动其主力追赶。红军突然东进，攻击了敌军中守备薄弱的永丰县的良村、宁都县的黄坡，相继歼灭两个师和一个旅（三战三捷）。发现红军绕到背后的敌军主力赶紧东进，集中兵力严密包围了黄坡。这时红军派出小部队在敌前方进行得意洋洋的佯动作战，利用上了钩的敌人迫击诱饵的间隙（这个间隙只有 10 公里，红军在敌人包围圈的裂缝的山中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县。等敌人发现时，已是半个月之后的事了，红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敌人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被拉来拉去，又受到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和红军的袭击，因而上气低落，粮食不足，9 月开始退却。红军乘胜猛追，在老营盘和方石岭两次战斗中大胜，分别歼灭一个师和一个旅，在这第三次反“围剿”中，击溃了敌人 7 个师，歼灭 17 个团，俘虏两万余人，缴获枪支一万四千枝，迫击炮 50 门，弹药 280 万发。敌军发牢骚说，“剿匪是无期徒刑。”(27)第四次“围剿”是 1932 年 6 月开始的，蒋介石集中了 90 个师 50 万人。敌人不是直接进攻中央根据地，而将其主力用于压迫武汉附近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和洪湖一带的红军（第三军）。这一地区的红军由于准备不足，进行了正面作战，陷入苦战。最后分别放弃根据地，转移到四川省和贵州省附近。接着国民党军队集中主力向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根据地进攻。武汉附近和洪湖的红军放弃根据地是共产党中央新的“左”倾政策造成的，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也实行了。党和军队的人事变动了，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也有出现偏向的苗头。然而毛泽东的影响很深，第一方面军与国民党军队战斗时的战术是毛泽东制定的，不是党中央的。1933 年 2 至 3 月，歼敌 3 个师，缴获枪支 2 万枝，粉碎了第四次“围剿”。第一方面军后来在江西和浙江省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把中央根据地和福建省境内的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在四川省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但这是从武汉附近转移来的红军相继击败四川省的小军阀的结果。1933年全国红军在 30 万左右，党员也增至 30 万人。

10. 渔家傲（第9首）
反第一次大“围剿” 1931年春

押韵的字都落在1an音上，用现代语音朗读的话，由高处急转直下到口齿清脆的第四音重音。也许是这个缘故吧，令人感到总体上可以说是近乎粗旷、泼辣的句子的汇集。大概在隐忍持重之后，联想到作战时取得重大胜利的那种喜悦吧。前阕，采用口语形式极为有效。作者自注的关于神话的诸说，也很有意思。

渔家傲反
第一次大“围剿”
一九三一年春

万木霜无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词作者原注

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韦昭注：“贾侍中[按指东汉贾逵]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陵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也。”）

《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按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

毛按：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

词作者原注注释

【共工、颛顼、炎帝、高辛、女娲、祝融】都是传说中古代部族的首领。

【天柱、地维】维，大绳。古人设想天圆地方，天有九根柱子支撑，地有四根大绳拴系。

【虞（同娱）于湛乐，淫失（同佚、逸）其身】贪图享乐，纵欲放荡。

【堕（同隳）高堙庳】平毁山丘，填塞沼泽。

【以水乘木】乘，接替。古代有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以解释朝代更替的说法。《三皇本纪》称女娲“亦木德王”，共工想用水德来代替木德。

注释

【渔家傲】62个字。双调。各5句，五仄韵。漫、汉、暗、唤、瓒，赣、半、万、

干、乱押韵。

【烂漫】花盛开貌。这里指一大片红叶，十分壮观。

【怒气】愤怒的样子。古代，越王勾践在路旁看到一个把肚子弄得鼓鼓的青蛙，于是他下车施礼。士兵们问其缘由，回答说，因为我在焦急地等待诸君战斗情绪的到来，看到即使像青蛙这样的东西对敌人都能表达怒气。我不得不为它施礼。听到这里，全军士气大振（见于《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恐怕是源于这个故事的吧。

【霄汉】霄为天空中的霞，汉是银河。高空。

【龙冈】江西省的地名，红军在此大胜敌军。

【嶂】像屏风那样高大而险峻的山峰。

【前头】前方，前面。唐代的诗中有例句，但已成为现代汉语，普遍使用了。这旦确实像听到战士的喊叫声：“前面活捉敌人师长啦！”

【捉了】了是现代汉语中附在动词后表示动作完成的接尾词。捉虽是文语，但已成现代汉语。意为猛抓、大把抓。这里的“前头”以下还是把战士们的喊叫声用在词中。

【张辉瓒】当时的“围剿”军总司令、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的直系部队主力师师长是谭道源和张，张还是前线总指挥。张与谭的师的兵力分别为一万四千人左右。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湖南省长沙人。

【20万军】反“围剿”的第二次会战是5月开始的，当时敌人的军事行动已开始，兵力为20万人。

【重】重复，再一次。

【赣】江西省的别名。

【风烟】风与部队行军时带起的尘土。

【滚滚】边旋转边动的样子。作为形容水涌起的样子例句有杜甫的“不尽长江滚滚来”（见于《登高》）形容云的有竹添井井“奔云滚滚随闾随开”（见于《栈云峡雨日记》）。

【天半】天的中间。

【唤起】叫醒，唤醒。正像陆游的诗中有“唤起十年闽岭梦”（《思政堂东轩偶题诗》）一样，作为诗句是有先例的。但这里可能是革命家，国民党的创始人孙文常讲的“唤起民众”场合的唤起吧。民众的大部分是工人农民，所以这首词里也有工农。

【同心】齐心。《易》中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见《系辞》）。

【不周山】据说是在昆仑山西北面的传说中的山。山的形状有缺处，且不完整，故此得名。这里大概是指革命根据地里的山，或者是指当时红军构筑有阵地的东国周围的山。关于不周山的传说，词作者在原注中已有，也表明毛泽东对这些传说的见解。中国民众对这些传说是比较熟悉的。在现代文学中，也有以此为题材的作品。郭沫若的《女神的再生》（1920年11月执笔），鲁迅的《补天》（1922年11月执笔）就是如此。为解释这首词，郭沫若写道，毛泽东说“共工没有死”，“这是从前谁也没说过的……我体会这指的是宇宙观的认识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共工精神，确实没有死，还活着”。（28）

【共工】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生自景风（东南风）（《淮南子·墮形训》）蛇身人面。（29）

【淮南子】书名，21卷。前汉淮南王刘安编纂。广泛收集先秦诸子言论，分成21篇。后又以传说和事实为据作了补充。各篇名中有像《天文训》这样的《训》，有经验教训之意图。也可视为百科全书，或视为一部格言名句集。

【天柱地维】古代人想出的宇宙构造。为说明天掉不下来和地平坦的道理，恐怕首先想出支撑天的柱子和连接地的绳索。然而，实际上，太阳西落，中国的河流几乎都

流向东南，于是产生了共工和不周山的故事。而且把共工与洪水传说联在一起，在神话的其他部分说共工是治水的官吏。“堕高处填低处”这种说法也是治水的一种技术，讲的是土填法。

【国语】书名，21 卷。据说由周左丘明撰。是春秋时代八国的历史书，周的部分篇名叫《周语》。

【史记】130 卷，后汉司马迁撰，从上古黄帝到汉武帝的历史书。分本纪、世家、列传、表、书记载，在文学上也是优秀作品，补充黄帝以前的部分是司马贞的《三皇本纪》。

诗词大意

满山的枫叶，霜后变成一片片红叶，多么壮观。红军的士气旺盛，干劲十足。龙冈正下着大雾，烟云笼罩，山变得灰暗起来。在那里待命的红军齐声喊叫，前面把敌军师长张辉瓒活捉了！

以为那场战斗结束了，可是 20 万敌军又来侵犯我江西根据地。敌人行军时爆土扬场，它又被风吹得滚滚而来。这边正号召千百万工人农民齐心去战斗！看，在像神话中的不周山那样的高山的山麓上，勇敢的共工子孙中国红军的红旗不是正在迎风招展吗？

11. 渔家傲（第 10 首）
反第二次大“围剿” 1931 年夏

这首词如同涌出的泉水一般，让人想起作者那富有流动感的笔迹。表现手法通俗易懂。顺利地打胜一场漂亮仗的情景，的确耐人寻味。最后表现出作者的幽默。

渔家傲反
第二次大“围剿”
一九三一年夏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注释

【渔家傲】（同前）。立、急、力、逼、入，日、碧、席、泣、及押韵。宋朝词人出生地的方言对这些的发音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带来这种伸缩的余地。

【白云山】在江西省会昌东 40 公里处，“峰高常有白云笼罩”（见于《嘉庆一统志》）。在与福建省交界处。

【云欲立】云想立起来。是自然情景，但意味着红军的斗志旺盛。欲，与其说是希望和欲求，不如说表现将成为那样的一种未来。

【呼声】逼过山下之敌的叫喊声。

【枯木朽株】落叶树和腐朽的树枝。是讥笑敌人的语言。开始也曾解释成被动员的我方群众，(30)但很快就订正了。因为有下面的“努力”二字，所以恐怕是误解成我方了吧。

【枪林】枪是现代汉语。枪像树林一样地排列在一起。

【飞将军】匈奴把汉名将李广称“汉飞将军”而避开，从此指优秀的将军。这里似乎意味着白云山上有红军，描写他们把山麓上的敌人赶下去的情景。

【重霄】天的高处。霄为高空，重是重复。高高的天空，重叠成九重。也说九重天，九天，九霄。

【赣水】从南向北在江西省流动的河。

【苍茫】青绿一片。

【闽山】闽为福建省的别名。白云山离福建省很近，可以见到福建省的山脉。

【横扫】从侧面砍倒敌人。

【卷席】气势如同卷席一样猛烈，并有压倒的优势。

【有人泣】敌军，特别是蒋介石哭泣。

【为营步步】把敌人的战术口号原封不动地放在词里。意指一步步地构筑阵地。

【嗟】叹息声。

诗词大意

云在白云山顶上欲高高耸立，似表现山顶上红军的士气。从山麓传来敌人的号令

等不停的叫嚷声。枯木朽株一样的敌军，妄图战胜我军而拼命，尽管他们调动了太军，枪支如林蜂拥而至，但这时，红军像古代的飞将军一般，从上面攻了下来。

七百华里仅走十五天，途中五战五捷，宛如帚把横扫敌军一样的战斗情景，恰是人们常说的如卷席之势。有人在哭泣，不是吗？虽然下达了一步步地构筑工事向前推进的命令，但还不是没有打赢？哀哉！

12. 被“左”翼分子排挤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对埃被加·斯诺说：“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31)

在1931年11月23日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项英和张国焘），所以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不过，把这个与被看成是中国共产党正史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对用的话，书中作了如下记述：

“‘左’倾分子所组织的临时中央，在一九三三年也不得不迁入中央红军根据地。临时中央到达红军根据地后，虽然已与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等会合，组成了正式的中央机关，但是排挤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

《菩萨蛮》不是写当时的战斗，而是回顾以前的战斗。这也与过去以同红军一起战斗为题材的一系列“词”略有不同，这恐怕是与被“排斥在红军领导”之外有关系吧。

所谓“左”倾教条主义集团，是指陈绍禹（王明）（安徽省人，现任中央委员，1907年生）、秦邦宪（博古）（浙江省人，延安《解放日报》社长，1907—1946年）、张闻天（洛甫）（江苏省人）、王稼祥（安徽省人，现任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何子述（不明）、沈泽民（文学家，茅盾之弟）等，他们是留苏学生出身，所以也叫留苏学生派。他们自1926年开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春该大学校长、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米林。

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时候，随米林一起回国。燃烧着年轻人热情的他们与当时支配共产党的李立三形成对立，在不顺利的党内斗争之后，掌握了1931年1月以后党内的权力，成立了临时中央委员会。而且，据说米林和共产国际为他们撑腰。由于“年轻没有实际工作经验”，(32)他们提出了超越民众中间强烈的“保卫中国”的意识，而提出了“保卫苏联”、“保卫中国革命”的口号，再加上打击中间派，使党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共产党组织，因为执行了他们的方针而完全被破坏了。失去基础的党中央不得不离开上海转移到江西省中央根据地。他们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给红军带来了巨大损失和失败。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是1933年10月开始发动的。动员的兵力达百万，其半数包围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国民党的兵力空前的多，但红军也壮大起来了，而且由于在福建省第十九路军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所以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军队中分出相当多的兵力对付那里，然而“左”翼分子强调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的反动性；不予支援，因此使其在短时间内便崩溃了。此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向第一方面军进攻。

以南昌为据点的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不穷追深入，而是在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固守，筑起碉堡，以备反击。并修筑军事公路，组织经济封锁网，企图把红军变成瓮中之鳖。

碉堡是利用土、木材、石头等修成的岗楼，内部有三四层，留有枪眼，

是一种小型要塞。它的优点是，红军的山炮和迫击炮根本破坏不了。据 1934 年统计，从湖北省南部到广东省边界，共修筑了约七千个。军队造的很少，多数是让当地农民出钱出力修筑的。

蒋介石以这种作战为基础步步逼近，首先占领了黎川。共产党中央的“左”翼分子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进行反击，但因为受碉堡的影响失败了，后又攻打东南面的资溪桥，又遭失败。在敌主力和碉堡之间辗转之后又转换成防御作战，把兵力分散到各地进行抵抗。然而，这时红军已经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经过一年间的苦战，只好从中央根据地撤出。中华苏维埃首都瑞金是 1934 年 11 月 10 日失陷的，三天前在这里刚刚举行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念大会。

在敌人强大、我方弱小的时候，应该采取战线流动的运动战方针，不应该采取战线固定的阵地战，这是毛泽东的原理。然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反对流动的同志们真像大国家的支配者一样处理问题，结果得到的是不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长征。”

推测《清平乐会昌》是 1929 年即三次进军福建省时之作。从内容上看，这样理解不勉强。这次出版的正式说法是 1934 年夏作的，可是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在这里呢？

会昌是江西省南部的县城，这里是粤赣党的领导机关和军区指挥机关的所在地，离前线只有三十多公里。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因此担任南方战线的红军第二十二师驻在会昌县城。如果从黎川方面的主战场来讲，是以掩护后方的形式与数倍于红军的两广敌军作战。虽然尚未发现有关毛泽东来到与主战场相反方向的会昌的目的的说明资料，但当时在会昌的一位政治指导员写有回忆手记，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33)

按照手记上的说法，当时红军第二十二师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他们在筠门岭近半年时间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但是最后遭到三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攻击，战壕和掩体均遭破坏，子弹缺乏，结果撤退到筠门岭以北的新开河，重新构筑战壕。过去曾转战江西福建各地，连战连捷的干部战士对第四次反“围剿”后期提出的新军事方针不满，那是与通过游动式的游击战积极对敌发起进攻的毛泽东做法不同，而是一种固守战壕的消极防御方针。形势一天天恶化，兵力眼看着在减少。在农村又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中间阶层开始动摇。随着占压倒多数的国民党大军接近，谣言在苏维埃区内流传，里面也有公开打起白旗，手持梭标和枪支发起叛乱骚动的。在党内，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类现象，并且采取了直接从苏联输入（大概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所以“使人惴惴不安”。

第二十二师的干部们（手记的执笔者等政治指导员）认真地总结了失败的原因，还进行了坦率的反省。但是在根本的问题上还是没有搞清楚，正像会场（新开河的祠庙）外的天气一样，人们的心情阴沉沉的，如乌云低迷不见晴天。虽然模糊不清，但他们已感觉到打败仗的真正原因在于第四次反“围剿”后苏区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当时，司令部作战科的值班参谋来到手记执笔者那里转告他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从会昌打来电话，想与前线指挥员通话。毛泽东在电话中对第二十二师的英勇战斗情况给予热情的慰问，并指示今后要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箝制敌人。同时主力要进行整训。而且还出了题目：是什么

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手记的执笔者说，他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意识到毛泽东想说些什么。接着毛泽东又讲出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秘诀：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小股敌人。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下打他的身子，要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手记的执笔者说，他紧紧抓住电话，从心里喊出：“对呀！对呀！”。第二十二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重新调整了战术，并在各部队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所以士气高涨，在四五天时间里通过小规模的战斗打败了敌人的前进部队。农村工作也改进了。……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或许想在南方战线找到挽回败局的办法。如果认为北方战线的失败明显的话，那么，在 1926 年以后，在多次战斗过的地方，成功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游击队的江西福建省交界处寻找出路，并非不可思议。或许想像过头了吧，毛泽东也许想在按自己的军事方针改变南方战线局面战胜国民党之后，以此胜利为依据，纠正党中央的极“左”倾向。即使毛泽东没有那种想法，对比一下按中央委员会的方针造成北方战线失败和按毛泽东的方针带来南方战线的胜利的事实，人们也自然而然地会清楚，两种方针在总体把握作为方针基础的中国革命的方法上的优劣了。

然而，“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被排斥在对红军的领导之外”的动向，也不是没有在得到暂时平稳的南方战线上表现出来。在毛泽东之后赶来的工作检查团，检查了第二十二师的干部。有些人被免职，有些人被开除党籍，有些人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毫无疑问，这种检查和处分是站在与毛泽东正相反的立场上的。

说是“招待所”，可是手记中并没有记载清楚。只知道是在“国家保卫局”管辖之下，大概是作为特别的警察机关收容政治犯的地方吧。据说受到处分的干部虽然内心不满，但他们从必须遵守党的铁的纪律这一观点和通过自己受处分可以让其他党员吸取教训这种对党的忠诚考虑严格要求自己。手记的笔者也被送到“招待所”，比他晚两周，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的团长和政委也被收容了。他从他们两人那里听说毛泽东还在南方战线与红军战士亲切交谈，分析形势，指出了今后的方针，十分高兴。但这位笔者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他想不到在毛泽东的这些活动与自己被处分之间存在着用肉眼看不到的激烈的政治摩擦。然而有一天，同样进“招待所”的另一个同志问他：“老弟！你知道不？现在有人在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他很吃惊。又听这个人解释说，“我也才知道党内存在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种可以说是牢房的环境里，回忆起第一次反“围剿”以后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和红军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以来的经过，他认为毛泽东的方针正确。1934 年 10 月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但他好像还以被收容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长征。1935 年 1 月召开了遵义会议。

手记中说：“我们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读到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一声春雷，在我们的耳边震响着。亲身体会到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多大损害的人，当时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是很难形容的。我们激动得掉下眼泪来了。拿着一份油印的遵义会议决议，如饥似渴地、逐字逐句地阅读。”就在第二天，他们都分配了工作（即从“招待所”释放出来了）。……

为了理解第 12 首词，将涉及一些其他事情。身在南方战线，进而把视野向南扩展的毛泽东的背后，存在着从手记笔者命运中可以看到上述情况。

意想不到在这首《清平乐》中的“风景这边独好”的“独”字里，或许寄托有毛泽东处于这种形势下的心境和克服困难打开革命局面的计划吧。

13. 菩萨蛮（第 11 首）

大柏地 1933 年夏

形容雨后的景色容易落入俗套，不过作者指出了激战时的弹痕，说这不是平凡的田园风景，这首词也还利用了这些景象，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革命诗。而且，这里听不到声音，色彩丰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宁静。甚至在去年的弹痕上……。

菩萨蛮
大柏地
一九三三年夏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注释

【菩萨蛮】（同前）。紫、舞，阳、苍、急、壁，山、看押韵。急与壁通用。紫与舞作为特例押韵的例子在北宋柳永等人的词中有一些。这也是宋代词人的方言吧，在现代广东方言和吴方言中有例。第一句巧妙地排出七色，而且平仄相符。但前阕和后阕的末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诗的情况这样是可以的，但在词中必须仄（或平）平平仄仄，特别是第三个字是平。据说这是绝对的要求。（34）如果是这样的话，阵更不适当了。不过如按“词律”要求的话，仄也可以。所以大概作者应用了这个吧。看是现代语，仄的发音（第四声），但古代也是平。

【大柏地】在江西省瑞金北。如本诗集《如梦令元旦》中所吟咏的，1930年1月毛泽东率第四军从福建省西部进入江西省。12月31日夜在瑞金北约十公里处的黄柏墟一带宿营。于是江西省的国民党军队刘士毅部追击过来，所以在大柏地南方的有利地形展开等候。翌日，即1月1日上午战斗打响。红军在正面迎击敌人，同时派一部队迂回从敌侧背包围，激战结果，俘虏敌团长等800余人。大柏地的战斗是当时进军中最大的胜利。

【赤以下一句】吟咏彩虹的七色。

【彩练】彩色绢带。

【当空】正前方的天空中央，现代汉语中经常使用。

【复】为调好音律，简单地添加上的助词。没有再次的含意。

【斜阳】夕阳。

【关山】设有关卡的山，国境线上的山。大柏地在福建省附近。李贺的词中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见于《南园十三首·其五》）。

【阵】一阵，阵阵苍，吟咏雨后的夕阳挂在云端，一阵照射使山上的绿现出明暗的景观。

【当年】那一年。

【鏖战】都去拼杀的激战。苦战。

【洞】贯通。

【装点】像山水画中的人物一样，略加勾画以烘托全体。装饰点缀。

【今朝】今日，如今。

【更好看】现代汉语。更是越发、进一步之意。好看是美，美丽。

诗词大意

赤橙黄绿青蓝紫，彩虹的七色是美丽的。究竟是谁手持色彩鲜艳的绢花在高空起舞呢？雨停后，夕阳露出明亮的霞光，边境的山上现出生机勃勃的翠绿。雨后的白云在飘动，映照在翠绿上的阳光也在移动，山上呈现更加壮美的景观。

三年前，这里曾有激战。回首观望，前面村子的墙壁上还留有弹痕（这一胜利的战迹表明，只要运用正确的战术，根据地和革命都能得到发展）。由于有这种弹痕，边界整个山上的景色庄严、心情紧迫，因此今天显得更美了。

14. 清平乐（第12首）

会昌 1934年夏

模仿古代诗人的句子，以乐观的和肯定的心情高声讴歌现实。前阙第二句的问答体确实表达了出发前的飒爽气氛。后阙，涌向大海似的南方山脉的群山和浓绿的林涛，被描绘成如同浮现在眼前一样。作者对革命党内部混乱的局面并不灰心的博大胸襟，似乎已化作山中林木那郁郁葱葱的激情，从词中喷发出来。

清平乐 会昌 一九三四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注释

【清平乐】（同前）。晓、早、老、好，峰、溟、葱押韵。溟与峰、葱本不押韵，但因作者的方言音，就通用了吧。

【会昌】江西省南部的县城，当时那里有南方战线的前线司令部。

【1934年夏】同年春，毛泽东来到会昌。

【欲】想，打算。

【莫道】莫，是不要这类禁止的命令。道，是说的意思。

【君】红军战士们，也含作者。

【行】行军。

【早】与表示速度快不同，是表示时间上早的意思，是说行军在一大早就出发了。

【莫道以下一句】君行早，是作为对方说给自己的话而使用的。作者抢先说别那么讲。禁止说叫莫道。

【踏遍】遍是各个角落。踏是走的意思。指1929年1月以后，数次从赣南到闽西开展游击战，创建革命根据地。

【青山】草木青翠繁茂的山。

【人未老】毛泽东当年虚岁42。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按古人的解释，“老，谓年五十以上也”（《论语·季氏篇皇侃疏》）。周振甫认为这里的意思是红军战士不怀疑，不悲观，坚信革命胜利，因而士气旺盛。《左传》里有“师直为壮，曲为老”（见于《春秋左氏传》僖公28年）。衰老也叫暮气，联想起1958年《人民日报》上提倡的《丢掉暮气，拿出勇气》，觉得周的说法是对的。可以解释成革命遇到困难，自己的年龄已到中年，但依然同红军战士们一起对胜利充满信心。作为诗句还应考虑下面一句。

【踏遍青山一句】*陆游的《渔家傲·寄仲高》中有：“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秋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有人认为是源于“行遍天涯真老矣”（35），的确妥当。恐怕不只是这一句，整个前半部分也许都源于陆游的《渔家傲》。

陆游的词，就总体而言充满对故乡的思念，或许毛泽东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自己不在无益地依恋故乡这种意义上吟咏“风景这边独好”吧。

【风景】会昌一带为红土地，松林多。进入夏季，水田绿，松树、樟树绿，山上和地面是红色，搭配得很美。

【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一片生机。是红军所指南方群山的风景。同时也指战士们的斗志旺盛和革命信念坚定。《后汉书》中有“气佳哉，郁郁葱葱。”（《光武帝纪》）

诗词大意

东方的天空快要亮了。天还没亮，红军战士们整顿好队伍即将出发，别对我们说：“你们出发真早啊！”我们在江西、福建、广东省边境草木茂盛的群山中行军，创建了革命根据地。虽然条件艰苦，但心境愉快，因此不觉衰老。蒋介石动员百万大军并命令40万侵入江西省中央苏区以来，北方战线的形势不利，但在南方战线可以挽回大局，因为民众依然支持红军，这边的风景越看越美。

会昌城外山上的高峰，像波浪一样连接着。这座山脉中途没有中断，一直通向东海。战士们边议论几年前的连战连捷，边指向南方各省。革命尚未彻底失败，如果我们恢复正确的方针一定能够取胜。这样想之后再放眼望去，南方的群山更加浓绿，充满生机。不，这生机不限于山上的树木，全体红军战士高昂的士气也很旺盛。

注释

赖毅：《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

李伟：《井冈山》（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张际春：《向赣南、闽西进军》，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

毕古云：《三战闽西》，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

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

毕古云：《三战闽西》。

同上。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荒井健：《李贺》，载于《中国诗人选集》。

(11)何其芳：《诗歌欣赏》（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12)村上哲见：《李煜》，载于《中国诗人选集》。

(13)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1944年。

(14)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

(16)同上。

(17)陈奇涵：《兴国的初期革命斗争》，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

(18)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19)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

(20)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21)同上。

(22)何长工：《开辟鄂东南》，载于《星火燎原》第1集。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

(24)刘贤权：《诱敌深入》，载于《星火燎原》第2集。

- (25)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载于《星火燎原》第2集。
- (26)同上。
- (27)李志民：《奇兵致胜》，载于《星火燎原》第2集。
- (28)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载于《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
- (29)同上。
- (30)同上。
- (3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32)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 (33)方强：《真理的光辉》，载于《星火燎原》第2集。
- (34)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 (35)宛敏灏：《读毛主席词五首》，载于《语文教学》，1959年10月号。

六、长征

1. 二万五千华里之行

对于中央苏区的红军来说，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与其说是不利，莫如说是战败意识浓厚。中国出版的革命史也写道：“红军虽经一年的苦战，但不仅没有打破敌人的包围，而且红军的士气受到严重挫伤。”第五次反“围剿”的详细经过虽不大清楚，但从红军战士的回忆录中可以想象出来。在广昌的战斗中，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重武器的袭击，损失惨重，这一仗似乎决定了后来的战局。不用说，这是回避游击战，固执阵地战的党中央的战术本身出了问题，但据说党中央在广昌作战之后变得保守了，整天在消耗兵力和丧失土地。而且“最后，又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苏区，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决定脱离中央苏区的人们把什么希望寄托在将来了呢？刘伯承（四川省人，中央委员，元帅，1892年生）的手记没有明确讲，但有份资料说，1934年秋莫斯科来电报劝告中国共产党从瑞金出发，如果必要的话，在离蒙古近的什么地方寻找个安全地带。

如果考虑当时掌握党中央实权并推行极“左”政策的人们形成了被称作“留苏学生派”集团和这些人在掌握党内权力的过程中也借助了莫斯科的支持这两种因素的话，不难想象上述资料中所说的电报，在作出下决心脱离（明确地讲是放弃）中央苏区这一重大决定时是一个有力的契机。即便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包围圈在缩小的现实情况，来自莫斯科的这份电报的权威，恐怕也起到了堵住反对者嘴巴的作用。

然而，在这份电报之前，即在1932年6月以后，第四方面军和第三军已分别放弃根据地向西转移，这在革命史一类的书中被说成是“极‘左’分子指导的结果”，在所谓的“留苏学生派”的眼里恐怕没有看到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本来他们就批评毛泽东的这种根据地路线。然而在脱离中央苏区之时，以什么方针替代这种根据地路线，恐怕也没有明确的形式。决定通知到一般战士是出发前一周的10月10日，从《赤色中华》上张闻天的文章描述的匆忙情景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最终目的地是延安这件事，在人们的心中并没有数。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人罗伯特·佩恩采访时谈到长征目的地时说：“如果你问我们是否有什么明确的计划，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有什么计划。我们只想突破包围，与其他苏区合并，然后想办法到可以同日军打仗的地方去。”长征开始后数年，在日本出版的由日本人写的研究著作中也曾指出长征本无计划，这看来没有犯估计上的错误。为便于简略地研究长征的路线，现将有关部分引用如下：

“1934年10月，在中央军猛将陈诚的攻击下，数年来作为红军根据地的赤都瑞金终于陷落。他们最初的落脚点预定在湖南西部，并没有考虑该向西北转移。首先命令肖克在前探路，贺龙从湖南西部渡过长江，又从三峡地区过长江北上企图再发展。焉知突然遭中央军的追击，于是不能在湖南西部停留，想入贵州，但贵州四面均有敌人，无奈转向西南，暂驻松潘一带观察形势。然而土城一败（此处有明显错误，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在土城被红军打败，受到蒋介石的军法会议处置——引用者），又入云南四川省边界，历经艰辛到达四川西北，但该地千里荒芜，人烟稀少，且松潘要地已为中央军胡宗南部

占领。无奈进入甘肃后转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会合，不久贺龙、肖克、徐向前部队相继到达，终于实现大团圆”。

文中利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这是个缺陷。但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外部世界是怎样看待长征的。文章作者对长征作了如下结论：

“这种长途的败退，实际上达二万五千里。红军敝衣破帽，赤着脚艰难地走在险峻的山路上，中央军不停的追击使他们无法进村征粮，士兵们因空腹和极度疲劳不断出现落伍者和死亡者，红军战斗力出现甚大破绽。部队有时饮山谷里的水，忍受着饥饿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困难和危险，构成了悲壮的场面。”

二万五千华里的大长征，可以比喻成一个国家的大转移，但也确实拖着长长的队伍。首先，正如刘伯承用十分愤懑的口气说的那样，准备不足还表现在行军的编成上。特别是党中央机关和行政机关编成的中央纵队好像更为严重。据说这个纵队行军时，从先头部队到后面部队拖有五六公里长。没有汽车，即便有，在山路也用不上，所以必须靠肩膀搬运造枪的机器和印刷机械以及各种物资。其中也有十几个青年人才能抬动的重机械架。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紧跟着对这个长蛇阵实施攻击。无法离开这个队伍，并负责保卫它的士兵们损失严重，这是理所当然的。“每遇爬山涉水，通过险崖隘路，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而周围却经常是枪炮声和敌机轰炸声，急得战士们直跺脚，恨不得立即到战斗部队去和敌人干一场”

情况对于战斗部队也是一样。长征最初的困难是在湘江上游渡江，但过这条江党中央的队伍就用三天时间。掩护这次渡江的两个团以国民党两个师为对手进行三天苦战。党中央机关的暗号叫“红星”，掩护部队的指挥员不断地接到如下电话：“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但眼前自己的部下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和负伤，而且不能放弃战线。他在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后方机关是太庞大了。连坛坛罐罐都带上，这就使我们行动迟缓。这时，我们真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据说这支部队在接到的命令中有“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据说作为党中央唯一依靠的，是在湖南省西北部的四川、湖北、贵州边界地区开辟根据地的红军第二方面军。它的总指挥是贺龙，政委是任弼时，是同年8月脱离井冈山一带根据地的第六军团在贵州省东部与在同一地区开展游击战的第二军团刚刚合编的部队。很快察觉红军意图的蒋介石（脱离中央苏区的红军以第二方面军的位置为前进方向，显示了战术上的幼稚）在红军的前方构成四道封锁线。最后一道封锁线是在两个团苦战的湘江东岸，这里的战斗持续了一周时间，十分激烈。最后，红军在两侧摆开掩护部队，主力部队像在用红军战士的肉体搭成的隧道中钻出来一样突破了这道封锁线。突破成功时已是11月下旬，从中央苏区出发时的十万红军（刘伯承的说法。斯诺说九万，《革命史讲义》说八万）减少到三万余人。“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是很自然的。这种空气恐怕带来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的结果——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贵州遵义，“党在1935年1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停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然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似乎应该说在这次红军中央纵队改变预定路

线，不与第二方面军会合进入国民党薄弱的贵州省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苗头。转向贵州省，这是毛泽东的主张。“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在占领了贵州省的黎平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后还要采取进攻贵州的路线，部队在整编后渡过乌江，打下了遵义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主张，“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2. 遵义会议——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遵义，是贵州省仅次于贵阳的重要城市，它那四周高而厚的城墙显示了典型的中国城廓的风姿。由于遵义会议的召开，这座城市的名字在中国革命史上长期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恐怕这是开始长征时没有料到的，对于遵义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吧。

红军于 1935 年 1 月 4 日夜至次日晨攻占遵义，翌日毛泽东、朱德等随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纵队入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8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据说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刘少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们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坦率的承认错误的发言，因此会议的气氛对毛泽东有利。周恩来从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降到副主席，毛泽东任主席。”* 《决议》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以下几项，追究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仅从第一项中便可以想象革命的主体方面首先想研究胜利与失败的根本原因，笔者大概是毛泽东或与毛泽东有同一思想的人物。实际上，按照后来传出的消息，那是把毛泽东的发言变成了文章。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李德，但把这个《决议》收入 1948 年版《毛泽东选集》时，把人名变成“××同志”“××同志”，成了缺字。据说是本着憎罪不憎人精神做的处理。但关于李德，在《决议》中用华夫这一笔名表示。

按照朱德的说法，在占领遵义之前，红军的作战是在苏联骑兵出身的利特罗夫，中国名字叫李德的外国顾问建议下进行的，他是第五次反“围剿”的负责人。朱德说他 1933 年进入中央苏区，是在那以后三年间唯一的一个外国顾问。但据张国焘的回忆，好像还有一个外国顾问在 1931 年至 1934 年期间呆在瑞金。不管怎么说，他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一个西方人。斯诺说，利特罗夫是“与红军一起行动的唯一的一个外国人”（黑点为笔者所加）。但这种说法不对。作为参加长征的外国人，还有朝鲜人毕士弟。他是林彪指挥下的第十五军团的师参谋长，有丰富的军事知识，为部下所尊敬。他是中国共产党员，长征之后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进入山西省的作战中战死(11)。

利特罗夫，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德国人。莫斯科军事学院毕业后，作为“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正如朱德所说，他是 1933 年 10 月来到江西苏区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

个名声很高的佛温·塞克特将军。利特罗夫屡次预料并猜中塞克特将军等的战术，这不仅使红军，而且也令南京的将军们吃惊。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正像在反“围剿”的经过中看到的那样，也有不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地方。长征开始后，在红军中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指挥方法逐渐产生了不满和埋怨。对比利特罗夫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这一事实，要求召开会议并最后掌握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是一步也没有离开中国的人，这件事意义深远。

中国的文献把这件事说成是“此后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永远结束了”（12），那种自然的感情也表现在“永远”这种形容词上，如果这里所说的“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党内的“机会主义”的话，那是政治上的事，所以不会“永远”被根除。应索性讲复活的可能性应予警惕。在使用党的用语中出现这种矛盾的文章，暗示出这里发生了超越党内用语范围的大转变，那就是确立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在莫斯科和外国，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而且，如果说对谁负责的话，不是对莫斯科而是对中国民众负责，这也是个原则。“永远”排除外国党的干涉这种共同的想法在这个时候就在中国共产党内牢牢地扎了根（这是后来在中苏论战中表现出来的中共主张的重要思想）。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也应该看作是与这种原则的确立表里一致。

想起来感到奇怪，不过也可以说，俄国十月革命的光芒，列宁、斯大林的光芒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遵义会议以后，也分给李德等人住处和发津贴，但谁也不去跟他们搭话了。朱德讲他们受到了抵制，就“同红军里没有他们一样”（13）有的材料讲，红军为缺乏烟草而苦恼，曾兴起用杂草代替烟草的风潮，据说带头的是毛泽东和李德两个人，不知他们是否把吸的杂草交换过……。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又把遵义会议以后的战斗气息反映到词中，人们可以看到气宇轩昂的诗境表现出来的那种变化。从作者所处的地位和长征的进行来看，从第13首《忆秦娥·娄山关》到第20首《沁园春·雪》，似乎都可以看作是属于一个时期的作品群。这些作品同长征一起接连不断地把新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作者的诗境变得越发宏大，到第20首时达到了也可以说是绝唱的境地。而且，其倾向已在最初的第13首中表现了出来。

遵义会议是在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官邪召开的，现在已作为纪念馆保存着。据说解放后为修缮这座建筑清洗墙面时，发现到处都是红军战士书写的口号，那是遵从长征途中每人每天书写三次口号宣传革命的规定留下的。

红军留下的不只是写在墙壁上的文字。解放后寻找长征足迹的剧作家宋之的（河北省人，1914—1956）在遵义听到如下的故事：

<小马灯的故事>

对于文化落后的边境地区的人们来说，红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小卫生员的小马灯。这个小卫生员在深夜里去给老大娘医病。在归途中，他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杀害，身边遗下了一盏小马灯。据说老大娘有一个美丽的孩子，她保存了这盏神奇的小马灯。其后，在二十年的漫长的苦难岁月里，每逢人民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小女孩就把小马灯点起来，人们瞧着瞧着，痛苦就消失了，生活和斗争的勇气就恢复了，而且增长了。解放后，在当地人民成立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时，已长大成人的姑娘把它献出来了。它高挂在合作社门前的树梢上，每夜每夜，照亮着夜归的合作社员们的道路。

<红军坟的故事>

在遵义附近，红军作过战的地区，人们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红军坟。立刻，红军坟便成了方圆几百里以内的人们朝拜的圣地了。国民党的一个大官得知后，派部队挖掉了红军坟。可是过路的劳动人民都不约而同地往这个空穴内投一块石头。起始还是过路的时候投，后来几百里以外的人就专门赶来投了。没有多久，红军坟便比过去更为宏大壮丽了。

<红军还钱的故事>

红军某连连长陈树云，约二十年前，向遵义的老农民赵锦和买了一口猪。陈连长怕红军走后，农民受损失，他开了个字据。二十年后，红军果然回来了。赵锦和把字据拿到人民银行，人民银行立刻兑现，并且加了他十倍的利息(14)。

3. 娄山关战斗

遵义会议决定继续长征。自遵义出发后，边行军边整编纵队，后勤工作人员作为士兵编入战斗部队，许多干部编入连的指挥班，加强基层的领导力量，笨重机械和不必要的物资丢掉了，部队轻装前进，一种新鲜空气洋溢在红军中(15)。据说由三个师组成的红军第三军团，师长下去当团长，编成四个团(16)。从这里可以看出确实采取了彻底的措施。

从遵义出发的红军向四川省南部前进。当时为了同四川省西北部的第四方面军会合，计划在泸州与宜宾间渡过长江，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阻挡未能接近长江，于是红军改变方向回到原路，占领了娄山关。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第一个胜仗。

王家烈为守备娄山关派出四个团。红军在改变方向时与娄山关相距 50 公里，有情报称国民党正调大军向遵义增援，所以必须攻其前锋夺取娄山关，进而占领遵义。行军是跑步前进的。

接受攻打娄山关命令的是第十三团，于 2 月 25 日在靠近娄山关 5 公里处与敌遭遇，前进受阻。但红军派一个连迂回到几乎无法攀登的左侧山上，占领了娄山关背后的点金山。另有部队在娄山关右侧山上迂回切断敌之退路。那一夜全是急行军。“虽然正是阴历正月的夜晚，寒风刺骨，但每人的军帽里都冒着热气，汗水顺着脸庞流下来。

走到半夜，星月突然躲进浓云里去了。接着落下了阵阵细雨，陡险的山路，像擦了油似的，溜滑难走。摔跤的人越来越多。”(17)

占领点金山的部队与担任正面进攻的部队协同作战，从傍晚开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经过四次争夺战之后占领了娄山关。黎明时分，虽有敌人两次密集的反击，但都被红军击退。红军又乘胜前进，歼灭了红军离开后占据遵义的当地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师，击溃国民党中央军的增援部队两个师，再度占领遵义。由于军阀的军队欺压和拷打帮助过红军的人和红军家属，所以遵义人比上次更热烈地欢迎红军，有人更加愿意当红军了。后来又与敌人增援部队展开激战，并把敌人迫到乌江，获得了歼灭 20 个团的大胜利。这之后，红军又采取佯动作战和使用机动力量的做法，摆出要攻打贵州省首府贵阳的架势，尔后又调转锋芒进入云南省，在这里也作出要攻打云南省首府昆明的态势，省主席龙云吓得胆战心惊，红军却在预想不到的地点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

4. 忆秦娥（第 13 首）

娄山关 1935 年 2 月继承了略微直观的前两首的风格，吟咏久违了的战斗场面。前阕如郭沫若解释的那样，是讲从江西苏区撤退的情景，气氛凄惨。后阕虽描述赢得胜利的红军得意扬扬地越过娄山关的情景，而且在夕阳西下时自然联想到血，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残酷的。至少作者的眼睛没有离开这残酷的场面。

忆秦娥 娄山关 一九三五年二月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注释

【忆秦娥】46 个字。双调。各五句（但前阕和后阕不是同一类型）、三仄韵，一叠韵（第二句结束，重复三字作第三句，用同一字押韵 = 叠韵）。烈、月、月、咽，铁、越、越、血押韵。

这一词牌，李白之作是很著名的，后世均效仿之。毛泽东也用与李白同一入声韵（在规则上，用平声押韵也可以）。所说的李白作的“词”流传数首，其中菩萨蛮和忆秦娥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但实际上不是李白，推测是后世无名词人之作。

【娄山关】是贵州省北部大娄山（主峰金顶山，海拔 1258 米）中最重要的关口。它由剑头般锋利的三庄山峰所包围，从遵义到四川必经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据说距遵义约 60 公里有一石碑刻有娄山关三个大字” *。

【西风烈】2 月 25 日傍晚，占领娄山关后红军在高山上。西风一般是指秋风，这里恐怕是指西风向山上猛烈吹来的情形吧。

【长空】很远的高空。

【雁叫】初春的大雁。

【霜晨】下霜的早晨。苏轼在吟咏梅花的诗中有“莫向霜晨怨未开，白头朝夕自相催”（见于《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诗》）。

【月】天未明，月亮出。

【西风烈以下二句】这里的西风、雁叫、霜晨一般是秋天的景物。因此，郭沫若推测前阕的时间可能是 1934 年秋，是歌颂长征初期红军的。而且所谓“西风烈”，是指以帝国主义各国为后盾的国民党军队的力量相对强大，“马蹄声碎”中的“碎”字是现代汉语“零碎”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解释成马蹄声“小而碎”。后阕是遵义会议后通过娄山关时的情景，因而这一首词可以解释成以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为背景，吟咏会议前红军的悲壮和会议后红军信心百倍的气氛(18)。因为当时没有说明制作年代，所以郭认为后半部分是遵义会议后第一次通过娄山关时（即 1 月份）所作。但周振甫的解释与此相反，他认为是歌颂为再度占领遵义通过娄山关时的战斗。对郭沫若把西风等看作是秋天的景物提出疑问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与梅花有关，苏轼也有使用霜晨的例子，这是否绝对了？“碎”，与其解释成现代汉语的“零碎”，不如按下项的解释更为妥当。郭沫若的那种不勉强地把前阕的时间与后阕的时间看成是同日也可以的说法，依然难于放弃。但不久便遵从周振甫的说法了。

【碎】像坚固的东西被粉碎一样，听到马蹄的声音。碰到山路上的岩石发出的很响的马蹄声。

【咽】呜咽。心里堵得慌，声音不通。

【雄关】地势雄伟。

【漫道】不要说。大致作为事实承认，放在否定它的句子前面。如果没有平仄关系的话，这里就成了“漫道雄关真如铁”。

【真】口语中强调时的副词，真正。

【而今】口语，感慨加重语词说的今天。

【迈步】现代汉语，大步走。

【从】表示动作经过场所的前置词，现代汉语。

【头】顶，最高处。

【苍山】林木繁茂的青山 150*。

【残阳】夕阳。

诗词大意

狂风从西面吹来，从高空传来大雁的鸣叫。抬头仰望，下霜的寒冷早晨就要亮天，皎洁的月亮还挂在天上。清晨在屋里听到红军的马蹄声，那是踏碎坚硬东西的声音。激励士兵的军号声悲壮，宛如抽泣声。

敌人夸耀设在雄伟地势上的关口如钢铁般坚固。别太得意了！现在我们不是勇往直前地越过山顶了吗？看眼前的景致，山上郁郁葱葱宛如大海的波涛起伏，即将落下的夕阳染红了天空。那红色是为革命献身的战友们的血的颜色。

忆秦娥

李白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5. 十六字令三首
(第14首)(第15首)(第16首)
1934年至1935年

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吟咏长征途中的山。虽使用民谣调的形式，但避免了民谣中的悠长，成功地把精神极度紧张压缩到短词中，因此丝毫感觉不到形式的陈旧。胜任这一紧张词作的作者的敏锐，恰是诗人的特点，而且是推行不断革命的革命者的特点。

十六字令三首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注释

【十六字令】16个字。单调（前半、后半不分）。

四名，三平韵。山、鞍、三押韵。其二，山、澜、酣押韵。其三，山、残、间押韵。这十六字令是词中最短的。再比这短的是十四字的竹枝词，但算插入的衬词便成为二十二字。有人把十六字令和竹枝词看作是民谣。也有人认为十八字的“闲中好”作为词是最短的。所谓令，一般是付在词牌上的称呼，如浪淘沙等叫浪淘沙令。顺便说一句，最长的词是二百四十个字的“莺啼序”。

【未下鞍】这是根据民谣中的“马过要下鞍”来的。这一句表现了向高山挑战的气魄。与民谣中说的相反，是“快马加鞭”，而且“未下鞍”。

【惊】心情突然紧张起来。面对险峻山峰的顶端，对自己战胜了它而吃惊。

【回首】回头看。

【三尺三】三尺三寸。

【离天一句】当然这是夸张。陕西有句古谚：“孤云两角，去天一握”（19），就是这样。在李白的《蜀道难》中也有吟咏“连峰去天下盈尺”，“百步九折萦岩峦，扞参历井……。”但李白说的是由于山高“仰胁息”的情况，毛泽东却没有描述那种艰苦。

【骷髅】暴露在荒野上的头盖骨。

诗词大意

山，民谣中有低头和下马的说法，但我又给快马加了鞭子，于是一口气登上山顶。回头看突然紧张起来，哎呀！我的头差三尺三寸就顶到天了。

其二注释

【倒】颠倒。

【翻】翻过来，使颠倒过来。

【澜】大波涛。

【奔腾】疾驰，有万马奔腾等成语。

【酣】事情正盛期，高潮。

【万马】把山的形状比作马的诗，有韩愈的《南山诗》。韩愈的诗形容细腻，但毛泽东用“万马战犹酣”，直截了当地进行概括，似乎可以产生气吞山河的效果。

诗词大意

山，似翻江倒海的巨浪涌来，其气势急迫，宛如骏马以惊人的速度跑上去。这样说来，这种连绵起伏的山峰像万匹骏马在竞赛，而且现在正是高潮。

其三注释

【锷】刀刃、剑锋。

【残】出缺口，缺。

【欲】想。

【堕】崩溃，倒塌。源于古代神话中的表现（参照第9首《渔家傲》原注）。

【赖】依靠。

【拄】像用拐杖支撑身体那样支持。

【其一以下】以上三首，都是吟咏山的，其一是说高，其二是说大，其三是说坚。但就其内容而言，的确都是独特的表现手法(20)。

诗词大意

山，像戳破青天一样高耸着，其险峻如刀锋。虽刺入云天，但还锋利无缺口。要掉下来的天，幸亏有这座山像柱子一样支撑着。

6. 长征路上（渡过金沙江）

长征是毛泽东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于 1934 年 10 月 16 日自江西省粤都附近的铜罗湾出发开始的，1935 年 10 月 22 日到达陕西省保安的吴起镇（吴旗县）结束，历时约一年。但据在甘肃省会宁最后于 1936 年 11 月完成与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的大会师，“胜利地完成长征”的说法(21)，这实际上是用了一年时间完成的事业。据统计，在 368 天中有 235 天白天行军，18 天夜间行军，不行军时几乎都打仗。一整天都打仗的大规模战斗有 15 次，每天都有一次小的接触战斗。长征通过 11 个省，占领 62 个县，在 6 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22)。

长征的距离，根据第一军团 1936 年在预旺堡所作的记录是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华里（9044 公里），从福建省最远处曲折迂回过来的一部分士兵，大概行走了二万五千华里（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即便是短的距离，也相当于北美大陆东西直线的距离。如果从北京一直向西走的话，极粗略地用眼睛估计，也似乎是横跨亚欧大陆到达大西洋彼岸了。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等历史上著名的长距离行军也比不上长征。正因为如此，牺牲很多。从江西出发时是 10 万人的第一方面军，到长征结束时只剩下 7、8 千人了。

长征路上红军克服了重重困难，这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巧妙地得到了描述。

长征开始后，首先踏破的是“五岭”群山。这包括横跨江西、湖南、广东和广西的许多山岭，其中大的岭有五个（参照注释），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五岭的北面，瑞金在赣江上游、贡江的上源。第一方面军自贡江下游的零都出发沿五岭北面西行，渡过信丰江（桃江）、章水、潇水、湘水，越过都庞岭。都庞岭为“五岭”之一，在湘水西岸，当地人称老山界。这条山路上山 15 公里，下山 7.5 公里，是有名的险峻山路。一位士兵把这叫作长征途中最艰苦的路段(23)。

然后，红军又在乌江、遵义、娄山关、猴场、赤水、上城这些属于“乌蒙”山区的崇山峻岭中转战（第 13 首）。

接着，他们渡过“金沙水拍”的金沙江。长征结束时病倒被担架抬着的周恩来，还在精神抖擞地指挥着渡河作战。

金沙江的水源在海拔 5000 米处，但西康省的巴塘附近为海拔 2735 米，宜宾为 296 米。就是说从水源到宜宾，平均 1 公里落差为 2 米，是急流险段，流速每秒 4.5 米。渡场只有 10 余条船，而且从龙街到上游岩石很多，所以只能使用皮筏才能过河。国民党估计红军可能在龙街渡河，但红军却在其下游的绞车渡（也叫绞平渡、交西渡）过河了。

有材料讲，靠金沙江这边的 30 公里路是下坡，走 20 公里就到绞车渡镇。从那里到河岸 10 公里，斜面更加险峻，不拄拐杖就有跌落到谷底的危险。4 月份的天气已经相当热了，越往下走越热，在河岸就热得难于忍受了。据说人们都贪婪地喝水(24)。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泽东诗中所说的“云崖暖”是避开直叙而显得从容不迫。在《三国志演义》中，金沙江是作为泸水出现的。马岱率领的兵士想在此渡河正赶上炎热天气，1500 人死去。因此，这里作为酷暑之地是自古就闻名的。

不过，当年的士兵提供的其他材料，是这样讲述通过云南省时的印象的：

“四月的云南，天气已经很热，只穿一件单军衣还经常汗流浹背。白漂漂的水田里，一撮一撮的禾苗被风吹得摇摇摆摆，好像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两边小山上，红花绿叶，树木丛生，蜜蜂嗡嗡的飞来飞去，真是一个迷人的春天。此时，我们的后面虽然仍有十几万追兵，但是谁都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指挥我们摆脱敌人，走向胜利。部队一面观赏春色，一面前进，情绪很高。”(25)也许是下游的风景吧，正如这种回忆录中所讲的，云南省以风景秀丽而闻名。在渡口有五六间船夫的房子（窑洞），但在准备要渡河时刮起了龙卷风，窑洞前的茅草屋被掀走了，红军战士也给吹倒了。30分钟过后风停下来，太阳也出来了(26)。红军拿出很多钱买下那里的六七条船，用九个昼夜全军完成了渡河任务。在“歌声和欢笑声”(27)中渡过金沙江的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彝族居住的大凉山地区。该地区与《三国志》关系密切，这里有据传是诸葛孔明设置的阵地“孔明寨”。再往里走有据传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猴屁股被烧焦的火焰山。

<安顺场的故事>

金沙江之后再一个要渡过的河是大渡河，但一部分红军要在安顺场渡河，其他人则在泸定桥过河。

安顺场，是太平天国诸王中颇有声望的翼王石达开为渡过金沙江好不容易才走到但却全军覆灭的场所。他率领的士兵及其家属，不愿被清军捉获，不管老人、孩子和女人都投入大渡河自杀了。那是1863年（同治二年）3月27日的事。当地人不相信石达开被清朝打败，传说让清朝抓到处死的是替身，真人已化作僧侣不知去向何方。还传说战败是因为石达开为儿子过满月举行宴会时被清军迫上的，就是现在还有人能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场宴会如何丰盛。在安顺场，大渡河水泛滥，在石达开被捕后的自供中也讲述了这件事。红军到达的时候，水量急剧增加，水流湍急。这是上游高山上的积雪融化而造成的。据当地人讲，河水比较安静的时候是冬季，其他季节即使有经验的船夫对这条河也心中无底。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夫中，也有解放后在这条河上遇难身亡的(28)。

解放后访问安顺场的宋之的，会见了当时从红军队伍中掉队，一直在那里生活的医生。这个医生是在中央苏区的医科大学里专门学药学的，20年来他更姓改名在安顺场生活。全国解放的消息传到这里后，中国医科大学给他颁发了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他像苏醒过来似的，在附近又开始行医，也到少数民族地区，逐渐成功地使那里的人们破除了迷信(29)。

正像朱德在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太平天国作为近代中国的先驱，其精神传统之根已深植于红军当中，所以石达开的失败是每个红军都十分了解的故事，蒋介石曾从飞机上向红军撒“毛泽东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传单。船全部拴在对岸，只有一条船每五天向南岸渡一次。红军的先遣队很好地掌握了这一情况。

大渡河宽约300米，但流速很急，每秒4.5米。第一次见到这条河的红军士兵心想，怎么水面也形成坡度了呢？怪石样的岩石在水流中伸出头，撞击它的浪花像雾一样迎面扑来。对面的渡口后面是数十米高的悬崖，在四十多层的厚石阶上，敌人没有路障。

除了进行敌前强行渡河之外别无他法，最初从志愿者中挑选出17名勇士。岸边排有6挺重机枪，数十挺轻机枪担任掩护射击。三门迫击炮将炮口

冲着对岸，但是不巧炮弹只有四发。第一船冒着敌人的炮火渡河成功了，接着第二船、第三船相继渡河成功，这是5月22日的事(30)。

<铁索桥>

然而全军在这里渡河是不合适的。结束渡河的第一师第一团决定沿东岸北上，与西岸的先遣队第二师第四团并肩夺取泸定桥。西岸的先遣队接到三天急行军160公里的命令。对岸和前方都是有敌人部署的悬崖绝壁，一步不慎下面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对岸还有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的敌人。比预定的时间提前行动了，党员在行军中边走边开会，做鼓动工作。进入夜晚点起松明探路，每当对岸敌人发来暗语时，当了红军俘虏的原国民党士兵，就用掌握的喇叭信号回答说是自己人使其放心。不大工夫，国民党军队的火把熄灭了，好像中止行军去宿营去了。西岸的红军终于先期到达泸定桥。当年的红军战士对那附近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 (31)

由22名红军战士组成的突击班在铁索上匍匐前进，紧跟其后的其他战士在桥板上前进着。敌人在西城门放火，但突击班继续前进，占领了桥头并迫击城内敌人。在东岸前进的第一师击败了敌人，到达这里也正是这个时候，那是深夜两点钟。与第一师一起赶到的刘伯承总参谋长、聂荣臻（四川省人，现任副总理，元帅，1899年生）政委马上进行泸定桥实地调查，刘伯承站在桥的中间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用力地踏着桥板，他感慨地叫着：“我们胜利了！”第三天，林彪（湖北省人，黄埔军校毕业，现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08年生）军团长率领的主力到达，接着毛泽东出现了。

（过雪山）

泸定桥之后，横在红军面前的险峻难走的地方是高的雪山——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的这座山，从山麓看去像由银子堆积起来似地耸立着，山顶完全被白雪覆盖着，红军战士们到处请教老百姓，他们告诉战士，早晚有暴风雪，上午9时到下午3时可以过山，要多穿衣服，还要用酒和辣椒暖身子，最好拿拐杖等。可是在边境上的荒僻山村到哪里去买酒和辣椒呢？穿着夏服的红军能够准备的只有拐杖。6月12日晨，部队在四川省宝兴县大跷碛村集合，据说呼喊“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时，伸向空中的拐

杖像树林一般。登山一开始，便遇上了暴风雪，来自江西省的一个战士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雪，觉得挺有意思，可是随着向山顶接近，却下起了鸡蛋大的冰雹，打在只穿夏衣的身上浑身真像刀刮一样。有三个战士抱在一起停下来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人们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但又不敢歇下来休息(32)。还有一个战士，脸被冰雹砸得很疼，他两手捂着脸前进。不过，若从山顶向四周眺望，那景色真令人叫绝。

“冰雹过后是万里晴空，阳光耀眼。到了山顶，举目一望，只见千里冰雪，银峰环立，除开山峰上儿根孤零零的电线杆和少数民族竖起的‘旗杆’以外，是一片琼玉世界。俯视山下队伍，像一条灰色长龙，蜿蜒而上，把这个一望无际的琼玉世界划成两半。……山顶上的一段道路是曲折的盘道，绕着夹金山的主峰，蜿蜒而过。经过四五个小时的紧张搏斗，我们全团人马都安全翻过山顶，无一掉队。下山时，已不像上山那么吃力，山歌声此起彼伏，荡漾山谷。战士们好像要让高傲的夹金山认识认识它的征服者的英雄气概。”(33)

部队下山时看到山脚下有村子，一边想会不会有敌人，一边紧张地向那里接近，原来是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两军战士那种喜悦心情就不用说了。那一夜在庆祝会上尽情联欢，然后就睡觉休息。长征以来，战士们好久没有在床上睡觉了，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给他们准备好了床。翌日晨，两支部队告别后又出发了。

<新的对立>

1935年6月，在四川省西部的理番（现在的理县）、懋功一带，毛泽东等的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等的第四方面军会合了。这个时候，以为自己率领的部队的供给比毛泽东等的好而自满的张国焘对毛泽东等采取了瞧不起的态度(34)。会合后，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张国焘也勉强地同意了。毛泽东率部队爬过冰雪覆盖的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来到毛儿盖，但张国焘根本就没有北上，所以几次打电报催促他，足足等了一个月，在毛儿盖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好歹出现的张国焘进行了批评，并决定继续北上。

本来，张国焘在与第一方面军会台前就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西北是指西康、青海、甘肃、新疆各省。他的意见是应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该北上而该南下。当然，作为民族危机，在当时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形势下，这种意见无法实现。在张国焘看来，这些地区离苏联近，感到放心和正统。也许还想利用新疆的特殊地位，梦想成立一种独立国吧。1932年以来，精力充沛的盛世才统治着这里，并把新疆视为自己个人的领地，他仰仗着苏联的援助。从1940年11月苏联取得50年垄断开采各种矿藏的权利这件事，似乎也可以想象苏联在该地区的特殊立场。而且，一般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具有代表北京小组出席大会资格的张国焘，作为个人因素起作用的，恐怕是对抗毛泽东的意识。如果张国焘的意见被采纳，今天的新疆将是另一个样子了吧。

总之，毛儿盖会议的批评和决议似乎没能改变张国焘的决心。在通过长征最后的艰难路程大草地之后，张国焘给党中央打电报，要求整个红军南下，

而且说，如果得不到允许的话，他就率领自己与朱德指挥的左路军（在毛儿盖，第一、四方面军的一半，改编成左路、右路两军）及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的右路军中原第四方面军（即红军的四分之三）的部队返回原路。这不知是否真实，但据传当时战士们曾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同张国焘大声争论的场面。

（《八一宣言》）

1931年9月18日，日军开始侵略中国的东北，发生了所谓的“满洲事变”。日本在东北制造了“满洲国”，接着又把手伸向华北，搞所谓华北“特殊化”、“自治”，因而夺走了中国的主权。这一动向在中国的民众和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1932年1月，日军企图占领上海，开始了军事行动，对此，过去曾作为国民党军队进攻江西省革命根据地的第十九路军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他们被全国民众称赞为英雄。蒋介石的“首先反共”口号不得民心，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驱逐外敌”的呼吁有力地动员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于1932年发出布告提出对日宣战，布告中赞扬了过去的敌人第十九路军的将士是“英雄”。进而于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所以称之为《八一宣言》取的是发表的日期。《八一宣言》抨击蒋介石等民族败类与日本侵略者合作阻挠和镇压“抗日救国”，但同时对于日本解散国民党机关和蓝衣社的要求又表示“坚决的抗议”，指出“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尽管国民党和蓝衣社危害人民，但那不是外国侵略者应该插手的事。正在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以王明（陈绍禹）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议。王明于八月七日以《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策略》为题发表了《八一宣言》中体现出来的新政策，据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八一宣言》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由王明在莫斯科发表的，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就是说，饱尝长征辛酸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以《八一宣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有人说在毛儿盖已经恢复了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关于《八一宣言》写道，“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确政策的帮助”，统一战线的设想，“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不可能完成”，可以理解成这暗示了《八一宣言》是莫斯科制定的。不过长征之后，在陕西省瓦窑堡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基本任务。这时还没有考虑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中，关于对统一战线本身的理解，尽管与不久回国的王明形成了对立，但这里毛泽东作为负责任的领导人把作为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同全体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了。而且中国共产党还通过统一战线这条渠道从中国民众中得到党的无限活力。

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性格，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传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尤为强烈。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日本军部和统治阶层缺乏把它算作对方“战斗力”的认识。在中苏论战中，让人感到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错误估计。所谓共产国际的方针另当别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个时候不会想不到“民族”这种东西的力量吧。正像后来不久被称作“民族主义者”那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不是把陶醉在“民族”具有的无限热情

的经验当作每个人具有的吗？而且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承认民族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在这里面有一个宝库，让人们虚心地认识这一宝库的，是经受住严峻考验的长征。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在工人阶级的名目中舍去“民族”，这在今后长时期内大概是不可能的。仅把中国共产党的性格归结到其多数党员是农民，这不可能充分预测它的政治行动。

当知道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七年来的工作，并通过了下述决议的时候，毛泽东一定大大地增强了自信心。对莫斯科是一种政变的遵义会议，没有受莫斯科干涉，这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已经表明了。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应根据各国的具体形势和特点，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问题，……（中略）

“四，应帮助各国共产党正确利用自身的经验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但不应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他国，更不应以枯燥无味的公式和抽象的公式替代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35）。

1941年1月，数名中共党员在从莫斯科出发踏上回国的路程之前，去见季米特洛夫接受指教。季米特洛夫说：“中国的同志需要认真地读一读《苏联共产党史》、《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书”。接着他赞扬说，毛泽东没有上大学，没有到外国留学，没有上马列主义的学校，但却把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这才是活的马列主义。还说毛泽东是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36）。

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这种赞扬，与承认各国党独立性的上述决议有联系，所以恐怕不是简单的恭维话吧。毛泽东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了解到，虽然在政策的每一个问题上还有缺陷，但在思想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运动有了新方向，并且认识到自己已经能够独立行事了。

（过草地）

接着，红军不得不过草地。接受先遣任务的某团政委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领受指示。毛泽东在毛儿盖住的地方是常见的西藏人住的房子，楼下是家畜小屋，毛泽东讲了红军前后遭夹击的状况之后说，国民党方面估计红军东进四川平原，但“我们走敌人认为不可能走的路”。张国焘过去指挥的原第四方面军的一个团被改编到先遣队。由于去看生病的周恩来，耽误了时间。看到这个团政委空着肚子的样子，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把毛泽东的晚饭拿过来，在陶瓷盘子里放有六个比鸡蛋还小的蒸馍。他惶恐地只吃了两个的时候，毛泽东出来了，“怎么样，再吃些吧，饿肚子可无法工作哟！”毛泽东对他说。

据说草地夏季长满青草，是个很好的大牧场。可是一到八九月雨季时，草地一下子变成湿草地了。

“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举目一望，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草底下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道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

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我们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在这里有不少同志倒下了，经过六天的艰难斗争终于通过了。”(37)

在走过草地那艰难的路程之后，有腊子口一战。腊子口是连接岷山山脉的要地，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打了胜仗。毛泽东的《长征》诗的最后两句的感情，又是全体红军战士的心情。一个红军战士在回忆录中写道，下了岷山山脉后，一进入甘肃省，我们感到有一种告别饱尝艰苦地带的愉快心情和来到这种地方的自豪。队伍背向岷山行进着，我们边谈笑，边回头眺望岷山的风姿。与其说是恋恋不舍，不如说是向它告别(38)。

接着是爬六盘山的艰难行军，但已逐渐接近目的地陕北了。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的一个少年战士回忆说，他在六盘山上精疲力尽不能动的时候，毛泽东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而毛泽东自己则只穿了一件单衣。他回忆了即将到达目的地的瞬间。

“一天，我们从甘肃环县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刚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便遇上了刘志丹同志派来给主席送信的人。主席看过信，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了！

……’主席的活还没讲完，山坡上立刻欢腾起来。同志们高兴地笑着、跳着、互相搂抱着、欢呼着，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得大哭起来。”(39)

<长征的意义>

毛泽东等率领的红军于1935年10月在吴起镇这个小镇与活跃在该地区的第十五军团会师（与十五军团的主力会师是11月在东村），但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又在直罗镇与国民党军队交战了。这是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红军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近前线的山丘上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说是国民党军队，却是张学良（张作霖之子，现被软禁在台湾）属下的东北军，他们是被日军从东北赶过来的，现在又被蒋介石驱使来讨伐红军。红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使他们深受感动，而且红军不杀俘虏的政策也很奏效。他们嘴里说着“这是三挺，我们给你们运枪来了！”向红军投降。东北军士兵甚至有人三次投降。战斗取得了歼灭一个师和一个团的胜利。在战火的硝烟中，同周恩来和国家保卫局长罗瑞卿（四川省人，黄埔军校毕业，中共中央委员，1907年生）一起出现在前线的毛泽东把珍贵的水壶里的水递给每个负伤的战士表示慰问，并在木板担架上放上麦秸和敌人的大衣让战士躺着舒服些(40)。

在这次直罗镇战斗前，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对中央军委纵队（即直属部队）发表了有关长征结束的演讲，据说那是极为令人感动的演讲。接着，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只就紧迫的军事问题和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问题进行了改革。瓦窑堡会议再次分析了政治形势并就策略问题做出了决议。《八一宣言》中表达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变得坚定了。其后又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是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对统一战线政策进行的说明。关于长征，他说从红军放弃原来的根据

地这一点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敌人发动的“围剿”和“追剿”失败这一点来看，长征是胜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毛泽东进而又就长征的意义指出：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7. 七律（第 17 首）

长征 1935 年 10 月

把长征的整个行程咏进诗中，可以认为是纪念之作。诗由均衡的确实令人想起纪念碑式建筑的诗句构成的。对照实际的行程读来，那是在乍一看平凡的语句中充满难以忘怀的感慨的极富真实感的诗。

七律

长征

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注释

【七律】七言律诗。这是由八句七言句（七字句）构成的，每两句为一联。一、二句称首联（起联、破题），三、四句称领联（前联），五、六句称颈联（后联），七、八句称尾联（结联）。这四联是按起、承、转、结展开的。所谓起承转结是这样一种诗的构成法，即“承”是

原封不动地承接“起”中叙述的事物，然后再详尽地展开叙述，在“转”中另外叙述与“起”、“承”中不同的事物和情况，在“结”中把“承”和“转”结合统一起来。律诗都有这种严密的结构。律诗讲对仗，领联（前联）和颈联（后联）分别对仗。就是说第三句与第四句，第五句与第六句对仗。例如，像山与水这样的同类词必须对仗，这是一种修辞技巧。天文与天文类词对仗时略显狭窄，但名词与名词对仗时范围便宽得多。难、闽、九、寒、颜押韵。

【长征】去远方征战。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诗中有“万里长征人未还。”（从军行）。

【红军】现代汉语把赤说成红，一般用在好的意思上。把结婚仪式、祝贺生日等吉事叫红事，赠物时包装也用红色的，即红包，与此相反，白色是用在凶事上的颜色，把凶事叫白事。与红军相对，称国民党军队叫白军，将其统治区叫白区。

【不怕】不惧怕，不在乎。现代汉语。

【万水千山】指路途遥远，经过的山河多。

【只】就那些，唯独那个。

【等闲】平常的事，当作家常便饭不予重视。不大介意，不大注意。中唐诗人张谓（河南人，天宝二年的进士）的诗中有“眼前一尊又长满，心中万事如等闲”（《湖上对酒行》）。还有中唐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秋月春风等闲度”。

【红军以下二句】首先概括整个长征，把长征的主角红军放在第一的位正上加以赞颂。另外，第二句起初不是“莫道乌江天堑，看红军等闲飞渡”吗？作为七律，第一句的字数不够，但在一个回忆录中引用了这两句，编者注解为“毛主席咏长征诗”（41）。

【五岭】红军首先必须越过的是山区。这里指连接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各省交界处的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城越岭。

【逶迤】像蛇爬行时一样，蜿蜒持续很长的样子。中唐诗人韩愈的诗中有“广州

万里途，山重江透迤”（《送李翱》）。

【腾】跳起来，跳跃。

【细浪】小波浪。

【乌蒙】乌蒙山脉。横跨云南贵州省，在云南省禄劝北方，临金沙江。广义上讲是指宋代乌蒙王封的云南、贵州、四川南部。山的高度，在云南省东部平均为2000米，随着向东而变低，在贵州省中部为1000米，那是有地裂的高原，地形横断，山势险峻，由于河流侵蚀。多有深谷，凸凹不平，谚语中有“地无三里平”之说。

【磅礴】广大又覆盖天地的雄壮气势。北宋的王安石（江西省人，政治家、诗人，1021年—1086年）的诗中有“盘礴委积于天地间”（《灵谷诗序》）。还有用于形容大地起伏的例子，“天穹隆而周乎下，地磅礴而向乎上，人而处乎中。”（《太玄经·太玄告》）

【走泥丸】滚动泥丸。从斜坡上扔下泥丸，边跳动边落下，速度很快，看上去是蜿蜒的一条线。比喻乌蒙山脉的起伏正像滚动的泥丸形成的一条线一样。出自汉蒯通说给范阳令徐公的：“范阳令先下而身富责，必相

率而降，犹如阪上走丸也”（《汉书·蒯通传》）。但是如果看颜师古（唐初学者，584年—648年）在此处的注释“乘势便易”的话，那么本来不是用作比喻群山起伏的。这种用法，恐怕毛泽东是第一人吧。

【五岭以下二句】是领联，是第三句与第四句必须对仗的地方，但这里又采用了使文章脉络交错的手法。就是说，叙述五岭的透迤、腾细浪与乌蒙有联系，叙述乌蒙的磅礴、走泥丸与五岭有联系。这种交错的手法，在王昌龄的《出塞》等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也可以看到。另外，“腾细浪”“走泥丸”，这上面的用语接续得不够好，但这是红军看到五岭和乌蒙的感想。就是说，五岭也好，细浪、乌蒙也好，都是吟咏走泥丸那样的雄壮气势。

【金沙】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经四川云南省交界处，与岷江汇合成为长江。在深山峡谷中流淌，河流宽阔（红军渡江地点约300米），水流湍急。红军在绞车渡依靠六七条小船使全军过江了。

【云崖】江河两岸那高耸入云的绝壁。

【暖】事实上，据说这里的气温相当高，很热。

【大渡】岷江的支流，大渡河。红军主力是在泸定桥过河的。

【桥】指泸定桥。

【铁索】泸定桥为铁索吊桥，在九条并列的铁索上横铺有桥板，但敌人几乎把它撤掉了，所以红军在铁索上爬行冲锋。

【寒】铁索外露的感觉。

【金沙以下二句】颈联对仗，但避免同前面的领联同一调子，在领联中把五岭和乌蒙的长时间的和许多战斗作为内容，与此相反，这里在一句里把一次战斗作为题材。领联使用雄壮的语句，这里吟咏温和的气氛。“律诗虽宜颜色，两联责乎一浓一淡。”（见谢榛《四溟诗话》）这里作者对下联改换了一种“淡”的手法，这是一种高度的艺术技巧(42)。

【岷山】横跨青海、甘肃、陕西、四川省交界的山脉。长征的最后阶段，越过它后便是目的地陕西省。

【千里雪】与其说是岷山上的雪，莫如说是大雪山上的雪。

【三军】全军。在周的制度里指大诸侯的军队。

【开颜】高兴地笑着。

诗词大意

中国红军不怕长征中遇到的任何困难，像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一样，坦然地通过险峻的山路和湍急的河流。

五岭的群山蜿蜒起伏，在红军的眼中像掀起小的波浪一般。乌蒙的雄伟山巅威严耸立，看上去又像滚动着的泥丸留下的一条线。金沙江的湍急水流碰撞着的悬崖峭壁高耸入云，热是热，但可以说是暖。在面前的渡河上架有桥梁，但那只剩下铁索，在急流之上高高悬挂着的铁索令人感到寒意。

（越过雪山夹金山和草地）欣赏岷山的茫茫雪景，我们红军的战士终于走完了长征中最后的险要地段，现在战士们都满脸笑容。

8. 念奴娇（第 18 首）

昆仑 1935 年 10 月

眼前的昆仑山，它作为神话的山，又作为美玉的产地世代相传，自古以来一直哺育着中国民众的幻想，其存在的现代价值在哪里呢？说把冰雪覆盖的山巅分给世界，由此让人感到人类寒暑相同。想象是奇特的，但由于填上了中国传统上向往的理想国“太平世界”这一句，显然其寓意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关于昆仑山，完全没有神话方面的叙述，而是直截了当地从现代的效用出发展开议论，这倒给这首词增添了分量。

念奴娇

昆仑

一九三五年十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无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成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载为巨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注释

【念奴娇】百字。双调。各十句，四仄韵。色、彻、鳖、说，雪、截、国、热押韵。色和国似离开了韵，但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据说前阕的玉、周，后阕的倚、截用平声是一般的用法(43)，如果是那样，玉是仄声成了例外。而且前后阕的末句第一字必须是仄，但谁、环都是平字，这也是个例外。作为一种词牌的作品，苏轼的很有名，在内容上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有联系，准备在后面涉及。

【昆仑】山脉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阗河的源头山，是中国最大的山脉。西自帕米尔高原的葱岭起源，形成新疆与西藏自治区边界的水岭，并与青海、甘肃、四川省的山脉相连。中国北部的支脉叫阴山山东，中部叫北岭山系，南部叫南岭山系。但原注上的岷山也是其一支脉。神话中说昆仑山是住着妖魔西王母（据传她是个美貌的女子）的神秘地方，这里还有天界帝王黄帝的下界宫殿。又有美丽的花园，因为太高，似悬在空中，取名“悬圃”。山的四周为弱水（东西无法浮在上面的水）的深渊所包围，进而在其外侧由火焰山包围着。”*

【横空】横在空中而巨大。

【出世】超出人世。

【莽】草木繁茂貌。大自然中充满着能量，未被利用而贮存起来的原始状态。

【阅】查阅文件等。一面观察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一面度过时光。这是把昆仑山脉拟人化的说法。

【飞起玉龙一句】如原注所示，借用古代诗人的话。见于汇集有关诗的理论、批评、插曲的《诗人玉屑》（宋·魏庆之编）中张元（宋人，奇人）的诗句。但是，却“战败”了。

【周天】整个天空。满天。

【横溢】水从河道中溢出来。

【江河】长江与黄河。源头都在昆仑山脉。每逢夏季山上积雪融化，在下游便形

成洪水。

【人或为鱼鳖】鱼鳖是鱼和鳖。人民或许要被洪水淹死，古代有个名叫刘定公的人称赞治水的太古圣人禹，说“微禹吾其鱼乎。”（《左传·昭公元年》）。那以后便把在洪水中溺死说成“化鱼”，杜甫的诗中也有“百万化为鱼”（《潼关吏》）。

【千秋】千年。

【功罪】长江与黄河给人民带来的利益和灾难。

【曾】表示时间的副词。以前，业已。

【不要】现代汉语，不需要。

【安得】希求难于实现事情的说法。想办法。杜甫在写屋顶被大风掀走时的诗中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倚天抽宝剑】开始的意思是一端凭靠在天上的长剑，叫倚天剑。传是宋玉（公元前290—223年）作《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李白的《大猎赋》中有“于是擢倚天之剑。”都是有关剑的形容，但这里活用了典故，成为人依天。

【还东国】以前的原文是“留中国”。平仄相同，所以是意思上的改动。“东国”不仅指中国，还包括亚洲各国。与下面的“世界”、“环球”在文意上接续得很好。“还”作为世界的共有财产而分配，但这时的心情依然是返还给原所在地，比“留”更为婉转，而且修改后在语言上动作感很强。

【太平世界】“太平”和“大同”一样，自古以来在中国就被看作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大同”作为孔子的话记在《礼记·礼运篇》中，是归纳起来的。（比孔子还早的理想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度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下闭，是谓大同。”（《大札记》礼运）就是说天下属民众，社去财富全体人民都能得到实惠，自己劳动并帮助别人，没有掠夺、欺骗和战争，兴福利保健，赞贤能者任公职。是这样一种计划。所谓“太平”在农民的道教教典《太平经》（据说是二世纪时的著作）中记述如下：“大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于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大同”、“太平”有些微妙之差别，但都是把人际关系和财产、劳动的平等和平均视为理想。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农民起义也把它作为口号。在近代，李汝珍、龚自珍、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文等也都以此为中心思考理想社会的样子。其中，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根据把历史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古代学说（公羊家），认为当时中国属于据乱，把欧美视为升平，接近太平。按照他的说法，所谓太平是指无阶级、一切平等的、没有私有财产的“极乐世界”。进而又主张不分国界与民族的差别，但他不主张“革命”。毛泽东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44）总之，从人类的这些乌托邦设想考虑，这里使用了“太平世界”这个词。因而下一句的“凉热”也不仅仅说的是气温。

【环球】地球。是欧洲地理学输入后出现的词汇。

诗词大意

高耸入云、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的巨大昆仑山，从神话时代开始就一直注视着人世间的春色。

古诗人吟咏的诗句中有“王龙五百万”，被冰雪覆盖的山巅像玉龙在空中飞舞，于是空气也将寒冷和冻结。这雪因夏日的太阳而融化，下游的江河泛滥，人被淹死化成

鱼与鳖。

千万年间这座山为人间带来的功绩和罪恶曾有谁给予评说？

今天我对昆仑说，你不要那么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雪。啊，设想倚靠在天上，猛然抽出长剑，把你割成三段送出去。

一段给欧洲，一段赠美洲，一段还是归还亚洲。

这样，地球的寒暑相同（民族平等）了。在中国，自古以来作为理想社会描绘的太平世界就要实现了。

9. 清平乐（第 19 首）

六盘山 1935 年 10 月

这首词可能是接着前一首作的，从议论调一转吟咏晚秋天空引起的伤感和北方强劲秋风给人带来的豪爽心境。在前阙第一句、第二句里充满无限的感慨，接着第三、第四句的展开宛如观看京剧名角的舞台艺术一样，后阙的紧张格调化作舞台上的豪放歌声流入耳中。最后一句可以理解成作者在向历史挑战发出的气魄十足的宣言。

清平乐

六盘山

一九三五年十月

无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注释

【清平乐】（同前）。淡、雁、汉、万，峰、风、龙押韵。

【六盘山】在甘肃省东南部固原县城西南。位于陕西、甘肃两省的交通线上，但山势险峻，狭窄的山路一直到达山顶，要盘旋六重（《读史方輿纪要》中说“曲折险峻，盘旋有六”），故名。古代也叫络盘山。来自甘肃省高原的红军与敌骑兵部队遭遇，将其歼灭后于 10 月 7 日下午一口气登越这座山，于 21 日到达陕甘宁边区。“六盘山和我们以前走过的雪山相比，虽然不是最大的，但一上一下也有六十里地。刚上山还有点树扶着，快到山顶时树也没有了，只有一些快要枯死的小草。行走起来更加艰难。”（45）过去，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在这里避暑，他狩猎时摔下马，1227 年 7 月 25 日死在这里。

【天高云淡】形容秋天的天空。

【望断】凝视中消失不见了。

【南飞雁】有个故事说，在汉武帝时被匈奴抓走的苏武将信拴在大雁的腿上，告诉祖国的人自己还活着。雁与音信常常连在一起考虑。这里恐怕也有看到大雁想起留在南方坚持战斗的红军，这是很自然的人情吧。而且看看自己和部队用脚板走的路线，再望着大雁在空中飞去的情景，感慨无量。一位 15 岁参加长征的人做了如下回忆，地点是越过夹金山，进入草地，与词中的六盘山不同。“八月高原，秋风刺骨的寒冷，时而传来最后几批南飞大雁的长鸣声，更觉得这里空旷、荒凉。”（46）

【长城】万长城。为防北方民族的侵入，从战国时代起修筑的墙垒，秦始皇时又接着修筑。现存的长城是明朝建造的，它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 2300 余公里。

【好汉】据说汉武帝屡征匈奴，故匈奴惧怕汉兵，称其为好汉。好汉一词是由此而来。指勇健男子，重义男子。据守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相互称“英雄”、“好汉”（《水讲传》）。在近代，是指民众心目中理想的反抗权力的勇敢男子。毛泽东在概括长征时运用了这种贴近民众的语言，“它（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47）

【不到一句】有些文言式的口语。可能是长征期间流传在红军中的口号。

【屈指】扳着手指计算。

【二万】二万五千华里之略。

【红旗】起初，这首词作为十八首中的一首发表在《诗刊》上时，原作是“旄头”。过去装饰旄平尾巴旗子的名称，从意思上讲是指红军的象征——红旗的。但1961年9月作者挥豪写这首词时改成“红旗”。事实上，这是明快的，而且有色彩感。

【漫】随便（旗子任凭风吹动）。

【长纓】汉代人终军受命出使南越（今天的越南）时，对汉武帝讲话时的开头一句：“愿受长纓，必霸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汉书·终军传》）

【缚住】往是现代汉语，是附在动词后面的助动词。意思是坚定地把动作做到底，以达到目的。

【苍龙】被看作是最为凶恶的太岁神。中国的注释似有一定论，认为这苍龙喻指蒋介石。但据说长征结束后，红军越来越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交战，如果根据现代史的阶段来研究苍龙的具体所指的话，那么指日本军队更为合适些。写这首词的第三年即1937年8月，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以朱德（总指挥）和彭德怀（副总指挥）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如下就职通电，“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纓杀敌，义无反顾。”但是过细地追根问底没有什么意义。所谓缚住苍龙，是主体地把握历史的决定权，问题未必只限于日军和蒋介石。

诗词大意

晴朗的高空一片蔚蓝，白云如同鸟的羽毛般，一两朵轻轻地漂浮着，成行的大雁向南飞去。

我们还在向北挺进。不到达长城中途掉队，那可不是堂堂的男子汉啊！话虽如此，扳着手指计算，已经踏矿二万里了！

先头部队的红旗正在六盘山的高峰上被西风吹得飘扬着。

古代武将降服敌人时使用的长纓，今天已掌握在我红军手中。捆住那个巨大的苍龙以改变历史，不知将在何时？

10. 北国风光

在瓦窑堡会议上，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全国的救国运动向前发展，决定“东征”。说是想渡过黄河东进山西省，到达直接与日军相对的河北前线去。在山西省有军阀阎锡山（山西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现在台湾，1883年生）长期割据，与日军勾结，老早就在黄河东岸修起一排排碉堡，以防红军进入。这次“东征”开始的时间是1936年2月，按照注释，第20首《沁园春雪》是在这个时期作的。

“二月中旬，虽然是初春了，西北高原上依然冰雪未化。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极其隐蔽地来到黄河西岸，在沟口至沙口一线，紧张而秘密地进行渡河准备。从林彪军团长到突击队队长，都仔细地研究了渡河口和登陆点。”（48）

一个先遣队队长第一次见到北方的雪和黄河，写下了如下感想。这虽与毛泽东的不同，但也许是了解毛泽东词的具体背景的线索。他们首先访问年老的淳朴放羊人和船夫，请求他们带路。

“一切准备停当，我们就踏着齐膝深的雪，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向河岸上走。这正是阳历十二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了，从黄河边上吹来的东北风，卷着大把的雪花直往人们的脸上和脖子里撒，冷得人直打寒颤，有时憋得人连气也喘不过来。但是，走出村子不久”就慢慢习惯了，而展现在眼前的一片雪景，却把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吸引住了，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的，到处白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真是又雄伟又壮丽。

那两位向导大概对我们的行动感到有些奇怪，忍不住问我们：“同志，这样的大雪天，你们到河上来干啥？”我连忙回答：“俗语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嘛，我们这些南方人没见过黄河什么样子，听说黄河多么大，水怎么黄；现在来了不管怎样也得去看看。”这几句话是为了避免暴露我们的意图而事先编好的。说着，我望望林彪军团长，他笑着点了点头。他一大步一大步慢慢吞吞地在深雪里走，有时抬起头来，四下里望望，还不时地伸出手接雪花。他是那么悠闲，看来倒真像是有浓厚的看河赏雪的兴致。

再往前走出不远，就听见“呼—呼”，“喳—喳”的声响。向导说：“听见了没有？那就是黄河了。”

十点钟左右，我们来到河口附近辛关渡对岸的河边上。这时，雪已经停了，冰冻了的黄河，更有一幅奇特的景象，大块的冰块像一座座小小的银山，在水里缓缓地浮动；一阵急浪卷来，冰块就猛地一碰，激起很高的水花和四溅的冰未，发出震动人心的响声，惊起成群的长嘴巴的白鸟，贴着冰面掠过，……”（49）

渡河是在黑夜进行的，虽遭敌人从碉堡里的射击，但是成功了。在占领三交镇、留营镇后，在关上村包围了阎锡山的独立第二旅部、第四团、炮兵团，拥有兵工厂并有充足炮弹的阎军炮火猛烈，但红军将其歼灭，并抓了很多俘虏。其后，兵分两路，北上部队逼近距山西省首府太原五六公里的晋祠，于是阎锡山调动十几个团的兵力。为了诱惑它，红军向西北返回，经岚县、兴县，渡过黄河回到陕西省内。在这一退却作战中歼灭步兵两个团和炮兵两个团。

在敌人被北上部队削弱力量期间，毛泽东率领南下部队大胆进入同蒲铁

路东侧，向霍、赵城、洪洞、临汾南下。红军组织工作队，所有的战士都成了宣传员。此外，还通过群众文艺宣传抗日，所以在汾河平原上青年们参加红军的热情很高，仅一个月就增加七千人，大致相当于跟随毛泽东到达陕北的兵力。以前提倡山西门罗主义，一直排除蒋介石插手的阎锡山也终于请求援兵了。4月中旬，蒋介石派遣10个师企图包围红军，但红军自临汾西进，经吉县渡黄河。在渡河处20万敌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步步逼近，但毛泽东一直坚持指挥到最后。当与掩护部队一起乘船离岸时，敌人的第一发炮弹从东岸飞来。毛泽东那坚毅、沉着、当机立断的气质，给红军战士留下了强烈的印象。(50)

东征虽然没有达到原先的目的——开赴河北省前线，但在75天里歼灭敌人一万余人，扩大了红军，所以收获很大。当时，曾有年轻的夫妇两人一起提出要求参加红军。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刚从小学毕业的男孩，虽想参加红军，但父母不允许，在路上他拉着红军战士到家里，让这个战士做家里的工作。在人民中间拥护红军，支持抗日统一战线的空气明显高涨，这使红军战士进一步感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那个小学毕业生终于说服了父亲。父亲对儿子不放心，想见团长亲手交给他。夜里父亲来到部队时，发现白天到家里来的那个战士就是团长。看惯了国民党军队，认为军官一定有架子的父亲非常吃惊，而且十分感动，他紧紧地握着团长的手说：“团长，红军官兵一样，真是名不虚传。我把儿子交给你了！”(51)

在《沁园春雪》里的英雄中，不是也自然而然地包括了这些无名的战士和人民群众吗？

当然，当时的日本还没有能够充分地了解中国人民的这种愿望和以这种愿望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意义。然而，“东征”中表现出来的红军实力似乎已被承认。从研究战局的角度考虑，引用一段日本人的记述。

“1936年2月17日，盘踞在陕北的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徐海东的联合军约两万三千人渡过结有坚冰的黄河侵入山西省西南部，瞬间（至3月20日）占领了霍县、赵城……（以下县名略）合计30个县，占全省的三分之一，逼近离太原25公里的晋祠，对此，防卫方面以山西军5万，蒋介石军5万合计10万的兵力，加上19架飞机进行讨伐，5月2日共产党军队一齐向陕西省撤退，骚扰两个半月的山西总算从赤祸的威胁中解救了出来。”(52)

这之后，红军于5月“西征”进攻西北方的盐城，扩大了根据地。但当时毛泽东似乎没有随军。

《沁园春雪》是吟咏“东征”攻入山西省时看到的实景，这是没有错的。但我认为题村不限于此，还应该包括内蒙古广阔的北方即北国风光的全景。有一篇回忆录与这首词一样用“银蛇”比作吹雪。

“老乡们常说，大青山的气候一天十八变，真是一点都不假。刚才天空还是一片晴朗，一眨眼，狂风呼啸，层云密布，棉桃大的雪片，翻滚着，遮天盖地压下来。整个大青山，骤然变得混混沌沌，山连雪、雪连天，对面三尺就看不见人。姚司令驱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积雪埋到马肚子，马儿就像陷进了泥塘。但是，它仍仰着头，竖着耳朵，在那白茫茫的积雪中踏出一条路来。走了一会，狂风更加暴烈，刮得森林旋转，山丘摇动，那气势真像要把天鼓破，把地荡平。这时候，口传命令根本听不到了。司令员只得

经常拨转马头，紧勒缰绳，逼马长嘶，联络部队。

风势越刮越猛，山呼海啸般卷着雪花旋转着，有时像平地升起的白雾，直钻太空；有时又如无数银蛇，在高空中翻滚。此刻，稍不小心，就有被吹下马的危险，战士们只得伏在鞍上，紧袍马颈，艰难地前进。”(53)

这个手记是回忆 1938 年以后在内蒙古的大青山度过四个冬天的事，大概从毛泽东的词中得到了启发吧，不过，确实很好地描述了鲜明的“北国”的“雪”的特点。因此，词中的广阔世界理应包括越过万里长城的北方景物。

围绕这第 20 首《沁园春雪》的发表，还有一段插曲。

日本投降后，战后中国的建设成了问题。为了避免国共内战的悲剧，毛泽东从延安飞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当时，旧交诗人柳亚子到下榻处访问了毛泽东，并赠送自作诗。对此，毛泽东把这首词写在柳亚子的笔记本上，后来重庆的《新民晚报》副刊（文艺栏）转载了这首词，因而出名。接着，重庆的《大公报》又与柳亚子的和词一起刊登了，进一步扩展开来。柳亚子在自作的前言上说：“沁园春·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他说，怎么也无法唱和毛泽东的广阔高深的境地。

《大公报》虽然同时刊登了柳亚子的和词，但好像略去了小序。强烈关心毛泽东行动的读者似乎理解成这首词是在飞往重庆的飞机上之作。但一年之后，郭沫若围绕这首词的议论而写的《堂吉河德的作法》（1946 年 7 月 10 日执笔）中指出，“听说是旧作，但何时作成的不得而知”，于是在作成年代问题上好像出现一些误解。

不可思议的是，在郭沫若执笔写文章时，虽然特意从柳亚子的笔记本上抄下了毛泽东的《咏雪》（当时的题目），但也没有问这首同何时作的。如果当时柳亚子和词时看了原稿，那也许在这个小序中能够看得出。今天，在《柳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的卷首有原稿影印件，这个前言印得很清楚。

但是，似乎也有毛泽东自己讲是飞机上之作的说法。因为毛泽东曾对罗伯特·佩恩谈过这首词。

“啊，那是一首好诗。在飞机里写的，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时候的事。我为从空中俯瞰我的国家的壮美而赞叹。——而且还有其他事。”

“其他事是指什么？”

“有很多呀！你想想看这首诗是何时写的。那时社会很有希望，我们信任大无帅”。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的诗很粗糙，你可别上当哟！”(54)

在毛泽东的这些话里没有自我宣传。或许是飞机上回忆起的旧作，或许继续对旧作进行推敲总算得出了定稿。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撇开它，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果这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的话，那么可以认为佩恩记述的毛泽东的口气中也有这种东西。恐忙在他说“啊，那是一首好诗”的时候，声音很低，语气似乎在欣赏竞争对手的作品。

在这首同的后阙列举了中国传统上给予高度评价的帝王，把这与毛泽东讲的“你想想看这首诗是何时写的”这句话结合起来研究，便会感到意味深长了。词在转换时期唤起了沉睡在民众意识底层的中国的豪华帝王形象，而且又加进了新中国的轮廓。最后两行展示了超过以前十行描绘的帝王形象的创造全新国家的担当者，真正的国家主人翁。这在今天作为“人民”是有意

义的，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可理解成是在战后中国的新开始，决心站在人民一边的政治家。

11. 沁园春（第 20 首）

雪 1936 年 2 月

用生机勃勃的形象（舞蛇、驰象）描绘广阔无垠的秦晋高原的风景。那雄伟的展望，南过中原，北越长城，似乎把整个“中国”都收入内心深处的视野中。随着展望的扩展，作者的思索追溯起悠久的历史，举出在中国建立大帝国的历史上的英雄，大胆地做了尖锐的品评。最后断定，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现代革命者是中国英雄中最优秀的英雄。用女性美丽的衣裳比喻太阳映照的雪景，与此相联系，又运用了赞美祖国的大胆技巧。然而，集中在这首词中的丰富多彩的形象和与这种丰富多彩统一的作者那强烈的个性，是他人望尘莫及的。

沁园春

雪

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注释

【沁园春】**（同前）。飘、滔、高，娆，娇、腰、骚、雕、朝押韵。望、看、惜、数为一字豆。

【北国】北方的国土，北方。指国王居住中心地王畿以北的国上。

【风光】景色。“三月边地风光少，五月沪中瘴病多”（骆宾王《从军行路难》）。

【惟】与唯同，只。

【余】剩下。

【莽莽】空旷无际貌。同茫茫。杜甫的诗中有“莽莽天涯雨”（《对雨》）。本来是讲草木繁茂貌，“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楚辞·九章·怀沙》）

【大河上下】黄河的上游和下游。

【顿】突然，急剧。在一周年，黄河河面全都结冰了。

【失滔滔】因为结冰，滔滔流动的河水不动了。

【山舞银蛇】山上降雪，宛如无数条银色的蛇在跳舞。

【原驰蜡象】秦晋高原上的雪，如同白象群在走动。蜡象是毛泽东亲笔写成的，改成蜡象被认为“是为了更易懂”（55），所谓蜡象是具蜡的象，真蜡是柬埔寨的旧名。可以认为这里说的不是普通的象，而是在印度作为圣象为人崇拜的白象。

【天公】天。也有天子的意思，但这里把天拟人化了。

【试】（把结果置之度外）表达了先做做看那种豁达襟怀。

【须】待，等到。

【红装】红色艳丽的女装。

【素】白绢衣裳。

【裹】用布包着，或包裹。

【红装素裹】红太阳和白雪映照的景象。

【妖饶】妖艳妩媚。妖有像妖精等那样加害于人的意思，有一种淫乱感的美丽。

【娇】姿态妖艳。

【引】吸引，拉到跟前。

【折腰】倾倒，躬着腰侍候。过去陶渊明说过，不可为五斗米而折腰恭敬乡里小人。

【秦皇】秦朝始皇帝（在位，公元前221—210年）。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之王，他灭亡了其他六国，作为“统一”的国家，成立了秦帝国。他统一度量衡，制定货币，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道路。他派遣将军蒙恬打击匈奴，并修筑长城。还向南方派兵，攻打今天的越南北方。他死后，以陈胜吴广的起义为契机秦帝国崩溃。现在的中国史学界高度评价他的功绩。

【汉武】汉武帝（公元前141—87年）。以汉帝国充实的国力为背景，大力谋求对外发展，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国家的规模为现代中国打下了国家基础。向中亚、日本、南洋打开了通过，促进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功绩很大。说是汉武帝作的诗有几首，其中最有名的是仿照屈原《离骚》风格的《秋风辞》。

【略】稍稍，略有。

【输】负，败。常说：“输一筹”，所以这里也只就文采而言，说文来不佳。

【文采】好的文章和著作。《史记》作者司马迁（陕西省人，公元前145—87？年）在答任少卿的信中说，自己虽受宫刑，作为男子处于耻辱之中，但他解释不想自杀的理由，“文章被埋没，不能流传后世才是耻辱”（56）。“文章”二字，原文是“文采”。也还有“文采风流”的说法，表现幽雅潇洒貌。杜甫的诗中有“英雄割据虽已矣，上来风流今尚存”（《丹青引》）。这首词的情况与司马迁的一样，是指文章的意思。即使如此，也感到像杜甫那样，有一个在生活中对文化的态度问题。总之，始皇帝和武帝统一天下只限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功绩。他们都还有缺欠，那是指在用文采这种语言表示的领域且文化政策上建树的功绩和后来君主自身喜欢和创作的作品。事实上，秦始皇改革了文字的书体，汉武帝有《秋风辞》等作品。尽管如此，还是要扣分的。这里使人感到这首词的趣味和作者的现代理想。

【唐宗】唐太宗（在位，626—649年）。继承高祖之后，完成唐王朝的统治机构，带来了所谓的“贞观之治”这一繁荣时代。高祖是太原的贵族官僚李渊，每当举兵时，他总去太原附近的晋祠祈祷。后来，他途经晋祠落脚，用得意的行书写铭文令人树碑。其笔迹卓越。在毛泽东指挥“东征”时，红军曾进入晋祠。高祖将其位传给太宗时说：“朕以武功定天下，今后应积文德。”并决定兴盛学问文化，令校订、注释经典，编纂《晋书》《梁书》《陈书》《周书》《隋书》等历史。

【宋祖】宋太祖（在位，960—976年）。后周的实力人物赵匡胤，以军队的力量为背景取得帝位，其后便进行将权力全部集中于天子的改革。他以“抑武兴文”为方针，出版《大藏经》，翻译佛典等兴起佛教。在太祖以后的50年间，耕地扩大两倍，农家户数扩大近三倍，生产得到了发展。

【稍】略微，少许。用“略”或用“稍”是措词问题，同对待始皇帝和武帝一样，作者并不想抹杀这些历史上的英杰，而是以从容不迫的态度给予评价，同时又提出希望。这里表现出作者的博大胸怀。

【逊】比较差和不足。

【风骚】文学作品的总称。所谓“风”是《诗经》中的十五国的风（民谣），“骚”

是指《楚辞》中的《离骚》。这也与“文采”一样，是指文化方面的政策和君主个人在文学上的才能与爱好。

【一代】一个时代里最著名的。

【天骄】受到上帝的宠乏，随意显示威风。正如“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汉书·匈奴传》）所说，汉代人指匈奴说的一句话，后来把对抗汉族的异民族叫“天骄”。

【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始祖。生年为1162年，1227年夏在甘肃省六盘山死去。

【弯】拉（弓）。

【雕】大鸷，大雕。是猛禽，飞得快，所以想射雕者，一定为使用弓箭之名人。《史记》中有李广把匈奴的一男子说成“一定是射雕人”的故事（《李将军列传》）。在《北齐书》中也记载如下故事：斛律光“见一大鸟，云表飞飏，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颈。此鸟形如车轮，旋转而下，至地乃大雕也”。于是被赞叹为“射雕手”。“大雕”是栖息在东北大兴安岭里鸟名的通称，有人见过它将堵抓起飞向空中，非常之大，发现猎物后两翼发出很大的声响降落下来，然后用其嘴戳破猎物的头将猎物打倒在地，然后带回巢中，它决不在途中休息。据说其粪便可用作消化药，有经验的猎手在绝壁的顶端采集回来(57)。这是否是词中所说的“大雕”，另当别论。从杂志上的照片看像是鸷。

【往】过去。

【数】数，计算。

【风流人物】对一个时代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风流”的本意是像风的流动那样给予影响，流风余韵。如同“王献高迈不羁，风流为一时之冠”（《晋书·王献之传》）那样，也指那些不拘礼法，与众不同而形成一派的人物，人们受其影响。“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后汉书·王畅传》）。

诗词大意

北国风光的优美程度如何？冰封千里，雪花在万里空间飞舞。

凝眸眺望，长城内外，一片皆白。黄河的上游和下游，已经结冰，滔滔的流水不见了，个人遗憾。山上有银蛇飞舞般的暴风雪和白色圣象奔跑样的高原。这北方的大自然不仅景色喜人，而且充满试图与天上的太阳比试高低的蓬勃朝气。

若在晴天，太阳的红光在雪上燃烧着，红与白映照得宛如美人的衣裳一样妖艳。

啊，祖国的山河是这样的迷人。为这魅力所吸引，历史上无数的英雄都在为祖国建功立业，对祖国表示敬意。

然而，那些英雄们——秦始皇和汉武帝在文化方面不是没有功绩，但在文章的力度上却稍有不足，唐太宗和宋太祖虽是文化君主，但在文学上为后人所景慕的魅力却略差。

作为天骄风靡一世的成吉思汗怎么样呢？——他只在弯弓射大雕方面是个好手。

一切都是过去了的人物。

若期望出现思想和感情丰富，具有创造新社会气概的杰出人物的话，那不应该在过去，而应该在现代的革命人民大众中去寻找。

注释

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刘伯承：《回顾长征》，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日本庆应通信，1959年版）。

- 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田边和一译，日本东和社，1953年版）。
- 深田悠藏：《支那共产军之现势》（日本改造社，1939年版）。
- 张南生：《遵义会议的光芒》。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李天佑：《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刘伯承：《回顾长征》。
-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版）。
- 刘伯承：《回顾长征》。
- (11) 韦杰：《右翼梯队的战斗》，载于《星火燎原》第4集。
- (12) 纓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学习杂志社，1956年版）。
- (13)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 (14) 宋之的：《沿着红军战士的脚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
- (15) 戴镜元：《长征回忆》（1960年版）。
- (16) 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17) 同上。
- (18) 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
- (19) 佛雏：《读毛主席；十六字令三首》，《文学知识》1959年11月。
- (20) 宛敏灏：《读毛主席词五首》，《语文教学》1958年10月号。
- (21) 刘伯承：《回顾长征》。
- (22) 李长傅：《二万五千里长征地理琐记》，载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实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版）。
- (23) 同上。
- (24) 同上。
- (25) 肖应棠：《巧渡金沙江》，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26) 李长傅：《二万五千里长征地理琐记》，载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实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版）。
- (27) 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28) 宋之的，《沿着红军战士的脚印》。
- (29) 同上。
- (30) 孙继先：《强渡大渡河》，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31) 杨成武：《飞夺泸定桥》，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32) 江耀辉：《红军鞋》，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33) 杨成武：《翻越夹金山，意外会亲人》，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34)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 (35) 中西功、西里龙夫：《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大雅堂，1946年版）。
- (36) 杨南桂：《新疆狱中斗争记》，载于《红旗飘飘》第10卷。
- (37) 杨成武：《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38) 杨定华：《从甘肃到陕北》，周振甫引用。
- (39) 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载于《星火燎原》第3集。
- (40) 游好扬：《毛主席扶我们上担架》，载于《星火燎原》第4集。
- (41) 刘亚楼：《渡乌江》，载于《回忆井冈山上的斗争》（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
- (42) 佛雏，《读毛主席长征诗》，《文学知识》，1959年5月号。
- (43) 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 (44)《毛泽东选集》，第4卷。
- (45)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
- (46)黄玉昆：《友谊》，《新观察》1957年3月1日。
-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
- (48)肖华：《渡河东征》，载于《星火燎原》第4集。
- (49)曾思玉：《踏雪访黄河》，载于《星火燎原》第4集。
- (50)肖华：《渡河东征》。
- (51)肖锋：《河东扩红》，载于《星火燎原》第4集。
- (52)深田悠藏：《支那共产军之现势》（日本改造社，1939年版）。
- (53)黄厚：《风雪大青山》，载于《星火燎原》第6集。
- (54)罗伯特·佩思：《毛泽东》，田边和一译，日本东和社，1953年。
- (55)周振甫：《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 (56)武田泰淳：《司马迁》，1959年再版。
- (57)朝襄：《在大兴安岭》，《新观察》，1958年1月16日。

七、在延安

1. 红军会师在延安

在历经千辛万苦的长征之后，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们并没有马上在延安安顿下来。在直罗镇战斗之后，党中央把瓦窑堡作为据点，那是1935年冬的事。不久开设了中央党校，毛泽东讲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2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包括从大学生到小学生范围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示威游行，在瓦窑堡，这一天整个一上午，党校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下午恢复正常，听毛泽东讲课。虽然斯诺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与共产党没关系，但是从这次瓦窑堡的示威游行来看，似乎不能那样断言。1936年7月，党中央转移到保安。这里虽然是大城廓围起的镇子，但是由于持续长时间的回教徒与汉族的战乱，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多次烧毁，建筑物几乎被破坏殆尽，人口不到四百人。一些不知何时挖的城外窑洞成了工农红军大学第一科的宿舍兼教室，毛泽东就在这里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向千里迢迢来访的埃德加·斯诺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他个人的经历。后来，转移到延安。

这里在红军进驻前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占据着。东北军由于故乡被日军占领，又受蒋介石的命令站在讨伐红军的前线，十分不满。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枪口对外”的口号产生了共鸣，终于接受停战。1936年12月，红军和平进入延安城。这以后约一年，到1947年3月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撤退，延安一直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所在地。这段时间比井冈山和瑞金时期长得多，虚岁45到55岁年富力强的毛泽东却没有诗词作品，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就连像井冈山和瑞金时期那样兵马倥偬时以及长征途中都有词作，而在环境稍好的延安倒没有词作，让人不解。或许把精力都用在党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工作了吧。如果作了诗词而没有发表的话，其原因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还是题材属于个人的太多，暂不发表呢？1960年5月14日在武汉接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代表团时，他说：“长期以来，我很少写诗，是个寡作的诗人。现在不大写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间，不大写诗了。每天忙碌，把诗给丢了。”从发表的情况看，有十二三首。以前也有经整理后发表的先例，也许应该稍等一段时间吧。

作为诗集，中断约十三年，但从总体上看，那依然是不可缺少的时期，所以还是多少涉及一下历史背景为好。……

在从瓦窑堡到保安再到延安期间，实现了与第二、第四方面军的会师。张国焘带着朱德，率领第一方面军之一部和第四方面军返回草地，他临时把西康省的天全、芦山附近作为根据地，自己决定成立“党中央”，然后当上了“主席”。张国焘要朱德在反对毛泽东等的党中央的宣言上签名，遭到拒绝，由于国民党军队马上来追击，所以部队从天全地区向西撤退到甘孜、大金寺附近，尽管张国焘的计划已经失败，但他还想向青海省的西宁转移。他所谓的“打通国际通道”的企图就是从这里想象出来的。这里的“国际”，当然是指苏联了。然而正在这时，第二方面军已到达甘孜。

1934年8月，在长征开始前，有的部队放弃了井冈山附近的横跨江西、湖南省的根据地转移走了，这是任弼时率领的第六军团。10月，在贵州省东

部与贺龙和关向应等的第二军团合并，成为第二方面军，以四川省东部为中心继续开辟包括湖南、湖北，贵州在内的根据地。党中央从瑞金出发时，指望的就是这个第二方面军，后来，第二方面军放弃入贵州，绕道行军，于1936年6月到达甘孜。朱德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支持下，主张北上与毛泽东等党中央会合。当听说第二方面军来到时，张国焘销毁盗用“党中央”名义的证据文件的做法，使士兵们感到奇怪，以前跟随他的部队也违背张国焘的意志开始北上了。然而尽管如此，张国焘还没有放弃最初的意图。到达甘肃后，他命令先头部队两万人编成西路军，让陈昌浩担任指挥向青海省出击（自己继续北上）。这支西路军遭到回民骑兵的阻击，补给和休整的根据地都失掉了，在受到两次重大损失之后在祁连山解散，一部分回到延安，但好不容易走到新疆省乌鲁木齐的主力，从祁连山出发时的一千人减少到四百人了。

没有编入西路军的第四方面军的残余与第二方面军继续北上。前一年先期到达的第一方面军在占领甘肃省会宁后在这里迎接他们，那是1936年10月的事。这样，从各根据地出发的红军几乎全都会合了，长征历时两年结束。但这时红军的总数还不到3万人。与第五次反“围剿”前的30万人相比，可以说损失太大了，可能毛泽东认为弥补这种损失是自己的任务吧。毛泽东没有去会宁迎接，这是因为占领会宁的部队是“西征”部队，而他没有加入这次“西征”。到达会宁的朱德立即给来到界石铺的“西征”军打电话，询问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安否。操四川口音的朱德和接电话的人都为再次会见和会师而欢喜。10月10日，党中央发来贺电，宣告了红军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那是“创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

2. 提高素质的运动

毛泽东和党中央所说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与延安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对于在延安的人们来说，是处在以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特点的生活时期。

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时的演讲《整顿党的作风》开始的，党校用了三年时间开展整风运动，规模很大。这是研究今天中国共产党素质时不可忽略的历史事件。这次在延安采取的实验性方法，其后（解放后）又反复进行，成为共产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地方干部的自我教育方法。

积极制定计划并推动整风运动的，无疑是毛泽东。促使他这样做的力量之一肯定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的痛苦经历。长征结束后在研究这种严重损失的教训时，恐怕不只毛泽东一个人痛感到失败源于党的素质不高，遵义会议是克服这种缺欠的第一步，但是，在研究这次会议之后，人们可以说，王明（陈绍禹）在遵义会议上（正在莫斯科，不在中国）是坐在被告席上。当他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而且起到连结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联络人作用的时候，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会议上的决定，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全党的东西，依然是个问题。遵义会议后张国焘的行动，已经表明了这种不安，但从共产国际会议上回来的王明，有再次以“国际会议”的权威为背景，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得势的机会，这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恐怕毛泽东考虑到了这种倾向与党的素质有关，因此不提高素质，凭借那种争论和多数表决的办法，自己将再次遭到灭顶之灾。他或许想起青年时代在长沙从以杨昌济先生为中心的群体向新民学会过渡，进而向共产党湖南省支部过渡时的事。他大概回想起在其后的井冈山和瑞金的战斗中，在长征的艰苦中，强烈地感受到的人格形成的重要性。或许在长征途中，随着目的地的临近，产生了一种进一步对党员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和随之而来的改造党的素质的要求，也可以说，这次整风是企图在自我人格形成过程中，集体地实施一种固定的人格形成方式。觉悟的人们实际上必须自己进行改革，不允许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不能不看到，中国的落后现状也是屡遭侵略的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进行从旧政权中夺得权力的“革命”，而且必须推进社会的改革——近代化，推翻旧政权，事情还没有完结。群众自己还必须成为民主的行使者，这样，为了启蒙和教育群众，首先自己必须成为那样一种新人。

中国民众对孔、孟等古代圣贤抱有根深蒂固的信仰，为了对他们进行启蒙，如果不采取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他们就难以接受，既然共产党人的目标不是培养孔孟之徒，而民众的价值基准又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如果不采取这种形式，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和古代的封建思想、道德体系即使被推翻了，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也不得不进行单纯朴素形式的积“德”，既然自己成为“圣人”不是最终目标，“革命”才是目标，那么在对“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的方法中也必须考虑民众的接受程度，而且，在通讯、交通不发达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即使与党中央的联系中断，每个人也应该发挥党员的作用。

从毛泽东个人的理想和环境的要求两个方面认真考虑，大概整风运动就

是这样设想出来的。而且，在这种设想实现之际，得到启示的东西是遵义会议上党内斗争的成功，难道不是吗？通过争论明辨是非，不抹杀被批判者而且尊重其人格……。把这两点定型化的同时，在延安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大会”，这是毛泽东接着开展的党内斗争。后来的整风运动以此作为具体模式，它的成功被认为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下定决心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因素。

关于“反张国焘路线大会”，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手记只有一篇，而且在这篇手记中没有记明年月日，如果推断它发生在西安事变以后，讲授《实践论》（1937年7月）和《矛盾论》（同年8月）之前的话，那可能是在1937年春季召开的。如果它就是毛泽东文章中所说的《延安会议》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话，那就是在4月，从时间上看，这也是一致的。

手记的笔者属于西路军（张国焘命令这支部队盲目进入甘肃省西部），他在水昌负伤，没有跟上部队，独自在山坳里治伤，他靠乞食生活，半年后回到东边。在石家周口这个地方见到了救授的同志，他们给他理发、洗澡、换衣服，把他送到镇原的“援西军招待处”。在那里，他见到了原来团里的同志。“说到西路军失败，两个人只是感慨。他沉思了一会几，吞吞吐吐地说：‘听说，咱们西路军失败，全是张国焘的罪过，现在正在批判他的错误。唉！恐怕我们……’”看到对方的表情，手记的笔者明白对方要说什么。这几个月自己单独行动也令人担心，另一方面，在党中央做出支援西路军的决定之后，迎接从西路军回来的士兵，这似乎不是坏事。第二天，党的干部来看他，问了情况，给予了鼓励。第三天他接到通知参加党支部大会，宣布恢复党籍。

“听到这个决定，我流出了眼泪，真如同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手记的笔者记述了接到通知时的感想。恐怕那是在党支部会议上听到张国焘的方针是错误的以后所发的议论吧。不过，还不能简单地认为自己吃的苦实际上是在错误方针指引下干的完全无意义的事。“由于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对张国焘的错误认识不足，因此，对于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这场严肃的斗争，我竟抱着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当组织下发文件时，我不仅不好好看，仔细深思，反而把四方面军干部和中央红军干部对立起来。”就是说，他大概把这看成是毛泽东一派对张国焘一派的权力斗争了吧。

“领导上谈话，听不进去，总是这么想：党中央对西路军回来的干部怎样处理呢？我们真的吃不开了吗？”

不久，几个曾在第四方面军的同志来谈话，具体地讲述了张国焘的错误方针怎样带来了失败。手记的笔者无法反驳，但却歇斯底里地叫喊着：“我只管自己干革命，不管什么路线不路线！”

有一个人说，“这就不对了”，“一个共产党员，只知做工作，不关心党的路线，那还行啊！咱们红四方面军曾经发展很大，打过许多胜仗，结果怎么样呢？”他不知如何回答，当他说：“算了吧，赶快送我到前方去吧！”时，别人跟他讲：“同志啊，你们很累了，还是学习一个时期再工作吧！”他被送到延安。

到那里一看就明白了，为了解决党内的对立，一对一或几个人对一个人的“谈话”，即说服方式，在这个时候似乎已经固定下来了，承认并尊重对方的人格是前提条件。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和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中似乎还是采用这种方式。然而，由于这种场合一开始就明确了进行教育方面和被教育方面，所以不能说相互生活在平等的立场上进行“争论”。因而也可以说，这

是党中央在党内树立彻底的支配权的方法。毛泽东是正确的，张国焘是错误的。让人们认识和弄清楚这种错误是教育者“谈话”的目的。而且，教育者有“权力”。这里可能也有人感到思想划一令“近代人”厌恶。然而即使第三者有怀疑，但中国共产党在其实际历史中产生的这种自我刷新、自我健全的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仅仅依靠路线和策略的正确。

手记的笔者到达延安后同第二方面军的一位团参谋长住在一个房间，据说从他那里听到的情况对他从大局上把握问题有参考作用。有关负责人每天都来跟这个笔者“谈话”，传达他们不在时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精神，讲述党中央处理西安事变（张学良监禁蒋介石，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为条件释放了蒋）的方针。十天后进抗大学习，不久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和第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都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被搞清楚了，第一次了解真相的人十分震惊，这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非常愤怒，甚至有人要求枪毙张国焘。对此，毛泽东说：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到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手记笔者从来没有像这天晚上这样激动，于是与朋友交谈起来，认为毛泽东是最爱护干部和爱护党内团结的人，他总是以理服人。这是笔者这一天的感想。“前些时候，只是人进了抗大，心还未进，现在迫切地想读书，想学习了。”

正如毛泽东所说，虽然解除了张国焘的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但是依然给他保留着以陕西省为中心的边区（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后，对解放区的称呼）政府副主席的职务。1938年，他脱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

1942年的整风运动，在具体的做法上似乎可以说完全以这次“反张国焘路线大会”的准备阶段直到大会召开的办法为模式进行的。如指定学习文件、注重说服教育这一点就是这样。学习文件增加到22份，说服教育（即“谈话”）的形式从三、五人到支部集体开会，变得多样化了。还有用墙报发表意见和召开民主大会的，在部队和机关里也有让人把话都讲出来（当然有对上级的批评）的集会，比原来的模式更加丰富多彩起来，……。这时，相当于张国焘的人物是王明。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当时还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特别是王明负责的长江流域的新四军（1937年10月12日，南方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成立的，正式名称叫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实行了王明一派的统一战线理论。就是说，过于重视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合作，根本不开展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公布“兵役法”后，担心与此冲突，不敢吸收新兵，不让地主出钱，不敢组织游击队等。实行这些做法的是共产党东南局书记项英，新四军最后终于在1941年遭到国民党的包围攻击，九千余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里当然有项英本身的责任问题，但显而易见是王明倡导的“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尊重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理论”在指导着。

后来，这里的根据地在刘少奇和陈毅等人领导下重建。如果在王明的重

返中有莫斯科撑腰的话,那么在 1942 年的整风运动中必然有批判莫斯科即共产国际——斯大林的侧面。然而,随着 1963 年 9 月中苏论战的激化,除了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中涉及这件事以外,当时公开发表的文件没有提起这方面的问题。正如斯诺认为的那样,首先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服从了莫斯科 = 共产国际 = 斯大林了吧。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还在红军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详尽报道最后才传到中国的红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举行的。就是这些报道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得到充分发挥的论述,……就是这种策略对他们的政策将起指导的作用。”

基本上是这样,一般人认为即使尊重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正统性,但也应看到直接输入其方针势必要出现的弊端,所以有人持慎重态度,有人给予拒绝。虽然没有可以进行对外争论的通讯设备和余地,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的基本想法是避免同共产国际进行争论。认为外面的权威有发言权,说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素质有缺欠,如果提高党的素质,就不会出现那种弊端。这是毛泽东 1937 年 7、8 月在抗大中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已经表现出来的看法。而且,整风运动的结果就是召开了可以说是肯定了上次反张国焘路线“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这次大会于 1945 年 4 月 12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用了五十天时间。这时,全国的党员已达 121 万余人,如果同长征最后结束时的红军数相比,确实可以说得到了惊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需要重视党员的教育,应该下力气进行整风运动。大会所以用五十天,是因为当时延安没有电灯,煤油灯也不多,只能在白天开会。不仅如此,大会不正是教育党员的一种场所吗?

这次大会具有历史意义。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听取了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新“党章”。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距上次 1928 年 7 月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已有 17 年,而且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仅考虑到这些,认识到革命主体发展的人恐怕多了起来。大会结束后两个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结束,迎来了“战后”的时代。这时解放区已有 19 个,人口一亿,百万正规军,220 万民兵。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他们不仅开展了整风运动,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实现了粮食、衣服、日用品和武器的部分或几乎全部的自给自足。特别著名的是三五九旅开垦距延安东南约 50 公里的南泥湾盆地的增产情况。当时的旅长王震(湖南省人,1908 年生)现在任国务院农垦部长,这也耐人寻味。

不用说,原来红军北上的目的是同日军作战。日中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见的那样,是按照“敌(日军)之进攻阶段”,“敌我对峙阶段”,“我之反攻阶段”发展的。但在第二阶段,在华日军的主力与投降了的国民党军队合作专门进攻毛泽东领导的解放区,在 1943 年,日军的 64%,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军队 95%对解放区发动进攻。而且在 1938 年 10 月武汉陷落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已没有大的战斗。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指出,“解放区战场才是真正伟大的全面的人民战争”。实际上,中国的中心不在当时国民党政府迁都的重庆,而在延安。

整风运动无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素质，而且不可否认它也为新中国的新的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奠定了骨架。这是高层次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低层次的日常道德、人际关系的做法想法的结合，采取的是每个人、机关和军队内相互批评的方法。因为是在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开展“谈话”，所以可以相当彻底地发现每个人及其机关等存在的缺点。当面开展相互批评十分困难，但是通过相互批评取得了新的进步，没有这种近代的人际关系，就培养不出民主。直接的民主是通过这种运动的过程渗透和确立起来的，这在中国近代主体（民众）的成熟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结合，谋求陶冶人格，这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教育观上看，并非不可思议，恐怕在争取中国一般民众的支持上，也是有效果的。

对于战败后第一次到中国东北和中国内地看到并接触他们的日本人来说，确实感到他们塑造了一种感人的品格。中国革命强烈地吸引着日本人的原因之一，是作为这次整风运动的发起基础的人生观和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群的气质，它们唤起了日本人的共鸣。

然而，在红军那样生活和目的单一的集团里是一回事，而在文学家和艺术家那种要求尊重个性气质上的独立性的领域里，问题则表现出复杂的情况。作为整风运动的一环，文学家和艺术家也集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成为今天中国文化运动、文艺政策和作家创作的基本方针。不过，后来在参加延安这次集会，并举手赞成毛泽东的结论的人中间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给打上“反党分子”烙印的作家，这也许有那些作家个人的原因，但是也表明整风运动不是绝对的。把政治与伦理相结合，是这次运动值得夸耀的一点，但是如果这一点被机械地处理的话，有可能出现与别的问题混同的情况。一旦在政治上与党对立，成为“反党分子”，那么整个人生价值便受到侮辱，这种倾向在与反革命斗争记忆犹新的今天，即使可以理解，也容易出现因害怕那种默默的制裁，而使人抱定不提政治上的不同意见的处世哲学，不是吗？关于文学和艺术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同样的。

一般说来，这次运动是把完成每个人的修养作为问题。但既然是运动，就难免那种划一的做法，即划定时间，阶段，给作鉴定。在“运动”中为了作结论恐怕也有用简单的形式处理个人内心世界问题的做法吧，也许还有用简单的贴标签的办法帮助克服缺点的。但这反而有可能忽略了实际上包括重大问题在内的复杂而难下定论的问题。

然而，另一方面，在没有户籍、没有通讯设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连证明身分的绝对的证据和制度都没有的当时情况下，为了形成新的社会集团，这次整风运动大概是能够想出的最佳办法。相互批评有时使得人际关系冷淡，但是这些人本来是为着民族的解放和完成中国革命而集合到延安来的。而且，中国还有把服从正确视为善的伦理观，这是很强的精神风土，具有崇高理想和悠久伦理传统的人们，如果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以同样的武器进行相互批评的话，其结果可以想象将出现更进一步的信任。问题是这种人际关系与作为政党的机能怎样结合？政党的大会常常作为“整风运动”的延伸而召开的话，那么大会很可能流于一种形式，而且政党在政治上的机敏反应很可能在个人的修养这种伦理问题上停止。

3. 对原子弹的评价

在延安时代还形成另一种理论，中共中央怎么也想不到后来这竟同苏联领导形成争论和对立的局面——对核武器的评价就是这样。据说在美国向广岛投原子弹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谴责了美国对日本人民的残暴行为，但后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就原子弹和广岛的受害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结果在 1947 年 2 月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声明》，《声明》的原稿经过七次修改，文体很像毛泽东的。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份《声明》，但其主要内容可以通过《声明》发表后访问延安的马克·盖因报道记述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谈话中了解到。在考察了广岛的受害状况后去中国的马克·盖因，到延安的第二天，会见了刘少奇，根据他的请求，刘少奇谈了广岛问题。

翌日，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定一等 25 人，还有两三个妇女来了。他们提出了有关日本的生活状况，战争引起的受害情况，工会的活动，日共的力量等问题之后，有人问起广岛的事。他讲了广岛的实情之后，“大家沉默了许久”，于是刘少奇这样讲道：“原子弹吓不倒我们。战争期间，日军曾出动 500 架飞机，有时出动 1000 架飞机轰炸中国的城市。在这样的轰炸之后，所有的东西都给炸毁了，留下几千具尸体。可是日本并没有打赢战争。中国的这些城市与广岛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中国落了许多炸弹，而日本只落一枚。可以说这是个重要的不同吧。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炸弹是否打垮了人民的精神，我们的经验证明，任何东西也不能打破中国人民的精神”（着重点力引用者所加）。

其他的干部都赞同这种看法。陆定一举出斯大林格勒的例子，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以为广岛的原子弹可以把世界吓住，然而被它吓倒的只是一些胆小鬼。”两天后，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窑洞里从夜晚一直谈到天明。话题是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中国的命运，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胆怯等等，涉及到全世界的问题。也提到了原子弹，毛泽东是这样讲的：

“听说你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谈了。据说你在广岛看了之后印象很深。不过那确实是美国在广岛的企图。就是说，那是吓唬人的办法。我们不害怕，用原子弹征服中国太原始了。美国人可以向中国的一万个村庄投一万枚原子弹，但是中国还有足够的村庄，人民要继续战斗，直到取得胜利。”

毛这次谈话中说“用原子弹征服中国太原始了”，因此原子弹这种现代文明的新式武器反而成了无用之物。这种思想与甘地的纺车有共同之处，这是亚洲反对欧洲近代文明侵略时的抵抗思想的一种类型。它虽然是解放区这个生活圈内的思想，但不久全中国解放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亚非等殖民地，抛开讲“原始的”时候的时间、场所上的固有条件，已被定型化了的这种抵抗思想的轮廓，进一步变宽，进一步扩大而成为一种主张。据说在与马克·盖因谈话 16 年后，毛泽东在 1957 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作了如下发言：

“未来的战争会造成多少人的牺牲呢？我看顶多不过是全世界 27 亿人口的三分之一，即 9 亿人罢了……。就这个问题，我曾同尼赫鲁有过争论。在这一点上，他比我悲观。我对他说，即使人类有一半被杀掉了，还剩下半嘛！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被一

扫而光，全世界都变成社会主义了吧。再经过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人口又会增加的，会增加半数以上吧。”(11)

这里表现出来的核战争观，后面还要涉及。总之，我想应该指出，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本来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形成的。而且毛泽东的无限反复和循环这种革命观中的永恒的时间存在于这种思想基础之中。

注释

刘占江：《保卫瓦窑堡》，载于《星火燎原》第4集。

莫文骅：《红军大学生活日记》，载于《星火燎原》第4集。]

尼姆·威尔斯：《红尘》（陆井三郎译，日本新评论社，1953年版）。

日本《中苏概况》杂志，1960年5月23日。

肖华：《红旗漫卷西风》，载于《星火燎原》第4集。

《毛泽东选集》第2卷。

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载于《星火燎原》第4集。

邓子恢：《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载于《星火燎原》第6集。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日本《东京新闻》1963年9月6日。

(11)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报告，1964年2月14日。

八、新中国的建设

1. 内战时期

1945年8月10日一个没有月亮的夏夜，延安人吃过晚饭后在议论两天前苏联对日宣战布告，这时从新华社（国家通讯社）所在地清凉山上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一消息从这座山传到那座山，从这个窑洞传到那个窑洞，像风一样地传播开来。每座山上都燃起了篝火。兴奋的年轻人把装衣服、木箱、旧皮箱和破草鞋等都扔到火里去了。嘴里叫喊着：“胜利了！跟你们再见了！”……然而，充满艰辛的斗争尚未结束。

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那一天向全体解放军发布解除日军和傀儡军（投降日军，并与其合作向八路军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武装的命令。对此，蒋介石命令朱德“一步不准前进！”又命令傀儡军，“维持治安！”，即反抗人民解放军解除他们武装。进而又命令自己的嫡系部队发动进攻，所以在解放区各处都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向人民解放军进攻的事件。8月23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甚至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命令：“收复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去的土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企图挑起内战。然而，为了赢得把军队送上前线的时间，国民党方面于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认为：“人民需要和平，必须寻求一切机会实现和平。去重庆即便谈下成也可以用事实证明谁在真正为和平而努力。”这样，他搭乘前来迎接的飞机离开延安。在即将出发之际，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夫人赶到机场对吴玉章说：“我们请求不要去了”，从这里可以明白延安的人们对接受善于搞恐怖的蒋介石之邀有一种怎样的危险感。从吴玉章那里得知范夫人的话的毛泽东微笑着说：“感谢大家的好意，我注意就是了”。8月28日中午自延安起飞的飞机下午飞抵重庆。周恩来、王若飞（贵州省人，同蔡和森等一起赴法留学，死于1946年）同行。这是世界性的大新闻，不仅重庆市民，而且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也都由于盼望和平而兴高采烈。天下的人心已不在蒋介石那里，而在毛泽东这边了，毛泽东在重庆机场下飞机时，欢迎人群那令人感动的场面也表明了这一点，群众得知9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而举行的鸡尾酒会，于是在人口处人山人海，筑成人墙在那里等候毛泽东，这表明他得人心和人们的期望。那一天，陈诚、陈立夫、吴铁成等国民党要员也出席了酒会，可是人们的注意力却都集中在毛泽东身上。他到后一上二楼，楼下的人几乎都跟上去了。人们蜂拥而至，同毛泽东握手，欢呼并同他干杯。周恩来走过来代替毛泽东干杯。毛泽东和周恩来走向各个房间，他们来到一个小房间，这里坐着冯玉祥、谭平山等中国革命的老人。毛泽东在这里坐下，同他们聊天。他们忆起昔日的友情，谈论20年来的变化，都为中苏条约的缔结而高兴，相互亲切地交流着期待新中国诞生的心情。特别是冯玉祥，他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在谈话时眼圈红了，眼泪流了出来。在毛泽东要回去的时候，站在路上的人们发出“毛泽东万岁”“欢迎毛先生”的呼喊声。毛泽东离开重庆时，在机场同担任警卫的国民党宪兵握手，说出感谢的话，许多士兵流下了眼泪。后来共产党的重庆办事处设宴招待了这个宪兵排，表示慰问。在这之前赠送礼物时，领导这个排的军官这样说：“我们跟随蒋主席八年，连一次面也没见到。可是毛先生同我的每一个部下握手。

将来的天下是毛先生的。” 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下会去重庆，他企图以此为口实，把内战的责任加到共产党身上。出乎他的预料，毛泽东来了。于是，他会谈消极，用掉 40 天的时间。由于共产党作出了大的让步，终于达成协议。10 月 10 日签定了“双十协定”，11 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可是就在 13 日，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开始内战的秘密命令，从日本投降后到 10 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 31 个城镇，肆意烧杀抢掠，内战终于爆发了。

在国共内战时，以调停者身份出现的美国，实际上援助了国民党方面，这个问题现在已无需多说。1945 年至 1947 年，美国政府供应的物资达七亿四千余万美元，同与日本作战时的八亿七千万美元一起，几乎都成了国民党打内战的费用。1945 年 9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 14 万人在天津、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从那时起到 1946 年 6 月，由美国海空军运往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约 54 万人。美国兵在中国各地对老百姓施加的暴行和伤害事件不胜枚举。

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昆明等地，纷纷爆发市民和学生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的运动。但是都被国民党用武力镇压下去了，许多青年男女流了血，然而，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进攻，在三个地点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派遣马歇尔特使出来“调停”，但是这正如后来美国国务院的《中国白皮书》（1949 年 8 月 5 日发表）承认的那样，美国的企图是，一方面避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另一方面想让国民党积蓄足够的力量打垮共产党。1946 年 1 月，《停战协定》成立，共产党和其他政党都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通过以民主的新中国为理想的政府的构成、军队的整编、宪法草案等。然而，国民党在 3 月公然声明予以拒绝，6 月再次开始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对此，美国的援助成为重要的力量，马歇尔于 3 月至 5 月，把 7 个军团运往东北。

国民党的进攻在同年末至翌年初达到了高峰，延安也被占领，然而，毛泽东的战略重点放在放弃城市和土地，歼灭敌人兵力上，开始的一年，歼灭敌人 112 万，彼此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内战勇开时，国民党的总兵力为 430 万，占领地人口为 3 亿以上，他们有百万日军的全部装备和美国大量援助的装备。但是，相比之下，人民解放军总兵力有 131 万，没有飞机和坦克，解放区人口为一亿三千六百万。到 1947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反攻时，国民党军队减至 370 万（其中正规军 150 万），解放军增至近 200 万（其中正规军 100 万）。士气的差别就不用说了。解放军于 1948 年下半年，在济南、辽沈、淮海、平津四大战役中取得大胜，从此战局胜负已定。

1949 年 1 月 1 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提出讲和。但是毛泽东提出八项条件，并回答说：“只要不承认建立真正的民主和平，就不答应。”当时，国民党采取让蒋介石下野等各种拖延政策，但是 4 月 15 日还是决定签署“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方案，在共产党把签署的日期指定为 20 日时，蒋介石的代理总统，南京的李宗仁予以拒绝。于是 4 月 21 日，毛泽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联名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

“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

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以下略）”

这一命令发出后，人民解放军在东起黄海，西至戈壁的广大战线上开始反攻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率领的）在完成淮海战役（1948年11月，打垮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约50万）之后接受整顿和训练，于4月上旬到达长江北岸，紧张地准备着渡江作战。在20日深夜，他们接到了渡江命令。于是在江阴至九江东约500公里广大前线分三路同时渡江。当时，炮声隆隆，众多的船只涌向南岸，依仗长江天险的国民党陆军三、四十万，舰船一百七、八十艘，空军三个大队守备的防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崩溃了。第21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歌颂这次战斗的，与大进军命令的高格调共呼吸，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的长夜终于即将迎来黎明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的一幕。人民解放军继续追击敌人，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相继解放了除西藏之外的中国大陆（西藏是1951年解放的）。

但是，这首《七律》，不是当时看到了战斗场面而作成的。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后来随着内战的进程，于1947年3月19日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即党中央书记处的多数人，依然留在解放区，书记处里的刘少奇、朱德等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经山西、绥远的解放区进入跨山西、察哈尔和河北的解放区，在接近河北省石家庄的平山县西柏坡开展了受党中央委托的工作。1948年5月，毛泽东与党中央到达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撤销。同年，在这里召开了称之为“九月会议”的中央会议，翌年3月，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其后，党中央迁至北京（当时的北平）。因而，第21首《七律》，是在北京之作，第22首《七律》，如后所述，是4月之作，这两首相隔时间很短。也许是偶然吧，一首对敌严厉（武），一首对伙伴温和（文），形成这种对照，也是在国共内战这种悲剧性的动乱中即将迎来新中国诞生这一新旧转折时期的象征。

第22首的《七律》，是与柳亚子的诗唱和的。

柳亚子，是清末幸存的继承文人传统的人。1886年生于江苏省吴县，1908年（光绪34年）一个叫南社的文学团体成立后，他主持这个团体，并在革命运动中奔走呼号。南社以诗作把鼓吹反清革命作为目的，在辛亥革命前后加盟者仅上海就有200人，在全国达千余人。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团体文人气质太浓，所以辛亥革命失败后有人加入了袁世凯和其他反动势力一边，这样南社便自行消亡。柳亚子不改初衷，他加入孙文的同盟会，并参加了北伐。他之所以能在国民党政府里三次当上中央监察委员，也因为很多人看到了他的这种人格吧。

在1926年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代理），并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住在广州。柳亚子与毛泽东结识恐怕是在这个时候，如同诗中吟咏的那样，他们之间似乎谈笑风生。除了在革命的志向上有共同语言外，他们俩人在文学上也很情投意合。由于蒋介石的政变，北伐以失败而告终，其后柳亚子似乎也感到了危险，便亡命日本。1927年写过以京都为中心赞美岚山和琵琶湖的十几首诗。他在石山寺看到刻有“京都有志者”字样的宝塔后，好像把“有志”解释成“有革命之志者”，于是诗句里有“有志为何人，吾倦矣”，这也很有意思。他同桥木关

雪有交往。后来去了东京，住在井头公园附近。那以后主要在上海生活。对于柳亚子来说，广州时代的毛泽东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1929年作的歌颂两个（生存者和故人）革命家的五首七言绝句系列诗的第一首中，赞美了孙文和毛泽东，甚至有“并列于世的支那两列宁”的说法。

他编辑出版了与他年纪相仿的清末文人苏曼殊（生在日本横滨的日中混血文学家，1884—1918年）的全集，并考证其传记，与之产生极大共鸣。另外，反对清朝的初衷使他制定了《南明史》这部描写明末抵抗运动的著述计划，他热心收集了资料，鲁迅著名的《自嘲》诗是答柳亚子的。可能是在同毛泽东再会的前后吧，重庆画家以他为模特描绘了屈原的肖像画，郭沫若写过“今日屈原”的文章赞扬他，这些小故事大概代表了对柳亚子的一般评价。

在他的诗中附有比较郑重的序，所以容易掌握他的情况。1949年2月28日，柳亚子自香港出发北上，那是因为他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路线是乘船到烟台，然后经胶济铁路乘火车前往，途中同剧作家曹禺夫妇在一起。在解放了的北京，郭沫若、李德全（故冯玉祥夫人，原卫生部长，现任红十字会会长）、许广平（故鲁迅夫人，现任妇联副主席）等人迎接了他。那个时候，北京已经开始了新中国诞生的胎动。3月25日，柳亚子去机场迎接毛泽东，他写道，在那里检阅部队的毛泽东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气概”。3月26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从4月1日起在北京与国民党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新华社的广播播发了这一消息，以此通知国民党政府。在这种动向中，柳亚子于3月28日夜，作“感事呈毛主席”《七律》，叙述故乡解放后自己回乡隐居的愿望。一个月后毛泽东的复信就是和韵的《七律》，柳亚子接受了毛泽东的好意劝告。他又和毛泽东的诗，“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翌年5月1日“五一节”，北京举行盛大活动，柳亚子很受感动。毛泽东带领夫人江青和令爱在他正睡午觉时来访，并拿出诗的近作给他看，然后共同游览颐和园。颐和园里有长廊，他们一起在那里漫步，又乘画舫绕昆明湖一周。据说这位突然的来客离去时已近黄昏。因为在园中碰上林彪将军夫妇，柳亚子马上赋诗一首赠送。数日后出席毛泽东的宴会作的是收入《毛主席诗词》中的一首。1956年成立“文史馆”，这是个高龄学者的研究所。他被任命为副馆长，1958年去世。

在毛泽东作这两首《七律》的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等23个团体134人在6月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在正式准备活动结束后，在同年9月21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民主人士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广西省人，1886—1959），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四川省人，1872—1955），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陕西省人，后来作为反党分子被逮捕，自杀。1905—1955）。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就职，同时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时，30万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举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仪式。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言，升起了新国旗。

新中国有不少困难。那以后经过十年，周恩来在题为《伟大的十年》的文章中叙述如下：

“ 尽人皆知，十年前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第 26 位；发电量占第 25 位；煤产量高一些，占第 9 位；就是比较发达的棉纺织业的产品——棉纺的产量，也只占第 5 位。

全国产业工人只占三百万人，不足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六。老大的中国素称以农立国。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小麦、大米和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根据海关统计，1933 年曾进口粮食 60 亿斤，1946 年曾进口棉花 690 万担。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国家财政连年人不敷出。从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开始到 1949 年 5 月的 12 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 1400 多亿倍；物价上涨了 85000 多亿倍。 ”

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前有两种预测。一种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他于 1949 年 8 月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嘲笑中国共产党关于“ 解决人民吃饭问题 ” 的 “ 种种前途 ” ，预言这个问题中国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取得成功。另一个是毛泽东的，几乎在同时的 6 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开幕式上他说：

“ 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

2. 七律（第 21 首）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949 年 5 月

这是处于历史的决定性转折时期的作品。运用与古典有关的语句，增加了这首诗的庄严。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看到革命与历史的无情和残酷的坚定态度。在断定革命与历史无情的时候，反而有一纽带同有情人连接着。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一九四九年四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无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注释

【七律】（同前）。黄、江，慷、王、桑押韵。

【南京】1927 年后为中华民国首都。从前，在这里建都是三国时期的吴国孙权，东晋 120 年，南朝 150 年都继承此都，但是规模不大。把它变成大规模的都城的是明太祖。西北起卢龙山的丘陵，南到包括清凉山一带的丘陵，北起玄武湖、北极阁，东至钟山脚下，南至雨花台。周围约 35 公里，由布有 16 个门的城墙围着，进而又筑成布有 18 个门的 90 公里的城外围，但是这些均未能保存下来。今天留下的内城高度从约 9 米至 15 米，宏伟壮观。成祖迁都北京后，这里被称作南京。1853 年开始的 11 年间，是太平天国的首都。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后，孙文在这里成立了临时政府（辛亥革命）。针对握有中华民国权力的袁世凯，孙文和黄兴发起第二次革命占据南京，但是失败了。参加这次革命的日本人北一辉写道：“情景多么悲壮啊！站在楼上环顾那历尽沧桑的金陵山河，她宛如在烟雨空蒙中为清朝 300 年的衰败而抽泣者……。”正如他说的那样，南京是座向人们述说王朝兴亡历史的都城。今天，它有人口 134 万，是江苏省的中心。在 500 平方公里的市辖区域里有高山、丘陵、平原、大河、湖泊，这种地形在世界的大城市中也是罕见的。

【钟山】紫金山。在南京东郊，中山门外。那里除有祭孙文的中山陵外，还有明孝陵（祭太祖）和六朝的帝王、名臣的很多陵墓。“当想起长眠于丘下的几多帝王宰相，心荡神驰便成了六朝之人，空想追逐空想，南朝的历史宛如走马灯般浮现眼前。”在军事上，自古以来，只要占领钟山和雨花台，就可制南京于死命。说钟山，意味着南京。

【苍黄】有变化反覆的意思。在《墨子·所染篇》中有，墨子观看染丝绸后，发出感叹：“染苍则苍，染黄则黄，入时不同，颜色变化。”另外，苍为天色，黄为地色，所以说“苍黄翻覆”（孔稚圭《北山移文》收入《文选》），是天翻地覆之意。郭沫若

解释成“有暴风雨，天地翻覆”。苍黄还与“仓皇”通用。也有慌慌张张，惊慌失措乱了阵脚的意思。赵朴初认为在南京“突然发生了革命的暴风雨”，寓意深远，展示了受人民解放军进攻的南京政府的狼狈相。《三国志演义》的开头。使用咒术的张角策划农民武装暴动定黄色为其象征，用黄毛巾裹头，很是威风。当时流行一种说法“苍世过后是黄世，甲子之年天下大吉”，是所谓的黄巾之乱。这里也用颜色，但使用了苍黄。作者是否意识到与苍黄有关的故事，那是另外的问题。正因为吟咏蒋介石的“王朝”覆灭，人民的“王朝”来到这一决定性的占领南京，所以苍黄一语也包含有多种感想。总之，因为这句里有王朝交替的意思，所以译成“社会的改造”。

【百万雄师一句】1949年4月21日夜，解放军进行了历史空前的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第三天即23日解放了南京。

【虎踞龙盘】比喻地形雄伟貌。踞为兽类前足立起而蹲坐，盘为蛇等弯弯曲曲地趴着，从前，有诸葛亮同孙权论起南京地形的话，“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宋张敦颐《六朝事迹》）。把南京城比喻成虎的，在五行说中有一左为青龙，右为白虎”的说法。面朝南左有钟山为龙，右有南京城为虎。在诸葛亮之后，提起虎踞龙盘就是指南京。北周诗人庾信（513—581年）的《哀江南赋》中有，“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吟咏南京是南朝（五——六世纪）历代首都。毛泽东在诗中说的是蒋介石在22年里把这里作为首都实行反动统治。

【慨而惊】同慷慨。这种倒置的例子在曹操的《短歌行》中也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正如《说文》（汉代字书）记载的“杭（=慷）慨是指壮士不得志”那样，因未能实现理想而十分悲愤。但是，郭沫若说慷慨有积极的感情高昂和消极的感情悲哀两个意思，这里是前者，陶渊明赞扬暗杀秦始皇的荆轲说，“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纆。”（《咏荆轲》）这里的“慷慨”也是一种积极的感情吧。前面曹操的诗是消极的一个例子。

【宜】恰当。动词上加的助词。表现价值判断。

【将】用，使用。

【勇】士兵。

【穷寇】被迫到绝境而感到为难之敌。中国有“穷寇勿追”的格言，这是源于《孙子·军争篇》中“归敌勿止，为围之敌开逃路，穷寇勿追，此为用兵之法。”当时，有一种意见，希望对蒋介石手下留情，把中国南北分割治理，这一句恐怕反映了这种情况。

【沽】出名，扬名。

【霸王】诸侯的首领。这里指自称西楚霸王的项羽。“霸”有非“王道”之意，所以项羽自称“霸王”足见其谦虚程度。项羽破秦兵入咸阳时，手下有兵40万，但是竞争对手刘邦只有10万兵。项羽虽想破刘邦，但项羽的叔父项伯里通刘邦，且对项羽说：“讨灭秦有大功之人不义”。著名的鸿门宴是那以后不久的事。尽管范增屡次暗示，但项羽还是未能暗杀来赔礼的刘邦。后来项羽被刘邦打败，在乌江自刎身亡。他为了让人们把自己评价为仁者，因此对刘邦有同情心，不想夺天下，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天若一句】中唐诗人李贺的诗《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有这一句。汉武帝制作的仙人铜像由魏明帝自长安运往洛阳，但是当时铜像的眼睛流着泪。李贺赞铜像吟咏“天若有情，（为我铜像的命运而悲伤）天亦老”。郭沫若解释天亦老（为国民党的恶政而悲哀）的意思与李贺的含意相当吻合。赵朴初认为，自然界的规律是无情的，不能以人的意志来操纵。如果自然也有感情，那么天的运行也就乱了，天也老了。人类社会也是同样。拙释也与赵说接近。恐怕作者把革命看成是残酷的东西，而且不想用一般的人道主义来中和那种残酷性。虽然残酷，但是作为革命家又非进行革命不可，这倒不

是因为革命家伟大，有使命感，而是因为人类微弱的人道主义不足以动摇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因而，意思是人不应该阻止变化，而应该推动变化。就是说，这里有（革命是无情的、残酷的）天若有人心，（因为伤感）将会衰老的意思。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看到残酷性和人心是两回事。应该说天无情，人有情。

【正道】正确的道路，真理。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

【沧桑】世间变化急剧。过去，有一名叫麻姑的仙女，在很短的时间里三次见到东海变为桑田，蓬莱水再度变浅就要变成陆地。从这个故事产生了这一词。以前的诗多以悲哀吟咏之。“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刘廷芝《代悲白头翁》）“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卢照邻《长安古意》）毛泽东则与此相反，肯定变化。而且这里的变化是带来人民新时代的变化。

诗词大意

紫金山——南京突然下起暴风雨。威武雄壮的百万人民军队同时开始渡江。

蒋介石 20 多年来霸占着过去被喻为虎踞龙盘的历史名城，但是今天已不是过去了。把天地颠覆，夺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人和帝国主义的权力，我们人民意气高昂。

与孙子兵法相反，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我们，一定要把敌人从全国消灭干净。还要从南京进一步追击。不要学习为得到虚名而失败的楚霸王项羽。（彻底消灭对方，会丧失许多人的性命，的确残酷）如果天有情的话，天也会因为过于伤感而衰老的。（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在决定性的转折时期，革命家的踌躇违背天之法即事物变化的规律。因为天是无情的，所以大自然在运行）人世间的真理就是不断的变化，不断的革命。

3. 七律（第 22 首）

和柳亚子先生

1949 年 4 月 29 日

诗句的连续感，令人感到轻快。从这里可以窥视作者在人际关系上的随意性。第五句的坦率批评也不强加于人。最后两句的结尾表现了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乍一看似有隐遁的南画的风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七 律

和柳亚子先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注释

【七律】（同前）。忘、黄、章、量、江押韵。

【和柳亚子先生】“和”是指与他人的诗唱和。那时一般以同韵押韵，柳亚子将诗呈送毛泽东，对此用这首诗以回礼。

【饮茶】在中国茶馆里喝茶需要茶叶和开水，在茶杯里放入茶叶后，从上面倒入开水，等一会儿就可以喝了。那时，在北方，作为茶食，是吃西瓜或南瓜籽儿。在广州，是吃烧麦和类似小甜饼的点心，种类很多。在茶馆里品茶，已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广东话叫“牙姆茶”。作者讲的大概是广州特色的饮茶吧。

【粤海】广州，一般说广东。

【饮茶一句】1926 年 3 月，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长，当时与柳亚子有交往。柳亚子也在 1941 年写给延安的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人的诗中忆起当时的情景，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毛泽东当然把当时的这句诗记在心上了。

【索句】请踢给诗。

【渝州】重庆。

【叶正黄】用秋天的景色具体地表现秋天。明末清初的诗人吴伟业，也有这种表现方法：“乌柏红经十度霜。”（《圆圆曲》）

【索句一句】1945 年 8 月，在重庆见面时，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文，是指赠送给他的《沁园春雪》一词。

【三十一年】从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的 1918 年 9 月算起。

【旧国】过去的国都，北京。

【华章】有寸华的诗篇。说的是“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牢骚】现代汉语。不满意，不平。发牢骚，发怨言。倾吐积愤。

【大】现代汉语，程度副词，过于。

【肠断】形容极度悲伤。一个人乘船在长江三峡逆流而上时，看到同船的一男子手中托着一只小猴。这时，母猴在江岸边哀位边跟着追赶百余华里，终于跳上船，然后断了气。最后发现母猴的肠子已断成一截一截的了。断肠一语就出于这个故事（《世说新语》）。

【风物】当地的风光。盛唐诗人张九龄（广东省人，678—740年）的诗“风物动归思，烟林生远愁”（《高斋闲望言怀》）。不仅是景色，恐怕也包含时局和环境吧。

【长】长期。

【眼量】视野、度量。一般讲眼界，但是这里因平仄押韵的关系，是创造的新词吧。

【放】现代汉语，放大，变大，扩大。

【昆明他水】京西郊颐和国内的昆明湖。这一名称是从汉武帝在首都长安挖成的昆明池得来的。杜甫也在《秋兴八首》中吟咏“昆明池水汉时功”。

【富春江】是指柳亚子在开头的诗中提到的子陵滩。但是，这里是接受了柳亚子的用语，实际上是柳亚子想回去的分湖。富春江发源于江西省婺源，东流经兰溪、富阳，在杭州入海。一般叫钱塘江，但名称的叫法也有个习惯问题，昔日文人墨客爱用富春江的名称，元、明、清的南画家常来描绘，特别是元末四大家之一的黄子久的画卷《富春山居图卷》很有名。在桐庐上游有七里泷的峡谷，其左岸的岸边有钓鱼台，台下有一小庙。相传这里是汉严子陵的钓鱼台。“严子陵是否真的在此钓鱼，那是无所谓的，但是站在此岩头俯瞰近处江河，远眺山峦，随意通览江山的心情实为痛快。岩石离江面约百米，当然从上面一百米高处是无法钓鱼的。那大概是随便把那里命名为钓鱼台的吧。可能因为那实在像一块大陆，人们在那里悠闲自得，很有意思。时值深秋，天空蔚蓝，远山咸浅蓝色，前面的群山为浓紫色，向阳的山坡被染成褐色。江水如白布在山峦间流淌，江面白帆点点来往穿梭。我在岩头凝视了片刻。”（11）

诗词大意

我至今还没有忘记在广州一起喝茶的情景。那年秋天，你在重庆要我写诗。

三十一年过去了，又回到昔日的首都北京。在落花时节收到你那花一般美妙的诗文。

不平太多，会像昔日的故事里讲的那样要断肠的，还是注意一些好。我想，风物这东西不花时间，不放开度量观看就不明白其长处，不是吗？

颐和园昆明湖里的水浅，也许不大好，但是尽管如此，赏鱼宽心比起与昔人隐居的富春汪相匹敌的你故乡的美景还是要好些啊！

七律 柳亚子

七律

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
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
无车弹铗怨冯欢。

头颅早悔平生贱，
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
分湖便是子陵滩。（原注）

原注：分湖为吴越间巨浸，元季杨铁崖曾游其地，因以得名，余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胜村。第宅为倭寇所毁。先德旧畴，思之凄绝！

4. 新疆省与弟弟毛泽民

第 23 首《浣溪沙》以后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之作，但是未必都与新中国的重要事件相对应。例如，关于朝鲜战争等就没有作品。不过从总体而言，当然还都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为背景的作品。就连《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也相应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一年来的变化。

《浣溪沙》中所说的于阗，是汉朝对新疆省的称谓。这一地区是 1955 年 9 月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直延续至今。它在中国的西北部，由于同苏联有根长的国境线，又在内地，容易成为国际性政治焦点。在中共党内，张国焘曾经想以这里为根据地，把党中央分成两部分，致使红军的大部队遭到了损耗。在占全中国土地七分之一的土地上，有 530 万人口。即使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仅主要民族就有维吾尔族（占 75%）、哈萨克族（占 8%）、汉族（占 6%）、回族（占 4%）、蒙古族（占 2%），其他还有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鞑靼族……等 13 个民族居住。这种复杂的民族构成，带来了复杂的宗教、语言、习惯的构成，这决定了这个地区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而且这些民族的某些人看到在国境线的另一方有同血统和语言的同胞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不是没有热血在骚动的时候。解放以后，在内蒙古和新疆曾发现党员中有人主张与北京分离的事件。

追溯历史，暂且不管远古的事情。在 17s9 年（乾隆 24 年）清朝的乾隆帝把包括这一地区在内的整个中亚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成为中国人领土意识的基础。其后，雅克布·贝克（1820—1877 年）统治了这一地区，英国和上土耳其承认了它，但是清朝进行讨伐，雅克布·贝克自杀。中华民国后，派遣杨增新作为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他进行 17 年的专制统治。1921 年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民主运动兴起，但是在连报纸也没有的，十分落后的社会中无济于事，不久便熄灭了。19s0 年当选为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包尔汉，是当时的为数不多的人（原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928 年发生暗杀杨增新事件。随后掌握权力的是杨的政务厅长金树仁，他进一步推行反动政治。1931 年哈密的一万余民众（维吾尔族）举行暴动，英国制造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让暴动的领导人尼雅兹当总统。对此，回教徒马仲英从甘肃开进，攻击土耳其斯坦。新疆成了内战的舞台。金树仁签定从苏联运进武器的秘密协定（以新疆的整个商业权作为代价），被南京政府发现后，1933 年将其投入监狱。金的部下盛世才后来掌权，他在某种程度上答应民众的要求，把“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作为口号。30 年代初，正像这个地方对外贸易的五分之四是对苏贸易所显示的那样，苏联的影响逐渐扩大。盛世才似乎也想积极地迎合苏联，以便巩固自己的权力。上述口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姿态。总之，这里开始出现张国焘注意到的那种新空气。1933 年小学生从 2000 人剧增至 10 万亲人，这里在执行着改革的政策。

然而，进入 1937 年，盛世才对改革的发展感到危险了，于是开始镇压进步派，包尔汉也被投入监狱，判刑七年。1943 年苏联在德苏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国民党的工作，盛世才正式与苏联断绝联系。不久，盛世才便由国民党调走。由于政治形势恶化，1944 年 11 月 7 日，伊犁发生暴动，诞生了“民族军”。起初，把棍棒和石块当作武器，但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过

武器后变得强大了，最后把国民党军队赶走。八个月的会谈之后，于 1946 年 2 月签订和平协定，省主席是张治中，得到新疆省人民支持的包尔汉为副主席。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开始了对新疆人民的镇压，在后来的一年里，把军队增至 10 万人，并利用土匪和特务在各地网罗封建势力，挑拨民族间的憎恶感情。采取的手段是：杀了维吾尔族人，说罪犯是哈萨克族人；杀了哈萨克族人，说罪犯是维吾尔族人。1947 年发生了国民党特务煽动哈萨克族人掠夺维吾尔族人一万余头羊的事件，为此维吾尔族人不得不卖掉随身的物品到其他地方流浪。据说当时一箱火柴价值 30 亿元新疆纸币，从这里可以想象国民党的政治是多么的黑暗。在这期间，伊犁地方的人民力量逐渐壮大。1948 年 8 月 1 日，作为统一战线，成立了“新疆和平民主保卫同盟”，伊犁的人民武装迅速壮大，并穷追国民党。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于是国民党不得不让步，想让包尔汉任省主席，穆哈默德·伊明任副主席。然而，1949 年 9 月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了新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民族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省政府的委员有 31 人。维吾尔族 9 人、哈萨克族 3 人、汉族 4 人、回族 2 人、吉尔吉斯族 1 人、蒙古族 1 人、乌兹别克族 1 人、鞑靼族 1 人、锡伯族（兼任满洲索伦代表）1 人、俄罗斯族 1 人、党政军 7 人。（12）

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新疆是他弟弟泽民牺牲的地方。毛泽民在长征时作为先遣工作团的负责人之一，负责管理金块和苏维埃银行纸币，负责所到之处的住宿安排和向民众支付款项，在 1937 年，他被从延安派到新疆省。当时高喊马克思主义者式口号，把自己打扮成进步派的盛世才，大概是为着寻求苏联的援助而作出的姿态，他希望延安合作，要求派干部帮助新疆省治理内政。毛泽民起初作为财政厅长为稳定物价、创办油田和铁工厂，开展对苏贸易打开物产的销路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文化方面的改革也在新疆进行了，新疆学院招聘了著名的作家茅盾（浙江省人，原文化部长，1896 年生），而且学院里开始充满延安抗大一样的新鲜空气，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盛世才一下变成“反苏反共”了，对新疆省内的进步人士进行了镇压。到 1945 年，共有 6 万人被捕，推测有 3 万人被杀害。陈潭秋和毛泽民等是在 1942 年 9 月被逮捕的。很多从苏联留学回来和去苏联治病疗养回国的人，途经新疆时被投入监狱（例如，已故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现任妇联副主席）等）。总数 130 余名，妇女也有 20 余人被捕。陈潭秋和毛泽民与许多同志一起，在狱中英勇斗争，事迹可歌可泣。然而，1943 年 9 月，他们被杀害。剩下的人最后获释，于 1946 年 7 月返回延安。

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在乌鲁木齐的一所女子中学里任教务主任，丈夫被投入监狱，使她极为愤慨，她编了几首歌教给孩子。其中一首是《问鸡鸡》：

一、公鸡公鸡，你为什么叫？小八路你听我来道，监狱里面黑暗我受不了，我要叫，我要叫，光明就来到！

二、母鸡母鸡，你为什么叫？小八路你听我来道，监狱里面吃得太不好，我要下蛋，我要下蛋，请你吃个饱。

朱旦华后来也进了监狱，她在狱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3）

现在，毛泽民的墓地在乌鲁木齐。1950 年 11 月，从北京派出的西北民族慰问团曾到这里扫墓。当说“百年魔怪”的时候，作者不是回想起那种群魔乱舞下的牺牲者之一了吗？言外之意是因为回忆起亲弟弟了吧。与柳亚子

的伺相比，使人感到在毛泽东的词中似乎有抒发喜悦的一面，但是在深处又在吟唱悲哀。毛泽民等人的工作并非徒劳无益，他派到苏联留学的新疆少数民族青年，回国后，虽然很多人被反动派杀害了，但据说今天仍有不少人十分活跃，朱旦华教过的，为人狱者开展营救工作的女子中学的某学生后来去了延安。

另外，这首词没有出现西藏，是因为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向西藏进军，恐怕因为受到西藏军的抵抗吧。10月19日，解放军解放了通往西藏的重要城市昌都，但是在击溃的5700余名西藏军中，混有两名英国人。1951年4月，在北京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10月，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首府拉萨。中国大陆的统一，至此完成了。

5. 浣溪沙（第 23 首）和柳亚子先生

1950 年 10 月

爆发性的欢喜比起吟唱哀愁反而更难，但是与柳亚子唱和已表现了作者为周围的喜悦氛围所融化的姿态。活用了由前阙和后阙组成的“词”的形式，把过去的黑暗同今天的光明作了对比。后阙在古典式的魔怪乱舞之后，带来了报晓的雄鸡和欢快的音乐，以盛大的联欢抹掉对往事的回忆。

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一九五 年十月

一九五 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注释

【浣溪沙】42 个字。双调，各三句。前阙三平韵，后阙两平韵。天、跹、圆，阗、前押韵。

【国庆】十月一日的国庆节。

【步其韵】是指用柳亚子的词的原韵。这一首词，正如后面附的柳亚子词序中说的那样的，首先是柳亚子作词，毛泽东的词是对其唱和的。

【赤县】战国时代，学者驺衍把世界分为九，其一为赤县神州即中国。

【百年】鸦片战争（1840 年爆发）以来的近代中国，是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压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说近代历史，是以近代百年为划分阶段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 年 9 月 20 日生效）序言的第一句也写有：“中国人民在百余年的英勇奋斗之后……”

【魔怪】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翩跹】随风飘舞。

【团圆】现代汉语。亲戚、家庭和睦聚集在一起生活。这里恐怕是宪法序言中所说的“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由自由平等的各民族组成的一个大家庭”意思中的“困圆”吧。

【人民】《周礼》大司徒中开始的说法。

【五亿】按照当时的推定。如果根据 1954 年 11 月 1 日第一次全国人口统计后发表的数字，在 1953 年 6 月 30 日为六亿二百万人。1931 年国民党政府发表过四亿四千万人的数字。

【一唱雄鸡一句】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鸣呃。”（《致酒行》）。李贺的诗是讲述想得志而未得到的个人忧闷，但是毛泽东用它歌颂解放了的中华民族，给语言注入了新的生命。郭沫若认为

“所谓雄鸡是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的党。”(14)

【万方】古代把建立一个国家的部族和民族叫作“方”。这里说的是许多少数民族，指为庆祝国庆节云集北京来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新疆、延边和内蒙古等的文工团。

【于阗】汉时的西域的国名，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地方行政区划，人口的74%是维吾尔族。诗中讲的是从这里派出的新疆文工团。

【诗人】似指对方柳亚子。一般认为也指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作诗的人们。

【兴会】兴趣、兴致、趣味。

【无前】过去无先例。

诗词大意

称作“赤县”这一美丽名字的中国，长夜持续总不见黎明。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百余年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所欲为，任意乱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因此，五亿人民七零八落，无法组成和睦的家庭。

雄鸡一声报晓，撕破暗夜，天终于亮了（党发出真理的声音，人民站立起来了）。各个民族从各地云集而来，一边奏乐一边跳舞，其中，还有新疆的民族。看到这一情景，作为诗人的你（我也和同席的人们一样）感到兴奋，引来诗兴。为各民族的融洽而空前喜悦，诗人兴致之高是没有先例的。

浣溪沙

柳亚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看到各少数民族乡姿多彩的歌舞，想起能有今天全靠毛泽东的领导。

浣溪沙

十月三日之夕于怀仁堂观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文工团联合演出歌舞晚会，毛主席命填是阕，用纪大团结之盛况云尔！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原注）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骈阗？
良宵盛会喜空前！

原注：新疆哈萨克民间歌舞有《圆月》一歌云。

6. 换了人间

作第 24 首《浪淘沙北戴河》，是在即将制定《宪法》和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普选刚刚结束的时候。词中吟咏的“换了人间”，当然是指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各种措施进行的变革。特别是通过这部《宪法》，完成了作为近代国家的形式，这还不引起人们的感慨吗？这一年农村的互助组织得到了大发展，在第二年冬季已经打下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而且与普选中的选举权登记同时进行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到 1953 年 6 月 31 日 24 时，中国的总人口为 6 亿 193 万 8035 人（其中包括台湾省的 700 余万，国外的华侨和留学生 1100 余万人）。

农村的互助组织是农民结成的小集体，实行共同耕作。土地改革实现了孙文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据推算全国各地农民人均占有耕地仅为 3 亩，一户只有 14 亩田。生产的基础极为脆弱，因此它对国家的产业近代化没有帮助。可是农民对土地的留恋是根深蒂固的，正因为如此，中共从在江西开辟革命根据地时起就实行了土地改革。这样，首先普及对于农民来说比较容易接受的互助组织，这是在土地改革之后提出来的。土地改革的完成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剥削制度，由此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因此为农业集体化做准备最为可行的做法是这种互助组织。这不是抽象的，在感觉上换了人间，而是社会已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另外，《宪法》是在这个时候即 1954 年 6 月 14 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公布“草案”，让全国人民讨论的。第一条把国家的政体规定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进而第二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这也是从“魏武挥鞭”时候开始的话，确实应该说“换了人间”。

此外，值得大书特书的“人间”面目为之一新的方面很多。这些就让给可以写成几册的中国现代史了。第 25 首《水调歌头》、第 26 首《蝶恋花》等待中可以看到一些作者个人生活的片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毛泽东个人的生活。

下面的一篇文章是写 1952 年时的事，文章作者在延安时曾当过毛泽东的卫士。当时他只有 17 岁，进入陕北的红军进攻山西时他参加了红军，后来被分配到毛泽东的身边工作。在约两年时间里，他出了不少差错，文章写的是作者去北京出差时相隔十三年又一次相见的情景。晚六时，他坐上了来接他的汽车，毛泽东的住处在北京紫禁城的西侧，中南海内的古式旧瓦房里，院子是高低不平的砖地，有两棵参天的大槐树，环境很清静。

“这天是星期六，主席的两个女孩子——姣姣和李讷都从学校回来了，主席的爱人江青同志也在，身边还有一个男孩子。几个人正在打扑克。江青同志一眼看见我，便亲热地迎了出来，接着端茶让座，告诉我说：‘主席还没有起来，请你等一等。’我答应说：‘好。’心里忽然想起，1937 年我初到主席身边去当警卫员的那天，主席正在休息；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主席，主席也在休息，多么巧！十五年了，主席晚上办公的习惯还没有改变呀！这时，我一边等候主席，一边注意看了看眼前的环境。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客厅，陈设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华贵的摆设，屋子里全部陈设就是一张长沙发，两张单人沙发，一张搁茶具的矮桌子，一个堆满书的书架，一张单人床。再

看看江青同志和孩子们身上穿着蓝布棉袄，脚上都穿着布棉鞋。多么朴素的
家庭啊！

不一会儿，李讷陪着主席从北屋过来了。我一眼看到主席那含着微笑的
脸，魁梧的身材，赶快迎了上去，谁料主席已先招呼起我来了：

‘是翟作军吗？你来啦！’”

两个人在沙发上并排坐着。从延安时代就很胖，身体很好的毛泽东向翟
作军询问了分别数年的生活，又询问了正在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
的情况。一会儿话题又转到翟作军的家乡，毛泽东说战国时代那里是古战场。
说自己的家乡在河南济原还是 15 年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候的事。所以今天
翟作军听了十分感动。谈着谈着晚饭时间到了，毛泽东领他去了饭厅。

“饭厅是一间约十平方公尺大小的小屋子，点的大概是 25 瓦的灯泡，光
线有些昏黄。饭厅中间摆着一张普普通通的小方桌，桌子周围放了几个圆凳
子，别的啥也没有了。北京的二、三月，天气还挺冷，饭厅里没有暖气设备，
只在桌子下面放了个小炭火盆，炭火正在‘毕毕剥剥’的燃烧。

饭菜端上来了，看样子是为了款待我这个远来的客人，加上是星期六，
孩子们都回来了，特地加了菜，所以一共有五个菜，一火锅大白菜粉丝汤。
吃的是红米饭，还有馒头。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我看到李讷他们几个小孩
子很快就把一盘子炒肉、一盘子菠菜炒鸡蛋吃得光光的，主席却吃得很少。

正吃着，主席指指那个小男孩对我说：

“这是毛泽民的小儿子，他爸爸叫国民党杀了。””

吃饭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汤不是盛在盆里而是用炭火锅放在饭桌上烧
汤。在汤不多时，锅开始发出吱吱的声响。为了防止火锅烧裂，翟作军无意
中拿起一个馒头，堵住火锅的小烟筒，炭火小了。这时，毛泽东取下馒头，
换上一个碟盖在上面……。

翟作军知道晚饭后是毛泽东的办公时间，他告别后回到住处。后来，在
1958 年 11 月为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他在武汉又见到了毛泽东。而且又
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当他看到毛泽东能吃三小碗后很是放心。(15)

斯诺写道，毛泽东的儿子在地方工作(16)，来这里的男孩不是毛泽民的
儿子远新吗？1960 年作家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作者，河北省人，1914
年生)在中国跟我(竹内实——下同)讲起他自己家庭时谈到收养外甥的事，
他还说红军的同志收养牺牲战友的孩子的例子很多。今天在翟作军讲的故事
里也让人感觉到毛泽东也不例外，同红军幸存者的那种生活风气一样。

毛泽东的儿子岸英是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这也是 1960 年在北京军事博
物馆参观朝鲜战争展览时看到的。展品中有一张照片，上面的说明是“中国
慰问团在朝鲜为人民志愿军扫墓”，照片上的墓碑刻有“毛岸英之墓”字样。
大概用这时的展览告诉一般的中国人，毛泽东的儿子牺牲了吧。不过，展厅
里的人流并没有特别注意这里，而是一定而过。或许在北京的国家机关的部
分人早已知道这件事。我对翻译讲的下述情况感到吃惊。“慰问团里的杨之
华在墓前哭得很厉害，因为是她养育毛岸英的。”

我听别人讲，毛岸英在朝鲜战争时是位相当于师长的政治委员，这种说
法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从《人民日报》等上面刊登的俄语文件的译者名字推
测，他是贺子珍的儿子。”*恐怕是瑞金时代出生的吧。把前面讲到的杨之华
等人在新疆省被监禁的情况一起考虑，恐怕在长征前他就同杨之华一起去了
莫斯科，后来一起回延安了。监禁事件的人名里没有他，大概用假名字了。

在延安附近的群众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毛泽东对从莫斯科回来的儿子说：“你还得学习！”，而且让他拿起锄头去田里干活儿。另外，一个在国共内战时期把自己的一部分房子借给毛泽东的河北省西柏坡村农民在回忆中讲述了毛岸英同农民一起干农活儿的情况。大伯问他“岸英，你常天和我们干活，怎么不去上学念书呢？”

“我正在上学学习呀！”毛岸英回答。“你上的什么学？”“农业大学”，“在哪里？”“就在这里。”“怎么我没看见？”“你还是我的老师呢，怎么会没看见？”周围的人听到后都噗哧地笑出声来了。……(17)

轻松有趣的问答情形，表现了父亲传给儿子的幽默。从农民为毛岸英找“学校”大概也能想象出毛岸英的年龄了。农民问他：“主席是说让你上这所大学吗？”“是啊，主席——我爸爸是说送我上这所大学的。……”从这一回答中，似乎可以看出毛岸英是个老实的、平易近人的青年。毛岸英是何时牺牲的，不得而知。也可能是1951年吧。而且是美军轰炸造成的。对于毛泽东来说，对朝鲜战争的政治评价，容不得夹杂私情，然而作为父亲，那确实是一场夺走儿子生命的战争。在批判斯大林之后，一种否定的评价似乎在苏联的一般群众中扩展。可是作为派出志愿军并做出重大牺牲，进而又把武器弹药的贷款偿还给了苏联的中国，引起别样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1952年翟作军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的朴素生活情况说明，在想到朝鲜战争时，更感到战争的残酷，在介绍弟弟的孩子时，恐怕在父亲的脑海中掠过牺牲了的儿子的事吧。女儿在什么地方？听说现在正在大学里学习历史。

关于毛泽东的私生活，除翟作军之外，还有陈昌奉、傅连璋等警卫员和医生写的东西，据此可以了解一二。但是作为一种气质，中国的知识分子相互不大谈私生活。正像翟作军的文章所讲的那样，毛泽东并不是过着那种与众不同的生活。看到解放后毛泽东与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的接触，感觉警卫人员比延安时代稍多一些。但是毛泽东处处关心战士们的学习和生活，游泳时，他问一起游泳的警卫战士：“你们知道不知道水的成分？”，“人能在水中浮起来是什么道理？”“海水为什么咸？”等等，他们回答不上来。1956年警卫连掀起了学习热潮。(18)第25首《水调歌头游泳》或许是在边与战士们问答，边游泳时得到诗的灵感的吧。第24首《浪淘沙北戴河》也是在巨浪拍打的海岸边下海游泳时的作品。

7. 浪淘沙（第 24 首）

北戴河 1954 年夏

昔日作为中国北部的尽头，彼认为荒凉的幽、燕地方，今天正是风、雨、浪大作的暴风雨天气。这不是无价值的抒情与伤感。作者虽然也吟咏作为与这块土地有因缘的一位文学家、昔日杰出的帝王，并与其伤感共鸣，但却热情地叙述了现代的伟大变革。最后一句过去曾作为诗句常被使用，但作者已赋予它全新的意义。前阕作者眺望风景的视点相当低，令人感到与水面相同，这大概是心情关系吧。

浪淘沙 北戴河 一九五四年夏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注释

【浪淘沙】54 个字。双调、各五句。各四句韵、一韵到底。燕、天、船、边，年、鞭、篇、间押韵。燕，作为鸟名（去声）和作为国名（平声）时四声不同，这里是作为国名，所以是平声，全部按规律押韵。

【北戴河】是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市年人口 21 万，为不冻港）西南的海水浴场。面临渤海，背后有联峰山。它以前就作为避暑圣地吸引来自北京和天津的许多游客。新中国成立后，建起了工人疗养设施。

【幽燕】幽州（北京附近之地，河北省和辽宁省西北部）与燕国（河北省）。

【滔天】洪水将达天上。“浩浩滔天”（《书经·尧典》）。

【打鱼】现代汉语。指用网捕鱼。冒着大雨出海捕鱼的渔船姿态，确实威武雄壮。

【一片】现代汉语。数广阔的场所的单位。说“一片雪地”，是指整个成了银色世界。

【汪洋】因为下雨，海上的景色迷茫。原意是水深、宽阔和无边无际貌。

【都不见】现代汉语。都是指全部。

【知】说“不知”也是同一个意思，表示介意、放在心上。

【边】表示场所。

【往事】已经成为过去的事。

【魏武】指曹操（154—220 年）。子曹丕篡夺汉位后，追尊称武帝。207 年，为讨乌桓北征途中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六朝时已沉入渤海，但到汉朝时又浮现陆地。登此山眺望东方海上的曹操以《步出夏门行》为题作五组诗。这首词中的“东临碣石”“萧瑟秋风”使用了组诗第二首的诗句。作为参考，将曹操的第二首诗（也叫《观沧海》）附后。

【遗篇】前人留下的书籍和诗歌。

【人间】同上，正如李白诗句“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答客》）所言，现实的世界令人厌恶，应该脱离。可是，这首词中的人间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作为值得赞美的东西给予吟咏的。

诗词大意

大雨下在古人称之为幽燕的这个地方，白浪扑天盖地而来。不顾这大海的汹涌波涛依然出海捕鱼的渔船哟，在一望无边茫茫的大海中视野不清，到底去哪里呢？

回想过去在一千年前，魏武帝征战曾路过此地，并在东临海的碣石山留下作品，流传至今。诗中说的萧瑟秋风，今天虽然还在吹着，但是人们生活的社会已经完全变样了。

步出夏门行

曹操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8. 水调歌头（第 25 首）

游泳

1956 年 6 月

在长江里畅游，持续长时间的旺盛精力也充实到这首长词中，拿出任何一句都是无懈可击的。前阕第七句，轻松的余暇那爽直的话头直接地传达出作者的人格，这在其他诗词中也是共同的。这里的风景和第 2 首中吟咏的是同一场所。相隔约 30 年，时代和作者也都有变化，但作者依然在赞美变化。

水调歌头

游泳

一九五六年六月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南，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注释

【水调歌头】95 个字。双调。前阕 9 句，四平韵，后阕 10 句，四平韵。鱼、舒、余、夫，图、途、湖、殊押韵。夫以下为虞韵，与鱼以下的鱼韵古来通用。

【游泳】1956 年 6 月 1 日自武汉到汉口，3 日自汉阳到武昌（在长江大桥下潜游），4 日又自汉阳到武昌，毛泽东三次游长江。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擅长游泳，在长沙第一师范时代，他作为拥有 800 名成员的游泳部领导十分活跃，和蔡和森等人一起，即使到了秋天也还在湘江中游泳。（19）

【才饮以下二句】三国时代的吴主孙皓（孙权的孙子，亡国之君）要把都城从建业（南京）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长沙水】“长沙南门外有一个叫白沙水的井，因其适合饮用而有名。岳麓山半山腰处一个叫白鹤水的泉水，过去是送到北京供皇帝饮用的。（20）另外，在市内成为庙的贾谊故居里也有一井，被人称作贾傅井（21）等等，在长沙围绕泉和井的故事不少。

【极目】**放眼远望。一望无际。陆游的诗中有：“冈峦极目汉山川”（《五月十一日夜且半……》）。陆游吟咏地上，毛泽东赞美天。

【楚天】宋词人辛弃疾（山东省人，1140—1207 年）的词中有“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水龙吟》）。楚为春秋五霸（齐、晋、秦、宋、楚）之一，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魏、韩）之一，以长江中游流域为领土，武昌、汉口当然属楚国。

【舒】舒展。

【信步】散步。信为随意之意。

【宽余】有余地，宽裕。

【子在一句】《论语·子罕》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河边，说道：“奔流而去的是这样匆忙啊！白天黑夜地不停留。”

【风樯】风中的帆柱，指帆船。

【龟蛇】同上。经过约 30 年之后又眺望同一处而发出赞美。

【宏图】宏大的计划。

【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加上引桥共 1670 米，主体部分 1056 米。桥为两层，上有宽 18 米的公路，下有复线铁路。上下层两侧均有宽 2.25 米的人行道。从桥墩底座到桥上路面高 70 余米，桥下可通过大型轮船。桥两端有八层建筑物。1954 年 1 月政府正式决定建造此桥，1955 年 9 月开始建造桥的主体，1957 年 10 月正式通车。

作这首词时，桥尚在建造之中。由于这座桥的建成，从广州到北京可以直通列车。在长江上架桥，这是第一座，其后又在重庆和南京建造了大桥。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中，苏联专家给予了帮助，但是钢材的三分之二是东北的鞍钢提供的。90% 以上的机械和全部水泥都是国产的。

【南北】一桥以下 11 个字有三种分段法，把上面用 4 个字分段的例子见毛滂的词，(22) 不过用 6 个字分段也没有错。

【天堑】使交通中断的天然大沟。始于隋军欲渡长江时，陈国孔范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度？”（《南史·孔范传》）。

【西江石壁】指在长江上游，三峡中段的三斗坪建造水坝的计划。1924 年以来，由地质学家李四光（现任地质部长，科学院副院长）进行调查的计划。中国政府在解放后制定了长江干流和支流共 62 个水量调节坝的建设计划，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三峡坝。估计完成时贮水量为 4 亿立方米（日本的黑部川第四发电所大坝的贮水量为 2 亿立方米），发电能力为 2—3 千万千瓦（苏联的古比雪夫为 210 万千瓦）。进而，大坝建成后可以调节全长 5800 公里，年流量为黄河 20 倍的长江水量，防止过去两千年来记录上记载的每 10 年发一次大水的灾害，1 万吨级轮船可以直达重庆（1958 年访问中国时为我们的讲解——竹内）。

【巫江云雨】楚宋玉《高唐赋序》中的故事：楚襄王游高唐时，在梦中出现神女，二人盟约结为夫妻。离开时，神女说住在巫山南的高丘上“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王见后确如此，于是建神女庙祭祀。后来讲“巫山云”，好像意味着男女间的爱情，但是这里恐怕是作为自然现象的云雨吧。巫山在长江上游，是耸立在被称作三峡的狭窄峡谷中的连峰之一。

【神女】在巫山传说中出现的神女。

【无恙】平安无事。问安否的话，恙为忧愁之意。还有一种说法是叫作恙虫的小虫专门进入人肚于里吃人心。太古时代人住在小茅草屋里，常为此毒虫所袭，故而问：“无恙？”（《楚辞》宋、洪兴祖之补注）。

【世界】世上、社会。“上人处世界，清净何所似”（白居易《赠别宣上人》）。

诗词大意

刚刚饮过长沙的水，接着就吃上了武昌的鱼。现在我在万里长江中游泳横渡，眼力所及楚国的天空悠然自得地舒展开来。虽有风浪，但却满不在乎。在大江中游泳胜过在宁静的庭院里散步。每日忙碌，今天可以轻松轻松了。孔子看到流淌着的江水，感叹时光的过快流逝。从北伐至今，面目为之一新的武汉三镇也有那种种感觉。

今天，轮船、帆船来往穿梭，龟山和蛇山反倒十分宁静。我们制定了宏伟的计划，长江大桥像在江上飞起一般，正在架设之中。切断南北的天然大沟，因此将变成方便的道路。进而在西部的上游筑起水坝，遮断传说中的巫山云雨，在高峰耸立的峡谷里出现水平如镜的湖泊。传说中的神女还健在吧，她看到这情景一定会惊叹世界真的变了。

9. 政策转换与毛泽东的哲学

从第 26 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到后来的第 30 首《七律登庐山》，仅有 3 年时间。但却是中国的政治发生巨变的时期。

首先，在作第 26 首的前一年，即 1956 年 5 月提出了在学术研究领域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据说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从“党章”中删去过去的“毛泽东思想”一词等，期望即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可以通过自由讨论寻求真理的政策。这也许是“上面给的自由”。研究一下 10 月波兰和匈牙利发生暴乱的形势，让人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新政策是有先见之明的。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处理国内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方针发表了意见。讲话录了音，好像让民主党派集会听了这个录音，被认为是对共产党的批评可以相当自由地开展了。接着，4 月中共中央发出整风的指示，并具体定出听取党外批评的时间表，而且中共中央统战部与民主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鼓励毫无顾虑地提出批评意见，当时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提了许多，5 月上旬开始在报刊上登载这些意见。针对毛泽东规定民主党派（没有中国共产党那样大的力量，但有抵抗国民党的历史）与共产党的关系，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口号，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同盟副主席、国务院森林部长罗隆基（江西省人，1896 年生）讲道，“为了实现互相监督，应给予工作的方便。在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应是平等、独立、自由的，当然是相对的”，提出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见。进入 6 月，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新任总编储安平（江苏省人）质问毛泽东和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 12 个人都是中共党员，你们意识到‘党的天下’吗？因为这样，中共与群众的关系才搞不好。”女作家丁玲（湖南省人，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1907 年生）等人也在这个时期力寻求自由化与有志之士一起四处策划，后来成为被开除党籍的理由。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协会党组书记江丰也与党外人士联系试图改变党的文艺政策。江丰对把“党的领袖”的话当作金科玉律引用表示不满，他说，“没有全都正确的道理”，“靠伟人一句话解决问题是危险的，这是崇拜权威的思想”。他听说的“党的领袖”多半是指毛泽东。

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面登载比这种批评更露骨更令人反感的言论的时候，毛泽东作了《蝶恋花答李淑一》。

人们相信提出并鼓励自由发表意见的是毛泽东。据说前一年号召“百家争鸣”也是他的主意。在那以后出现的新鲜空气中，文学界里出现了暴露和批评中共党内沉闷和僵化的小说，其中之一有王蒙这个新人的小说，他大胆地描写了首都北京的党组织内幕。文艺界的党组织负责人不知道该肯定还是该否定，但据说毛泽东在讲话中赞扬了这部作品，因此至少上面没有否定。从各种传闻来考虑，毛泽东似乎想要在这里采取一种“自由化”的政策。

然而他的意图和期望未能实现，不久便开始对反抗中共的言论和提出违反“宪法”的国家体制等意见进行反驳。据说是因为在党员中间表现出对容许这些言论的“自由化”方向的不满和不安，大概是事实吧。反共言论在大学里特别激烈，因此甚至不让这个时期访问北京的外国人参观大学。反抗分子和不满分子，就总体而言，除大学生外，限于过去在欧洲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记者以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们既没有武器，也

没有实力，所以一般认为他们用这些言论不可能使新中国的体制崩溃。但是另一方面，在农村想自发地发展富农经营的某些阶层已开始发展力量，他们在反抗中共的粮食统购政策。由于搞农业合作化，富农不想加入生产合作社，企图让上算的经营（以投机倒把、黑市交易为主）合法化的要求，这些传到了在城里发表反共言论的政治家耳中。如果对此放任不管，农村中零星出现的反抗气氛不能说不会形成一种政治集团。对于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恐怕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了。

反对共产党的一群人，还没有达到过去国民党那样敌对的地步，因此避免使用“反动派”的称呼，而叫“右派”、“资产阶级右派”。当时报刊上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针对城里政治家和知识阶层的“反右派斗争”运动，在农村也开展了。实际上农村的“反右派斗争”被认为是给这之后的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实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开除了走富农路线的农民党员。

在这之后，中国的思想斗争进一步加强了，“政治领导一切”代替了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口号。这里所谓的“政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进入1958年便开展了令世界瞩目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整个中国为一种高昂的气氛所笼罩。成为第27、第28首《七律》题材的消灭地方病不过是从这一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一个插曲而已。在农村，由于否定了富农路线，开展了以贫农为主体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向体内注入了新的沸腾血液，这成了这次群众运动的能量，毛泽东说的“人民群众创造了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这不是我们而是河南省人民想出来的，后来把它推向全国”，也就是指这件事吧。例如，8月4日毛泽东视察的河北省徐水县，当天晚上便召开群众大会，决定成立“人民公社”，但从记述视察的现场报道上看，毛泽东并没有发表讲话号召成立“人民公社”。毛泽东与当地农民交谈时很乐观，“能打那么多粮食，一天得吃五顿饭喽！”一会儿又指示要搞农作物的多种经营。来到安徽省安庆，毛泽东在长江里游泳了。1958年是报刊上报道毛泽东在国内视察十分突出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除了南部和内地外，他几乎走遍了全中国。从这一点上说，《七律》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的说法，或许包含着实际感受。关于在1958年出现这种急进的、积极的群众运动，恐怕有各种国内国际因素。即便说是“人民群众想出来的”，但没有政策指导不可能有那样的发展势头。而且，在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里也有那种因素。这一年的6月1日，党中央创办了理论杂志《红旗》，毛泽东在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这是赞扬河南省的一个县委关于两年里创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也刊登在《红旗》杂志上了）的短文。作为中国的决定性因素，文章举出党的领导和六亿人口，他在文章中说：

“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进而又说：“除了别的特点，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好像是坏事，实际上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所谓的“一穷二白”，是指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未开发状态，“穷”又有走到尽头的意思。这让人想起人们熟悉的《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传》）这句话来。这句话是以成为《易》本质的阴阳循环的宇宙像为背景的。

如果按照《易》所表示的那样，宇宙是由对立的阴与阳的两个元亨组成的，但这两个元素的结构是循环变化的。纯阳（乾卦）的宇宙后面回转一变，虽微少但包含有阴，这种阴上升扩大，变成纯阴。而且，这种纯阴的宇宙再一次回转一变为生阳（复）。这是“复”卦，这里萌芽的一个阳在增殖上升扩大，成为纯阳，即“乾”卦，就是说，纯阳、纯阴的状态，乍一看，似增殖的极限，但它通过回转一变又展现新的宇宙。这是“变”，其后再次增殖。从纯阴的状态（“穷”）到发生变化是“复”，这是复归和反复的意思。复归和反复是事物变化的姿态，是宇宙的本质。只要有复归和反复的基础，其变化是无穷的。无限循环的运动停止了，宇宙也就消失了。“穷”在《易》中有“亢龙有悔，穷之灾也”（《文言传》）之说，所以是带来灾难的恶状态。然而无需担心，“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传下》），所以刚与柔的对立斗争持续过程中，局面便打开了。因此，作为主体的人，需要“穷则思变”，而且必须去“思”。

也许有人会指责说，这种解释过于把毛泽东的思想辽原到传统哲学上了。在《矛盾论》的最后部分，他描述了无限反复循环的运动，但这反复循环的同时在向高处上升，在“循环”里加进了“进步”和“发展”这些概念，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哲学的重复。

不过，在这里的文章中，接着“一穷二白”的是“穷则思变”。因为是中文，所以是可以的。运用文章的节奏感达到了同字异义的词义转换，而且它又“合辙押韵”。因为“合辙押韵”，所以可以说效仿人所共知的《易经》中的词句容易使读者产生共鸣。只用同传统哲学的连续关系来解释毛泽东的思想，无法充分理解现代的中国革命，这是不用说的。但是中国哲学在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传到法国，中国哲学的唯物论思想影响着法国的思想家，进入 20 世纪之后它又传回中国，在法国的中国学家中似乎有人说明过这种思想传播的潮流。人们认为毛泽东同作为人类遗产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联系，这恐怕也是理所当然的。

特别是从 1964 年 7 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编辑部署名的文章对毛泽东 1958 年的这篇文章作了很好的注释可以看得出来。举例的话，关于在“反复”中看到事物变化这一点，认为“在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革命，都表现出反复和曲折。革命当然要经过严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也要经过长期的反复曲折的过程”，把“刚柔相推变在其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可以发现“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促进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而且，这一过程是“无限”的，作为几乎是无限的例子，似乎可以看到如下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谁胜谁负的斗争不用相当长的时间是无法解决的。几十年不行，不用一百年数百年的时间是不能成功的。”的确，正如 1964 年的这篇文章引用的，列宁也说过：“新的生产方式不连续伴随几次失败、失误、逆转，一下子在历史上扎根果真会有吗？”然而，把失败、失误、逆转看作是宇宙永恒的姿态的观念总是属于毛泽东。

但是简单的无限反复和无限循环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相冲突的。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26）

如果没有“直到胜利”，阶级斗争就不能结束。

这种无限反复、无限循环的思想也是永恒的内容。毛泽东的革命观，主张丢掉一切幻想，正视革命的残酷性，虽然带有一种虚无的味道，但自称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这恐怕是因为把人的生命看成是宇宙的永恒中的一瞬吧。在核战争的“废墟”上看到“人类幸福的未来”，也是因为把革命事业放在以这种无限反复和无限循环的运动力内容的“永恒”之上。这是把这样思索的革命家也包含在内的“时间”。革命家，即人在无限反复和循环中结束他的有限生命。如果只有自己是例外，站在“废墟”之外的话，那么这个人将选择法西斯主义，这种永恒观具有不允许那种自作聪明的例外和利己心的严肃性。

然而，他不喜欢永恒这种抽象概念，所以只说明失败的反复发生这种具体的事物，并要求对此有“思想准备”。1964年7月的文章关于无限和长期性，他在上面引用的活之后接着讲，“关于时间的问题，与其准备短些，不如准备长些。”虽然做“长期的思想准备”，但是，为了缩短它而工作的，是共产党，是人的努力。这样的话，分析缩短的可能性，并找到具体方法，就是这种文章的内容，可是里面没有讲。《易》在古代是实用的预知术，但它也是人们行动的指针和格言。根据这个指针和格言，有的“穷人”看清了郁积的能量不久将爆发，于是在消极地等待“变”，有的则想积极地从中突破，使之出现打开局面的“变”。纵然失败，也可以指望“无限反复”的观念来挽救。这的确是规戒，是“思想准备”。在讲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连续时，必须把这种伦理上的、规戒上的、人生观上的侧面的连续性作为其主要方面之一提出来。

然而，如果这种“思想准备”不同时认为社会不再是从前那样的话，那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充分地考虑到在新社会中，这种伦理、规戒和人生观具有与古代和中世纪不同的社会效果。而且，也应该承认，在毛泽东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他那种积极的、主动的思想已成为强有力的支柱。

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文章里引用的部分言论来看，他不是把事物的无限反复循环绝对化，而是与人的积极的、主动的作用一起来考虑的。虽然讲“反复”失败，但在他的念头里却没有因此而怠惰和沮丧的成分。从这里可以感觉到他青年时代追求的原理依然有生命力。在“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种思想脉络里存在着“主观能动性”的概念。但是与青年时代不同，它不仅限于个人的主体性（身体的锻炼和人格的确立），而且是与“中国六亿人口”联系起来提出的。“人多……干劲大”。这种把“群众运动”与“主观能动性”联系起来的思想，也可以在1956年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看到。这篇文章是由《人民日报》执笔的，理所当然加进了毛泽东的思想。“无产阶级把从物质上解放人民作为目的，……应尽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

可是，这里并不是没有问题。如果“群众运动”与“主观能动性”无媒介地结合，就有可能允许任何的“群众运动”。因此，在《红旗》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中，他举出了“大字报”作为其媒介物。做法是把意见、方案、批评等写在大纸上张贴出去，赞同者和反对者也都用同样方式给予回答。因为有第三者看，所以影响很大。如果这也作为一个“运动”来搞的话，平常不好讲的话也可以大胆地说出来，这能取得很大的政治效果。不仅是“大字报”，就是依靠“主观能动性”的发动机使“群众运动”这部车子跑起来，实际上也需要一些“齿轮”，毛泽东对此恐怕也十分清楚。所谓政治，实际上就有

这种“齿轮”的机能。就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也是在具备了条件之后才成立的，它不是在头脑中“思”“变”出来的。

然而，文章格调高雅，很有说服力，是篇佳作。而且这篇文章有很强的煽动力。作为新的“格言”，它似乎在发挥作用。而且包含着飞跃的“格言”，一旦忽视时间和场台的具体条件乱用，反而会起负作用。《红旗》杂志后来发表了题为《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文章，强调“主观能动性”不是万能的、绝对的东西，只有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才能发挥其作用，指出了它的局限性（1959年8月16日，施东向的文章）。这也是因为从哲学的“格言化”中产生了弊病吧。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六中全会上提出不当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理由是专心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他的这个提议被接受了。

第26首《蝶恋花》是“答李淑一”的。正如“编者注”中所说，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已经牺牲了，据说尸体至今不知在何方。1933年夏，她听说丈夫已经牺牲，一天晚上梦见丈夫回来了。一睁眼从梦中醒来的她，痛苦不止，于是写出词《菩萨蛮》。后来她把这首词送给毛泽东（可能是在解放后吧，或许是1957年）。当时，她问毛泽东有诗作没有（赞扬柳直荀或杨开慧的），希望给作一首。毛泽东在回信中说那首诗写不出，写了别的一首，就是这首词。

李淑一是毛泽东第一个妻子杨开慧在长沙福湘女子中学里的同班同学，她们很要好。她跟柳直荀结婚，也是由杨开慧介绍的。李淑一一直当教师，毛泽东送她词的时候，她已56岁。“编者注”中的长沙第十中学是福湘中学的后身。《毛主席诗词》中没有登载李淑一的诗，但作为参考，把它附在《蝶恋花》后面。

10. 蝶恋花（第 26 首）

答李淑一

1957 年 5 月 11 日

作者在延安时代即兴吟诵的，好像是与此不同的词。但是否如作者说的那样做得不好，因为没有发表就不得而知了。这首词正如词牌《蝶恋花》的名字本身所暗示的，内容极富感情，在神话传说的人物背后，隐藏着个人的悲叹之情。心中是否有这种隐藏着的东西，决定着神话世界里幻想性描写的感染力程度。

蝶恋花

答李淑一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编者注：这首词是毛泽东同志 1957 年 5 月 11 日写给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同志的。词中“柳”是指李淑一同志的爱人柳直荀烈士。他是毛泽东同志的老战友，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3 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骄杨”是指杨开慧烈士。她在 1930 年红军退出长沙后，为反动派何键杀害，她是李淑一同志的好朋友。这是一首和词。李淑一同志写了一首纪念她死去二十几年的爱人柳直荀同志调寄蝶恋花的词，寄给毛泽东同志，因有此作。

注释

【蝶恋花】（同前）。柳、九、有、酒，袖、舞、虎、雨押韵。但是袖是去声，与其他押韵字的声调不同。另外，前阕是有韵（十二部），后阕是 韵（袖为宥韵）（四部）应该是不通用的组，但在现代汉语中除了雨字外，其他是通用的。

【答李淑一】关于李淑一，在“编者注”中已有说明。最初发表时，是以《游仙》为题的。在想象中的世界，即仙界里游玩这种想法在屈原的《远游》中出现过。他因为效忠祖国，反而被人排斥，而且无述说之所，于是随仙人在天上地下四处游逛，曹植的《远游篇》、《仙人篇》，也是与仙人一起周游的幻想。这些都是出于对现实的人间世界不满想逃到幻想世界里去的愿望。晋的郭璞（276—324 年）的著名《游仙诗》，比之描写仙界更重于描写自己的理想。可是不管怎样，以上诸篇的作者都去访仙界，著名词人秦观（江苏省人，1049—1100 年）的《鹊桥仙》，表明作者不去访仙界。毛泽东说的“七夕”之类，大概是指这个吧。毛泽东把革命烈士同仙界结合起来的词，可以肯定他说，在游仙诗词的宗谱里，也是新颖的。在这一节的末尾，附有秦观的作品，以供参考。

【骄】值得夸耀。把杨开慧不屈服于反动派与杨树长势挺拔貌一起述说。骄，原是高六尺的马（《说文》），后来转意为傲自矜（《字汇》）不服他人支配。“白马骄不行”（崔国辅《长乐少年行》）。

【杨】水杨。枝不垂。叶内白色。英译为白杨，但与白析略有不同。

【颺】被风吹起的样子。

【杨柳以下一句】二烈士的灵魂登上了月球。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实际上不限于中国人）认为死者的灵魂离开肉体飘在空中。《楚辞》的《招魂》，是描写招回死者灵魂让其复苏的仪式的诗。杜甫思念去夔气楼东海岸的弟弟，也作了“魂飘结蜃楼”（《五弟丰独在江右》）的诗句，说自己的魂已飞到夔气楼旁。为使灵魂回来再度附体成生者而生活，死者的肉体特别被珍重而葬埋。以前，中国把棺材做得精致，也是与古代的这种思想有关吧（日本也有以死者的灵魂飘拂这种中国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如富士正晴的《游魂》）。

【问讯】打听。杜甫的诗中有“问讯东桥竹，将军有报书……”。（《重过何氏》五首之一）。在中国有一种说法，已成仙界上客人的杨、柳二烈士，向招待自己的主人打听是不礼貌的，是与烈士身份不相称的。如果看杜甫的实际创作便可明白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不过，关于这个“问讯”的主语是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作者即毛泽东（27），另一种认为是杨、柳的灵魂（28）。第二种看法好像有说服力。还有人认为，作为修辞的技巧，是为了加强感情，使下文更显明才发问的，但谁发问，无法确定，很模糊。例如，李煜的词《虞美人》中有“问君都有几多愁”，李煜的词《虞美人》中有“问君都有几多愁”便是一例²⁹，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陆游的诗中也用过“问讯”而不用“问”的例子。所以这里可能是与杜甫，特别是陆游诗中同一性质的用语。

【吴刚】汉代西河人，跟仙人学成仙术，但出了差错，被罚砍桂树。桂高500丈，斧头砍下树，又立刻长成原样，所以吴刚一直在那里砍树（《酉阳杂俎》《天咫》）。按照《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说法，这个传说始于隋唐小说。大概是从月缺月圆想出来的故事吧。月与桂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也说月为桂魄。

【桂花酒】因为有月中之桂，所以出了个桂花酒。说是把桂切下来放入酒中，这种酒叫桂酒。曹植的诗《仙人篇》说桂酒是仙人饮用的。汉语中讲的桂花，在日本指的是“木犀花”，与吴刚砍的高大桂树不同，不过这里无需考证它。

【嫦娥】月亮上的美女名。据《淮南子·览冥训》，姮娥是羿的妻子，因为偷吃了羿从西王母那里求到的长生不死药而飞入月中。后来汉文帝的名叫恒，为避同字便改成嫦娥了。从这一传说中取材的李商隐诗中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想象嫦娥到月亮上去，全都是蓝天，十分孤单。因此词中的“寂寞”也是据此而来的。

【舒广袖】传说方术（长生不老之术）士罗公远与唐明皇一起邀游月宫时，仙女百人着白衣跳起霓裳羽衣舞（《乐府诗集》）。

【且】暂先，暂且。

【忠魂】忠义之心。对革命的忠诚。

【伏虎】指革命的胜利。

【顿】突然。

【作】成为。

【泪飞以下一句】这句主语是谁，有争论。这首词在最初发表时，诗人臧克家写有解释和鉴赏文章（《北京日报》1958年1月10日），他认为流泪的是嫦娥，当听到杨柳二烈士生前为人民而奋斗！没有完成其志向就被杀害，表示同情而哭泣。这就是“惊天地、泣鬼神”。对此，谢思洁认为杨柳二烈士听到下界革命胜利的消息流下了喜悦的眼泪。词由8句组成，但把后阕4句都用于托故的描写，作为词是欠平衡的，对革命烈士升入仙界后仍在关心人间的革命事业这一点没有给予说明。郭沫若认为不仅二烈士，也可以包括吴刚和嫦娥，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是欢迎二烈士的。所以可以认为是二烈士喜悦的眼泪。但是说对此无动于衷，作为故事是不正常的。他进一步纠正了谢思洁的说

法。(30)谢思洁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二烈士与吴刚、嫦娥之间应该有所区别，还认为是指二烈士喜悦之泪。(31)而且又与对前句的“曾”的解释连在一起，是“终于”还是“已经”，说法不一。如果做过度的详细考证，词的妙处反而受损，所以这里取二烈士说(也包括吴刚和嫦娥)。“人间曾伏虎”的主语不是二烈士，而是包括作者在内的中国人民。但是，这个消息不是在革命胜利后新中国诞生时立刻就传到了，而是相当晚(假设以李淑一与毛泽东赠答词时算起也可以)的话，便产生了表示隔有一定时间的过去的“曾”字。李淑一赠词给毛泽东是解放后数年的事，大概引出这两句的述怀，写在信上了。所谓述怀，恐怕是为死者们未能见列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而遗憾吧。对此，毛泽东叙述了他们在仙界上的生活(以此描写来安慰李淑一)，不过对于死者来说，这不是真正的安慰，如果突然报告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的话，他们一定沉浸在真正的安慰和欢乐之中。因而最后两句的前提是死者无法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认识。或者仍陷入不能自己的悲哀和追慕之中。虽无法知道，但知道后一定高兴这种认识和感情的两极间的动摇，使这两句成立。“忽”与“曾”这种错位的时间副词在一句内共存，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而且，寄托在“倾盆雨”这种剧烈的景观中的，实际上是作者对死者百感交加的表白。

诗词大意

我失去了在敌人威逼下永不屈服的值得柳已如同杨柳树的白絮那样轻轻地一直飘向九天。两人在月宫里问砍桂树的仙人吴刚：这里有什么？据说吴刚捧出来桂花酒。

在寂寞冷清的月宫里生活的嫦娥，也飘动她那宽大衣袖，在高空中给为人民尽真心的魂灵跳起一阵舞蹈。这时，突然传来下界征服了虎狼(革命胜利了)的消息，他们都落下了眼泪，如倾盆洒下那样，成为大雨降下来。

菩萨蛮李淑一兰闺索寞翻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鹊桥仙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槽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1. 七律二首（第 27 首）（第 28 首）

送瘟神

1958 年 7 月 1 日

抒发沉重的心情，似乎也是作者的才能。恐怕这与他始终未忘却革命的残酷性有关系。进入后阁，像在银河里一样展宽行动范围，大概也是为着摆脱那种重负吧。明与暗的振幅很大，不过，还没有充分地表达出喜悦的心境。这也是写“其二”的原因。

“其二”，是前一首的后续。尽情地讴歌了喜悦和明快的世界。最后两句与前面的“牛郎”相反，举出恶的象征，但却有明快的幽默。

七律二首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失，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无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注释

【七律】（同前）。多、何、歌、河、波押韵。“其二”：条、尧、桥、摇、烧押韵

【瘟神】传染病神，瘟神爷。“青面红发瘟神爷”（《红楼梦》第 39 回）。这里幽默他讲述了血吸虫病的事。这种病，在日本分布在佐贺、广岛、冈山、山梨、静冈、

千叶，在外国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和印尼的西里伯斯岛等地。在中国，分布在长江沿岸和华南的农村，人们叫它“大肚子病”。血吸虫寄生在人体肠膜血管内，吸人的血液然后放出毒素。在血管年产卵，卵随粪便一起排泄出去，在水中孵化，寄生在中间宿主钉螺体内（日本叫光钉螺），成熟后浮在水面上，等待寄生于人体的机会。它一旦进入人体，患处便肿起。

患者有手足疼痛、发烧、呕吐、咳嗽等症状出现。成虫开始产卵后，人发烧、痢疾、肝脾肿胀。感染后，经四五年，呈现腹腔积水、贫血、发烧不退、消瘦等症状。据1959年9月的统计，消灭钉螺的面积已达63亿5000万平方米，以前苦于这种疾病的地区缩小到三分之一。全国的患者700万中，70%已接受治疗，350万人治愈，14万头以上的耕牛也接受了治疗。据说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果好。

【余江县】江西省东部。这个地方“余江兰田坂方圆五十里，近五十年内有三千多人患血吸虫病死亡，二十多个村庄完全毁灭，一下四千多亩田地变成荒野。幸存者多数腹部肿得老大、面色消瘦苍白、即使能吃东西但也无法劳动。”（32）另外“全县面积1000万平方米中，有血吸虫病原体的钉螺分布面积在78万2000余平方米，171万县民中有3万5000余人受到血吸虫的严重威胁。……听建头材的老人说，50年前这个村子有500多户，1500多口人；但由于血吸虫病的折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践踏，每年都有许多村民死亡，一部分人不得不逃往他乡。这样到解放时，只剩下8户，24口人。”

【浮想联翩】联翩是像鸟那样轻轻飘舞。把文章的构思不断涌上心头，说成是“浮藻联翩”（晋陆机《文赋》）。

【枉】白白地，元益地。“云雨巫山在断肠”（李白《清平调》）。

【自】专心致志，自然的秉性，杜甫的诗中有“关山空自寒”（《初月》），“西蜀樱桃也自红”（《送野人朱樱》）。

【华佗】安徽省人。后汉名医，因治曹操的头疼病，被强迫当侍医，因屡次提出辞职，被投入监狱，后死在狱中。死前，华佗将秘传一卷交给狱吏，说明用此药方可使死者复苏，但狱吏害怕，未敢接收。华佗便要来火给烧掉了。

【小虫】血吸虫。

【薜荔】薜为薜荔，顺着墙壁爬的扶芳藤。荔为葶苈，长在田野里的杂草。

【千村一句】谭用之的诗中有“暮雨千家薜荔村”（《秋宿湘江遇雨》）。

【遗矢】遗为小便，失为大便。《史记》的廉颇蔺相如传中记载，想召回廉颇的赵王派使者来到楚国，被收买的使者回报说，廉将军虽已年迈，但吃饭很好。不过，在同我一起坐着的不长时间内，三次去厕所（三遗矢矣），这里指是因疾病下泻不止。

【萧疏】寥寥落落。

【鬼唱歌】鬼为死者、亡灵。李贺的诗中有“秋坟鬼唱鲍家诗”（《秋来》）。

【坐地日行八万里】八万华里为四万公里，是地球赤道的长度。因而，同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一起，一天走四万公里，周游仙界（郭沫若之说，《人民日报》1959年的长度。因而，同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一起，一天走四万公里，周游仙界（郭沫若之说，《人民日报》1959年3月4日）。作者看到有关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后，极为高兴，说自己身虽在北京，但思绪已经在天地奔驰。读《人民日报》上的报道后，有种种想象，把这些想象解释成到达很远的地方是可以的，未必把八万里与赤道联系起来。实际上，下句中的牛郎在科学上并不存在，所以考证八万里的科学性反而失去均衡（33）。

【一千河】天上的银河，也可以理解为地上的（中国的）许多河流。

【牛郎】七夕传说中的牵牛星原是牛郎。

【悲欢】受灾群众的悲哀与瘟神的得意欢乐。

【逝波】流动的水。出自《论语》中的孔子语。时间一过，事情便成为过去。

【神州】中国的美称。

【舜尧】《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舜与尧都是古代的圣人，但这里指中国人民具有新的社会主义道德。

【红雨】取自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不过这里不是像李贺那样惋惜逝去的春光而饮酒，而是讴歌群众运动像怒涛一样高涨的情景。

【随心】按照人民的心愿。

【着意】想办法，想起。

【五岭】全国各地的山。

【三河】*黄河、淮河、洛河。这里指全国各地的河流。

【大连以下二句】6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报道，湖北省谷城县人民“削山填河，移石埋湖”彻底驱逐钉螺，将要根除血吸虫病。为驱除钉螺，埋旧河和水沟，另挖新水道，采取了果断措施。在余江县用这种方法成功了，这首诗赞美了劳动人民的本领。1956年中共余江县委动员两万县民开始征服钉螺，并结合兴修水利，在两年间共挖新沟200公里，埋旧沟灭绝了钉螺。另外，患者接受免费治疗，1958年5月百余年的受害历史结束了。县里又进一步改善环境卫生，保障了农民的健康。（34）

【纸船】古代的习俗，在送死者和种上天时，要，或起香和蜡烛，烧纸船纸马。韩愈的《送穷文》中写有在柳编的车、草编的船上，放着面食和糖供给穷鬼，意思是祈祷离开自己的地方。这在作者的心中也有吧，但这里作者送走的是全体人民的灾难。

【照天烧】天映照得通红，像燃烧着的一样。

诗词大意

美丽的大自然同人们的福利不相称，那只是外观的美景。就是华佗这样的古代名医对这小虫带来的疾新中国的建设285病也束手无策。

各个村子杂草丛生，人们的身体在衰弱下去。人口剧减的每家每户显得荒废不堪，常听到亡灵的歌。

（消灭了疾病，高兴得无法入睡）我的身体虽在地上，可是思绪已在八万里外奔驰，已升入天空，在眺望这宇宙（和中国）。七夕星牛郎只知道旧中国，如果询问风土病的活，回答是：和过去中国的所有悲伤一样，已像流逝的波浪那样，成为过去的事。

春风吹，万千条杨柳荫浓。在这明快的风景中，祖国的六亿人民具有与古代帝王匹敌的高尚思想和道德。

花瓣儿像红雨一样散去，那如同大的波浪（群众运动那样高涨），河对岸的青山间，有人民的智慧结晶后架起的桥梁。

山上的银锄，连着天般地挥动着。在各地的河川上，挥动着健壮的臂膀，震天动地——人民在迅速地改造大自然，改善环境卫生。

喂，瘟神君，你往哪儿逃啊？多么难得的出发机会，通红的天都要烧焦了，纸船在烧着，又点了许多蜡烛，欢送你走吧！

注释

叶镛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历史故事》（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廖盖隆：《新中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吴玉章：《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载于《毛主席在重庆》（解放军文艺社，1961年版）。

龙飞虎，《毛主席在重庆》（解放军文艺社，1961年版）。

廖盖隆：《新中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

-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1916年5月稿。
- 宇野哲人：《支那文明记》（日本大同馆，1912年版）。
- 郭沫若：《百万雄师过大江》，载于《红旗》，1964年1月号。
- 赵朴初：《读毛主席诗词十首》，载于《诗刊》1964年5月号。
- 同上。
- (11)米内山庸夫，《支那风土记》（日本改造社，1939年版）。
- (12)戈扬：《新疆二十年》.载于《新观察》1950年7月号。
- (13)杨南桂：《新疆狱中斗争记》，载于《红旗飘飘》第10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 (14)郭沫若《一唱雄鸡天下白》，载于《文艺报》1958年6月11日号。
- (15)翟作军：《在毛主席身边》，载于《新观察》1959年4月16日—5月16日。
- (16)埃德加·斯诺：《今日中国》，松冈洋子译，日本筑摩书房，1963年。
- (17)阎涛：《毛主席在西柏坡的时候》，载于《新观察》1958年5月1日。
- (18)《解放军报》记者：《毛主席关心警卫战士学文化》，载于《新观察》1960年6月16日。
- (19)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 (20)文井正太郎：《湖南》（日本博文馆，1905年版）。
- (21)宇野哲人：《支那文明记》（日本大同馆，1912年版）。
- (22)林大椿：《词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 (23)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载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 (24)日本《中苏情况》杂志，1960年5月23日。
- (25)《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历史教训》。
-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
- (27)张光年：《致郭沫若同志的信》，载于《文艺报》，1958年第7期。
- (28)郭沫若：《回信》同上，周振甫《毛主席：〈蝶恋花〉词再解释》，载于《语文学习》1958年第2期等。
- (29)何劲人供稿，《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 (30)郭沫若：《文艺报》《蝶恋花》讨论专辑，1958年第7期。
- (31)谢思洁：《再论毛主席的词〈蝶恋花〉》载于《文艺报》，1959年第6期。
- (32)《人民日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1958年6月30日。
- (33)红雨：《病魔巢穴变乐园》，载于日文版《人民中国》1960年11月号。

九、内外危机

1. 庐山会议

毛泽东不仅负责“理论工作”，而且也管实际的行政工作。所以，如果说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缺点的话，那么他应该受到批评。党中央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11至12月的武昌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纠正“人民公社”的方针，这是完全按照当初的模式开展运动仅几个月的事。实际上，“人民公社”在反复地进行各种地区性和部分的试验和修改。进入1959年，迎来了8月在江西省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

这次全会的《公报》，公开承认过去把生产数字估计过高，这引起世界的注目。1958年12月的六中全会《公报》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为7500亿斤，但是这次八中全会《公报》把它改成5000亿斤（2亿5000万吨，比1957年增产35%），把6700万担棉花改成4200万担（210万吨，比1957年增产28%），根据工业规格计算，把1100万吨钢改成800万吨（比1957年增产49.5%）。据说在中国国内有人认为这些数字依然偏高，但基本在这些数字左右，括号内为增产的百分比，另外，八中全会《公报》指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这也是在激进政策之后党内出现的矛盾，因而引人注目。《公报》中说：“八中全会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以后指出，对于实现今年的继续跃进来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对于那些根据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本来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去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估计过低，而对于这两个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并且已经迅速克服的若干缺点，则估计过于严重。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一个月之后，从江西苏区时代就与毛泽东一起同甘共苦，在朝鲜战争中作为志愿军总司令建立过功勋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突然被免去职务。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也在这个时候被免职。当时有各种猜测，但在1962年报道了八中全会《公报》中谴责的“他们”和“一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指这几个被解职的人。”

从事件过后两年的新闻报道（《东京新闻》1962年2月11日和《中国季刊》的报道）中我们知道，在庐山的中央全会上，彭德怀拿出长篇意见书表明自己的见解，据说内容是批评成立人民公社准备不足的错误和批评作为大跃进一环在全国范围内搞土法炼钢浪费资金和材料。他还指责“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对彭德怀的这种大胆指责，党中央开始允许与会者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但最后会议作出决议，谴责彭德怀拉拢其他中央委员搞派别活动，认为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据说彭德怀在会上发言说：如果出现自己被清洗的情况，鉴于我在国内的威望，恐怕部队要起来造反。对此，毛泽东眼含泪水回答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回农村再组织军队好了。与会的将军们相继站起来，表示忠于毛泽东。

报道的彭德怀意见书和“公报”中讲的不一致。八中全会通过《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恐怕是因为彭德怀提出的“资产浪费”也是其他人看到的现象的缘故吧。也有人说彭德怀提出的意见书是张闻天执笔的，不过我看不出彭德怀想让毛泽东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的意图。如果说这次完全是

“突发性”的话，应该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作第 30 首《七律》和写去庐山途中回故乡的第 29 首《七律》的时候，并没有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然而，他在第 29 首诗中使用“咒”，在第 30 首诗中使用“冷眼”和“热风”这种对仗法，不禁令人打起寒战。

2. 七律（第 29 首）
到韶山 1959 年 6 月

碑文般的诗句，使全诗显得十分协调和匀称。第一句中的“咒”，第三句和第四句那紧迫而威严的意境表现作者丰富的洞察力和回首往昔的情感。他把过去的同乡称作“英雄”，似表达当权者的关怀之意，用这种现代汉语来表述作者的情怀，更使人感到亲切。

七律
到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成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注释

【七律】（同前）。川、前、鞭、天、烟押韵。

【别梦】1927 年 1 月来到故乡，对别时的回忆如同一场梦。

【依稀】隐隐约约不清楚。在陆游的诗中有“家山万里梦依稀”，只是这里意在因回故乡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在赵嘏的诗中有“风景依稀似去年”（《江楼书感》）。

【咒】也有祝愿的意思，不过此处是祝愿的反义词，有诅咒神灵加祸之意。“对故乡的回忆，仿佛进入梦境，但憎恶之情极浓，于是回想变成‘咒’字。这是大喝一声，读者不得不睁大眼睛用头脑想一想。”

【故园】旧庭院，转意为故乡。“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红旗】指当时的农民运动。红旗指中国共产党，卷是风吹动旗子的情景。

【黑手】指反革命势力和地主势力。1927 年 5 月 21 日，驻长沙的军阀许克祥率一个团叛乱，袭击并解散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解除工人农民的自卫队武装，杀害百余名共产党员和群众，建立了反动政权，这就是“马日事变”（旧时用韵国代日期，马日代表 21 日）。被这一事变激怒的群众在各地组织武装队进行抵抗，在韶山也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湘宁边区司令部，千余队员拥有 300 余条枪，企图同友军一道夺回长沙，但由于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错误，这次没有成功。不久反动军队从三个方面进攻韶山，农民自卫军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在残酷的恐怖中，许多农民牺牲了。

【牺牲】在中国革命中，许多人牺牲了，这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也在革命中先后失去第一个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在朝鲜战争中又失去儿子毛岸英。

【换新天】同“换了人间”。

【菽】豆类的总称。

【下】现代汉语，从学校和工作单位回家叫“下学”和“下班”。

诗词大意

回到故乡，别时的情景便隐约浮现脑际，勾起对过去日月的悲伤回忆，怒与憎又一齐向我袭来。数来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

高举红旗，人人手持梭镖的被压迫农民起来了，但反动的黑手替穷凶极恶的地主抡起鞭子镇压农民。

无数胸怀壮志的同志为革命而献身，但幸存者依然毫不畏惧地为开辟今日的新天地战斗，而且实现了这一愿望。当我以喜悦的心情眺望田园上碧波千重的庄稼时，不知不觉天色黑下来，缕缕炊烟升起。四处可见忙碌一天的农民（那是堪称英雄的人们）回村的身影。

3. 七律（第 30 首）

登庐山

1959 年 7 月 1 日

这是一首规模宏大的风景诗。说它把旋转 360 度全方位地展望到的风景尽收一首诗中并不过分！热风吹雨只不过在天的一角。引用古人的诗句描绘当今新的劳动世界，是作者最得意的技巧。

七律

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注释

【六律】（同前）。边、旋、天、烟、田押韵。

【庐山】也叫九十九峰，由七条大岭组成，最高峰海拔 1543 米，周围约一百华里，与日本的箱根山相仿。山上耸立着累累绝壁，东南与鄱阳湖相接，北可眺望长江，西有较低的高地连接九岭山脉。鄱阳湖与长江汇合处有石钟山，从此处望庐山和长江可见天下之绝景。作为从下面望庐山的景色，从石钟山背面的鄱阳湖畔星子附近眺望为最佳。那里连接一块宽数百米，高一千几百米的巨石，在其断壁处挂着数百米高的瀑布，极为壮观。庐山古名叫南障山，或叫匡山、匡庐山。相传古时有个名叫匡俗的隐士同兄弟七人隐居山中，人称庐君，故此山得名庐山。据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山中修建寺院多过 380 余处。由于唐宋时代名人来游并作诗文，此山逐渐有名。这些诗人是李白、王勃、杜甫、白居易、苏东坡、周濂溪、朱晦庵（朱熹）等。清末，英国人租借山顶盆地牯岭作避暑地，蒋介石常在此召开讨伐共产党的会议，在日中战争时期也曾有过战斗。国共内战时期，美国的马歇尔曾在这里同蒋介石密谈。庐山是 1949 年 5 月 18 日解放的，毛泽东在 1959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那一天登上此山，并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飞】飞来峰或飞来石，是个形状奇特的孤立岩石和山峰。相传是仙人搬来的，也有自己飞来之说。从宜昌顺流而下到河口，长江两岸是一望无垠的千里平原，流至九江方见庐山，于是自然联想起飞来峰。不过把这种传说用在庐山这样的大山上；作者算是第一人。庐山到底是不是“飞来”的，单从“飞”字尚难确定，作为对山高而雄伟的形容，个人有“飞来”之感。“飞”是飞阁、飞楼等对高物的形容。

【葱茏】草木繁茂的样子。

【四百旋】旋为转圈之意。1952 年 9 月开始，用时约 7 个月在庐山修筑全长 35 公里的公路，它有近四百处转弯处。旧中国那种人们流着汗水使用轿子抬人上山的情景不见了。

【冷眼】“蔑视搞反华大合唱的人”。让人想起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诗句。第二句和第三句，第四句和第五句形成对仗，“冷眼”对“热风”。

【洋】水域广阔。《诗经》中有“河水洋洋”（卫风·硕人）。在庐山北面，有面积为 2780 平方公里的淡水湖鄱阳湖。据说从庐山的最高峰大汉阳峰眺望，可见如下风景：“大汲阳岭居庐山的西南，高达 1543 公尺。晴天登岭顶，可以远眺山下如画的景色：长江如线，鄱阳湖像一面镜子；烟波浩淼，远天与碧波连成一片。彭泽、九江一带的城镇农村，也依稀可以看见。古人说：‘月明清之夜，可观汉阳灯火’所以称它汉阳峰。”

【热风】7月的暖风。南风。为避免使用南风这种平淡的叙述，在诗中常用“薰风”来形容。它出自传说中的舜的诗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鲁迅在散文集题名中曾使用过“热风”，他在序文中写道：“我感到周围空气过于寒冽，但我要说话，故而反倒用‘热风’题名。”据说毛泽东是用热风一词寓意在反动派的严酷环境里，中国人民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热情。作为对大自然的描绘，诗句是非常美的。诗中对大自然的赞美，也是对独立不羁革命精神的歌颂。

【洒】雨等倾盆而下。倾注。

【九派】九是指数量很多，派是指河的支流。长江在湖北省江西省附近分成一些主流，相传古代长江在庐山和浮阳（即现在的九江附近）分成九条支流。李白的诗中就有“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但九是指什么，人说纷坛。这且当作比喻长江汇集许多支流的情况是可以的。

【黄鹤】参见三、2 中的黄鹤楼。形容从庐山向西眺望长江上游，隐约可见武汉和长江大桥的情景。

【三吴】指的是长江下游地区，当然这里描绘的是包括上海及其附近工业区冒出白烟的景色。关于三吴有各种解释，一说是指苏州（东吴）、润州（中吴）、湖州（西吴）。

【陶令】陶潜、字渊明（也有人说渊名是名字的，356—427 年），因做过彭泽县令，故叫陶令。他是李白和杜甫以前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因《归去来辞》等表现出的田园隐居生活及《饮酒二十首》等爱酒癖而著名。诗人出生在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的浔阳柴桑，除青壮年时数次为官外，未离开故乡。靖节先生是他死后人们对其清廉一生的赞美而起的谥名。柴桑在九江市西南 4.5 公里处，三国时代吴国孙权驻在此地，诸葛亮为在赤壁打败魏国曹操去会见孙权。陶渊明的故乡是柴桑，但一般认为其住处在柴柔和庐山中间的栗里，他的墓埋在庐山北麓的面阳山上，今天在栗里和面阳山还有陶姓人家，诗人在柴桑过着“躬耕自养”，“夫前耕，妻后锄”的和睦生活。按照郭沫若的说法，陶渊明一生勤奋耕作，但他的这种值得尊敬的一面却被后人遗忘，只强调他的隐居和爱酒一面。好像陶渊明不劳作也能过活似的，然而这是憧憬隐居生活的后人——地主阶级对他的歪曲，他亲自耕田的侧面正是毛泽东认为值得羡慕之外，是今天的时代精神。在 1500 年前不愿作官甘愿为民的陶渊明，确是个难能可贵的人物。

【桃花源】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幻想中的理想国。一个渔人为在河中捕鱼逆流而上，他来到两岸开满桃花的地方，又向前去发现山中有一洞穴，于是钻了进去，里面有和平生活着的村子。据村里人讲，他们是为避秦朝的战乱来此僻地的。返回途中，他虽留下标记，但第二次来时却未能找到。作者在诗中所说的“桃花源”，指的是现在的中国。

诗词大意

庐山宛如突然飞来似地耸立在水面宽广的长江边。汽车沿新开的道路奔驰，在绿

色的林海中，一气通过四百个转弯处到达山顶。

冷眼观看鄱阳湖和世界，在广阔无边的天的一角，热风吹雨，从长江的上空倾盆而下。

转眼望去，云横在上游的武汉三镇上空，猛然间像是传说中的黄鹤飞来。再回首张望，长江下游历史上物产丰富的古代吴国，现已冒起近代工业的缕缕白烟（长江横贯东西，又汇集支流，汹涌而又悠然地流淌着）。

这附近的陶渊明现在何处？曾憧憬理想国桃花源的这位县知事，一定在现实的桃花源中高高兴兴地耕田呢。

4. 最严峻的时期

虽说彭德怀事件是突发性的，但在其背后似乎有苏联领导的影响，1964年2月14日，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认为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批判，他把中国领导人和理论家的思想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倾向”。这不禁让人想起报道中讲的彭德怀认为“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般认为，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贴上同样标签这一点来看，如下推测是对的，即彭德怀是在同赫鲁晓夫沟通意见后才批评毛泽东的。据此，认为在庐山会议前彭德怀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去东欧访问时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和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接触。那时，已得知苏联废除了《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在担心军队现代化遇到严重障碍之余，想通过扭转国内政治的方针再次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有人说彭德怀给赫鲁晓夫写信讲了自己的意见，被发觉后在1960年受到了更加严厉的处分。因此，赫鲁晓夫与此相对抗，在同1961年10月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地不止一次地表明“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赏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说这是‘非常有勇气’的行为等”。然而，赫鲁晓夫在多大程度上与彭德怀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约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与毛泽东和党中央本来并没有根本性的对立，但他却因此而给自己惹出了麻烦，在约定这项《协定》时，赫鲁晓夫的本意姑且不论，但可以设问在反对核扩散的今天，即使彭德怀成功地变成中共党内的主流，苏联果真能再次把“原子弹的样品”提供给中国吗？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彭德怀是因为在反对党的方针上的“有勇气的行为”才使他成为值得支持的人。彭德怀活该！作为赫鲁晓夫，以这种方式干预中国的党内斗争，最后使两党关系恶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轻率的行为。9月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和平共处》文章，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赫鲁晓夫感到需要给中共打进一个楔子，在这个时候，碰巧彭德怀出场了。

这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共的牵制和攻击变本加厉。特别在1960年5月，由于在苏联领空击落美国U—2飞机，四国首脑会谈流产，好不容易得来的共处气氛云消雾散了。其后，在利用罗马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的会谈中对中共的攻击，似乎只是纠正中共中央的路线偏向。但根据中共后来披露的情况（今天，已大白于天下）如下：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6月24日到26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日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6月21日《通知书》，在中共代表团布加

勒斯特会谈结束时发表的“声明”中叫《苏共致中共的意见书》，其内容时至今日也未公开发表，不过其论点与后来论战中讲述的没有不同。在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未能达到目的。因此，7月通知中国在1个月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技术人员和各种专家1390名（1964年在80个工业企业建设中继续给中国以协助），废除343项派遣专家的合同和补充合同，废除257项科技合作项目。

苏联专家是在经济、国防、文教、科研等部门和领域里工作的，由于是紧急撤回又突然中断合同，无疑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与此同时，也停止发行为友好而使用对方语言出版的杂志，要求召回一名驻苏使馆人员，中苏边境也发生了纠纷。引起中国方面最大义愤的是撤回专家和废除技术合作。因为这是在中国群众眼前发生的事。以前倡导中苏友好的中国领导人和共产党员不得不承受群众的怀疑和失望。事件发生后，一位到中国旅行的日本人听到流传在中国人中间的一段现代民间故事：“一个苏联技术人员在撤回国时烤了一个大面包，他写下留言请大家吃这个面包。当人们切开面包时发现里面放着一张图纸，这是苏联技术人员背着本国的命令赠送给中国人民的。”在大面包里放图纸的故事表明中国百姓朴实的失望与愿望。据说三门峡工程没有开始也是由于苏联的这一措施造成的。它败坏了苏联的“信誉”，破坏了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百姓对苏联抱有的“憧憬”和“尊敬”。为打击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是特意这样干的。薄一波曾明确他说：“这和正在吃饭时从餐桌上撤掉饭菜一样”（1964年1月），这是心理上“愤怒”和蒙受“屈辱”后的一种表露。中国领导人过去曾宣传这桌“饭菜”是苏联如何以无私和兄弟般友谊赠送来的，这一下中国领导人在中国百姓面前丢了面子。这种创伤即使再次派来专家也决不能治愈，反而会加重痛苦。苏联“违背共产主义道德”，“坦率地讲，中国人民已不信任你们了，”以此拒绝苏联再度派遣专家，这说明在心理上已筑起了鸿沟，给中共以打击，也许使苏共领导痛快一时，然而从长远观点看，它应该明白将要付出无形的沉重代价。

1960年11月，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共在会议前向代表们散发了攻击中共的长篇公开信，引起更加激烈的争论。1961年6月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会谈，7月1日苏共没有出席中共成立40周年紀念大会，在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批判斯大林，不邀请并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周恩来批评了苏联的这种态度，就在参加这次大会期间，中途回国。周恩来在回国前特意到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墓前献了花圈。

中国不仅遇到对苏关系急剧恶化问题，而且在国内也面临严重的困难。正如1961年大量从加拿大和新西兰进口小麦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粮食供应十分紧张。1959年受灾面积为3300万公顷，1960年为6000万公顷，1961年为4000万公顷（中国的耕地面积为1亿1千万公顷，相当于16亿亩）。农业歉收直接影响到工业生产，所以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停顿状态。1960年的工业生产维持在1959年度的水平上，但农业生产却比1959年减产40%。(10)为了每天向中国的7亿国民供给1500卡路里的谷物，每年需要1亿8000万吨（或1亿9000万吨）谷物，或相当于这些谷物的土豆、大豆。据说在最好的年景1958年生产2亿5000万吨，1959年说是2亿8000万吨。可是实际上只有1亿9000万吨，1960年为1亿5000万吨（毛泽东与蒙哥马利元帅谈的数字）。(11)以后每年增产1000万吨，1961年上升到1亿7000万吨，1962年上升到1亿8000万吨，1963年上升到1亿9000万吨。(12)

同苏联共产党对立的激化，受到撤回技术援助这种严厉打击，使得中国人面临更大的困难。1960年6月，在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带领游览的作家和翻译对我们说：“你们别着急，慢慢吃慢慢谈。”他们不跟我们一起就餐，而到别的餐桌吃饭。我们这些人真是太疏忽了，他们真是好样的。1960年的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据中国的一位学者讲：

“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自纪元初至19世纪期间，共出现过1013次大旱，658次大水，每世纪平均有水旱灾88次。其中旱灾以华北居多，长江流域水旱灾都比较频繁，而华南的水灾和旱灾比较少。从20世纪近60年的雨量记录来看，大范围的旱涝现象不下三四十次。从1900年起，出现大范围旱灾的有1900年、1913年、1917年、1920—1921年、1928—1930年、1934年、1941—1942年，1959—1960年等（约相当于七八年一遇），而干旱的程度则以1959—1960年为最严重。据不完全的历史资料分析，从16世纪以来，象1960年这样特大的旱年共只出现过3次，即1640年（明崇祯13年）、1877年（清光绪3年）和1960年。

如果以一个月里面，有25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两个福建省的面积）以上的土地上雨水比常年多50%，作为发生了一次涝灾；雨水比常年少50%，作为发生了一次旱灾，那么在20世纪的60年中，我国每年旱涝灾害平均有4次，最多可达10次以上。而最近几年的旱涝次数都在6次以上。尤其自1955年以来，大范围旱涝的总次数都明显地超过常年的平均次数，在1959年和1960年竟分别达到10次和13次。这个统计数字仅是指旱涝而言，尚未包括由寒潮、霜冻、台风、冰雹等所引起的自然灾害在内。这说明了近年来我国天气气候的反常情况。

近几年来这种气候上的反常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从1956年到1959年的4年中，在美洲的美国有1年（1957年）农业自然灾害较重，1年（1956年）较轻，两年（1958年、1959年）天气气候条件基本正常；在西欧的英国，1年（1958年）自然灾害较重，3年（1956年、1957年、1959年）天气气候条件基本正常；在亚洲的日本，两年（1956年、1959年）自然灾害较重，两年（1957年、1958年）天气气候条件基本正常。我国除了1958年天气气候条件基本正常外，其他3年的自然灾害都较重。如1956年全国受灾农田的面积近2亿3000万亩；1957年受灾面积约2亿2500万亩；1958年是近4年中自然灾害较轻的一年，但全国受灾面积也达1亿亩。1959年我国天气气候极为反常，全国旱涝面积之广及强度之大是少有的；而1960年我国又遭受了近百年来所未有的大范围特大干旱和其他一些自然灾害。这说明近几年来东亚天气气候条件特别恶劣，不但遭受自然灾害的年份多、受灾面积广，且受灾程度也比较严重。

根据本世纪60年来的雨量资料统计，我们发现每5年内出现大范围涝次与旱次的比值无论在冬半年（10月到次年3月）还是在夏半年（4月到9月）都有比较明显的周期起伏。在本世纪初的20年内，夏半年干旱占优势而冬半年则是涝占优势。在本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冬夏都处于干旱频繁占优势的周期，40年代以后无论冬半年和夏半年我国大范围降水一般偏多，处于涝占优势的周期。自1957年以后，我国大范围降水又逐渐偏少，是处于干旱占优势的范围内。1959、1960年已连续出现了大范围干旱。从近几年的趋势看，未来两三年内冬半年出现旱的机会比出现涝的机会仍可能要多些；而夏半年则可能是出现旱的机会要逐渐相对地减少，而出现涝的机会要逐渐相对地增多。1960年在我国出现大范围特大干旱的同时，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却受到洪涝灾害。辽宁省东部地区遭遇了当地水文记录上从来没有过的特大洪水。所以在总的趋势中，某些地区出现相反的趋势则是完全可能的”。（13）

这篇文章还科学地论述了发生天气异常现象的原因。文章在此时发表，并不是没有政策制定者想把农业歉收的原因转嫁给老天爷的意思，但是这篇

文章的调子是认真的，不能说里面掺有假话。总而言之，看到这些统计数字，不禁让人感叹，治理中国这样的国家，从自然条件看，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毫无疑问，尽量克服这些灾害，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工作。

1958年，我去四川省灌县参观了秦代修筑的灌溉水渠，听说要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工程。那里的主任一边劝我们喝烈性酒“五粮液”，一边说：“想听听贵宾们的批评和建议。”一行中的一位农业问题专家说：“灌溉水渠还是要修成弯弯曲曲的好，这样可以多接受日光提高水的温度。”主任直点头，还拿起笔来记。看到这，我们很高兴，觉得好像我们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帮了忙。后来据日本报纸报道，遭受严重旱灾的一个原因是水渠的设计不合理，没等到水流到田里就已经蒸发掉了。这恐怕是水极度缺乏时的现象吧，我忽然又想起那位主任，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水渠修成弯弯曲曲的样子了。

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不仅打破了我们的常识，而且也打破了他们的常识。

1961年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0年以后不再公开政治报告、财政报告和经济建设的成果，而且在这一年也不公开预算计划。虽然向农业投入2000万工业劳动者，但还是连续三年歉收。1961年9月，毛泽东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因为下面对中央统管意见不少，所以我们放松了一些。可是由于下面经验不足，却出现基础物资供给不足和原材料浪费的现象。于是，我们又加强了统管，这种浪费和下面组织的不得力，与严重歉收的第一年1959年赶在一起，所以问题更加困难了。”他又说：“我和我们党在处理面临的不寻常问题上经验不足，犯了不少错误。”(14)

在这种内外危机最严峻的1961年（已经出现了摆脱危机的征兆），毛泽东写下第31首等四首诗作。虽然当时的环境为一片危机感所笼罩，但似乎可以说毛泽东仍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一切。特别是这四首诗中的第1首《民兵》，确实耐人寻味。因为中国没有原子弹，而抵抗原子弹的策略必然是积极地评价“民兵”。

第35、36首是在最严峻一年的翌年作的。这一年，在国内已经看到了国民经济好转的征兆，有渡过危机之感。然而，在对外关系上，中苏对立与其他国际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1962年9月，在早有纠纷的中印边境线上再度发生战斗，中国军队连战连胜。可是中国于11月突然提出包括停战和谈的提案，12月1日又单方面地从全线撤军。苏联支持中国的主张，劝说印度进行停战谈判，然而后期却向印度提供米格21型战斗机。也有人推测，这是苏联为牵制中国企图恢复对拉达克（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纳加（印度）等“乾隆时代的中国主权”，讨好印度的做法。(15)

10月，美国针对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采取强硬措施，发生了战后最大的一场危机。在那紧张的一周时间里，中苏的方针明显不同。中国动用远远超过1960年支持日本反对安保条约的动员人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并广泛利用了新闻舆论，支持古巴的五项要求，声讨美国的侵略行径。苏联最后撤回导弹和轰炸机，避免了战争爆发的危险。

中国严厉地谴责了赫鲁晓夫路线，批判它以牺牲革命人民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后来，11月至翌年1月在东欧各国和意大利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多数共产党支持苏联的解决办法，中国是少数派，可以说陷入了孤立状态。

第35首《卜算子咏梅》，第36首《七律冬云》，不论是作侍的季节，还是当时中共所处的国际环境，可以说都是“冬天”时代的作品。

5. 七绝（第 31 首）

为女民兵题照

1961 年 2 月

武装起来的“民兵”不脱离生产，“保卫土地，保卫家园”。遇到外敌来侵犯时，勇敢地与之战斗。没有这样的“民兵”，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诗文细腻奔放，如果联想到赫鲁晓夫在 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说的“依拥有现代武器的我们看，民兵不是军队，它只不过是一堆肉。”那么，作品的意图便可想而知了。

七绝

为女民兵题照

一九六一年二月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注释

【六绝】七言绝句。四句，27 个字，一般用平韵押韵，这里也是如此。枪、场、装押韵。

【题】在绘画的空白处，记有赞词和诗文。中国在唐代就盛行赞赏他人绘画的“画赞”，四言四句居多。也有七绝。五绝，还有两句的。实际上，就是不写在绘画上，但是有关的诗文叫“题”。写在书后的是“题跋”。

【儿女】儿子和女儿。这一句的第四个年没有用平声，说不定把该用“女儿”给颠倒过来了。如果讲平仄的话，这里使用“少女”、“女子”是可以的。所以特意使用包括男子在内的用语，是指所有的民兵。据郭沫若讲，下一句的“不爱……”也不限于女性。(17)下面结合照片，还是在颂扬女性，但这里也包含男儿，一定是在说“所有民兵”。作者曾讲过，不出名的年轻人，没有地位的年轻人，没有钱的人，是可以诚就对人类有意义的事业的。

【飒爽】本意是表现下霜时节 9 月份的用语，意味着高洁。杜甫诗：“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这是赠送给当时大画家曹霸的一首诗，可以体味到肖像上那栩栩如生的武将气概。为女民兵题照的诗句多么贴切，读者可以从现代民兵的姿态中见到唐代名将的气概，诗中充满着爱国的热情。

诗词大意

女民兵英姿飒爽手握钢枪，曙光照在练兵场上，在建设新中国的一代人中有志者众多，比起用华丽的衣裳来装饰，更喜欢着保卫祖国的军装。

6. 七律（第 32 首）

答友人 1961 年

词汇，典故、色彩和事件，都由作者用严谨的结构汇集到一首诗中，它们是那样的丰富、绚丽多姿。这是一首歌颂祖国的爱国诗，象这样内容充实，诗句华丽的赞美祖国的诗，过去任何一位诗人也未曾作过。

七律 答友人

一九六一年

九疑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注释

【六律】同前。飞、微、衣、诗、晖押韵。

【友人】*不明，从诗的内容上看像是湖南省人。

【九疑山】也叫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接近与广东省的交界处。相传古代的舜帝陵在此，山南有舜庙，从那里仰望山顶显得山势极高，从未有人登过。传说有 9 座山峰，分别起了与舜有关的名字。

【白云】天帝住的地方叫白云乡，在《庄子》天地篇中有“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从九度山的传说到白云的说法，进而联想起帝子来。

【帝子】天帝之子。古代传说天帝有二女同嫁舜帝。这一句源于《楚辞》九歌中的“帝子降兮北渚”（《湘夫人》）。

【翠微】轻淡青葱的山色。

【斑竹】留有泪痕那样斑纹的竹叶，也称湘妃竹。相传嫁给舜的尧帝二女，在舜死后十分悲伤，她们的眼泪落在竹上形成斑痕。还有说二女追踪舜后，投身湘江中。当时她们望着苍梧方向哭泣，泪落竹上留有斑痕。

【斑竹一枝】在一枝竹上留有許多泪痕。也许作者想起了革命征途中倒下去的同志才这样写的吧，从围绕斑竹的传说自然而然想起杨开慧来，因为下面红霞的红字是表明女子的语言。

【红霞】朝霞，晚霞。

【万朵】白云纷绕。这一句同前一句对仗，一枝对万朵。

【洞庭】是位于湖南省南部的中国最大淡水湖，其面积随季节不同湖面有明显变化，约 3100 至 5200 平方公里，青草湖、翁湖、赤沙湖、黄驿湖、安南湖、大通湖等合称洞庭湖。“夏秋涨水时，怒涛澎湃形成鱼龙出没的大观。冬季水落众湖皆枯，变成一望无垠的洲汀。”（18）“船在洞庭湖上，从船舷遥望君山和岳州即岳阳楼处，可以领略范文正公（宋代政治家范仲淹，文正为谥名）所谓的阳风怒号，浊浪排空八个字并非虚

构”。(19)

【长岛】橘子洲即水陆洲。“水陆洲为湘水中一长岛，景色颇佳”。(20)

【动地诗】洋溢着惊天动地的强烈感情的诗。

【我欲因之】李白诗中有“我欲因之梦吴越……”（《梦游天姥吟留别》）。

【梦寥廓】是指梦见天地即未来的世界（与李白的梦不同，描写想象）。

【芙蓉国】出自五代末（950年）诗人谭用之的诗“秋风万里芙蓉国”（秋宿湘江遇雨）据说是作者答郭沫若的质疑（郭沫若《芙蓉国里尽朝晖》《人民日报》1964年5月16日）。(24)当时湖南芙蓉树很多，湖南省的名山衡山又名芙蓉山。或许与此有关。

【朝晖】旭日的的光辉，“朝晖夕阳气象万千”（范仲淹《岳阳楼记》）。

诗词大意

白云飘在九嶷山巅，宛如古代杰出帝王舜的住所，尧的两个女儿同嫁给舜，他们不是乘风来到这个绿色的下界了吗？

她们的手上带着传说中的湘妃竹枝了吧。那斑点的模样是千滴泪痕。一定是怀念为革命而献身的同志流下的泪痕。美丽的晚霞是姑娘们的衣裳吧，那大概是烈士们的盛装。

今天湖南省一片大跃进景象。洞庭湖的波浪溅起的水花像是连天雪，长沙的橘子洲上人们的歌声震撼着大地。

眼前的光景给人以启示，我要描绘来来。晨光照在芙蓉国湖南的每个角落，它已放出金色的光芒，不是吗？而且。不只是湖南一省，这是全中国的未来。

7. 七绝（第 33 首）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1961 年 9 月 9 日

第四句寓意明确，全诗赞颂的风景美是中国的文学家和艺术了所憧憬的理想自然美。似乎可以说，从这首诗中能够看到中国传统的美学。

七绝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无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注释

【七绝】（同前）。松、容、峰押韵。

【李进同志】在发表这首诗的当时，只知道是位女摄影师。1973 年 1 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为在日本上演中国的革命现代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去中国学习。2 月 10 日在北京天桥剧场与中国舞剧团联合演出那一天，毛泽东夫人江青观看了演出，并同松山芭蕾舞团长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夫人握手，祝贺演出成功。这是相隔 9 年后的会见。翌日晚，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说：“受江青同志的委托”，送给一张照片。背面有“庐山仙人洞”的标题和“江青摄”的铅笔签字。1964 年《人民日报》介绍了这幅照片，同“李进同志摄影”的是一样的。吴德组长讲，“我告诉你们，江青同志说了。这张照片可以公开发表”。后来，清水团长在上海听有关人士讲：“这首诗包含有双重意思，一方面表达毛主席对照片摄影人的关心，另一方面在号召中国人民克服当时面临的困难。”(22)使用笔名“李进”，这不是第一次，1951 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在派往现场调查团中就有这个名字。

【庐山仙人洞照】照是摄影。1964 年 4 月 11 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李进同志摄影》和郭沫若的鉴赏文章。仙人洞是庐山牯岭西面的一个肩然洞窟，高约两丈，宽与进深三四丈，洞窟中有供奉传说中的仙人吕洞宾的词庙，里面有与一滴泉相连的泉水在流淌。在仙人洞上有白鹿升仙台，台上有御碑亭，亭中立有据说是明太祖朱元璋写的洪武二十六年御制的周颠仙碑。周颠是个疯子，到处叫嚷：“给我和平！”朱元璋在鄱阳湖打败陈友谅后来见他，还是大叫大嚷那句话。用火烧他也不死，仍到水中也淹不死。投进牢中 23 天不给饭吃，照样叫个不停。给他饭后，转瞬之间把几天的份儿给吃个精光，还说没吃饱。然后就无影无踪了。后来，朱元璋生病时，托天池寺和尚给拿药。痊愈后的朱元璋派人去拜访，但不知去向了，郭沫若在这个故事里指出来元璋有所作为。照片是把这个白鹿升仙台作为远景拍摄的，因此仙人洞不是特别清晰。诗中的松是近景，在照片上方只有松枝被摄入镜头。

【暮色】黄昏的景色。

【从容】悠闲平静。

诗词大意

在傍晚天色暗淡即将入夜时观看强劲的松姿，松在乱云飞舞中悠然从容，这松耸立在天然的仙人洞之上。耸立于高山之巅的松实在庄严，有取之下尽的妙处。要欣赏到

这样的美景，以便达到神清气义的境界，人人都可以做到。不过，那属于不懈努力、不畏艰险、勇于攀登顶峰的人。

8. 七律（第 34 首）

和郭沫若同志

1961 年 11 月 17 日

一般人对三藏法师和孙悟空的看法，是前者为贤后者为愚。但作者在诗中的看法与此正相反。在郭沫若看的戏中，识破恶魔面目的是孙悟空，三藏误解了孙悟空的行为并惩罚了他。因此，郭沫若同意了作者的看法。作者把苏共看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僧是苏共领导或赫鲁晓夫，孙悟空是中共领导或自己，但避免把诗还原到现实中来，只限于戏的现代解释，因此不能说孙悟空就是作者。在郭沫若看来，把这出戏作为现代的投影，僧是赫鲁晓夫。作者多半持同样的见多，所不同的是认为通过工作是可以变的。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 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注释

【七律】（同前）。雷、堆、灾、埃、来押韵。

【和郭沫若】郭沫若原名开贞，四川省人，1892 年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主席。1914 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九大医学部。留学期间组织创造社这一文学团体，他针对集结有前辈文学家的文学研究会里强烈的现实主义何向，鼓吹浪漫主义，活跃在诗词、小说、评论、剧作和翻译等广泛领域里。后来，他提倡革命文学。在北伐战争时期，作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从军，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后，参加南昌起义。但是，由于后来形势恶化，他同去井冈山的来往分手去上海，最后亡命日本。在日本的约 10 年间，住在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发表研究著作。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运动。先在武汉，后在重庆，作为无党派人士抵抗蒋介石的反动政治，曾去香港躲避蒋介石的镇压。毛泽东的诗词发表后，他写了不少鉴赏和解释文章。

【孙悟空】《西游记》一书中的主人公。《西游记》是以去印度取经（佛教经典）的唐玄奘三藏（洛阳人，596？—664 年）的史实为依据，在说书人的口头文艺中广为流传。到明代，由吴承恩（江苏省淮安人，1500？—1582？年）将其成书。《西游记》第 27 回中说，妖怪起初以年轻美貌的女子出现，后来又变成老太婆和老翁，想吃掉三藏法师，但每次都被孙悟空识破，并用千钧棒打败，最后现出原形，成了一堆白骨，但三藏法师听信猪八戒的谗言，说这是孙悟空为掩盖杀人罪行施展的法米，责备悟空，并念起紧箍咒来制裁，最后将悟空赶走。后来三藏被黄袍怪抓住，在猪八戒的恳求下，悟空救

了三藏，于是，又恢复师徒关系。把这段故事编成剧就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戏后半部分说的是妖怪再次逃走后，又抓到三藏和弟子沙悟净，并在其眼前变成妖魔鬼怪，了解真面目的三藏十分懊悔，思想上有了些变化。这出戏是1961年10月由浙江省绍兴剧团在北京上演的。郭沫若应邀发表观后感，书赠七律一首，和它的就是毛泽东的这首七律。据说郭沫若看到这首七律是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的时候，是中央委员康生抄写给他的。那一天，郭沫若又和毛泽东的原韵作了一首七律，在诗中有“僧受折磨不知悔”一句。毛泽东通过康生又得到这首诗，并说，“和诗很好，不要‘千刀当刚唐僧肉’了吧。对中间派采取统一战线政策，才是对的。”郭沫若在解释毛泽东的话时认为，三藏站在白骨精和孙悟空中间，是受白骨精蒙骗的人，这种人虽然很多，但是可以变的。我们应把他们当做可以争取的对象，感情用事“千刀当刚”是不行的。(23)赵朴初认为，“唐僧的问题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他属于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是可以通过教育到我们这边来的人。”从当时的环境推断，唐僧是指赫鲁晓夫，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赫鲁晓夫的一定看法，可以通过诗和对诗的解释表达出来。猪八戒恐怕是指彭德怀等右派中的悔悟者吧。

【精】妖精，妖怪。

【僧】玄奘三藏。毛泽东把这个僧当做“中间派”。

【妖】与一般的東西不同，它常加害于人。妖怪。民间传说，这种东西经常化装成美女，因此把外表很漂亮，本质很坏的东西叫妖。

【金猴】指孙悟空。因常生不死，故用金字形容。

【千钧棒】据说悟空在龙宫得到的铁棍重达13,500斤。是太古时代禹治水时的剩余物，可随意伸缩，又叫如意棒。

【玉宇】壮丽宏大的殿堂。

【孙大圣】悟空在水帘洞里率领众猴子时的尊称。

诗词大意

从革命暴风雨刮起之日起就有反革命的干扰。唐僧玄奘不相信别人的话，又辨别不清是非，这怎能用真理引导伙伴呢？妖怪（帝国主义）本性难移，总要给人类带来灾难（战争）。

幸亏百折不屈的孙悟空抡起千钧棒，才把积在殿堂上的尘埃一扫而光。

今天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观赏孙悟空的戏，是因为支持孙悟空，也因为他与之斗争的妖雾又在笼罩着当今世界。

附：郭沫若原诗 七律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
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
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
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
猪犹智慧胜愚曹。

9.卜算子（第 35 首）

咏梅

1961 年 12 月

诗中流露出美好的感情。作为这首诗的背景，中共与苏共和西欧共产党的对立激化，中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作为直接反映它的东西，诗的格调高雅。总的说来，作者在诗中寄托有对人生的态度，这或许采用“咏梅”的做法更合适一些。

卜算子

咏梅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他在丛中笑。

注释

【卜算子】44 个字，双调，前后阕各四句，两仄韵。到、俏、报、笑押韵。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按照郭沫若的说法，这首诗是 1961 年 11 月“美帝国主义及其一伙掀起反华大合唱时”作的。“作这首诗是为了激励大家。开始是在党内传达和学习”，希望党员“首先不动摇，不怕寒气成为梅花”，做中国人民的“好榜样”。后来，情况好转，寒气减少，才公开发表。郭沫若自己是在 1962 年 1 月 30 日去海南岛时由康生抄给他的。当时，他感慨颇多，自己又作五首诗。(24)这样，作诗日期自然与实际不同了。另外。毛泽东的词（虽不能说是全部）是作为政治的一部分发挥作用的。

【陆游】浙江省山阴（现在的绍兴）人（1125—1210 年）。据说一生作诗约两万首，保存下来的约一半。他生活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在婚姻和官场受挫颇多，但他主张积极抗金。在临终的诗中还希望收复国土时，一定到灵前告慰。他有诗、词、文、书法和历史等多方面才华，爱国精神贯穿其思想始终，与同时代的辛弃疾（山东人，1140—1207 年）、陈亮（浙江人，1143—1193 年）等齐名被称作爱国诗人。其诗悲愤激昂，情调强烈，另一方面其作品反映同农家亲密交往的生活，以日常生活和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十分丰富。屈原爱兰；陶渊明爱菊，而陆游爱梅。郭沫若从诗集中汇集 12 首咏梅的佳句。顺便说，中国人一般都爱牡丹。晚年，他帮助主张抗金的韩 胄。宋代曹禁止过朱子派学问，韩的抗金策同时被学士们责为大逆不道，陆游也受到株连。陆游不仅在官场，就是在当时的文人也处孤立状态。他的号放翁，这个不受礼法约束的他曾被人指责成“颓放”便由此得来。似乎可以说，他继承了作为魏晋自由人的文人传统。事实上，《世说新语》和《庄子》从儒教的经典中引用很多。作为同时代的文人，与范

成大（苏州人，1126—1193年）交友，他特别尊敬唐代诗人杜甫和岑参，在爱国的感情和豪放的诗风上，确实与他们有共性。作为同时代的诗人，他为与自己不同的具有淡泊深远风格的梅尧臣（安徽省人，1001—1060年）所倾倒。

【反其意】将诗的趣旨和境地倒转过来。陆游的词是“愁”，毛泽东的词是“笑”（郭沫若）。

【不争春】同百花竞争，不想把春天归于自己。这里所谓的春，是指因革命胜利而得来的果实和名誉（赵朴初）。

【她】欧洲文学进入中国后新造的字。这时指梅果。在其他花开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报春的任务，结成小小的果实。

诗词大意

风雨把春天送回大地，飞雪又去迎接它。百丈冰柱悬挂在高高的悬崖上，可那里却长有美丽的花枝，那是耐早春考验正开着的梅花。

它虽美丽，却不想独占明媚的春光，只是告诉人们春天来了。当万花在山上盛开时，已完成先驱者任务的地（梅花）.结出了果实，在万花丛中露出满意的笑脸。

10. 七律（第 36 首）

冬云

1962 年 12 月 26 日

作为赞美冬云的作品，超越了自然的景象，更多地颂扬人。从诗的规则说，第三句和第四句是要求对仗的，但却是奇异的对比。第五、六句中人的形象也令人感到一下子进入神话时代那样不谐调。如果在“苍蝇”上重复鲁迅写的在战士的尸体上乱爬的苍蝇形象的话，那么作为这首诗的整体，描绘了自然的严酷。同时似乎表现了与因同苏共领导的对立带来内外困难斗争到底，纠正那种偏向的决心。作为一种现实的绘画，作者描绘一种思想状况的才华相当出色。这是作者 69 岁生日之作。

七律

冬云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雪压冬云自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无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注释

【七律】（同前）。飞、稀、吹、罴、奇押韵。

【冬云】作这首诗的时候，正是北京下大雪的季节。不言而喻，它包含有政治上的意义。

【寒流】冷水流。“寒流带月澄如镜”（白居易《江楼宴别》），这里是寒潮之意。中国常有这样的天气预报：“因有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气温下降。”这首词中的“寒流”恐怕让人从自然和西伯利亚想到苏联吧。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奚落。这里指各国的党代表大会在政治上对中共表示露骨的反感。

【大地】在中国大地开始看到经济好转的兆头。

【虎豹】与下句的熊罴一起，都是令人生畏的猛兽。杜甫的诗中有“熊黑咆我东，虎豹号我西”（《石龕》）杜甫是源于《楚辞》的“虎豹斗兮熊罴咆”（《招隐士》）。

【英雄】毫无疑问，这里的英雄豪杰都是指中国人民。

【梅花】春季最先在寒冷中开的花。按照郭沫若的解释，有中共党员的意思，也可以解释成中国人民。

诗词大意

雪压着冬天的云，宛如白絮般飞舞着，万花凋谢，暂时为那美景所述（无

聊的言论也像如花的冬雪一样是短暂的)。高空中吹来西伯利亚的寒流给人紧张感，但是春天的温暖空气已微微吹到大地。有不惧严寒敢于驱逐虎豹的英雄，还有不怕熊黑的豪杰。梅花喜欢在满天大雪时开放，即便有冻死的已丧失自尊心的苍蝇，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注释

- 《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
- 郭沫若：《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民日报》1964年2月8日。
- 郭沫若：《桃花源里可耕田》，《人民日报》1964年2月2日。
- 《庐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 赵朴初：《读毛主席诗同十首》，《诗刊》5月号。
- 斋伯守：《长江的自然与文化》（日本讲谈社，1942年版）。
-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
-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人民日报》1964年2月4日。
-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
- 中国研究所：《新中国年鉴》（日本远东书店，1964年版）。
- (11)埃德加·斯诺：《今日中国》，（松冈洋子译，筑摩书房，1963年版）。
- (12)中国研究所：《新中国年鉴》（日本远东书店，1964年版）。
- (13)庐签：《关于旱涝的周期性问题的》，《人民日报》1961年4月9日。
- (14)《朝日新闻》1961年12月26日。
- (15)《东京新闻》1962年11月12日。
- (16)《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1月15日。
- (17)郭沫若：《不爱红装爱武装》，《人民日报》1964年4月25日。
- (18)安井正大郎：《湖南》。
- (19)德富苏峰：《七十八天游记》（日本民友社，1906年版）。
- (20)诸桥辙次：《游支杂笔》（日本目黑书店，1938年版）。
- (21)郭沫若：《芙蓉国里尽朝晖》，《人民日报》1964年5月16日。
- (22)《日本经济新闻》，1935年5月8日。
- (23)郭沫若：《玉宇澄清万里埃》，《人民日报》1964年5月30日。
- (24)郭沫若：《待到山花烂漫时》，《人民日报》1964年3月15日。

十、越过中苏对立

1. 批判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赫鲁晓夫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的攻击以及一齐撤走派到中国的技术人员，进一步加剧了其后的“对立”。但是这也是以前“对立”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清楚了，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是其具体“分歧”的出发点，从此以后逐渐发展成“对立”或“对抗”。“二十大”开始出现的“分歧”，表现在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上。特别是关于前者，毛泽东直接提出意见，这表明批判斯大林的余波不小。按照中共文章的说法，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关于斯大林问题），…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

为什么说苏共领导人是错误的？据说“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缺乏自我批评”，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然而1956年4月以后，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执着。如果答应这个要求的话，米高扬和赫鲁晓夫那不是全部否定“二十大”上的发言了吗？读到中共文章所说“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并领导能够改正错误”一段话，便可以明白毛泽东的要求不只是把自己的见解通告给对方就完了。然而，在这一点上，恐怕毛泽东的估计有误，不是吗？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在于通过批判斯大林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措施赢得苏联群众的极大支持，对于这一点大概他自己是明白的吧，所以不可能接受。关于毛泽东批评的三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和苏斯洛夫1964年2月的《报告》都没有进行具体的反驳，只是把它作为“个人崇拜”的一般问题加以反驳，这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体制中也曾很活跃不无关系。中共指出，他多次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这与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的指责之间有矛盾。而且，中国共产党本身把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盲目地服从斯大林的“错误”作了如下的夸耀，但就是对于这一点，赫鲁晓夫或许很难拿出自己的同样值得夸耀的东西来。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

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

像这样的文章，假如中苏关系不是变成这种样子，恐怕中共永远也不会写出来，只会将就下去的。特别是一想起三十年代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主张”的影响，丧失了江西省中央苏区，许多人牺牲了，革命运动受到重大损失，应该说在这篇文章里还是抑制在起作用。

关于这种国际间党的关系，尚未充分地总结出经验来。“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的中国共产党在伦理上是高尚的，尽管如此，不能说斯大林就没有责任。因而，认为“负责任”的是“中国自己”的中共这一见解，抓住了在中国消除斯大林的错误，防止再次出现错误的根本所在。但是，命令“接受”和“实行”的斯大林的“责任”理应存在。将其责任确定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与“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相区别，难道不是更合适吗？

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共对斯大林的错误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是公正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如何对待斯大林在当时是最难的问题，正因为有在正确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中国革命才获得了胜利。如果对这一方面给予特别的评价，不能不说对斯大林采取独立的做法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红军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壮大成长，而且战胜了得到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军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革命的简单证据。尽管如此，中共为什么不否定斯大林的“权威”，而且在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恶化前还试图反对那种“权威”的丧失呢？

按照苏共的说法，那是因为中共正在滋长“个人崇拜”。然而更为现实的主题也许被隐藏在斯大林批判的背后吧。双方的争论也好，公开信也好，都十分谨慎地回避斯大林的权威和中共的权威共同产生的事件——朝鲜战争。关于中国革命，在实践的过程中，中共在内部进行过“批判斯大林”。所以，即使斯大林的权威丧失了，那也不会影响到中共的权威。斯诺也说，斯大林参与了1950年朝鲜战争的扩大。“帮助树立北朝鲜政权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的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他们还留在主要的位置上。事先不与斯大林协商，并得到他的同意，计划这样充分，实施这样的武装进攻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战争爆发的同时苏联的顾问团从朝鲜撤回，后来中国志愿军取而代之这是事实。”斯诺写道，“怀疑主义者甚至说，朝鲜战争把美国引进与中国无法解决的纠纷之中，这是斯大林想出来的主意。”然而，或许把这个“美国”和“中国”调换过来也可以吧。1960年在北京参观军事博物馆时，陪同我们的人说，“向朝鲜派志愿军是毛主席决定的。”我当时的印象是，有不少人反对和怀疑，最后是毛泽东的果断实现了中国的介入。毛泽东当时的果断决定是否与斯大林无关，不得而知，但是除了保卫中国这一目的之外，不能认为没有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使命感。

结果，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前面也有所涉及。据说在批判斯大林之后，从莫斯科的市民中公然传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随便发动的（同斯诺的推测一致），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的议论。只要批判斯大林还在发展，真相会水落石出的。但是对于流血的人们来说，心境怕是复杂的。由于情况不同，这也关系到中国和朝鲜领导人的“责任”。“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这种

不满，大概不是没有内容的吧。赫鲁晓大批判斯大林，可以拒绝斯大林的“责任”遗产，然而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偿还当时借款的“责任”今天还继续存在着。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借款，其中最大部分是中国为了从苏联购进军需物资而使用的，……这些军需物资的大部分是用于并消耗在抗美援朝中了。……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用现货偿还苏联的这些借款，这在中国向苏联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据估计这次抗美援朝出现的对苏欠债为 15 亿 5000 万元以上。

2. 论战的各篇文章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论战与对立为什么发生？推测作为被隐藏起来的动机是与批判斯大林和朝鲜战争有关。但是按照 1963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编辑部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说法，“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除了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之外，又举出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讲，给世界形势带来根本性变化的十月革命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对此，中共从一开始就表示怀疑，在 1957 年 11 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一系列活动，特别就和平过渡问题同苏共代表团有争论，而且在通过的《宣言》中写进了“非和平过渡”和“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两项。然而，在中共看来，其后苏共领导内修正主义在发展，最后在 1960 年 6 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共发动突然袭击。11 月，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但是根据中共代表团等的主张，加进了谴责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的条款。然而在签署二十四小时之后，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的党代表团的宴会上喋喋不休地大谈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争论在开始那段时间是当作意识形态问题的。在半年后的 1964 年 2 月 29 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中，作为对苏共提出来的问题的答复举出了（1）中苏边界问题；（2）援助问题；（3）苏联专家问题；（4）中苏贸易问题；（5）停止公开论战问题；（6）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问题。（5）、（6）另当别论，这些都属于国家间外交问题性质的东西。一定是从争论中派生出来的问题，但却是邻国间有经济关系的国家间的问题。而不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题目。冷淡了的两党感情，导致的首先下外是清算双方货惜关系的问题。

然而，作为以前提出争论的题目，可以举出（1）战争与和平问题；（2）和平共处问题；（3）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4）民族解放运动问题；（5）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6）个人崇拜问题；（7）全民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等等。争论涉及国家关系方面，另当别论，这些都是当代的结构和矛盾的反映，因此想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困难的，然而无疑又是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我们必须与那些具体的过程如是谁先挑起的争论？提出那些主张的背景是什么，被隐藏起来的动机是什么？等分开研究。这些既是一般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同我们生活的当代关系密切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必然十分关注。看来苏联与中国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即两大共产党的对立就要表面化了。

人们感到争论已进入对立和对抗阶段，在看不出有和解的征兆的情况下，分裂不是已成定局了吗？这种观察已逐渐地明确下来。1958 年 8 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北京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双方极其满意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正在顺利地发展着和日益巩固着兄弟般的友好、全面合作和互助的关系。……两国建立在完全平等和同志般互助的基础上的团结和合作具有伟大的生命力，这种团结和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迅速前进，而且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这样的党、政、民之间的“友好”，现在已经被切断了。如果在“友好”，的名义下“美化”压制相互的合理主张，势必不能顺利地从事实出发考虑问题，那么，双方完全根据各自的主张重新研究边界线的划定、借款和贸易，这反而是一个“进步”。这种公开发表文件，不另外在内部就重要问题进行交涉和争论，而是双方公开表明自己论点的办法，给一般群众提供了独立思考是非曲直的素材。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政治是光明磊落的。如果两党的领导不是把争论的解决当作“权威”的解决，而是在选定政治的合理方针这一层次上处理问题的话，那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赞扬的“友好”关系一定会在更高层次上得到恢复，而且它将有利于世界和平。

如果从第37首中“一万年太久”这一句来看，毛泽东认为，解决这场“中苏对立”，进而实现人类和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据报道，毛泽东于1959年2月，对访华的法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一位成员（36岁）说，“你最年轻了，你大概可以看到赫鲁晓夫下台。”不过，赫鲁晓夫却出人意料地过早下台了。当时，毛泽东认为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中国方面的文章，从风格和引用毛泽东已发表文章的作法上看，不是毛泽东执笔的，这些文章大概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的，或者毛泽东作了校阅，有若干修订吧。就总体而言，这些文章的文字有些呆板单调。在叙述毛泽东的意见时，专门作了说明。这只要看署名便可以清楚，这里无需再提了。不过，1951年号召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一节，后来在谁的文章里曾作为毛泽东的文章引用了。那是作为领导人的指示引用的。文章格调高，非毛泽东无人能写出来。后来这一点得到了证实，所以给人留下了印象。另外，文学家胡风受到批判时，发表的有关文章的序文也不是个人署名，不过从调子来看，很显然是毛泽东的风格。在中国的官僚机构中，把批准和评价下面呈上的报告类东西叫作“批”（老师改学生作文的评语和在古典小说要点上加注也叫“批”），用这种“批”的形式写的东西，就是批判胡风文章的序文。前面提到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文章，也是对下面党的书记“报告”的批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1）这套三本的丛书，就是由下面的“报告”和有关“批语”组成的，“报告”是下面实践的记录和概要——包括从这里引出来的思想，而且这些实践是在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毛泽东在开头写了短的“批语”，三册中收录的言论似乎与毛泽东的著述具有同等价值。而且，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像这些“报告”一样，是从现实的实践中形成的，所以写“批语”本身对于毛泽东来说，是自己的思想再一次地从现实的胎年诞生的重复过程。

无毛泽东署名的片断文章，在解放后大概有很多。在中苏论战的各篇文章中，不可能不包括某些片断，不过作为中文读起来，总觉得缺少毛泽东文章中的格调、寓意和乐趣，这是不可否认的。即便读完了这些文章，也感觉不到文章中本应有的一种人格的存在。我想这表明了“论战”本身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展开的。如同朝鲜战争、围绕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纠纷和日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一样，当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没有发表文章（作为舆论发表的某种言论是另外的问题）。即使在中国遇到“对立”时，这似乎也是特异的情况。如果从毛泽东的从实践形成思想的方法论来讲，这种“对立”本身还是实践的过程，外界可以通过那些“批语”大体掌握其方向和决

心。论战的各篇文章，同毛泽东既有联系又有距离。这些文章的论点与诗集作品是有距离的。不过也有相互联系的方面。我觉得有必要把对理解作品有帮助的情况作些介绍。

3. 对立点之一——核战争

中苏论战中争论的问题，也包括两国的利害关系、权威和对本国人民的宣传等因素。这些同一般真理有多大关系值得怀疑。然而，即使在这之中作为一般性问题，而且与中苏两国对立无关，但容易引起人们争论的问题之一，可以举出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

例如，中国关于核战争是这样讲的：

“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彼毁灭，而决不是什么人类的毁灭。……胜利了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这与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理论依然有效的主张有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抗“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发言，但是有人会下意识地发牢骚，希望有一个没有“废墟”的和平，纵然在“废墟”上能够建起比现在的生活好上“千百倍”的“真正美好的将来，”也不愿意。

针对这种意见，中共在这篇文章发表两年后的另一篇文章中说：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认为‘甚至连谈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可能倾向于什么，也无济于事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13)

或许在核战争的“废墟”上只描述悲惨的形象是这里说的“悲观绝望的论调”，因此是错误的，然而，针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提出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的逻辑推理又如何呢？现在把文章分成几段加上编号来研究吧。

(1) 为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需要告诉人民群众核武器具有的巨大破坏力。

(2) 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来推行他们的核讹诈政策。

(3) 在这种状况下，共产主义者在指出核武器具有破坏力的同时，必须针对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明确地指出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战争的可能性。

(4) 把人民群众对和平的愿望变成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政策的义愤。

(5) 必须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上来。

(6) 共产主义者绝对不应当成为美帝国主义核讹诈的宣传员。

(7) 通过保卫和平的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可以阻止美帝的核讹诈政策。

从(1)到(7)的整个中心思想，是从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人类的和平这一决心出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暂时把这种决心搁下，如果研究中心思想的展开的话，那么可以说，(1)和(6)的意思正相反，显然重点在(6)上。“需要告诉”人们核战争的悲惨结局，但是不能成为“宣传员”。这是在忠告，只是宣传其悲惨程度，将有可能削

弱保卫和平的积极热情。然而，在通过强调核潜艇的安全性、宣传核战争条件下的生还方法，意图在于进行核武装和使核战略具体化的状况下，恐怕必须把重点放在(1)上了，而且，在(1)中制定限度的理由，是在(2)、(3)、(4)、(5)、(6)、(7)中简单地把作为美国侵略和战争政策的一环的核武器开发和贮藏定义为“核恐怖”和“核讹诈”，这不是把人们引导到无视实际存在的破坏力的错误上去了吗？“恐怖”和“讹诈”的用语，总给人一种虚构的印象。确实，美帝国主义把核武器的巨大威力弄成时隐时现，像在“讹诈”一样，这是事实。但是，那不是假想的炸弹，这也是事实。然而问题在于，由于那样规定对方，主体方面反而也被规定了。如果对方“宣传”“讹诈”的后，主体方面“宣传”非“恐怖”不是更好吗？针对帝国主义的“恐怖”和“讹诈”采取怎样的措施为好，在这个问题上回答只能是(3)“明确地指出”(4)“把愿望变成义愤”(5)的“引导斗争”(7)的“联合保卫和平的各种力量进行斗争”。(5)和(6)另当别论。(3)、(4)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针对宣传的宣传。然而，另一方面，对方不仅在“宣传”，而且拥有“实体”的话，与那种“实体”相抵的抵抗和反对是必要的吗？与那种实体相抵的论法在(1)至(7)中，在(5)(6)里只不过做了抽象的叙述而已。但作为现实的政策，毛泽东已经说清楚了(1964年2月，对访华的法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另外，陈毅也讲清楚了(1964年5月，对访华的英国新闻记者代表团的书面回答以及对6月访华的桥本东京广播电台报道局长的谈话)。据此，中国虽然尚未出现核武器的实体，但逻辑上是把拥有核武器当作好事。在前一年曾指出：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

这里的前半部分的逻辑，同苏联进行核试验，开发贮存核武器的现实过程(和指导它的逻辑)是一致的。最后部分是中国对苏联开展批判的序曲。然而，中苏间的这种不一致，如果从日本民众所处的地位来看，在总体上是相同的。就是说，由于有把核武器作为实体而保有的现实(或将来制造)，所以是在这一基础上的防止核战争和彻底禁止核武器。但是，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是没有核优势、没有核武器(将来也是这样)这种现实情况下的反对核实验、防止核战争和彻底禁止核武器。

即便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是防御武器”，在现实中它产生的政治上、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影响还是引起了复杂的议论，而且今后将继续引起议论。没有核武器国家的民众的逻辑，必须从没有的现实出发形成。这样才能分担有核国家对和平的责任，并与之合作。在民众生活中经受过原子弹之害的日本民众，从那种“废墟”的悲修形象中燃起争取和平的热情，决不会对“帝国主义核恐怖”“无条件屈服”。

……书稿写到这里交给出版社后，中国进行了核试验。当我再看校样时，并不是一点也没有落后于时代的感觉。然而，中国的核试验比15个小时前赫鲁晓夫下台对世界政治的影响要大，而且今后这种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在这里写预测报道不是本书的任务。还是回到中国开发核武器的逻辑上吧，通过这次核试验，证明中国的逻辑在现实中起作用，而且将影响到今后，所以不

必修正。叙述为什么日本民众反对核试验这一部分，我也不认为由于中国进行了核试验，这一事实就必须改动。

中国政府在关于核试验的 10 月 16 日声明中讲道：“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然而，国际形势不断变化，或许中国的核试验和开发核武器反而一时出现了打开核扩散道路的现象。然而，正是这种时候，日本民众不应忘记战后的初衷，必须根据自己不搞核武装这种积极的理想，追求“消灭核武器”的道路。

4. 对立点之二——民族解放运动

然而各篇争论文章主张的支柱，不用说与毛泽东的主意有关。如前所述，有些部分是毛泽东的思想的很好说明，有些部分积极地提出了与毛泽东的哲学有关的世界革命力量的分布图。

这是 1963 年 6 月 14 日致苏共中央的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提出的，在同年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中又反复作了说明。据此，“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重点为引用者所加，下同）

一面说“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一面说“不能简单地看成只是”这中间还不能说有逻辑的飞跃，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重要的是如下主张：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问题。”

以上主张大概没有错，亚、非、拉美的革命斗争改变了世界的形势。证明之一不是别的，中国革命就表明了这一点。然而，现实的过程暂当别论。如果探讨第一到第六的逻辑的话，论证本身还有疑问。

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第一项），可是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第四项），不是说明不足吗？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斗争不是“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了吗？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轻视殖民地的革命斗争。作为现实的过程，这个论点是以正确的事实力依据的。然而，这一事实被认识、被理论化的过程，实际上如中苏论战中表明的那样是下一致的，这里就是问题。另外，在从第四项到第五项的论点发展，在从第五项到第六项的论点发展中，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内容来看，说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有缺欠也是有问题的。在引文的稍后又就这个问题叙述道：“我们相

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只是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说成以“大搏斗”的形式来理解，在这种对“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的展望上，不是有一种理论上的缺欠吗？

然而，赫鲁晓夫推行的和平共处政策是苏美协商的“和平”。苏联实行的尊重联合国主义未能阻止刚果杀害卢蒙巴，对中国的不“友好”措施是在同美国协商后采取的。如果考虑这些话，那么这些方面的“和平共处”与亚、非、拉美地区民族民主革命给帝国主义“严重打击”的事实是对立的。逻辑上的部分缺欠，另当别论。就总体而言，这是必须承认的。中国革命与之产生共鸣也是可以理解的。谁也无法断言不在这些地区发生像古巴那样的新事态，即所谓首先有革命，然后才有理论这种超越中国革命家的期望和预料的新事态。

如果以上论点的意思是否定“和平共处”的话，那么出席1961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工会第五次大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回北京后的报告中的下述讲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中国、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和人民一贯为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而努力。但是，帝国主义者总是反对和破坏和平共处的。因此，和平共处决不能意味着各国工人和人民放弃对他们的敌人的斗争。行动纲领说得对：‘和平共处显然并不意味着工会运动接受资本主义剥削和殖民压迫以及阶级合作。相反的，正是在为和平共处而斗争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利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高涨以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的新的可能性，而这些斗争反过来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实现。’”(15)

这里把资本主义的（国家）阶级斗争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放在同等地位，同时又把两者结合起来。然而，前面提及的6月14日“公开信”的理论，作为“现代”的示意图树起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两根支柱，而且主张前看是（几乎是唯一重要的）重要的。显然，与刘长胜“报告”的意思不同。

轻视民族解放运动，把它当成大国间妥协的“礼品”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和实现和平共处“断绝”，那不反倒过分了吗？这种“断绝”在中苏论战和对立愈演愈烈的过程中，不是没有被机械地推动的倾向。就是说，在我看来，由于这种“断绝”，并不能说可以给马列主义补充什么创造性的新东西，填补由于这种“断绝”而造成的空白，是中苏两党领导的责任，但是寻求世界和平和人类和平的人们也必须积极地来填补。和平属于寻求和平的人们的，在寻求和平的问题上，人们应该是平等的。

毛泽东于1963年8月8日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的反对种族歧视运动的声明。可以看出这是对上述“公开信”中世界革命力量分布图的补充。美国的种族问题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不是转折时期世界的坐标轴，它包含有复杂的因素，但是事实是，在今天无视这个坐标轴已经不可能了。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

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19)

5. 展望未来

毛泽东在中苏论战和对立期间没有发表个人署名文章，诗集里的最后一首第 37 首《满江红》署名了，因此，作为对“现代”结构和矛盾表明意见的作品值得注目。通过第 35 首、第 36 首的“冬”的凛烈寒气象征的危机感，也表示了对未来的展望。把《满江红》的最后部分看作是对前面引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六个论点作了脚注，歌颂整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胜利，恐怕好一些吧。

论点虽然有前面涉及到的应该填补的空白，但不能否认从总体上指出的“现代”断面即殖民地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

也许无须举出古巴和越南的例子，不过下面的故事可供参考。

“我在越南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青年在苏联留学几年后回国，当他讲起‘肯尼迪的和平主义’之后，母亲用两米长的竹子‘狠狠地抽他的屁股’，还追着他乱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一直主张同美国和平共处，世界和平评议会为肯尼迪之死默哀。……1950 年到 1954 年间，在全越南同法国殖民主义者作战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像叫作‘美国的战争’那样援助法国。1950 年到 1951 年援助 2183 万美元，1952 年援助 2469 万美元，1953 年援助 6505 万美元；1954 年援助 3 亿 8500 万美元”。

不仅越南，就在近邻韩国，也有学生和舆论界反对日本资本的帝国主义式的进入的动向。对亚、非、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一种朴素共鸣的日本人，不是反而有不能正确地倾听朝鲜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声音的现象吗？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的初期，犯过没能抱有同感的错误，我们不也与这种错误有关系吗？因为战败而丧失了殖民地，所以战后日本没有像法国那样，发动镇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无谓地消耗巨额国力和丧失许多生命。日本虽曾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加害于朝鲜和中国等亚洲人民，但由于“民众的善意”这种东西夹杂在里面，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各国是有亲切感值得回忆的国家。然而如果不重视一度钻历史空子的“民族关系”这种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不也会非常痛苦地面对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吗？苏联共产党对这一点认识不足，这正如今天事态所说明的那样。

从这一点来讲，中共的主张强烈地打动了这些地区人民的心，他们切身地感受到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这是合乎道理的。而且，派到这些地区的中国代表团和中国人的工作态度与苏联人的不同，似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前面引用的越南的报告中，越南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正式的）并没有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名字，这是事实。“因为把意识形态问题同国家和元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不台道理的吧”（18），真正与敌人战斗，建设自己国家的人们的骄傲，一定成为这一自主性表现出来。

公开论战和暗中对立，二者必居其一。但在这中间，应由各国自己确定开展革命运动与和平运动的方式，保障各国人民及其政党的自主性。在下一个阶段，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实现统一恐怕将成为重要课题。中国处在这种多样化的潮流之中，自己却想成为一极，形成统一的运动。这作为一种责任感和义务（即便中苏没有对立）似乎使人觉得他们是想象过去的井冈山和延安那样，使北京成为各国和各民族的革命家学习和休养之地，进而应该成为

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实际上，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中国的悠久文化和辽阔的国土，作为“一个世界”，他们在其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可能的。而且，作为当政者，某种程度的封闭在政治上也许容易一些。

尽管如此，却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就那样原封不动好。中国是“一个世界”，世界把中国除外是不可能的。“部分停止核试验协定”，从中国的核试验得出的教训就是这样。在这僵化和分裂的世界中，日本必须努力首先与中国开始对话。

6. 满江红（第 37 首）

和郭沫若同志

1963 年 1 月 9 日

在这首词中，直喻法和隐喻法交织在一起，比较难懂。不过，表明作者以永远永劫的时间（词中说“一万年”）透视世界的未来，而对当代最集中的对立，要在短时间内决定是非的决心是勿容置疑的。

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荡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注释

【满江红】93 个字。双调。前阙九句，四仄韵，后阙十句，五仄韵（也有平韵）。用了许多入声，前后阙七个字的两句有许多成对偶（两词都是这样）。后阙五句的第一字是一字豆，但毛译东在“一万年”之后没有按规则。郭沫若说“有”。壁、泣、易、镝，急、迫、夕、激、敌押韵。这一词牌传说为宋岳飞所作，故有名。这是颂扬爱国热情的。郭沫若和毛泽东都把岳飞之作放在心上了。后面举出岳飞之作，供参考。当然不是简单地模仿岳飞之作，在《满江红》中的“红”字里，也包含有红旗象征真理胜利的意思，可以从这些作品的内容上看得出来。

【寰球】地球。同环球。

【碰壁】碰墙。在工作等不顺利时说的俗语。碰，是未预料到而遇到。

【凄厉】指风凄凉地吹来的情景。但这里是形容鸣叫声。

【槐】指大槐安国的槐。古时，有一个叫淳于棼的人，邺南有一古槐树。一天，他喝醉酒后在梦中来到大槐安国，把国王女儿娶为妻，又当上南柯郡的大宁，20 年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从梦中醒来后，太阳尚未落山。当他去寻找槐树时发现有一个蚂蚁洞，所谓南槐郡就是槐树南面树下的蚂蚁洞。淳于棼见此悟出人世间的空虚。据传故事为唐李公佐之作，见《南柯记》。

【蚍蜉】大蚂蚁。唐韩愈《调张籍》：“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是叱责当时贬低李白和杜甫诗的人为。这且是指诽谤坚持真理的人的那帮家伙。

【西风】这意味着反动派。1957 年 11 月 18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作者讲道：“我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名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在这个发言的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对留苏学生讲：“世界的风向变了。现在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十亿，独立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以及带有中立倾向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

风。”(19)清朝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作为在妻妾同居、大户贵族人家里干活的使女的愚痴话，“大体说来家中事，‘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第82回)。

【落叶下长安】引自中唐诗人贾岛的诗句“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据说贾岛想出这两句后狂喜，冲撞了大官的行列，因此被拘留一夜。自古把落叶不停地落下形容成“中箭后如云彩散去般逃跑的军队貌”。这里是把迅速没落下去的反动派比喻成落叶。

【鸣镝】响箭。据说是汉时匈奴冒顿发明的。冒顿命令：“今日起，跟我的鸣镝一起射，不从者斩。”他首先射良马，斩了远虑者，接着射爱妻，斩了畏缩不前者，接着又出去狩猎，在射自己心爱的名马时，均服从。于是与父头曼出去狩猎，射其父，将父打倒，继单于之位。这里恐怕比喻与反动派的斗争开始了，而且这是发给反动派的革命声明和檄文。

【四海】中国周围的四个海。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礼记·祭义篇》)。这里意味着世界。

诗词大意

在小小的地球上，有几只极微极小的苍蝇，把头向墙壁上撞(也不知道出口)，发出嗡嗡的叫声。微弱的声音十分凄凉，还伴有一点哭泣声。蚂蚁在槐树上打开一个洞，自吹自擂是大国，大蚂蚁摇动着树大声叫嚷，可是吹牛皮说大话容易。现在西风吹落叶落满长安(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相继没落)，像射那种落叶一样，鸣镝的箭勇猛地发射了出去(我们发表了革命宣言，斗争开始了)。

以前急于解决一些事情，天地回转，时间一刻一刻地紧迫。用一万年给历史下结论，花的时间太多了，所以我们只能争朝夕。四海沸腾起来，云和水也都发怒了。五大洲激烈地摇晃着。暴风雨和雷鸣来得猛烈。要把所有危害人(人民)的虫子(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干净彻底地清除掉。这场(革命人民的)斗争是天下无敌的。

郭沫若原词

满江红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无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莫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满江红

岳飞

怒发冲冠 凭栏处 萧萧雨歇 抬望眼 仰无长啸 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靖康耻 犹未雪 臣子恨 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 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虜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 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注释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

同上。

同上。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

同上。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情》，1964年2月29日。

《朝日年鉴》1964年版。当时人民币一元约等于一百五十日元。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

日本《东京新闻》1959年2月2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人民出版社，1956后版）。

《列宁主义万岁》1960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人民日报》，1961年12月29日。

毛泽东：《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斋藤玄：《访问北越》，日本《每日新闻》，1964年9月11日。

同上。

《人民日报》编辑部，《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58年10月31日。

后记（其一）

武田泰淳

地球上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在这个国家里，有富于变化的大自然，还有适应这种大自然的国民，即有生活在辽阔的平原、漫长的河流、巨大的湖泊和群山峻岭之间的“英雄豪杰”们。这些“英雄豪杰”们的活动范围十分广大，他们确实配称“江湖大侠”。

可以拿来《义经记》和《平家物语》同《史记》和《三国志》比较。也可以想象为争夺天下被驱赶到关原之战和赤壁之战上的士兵们步行的距离。无须计算秦始皇、汉武帝统一的领土和落到太阁手中的领土面积。以大阪夏季之战和冬季之战决定胜败，中国余地极大，它有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北海道和九州被统一到一个经济单位。比这早得多，“南船北马”所代表的华南和华北通过几度战乱被紧密地联结起来。

那种“统一”很大，完全同样“分散”也很大。统一和分散，引力和离心力的大小又同处在其影响下的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聚集的地区是同《八犬传》中八个犯人聚集的地方无法相比的大空间。集结到梁山泊上的英雄好汉们都有各自的经历和性格。他们的合作与分裂的矛盾比起马琴翁考虑的南总里见家的八犬士要大得多，这自不待言。

从古至今，大陆上这种扩散与集中的现象对日本列岛的影响一直没有变化。但是辛亥革命以后，由于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使大陆与列岛变得更近了，所以日益变成不是别人的事了。开始把大陆上目不暇接的扩散和集中运动看作后进国的悲惨命运而轻视的人，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这场运动的漩涡中。在日本，也有这样一些野心家，他们错把被各地军阀们搞得毫无目标的各种运动看成有希望的东西，于是企图插手，进而挤进其中。这些小小的野心家们，完全了解对方的运动，并以能操纵它而心安理得，然而实际上这些落后运动的本质被看穿后，在不知不觉中化作更大运动漩涡中的一个泡沫了。鲁迅等人的“语丝”派，茅盾等人的“文学研究会”派，郭沫若等人的“创造社”派都是从有前途的根本性运动中诞生的。然而，这种新文艺三派无论如何也无法简单地预测扩散状态将是什么样子，不久又如何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

当时，在一个很有希望的政治集团中出现了一位很有前途的领导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领导人不久便成为具有光明前途的根本性运动的核心。他有与伟大运动相称的伟大抱负。他从未自称自己是诗人。甚至许多中国的文学家们都不知道他在写诗。他只顾埋头行动。鲁迅、茅盾、郭沫若他们都不断地继续着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的彻底行动。如果他在一瞬间突然停止行动的话，他自己和他同事们的生存都不得不停止。比起梁山泊上的头子宋江和太平天国最后的幸存者石达开将军来，他的行动范围更为广大，更可以迂回，反复，有进有退，有退有进，持续长久。

他的诗词植根于中国这块辽阔的沃土之上，并充分地表现

它。然而，那些采取古典形式的诗词相当深奥难懂。特别是如果不了解当时写作的背景，就更难理解了。竹内实先生倾注全力分析了作为每一首诗产生的背景的毛泽东的行动，和围绕其行动的复杂条件。书稿是由竹内实先生一手写成的，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写。我只是把两次访问新中国时得到的资

料提供给竹内先生，而且在几次审稿会上提了一些意见。所以，如果说本书写得好的话，那都应该归功于竹内实先生，当然若书中有不足之处，那责任应由竹内和武田两个人负责，因为在付样之前我通读了手稿。

从赤坂公寓到富士山麓的山间小屋一次次来回奔跑的文艺春秋社的青木先生，给我送来竹内实先生的书稿。读着读着，我便为毛泽东这位有男子汉气概的人物，人中之杰的行动记录所感动，于是提出：“我希望您写得尽可能再详细一些。不必担心写长了出版有困难。为了能够让日本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喜欢，要把书写成不需要找其他参考书他们就能看懂并感到亲切的一本书。”

当我写这个“后记”时，虽然为“伟人”、“巨人”这类形容词使用过多和用得过度而难为情，不过尽管如此，它还是不能充分地表达我那种“地球上出了个巨人”的感慨。非行动者仰慕行动者。非行动者根据情况通过对行动者言行的讲解装作自己也是行动者一样。然而，在行动者与非行动者之间有着令人眩晕的距离，有神智恍惚般的断绝。非行动者决然不能完全理解行动者，正因为如此，我也（恐怕竹内实先生也）打算好好地去领会。即便打算去领会，最终容易陷入是同一舞台的出场人物那种错觉中。必须反对承认那种错觉的潮流。而且，“只要赞扬的话，非行动者的忠诚愿望将为行动者接受吧”这种简单与傲慢也该粉碎。

我不想通过这本书宣传“文学必须从属于政治”等观点。作为日本战后派作家的一员，我不喜欢那种主张。但是毛泽东的诗词到底是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诗同，他的诗词令人难以忘怀，我无法摆脱想读它的愿望。所以本书的价值同我的心情也许是矛盾的。例如人们要这样问：“如果你那样尊重毛泽东的诗，那么为什么不同样尊重其他政治家们的诗或其他文学家们的政治诗呢？你的态度不公正。”我将无言以对，不得不陷入沉思之中。在自己的作品中，贯彻执行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讲话”，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却无法割断把毛泽东的诗词当作优秀文学作品的感佩。

即便有人批评我不公正，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我对毛泽东的伟大行动的魅力以及从那里产生出来的以古典形式完成的诗词魅力不能视而不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诗词如同厚厚的冰雪融化后萌发出来的强劲小草。他的诗确实同他的政治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与政治行动紧密联系的诗未必都是好诗。因此，他的诗词的优美近乎是像火与水、天与地合为一体迸发出威力无穷的奇观。作为那种奇观的见证人，我是不合适的。合适的见证人大概是同他一起走过那伟大而艰难的路程，没有见到革命胜利就已牺牲或今天仍抱着同一信念幸存下来的那些人吧。所以，我写这个后记在精神上很痛苦。

中国的古典经过几代王朝的变迁添加了无数注释。某一流派（例如儒教的或老庄的）的解释得势后，其他流派的解释便被清除。一个学阀的系统逐渐分裂后，同一流派的内部便发生不同意见的纷争。今天不可能读完的大量注释书，无从获悉其制作者们的执着之念，它们依然埋在厚厚的尘土下。大概今后也会出版许多关于毛泽东诗词的注释书吧。就是在日本也已经看到了这种倾向。本书当然不该像构成学派、学问和学术系统那样的东西，它只不过是在更优秀的注释书出来之前这段时期内的一种尝试罢了。

尽管如此，在一旁看到出现像竹内实先生这样具有实力的脚踏实地的中国研究家在竭尽全力地埋头苦干，自己能做点声援工作，在已衰老的我来讲，是无比的高兴。

在对毛泽东的根据地进行访问和调查方面，我们日本的学者和记者已经落后于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等人。如果不能出现精明强于的新生学者，尽管中国与日本在地理上很近，我们今后还将再次遭到无法挽回的失败。我热切地希望在这本书的读者中间能够出现同过去的斯诺和史沫特莱毫不逊色的记者和研究家。

(1964年12月)

后记（其二）

竹内 实

翻开我的笔记，上西记载着去年（1964年）3月4日曾拜访过武田泰淳先生。起初，本书是作为武田先生新作规划的，金子胜昭先生来电话要我给予协助。确实我分担的是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即历史的记述部分。为什么写成这种形式的东西，我也不大清楚。在同就要出发去中国旅行十分忙碌的武田先生交谈中得知，出版社希望尽早出版这本书，因此要求我在武田先生访华期间首先做好词的翻译工作。但是武田先生回国后希望我作注释。当然，比我更合适的人不是没有，但我想失掉同“武田先生”共事的机会那也太可惜了，虽然有些踌躇，最后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下来。这样便开始了半年多的苦修苦行。我当时想，武田先生一定以我的手稿为基础把它加工完成一部极优秀的评注书，所以思想上是比较轻松的。约进行到四分之一的时候，通过出版社把手稿交给武田先生，带回口信说：“就这样写下去吧！”于是我一于到底了。接着是后面的事情，成书后听取评论，这里想略去。武田先生选我作搭档，又非常仔细地审阅难读的手稿，我由衷地表示感谢。在重要的地方给予恰当的提醒，我觉得这不仅对这项工作，对我今后写文章也有很大帮助。如果这本书有可取之处，那是武田先生巧妙的润色和忠告的成绩。如果有错误和不足，那都怪我对不想提过细的要求以免损伤对方自尊心的武田先生的关照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给予报答，怪我的不周到。

本书好歹完成了。在参考书里列出了许多先辈的研究成果，特别从臧克家和周振甫两位老先生的讲解注释书中得到了帮助，没有包括在这里的诗词，得到了郭沫若先生注释的帮助。如果在借用这三位先生的部分加上引用括号的话，那么这本书怕都是些括号了。我没有引用几位先生的鉴赏部分，只借用语言学 and 文学上的知识，或许是一种不礼貌的做法。就这一点而论，如果读者产生一些误解，那完全是我的责任。还从赵朴初先生等其他先生，当然也从日本的前辈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可以说历史部分和作者传记部分也是同样的。关于历史部分，收在《星火燎原》里那些有名无名人们的回忆录十分有用，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受益匪浅。我读了武田先生在北京买到的所有书籍后非常高兴。作为现代史，已经有人研究。即使在书上讲得很明白的事，这样看看亲身经历者的口述又有不同的感觉。关于历史的发展，我想尽量通过体验者去玩味。因此，我担心或许给人一种印象：一种不直截了当，怀疑用想象来描写在现代史上已成定论的事情。这一点，请读者直接查阅现代史和革命史的书。传记的部分苦干没有新资料，斯诺和萧三的著作是基本的东西，同以前山版的关于毛泽东的书没有变化。李锐和周世钊的书还没有介绍到日本，所以我认为这里有新东西。不过，本书不以传记为重点，所以作为两部著作的介绍是不完整的，虽然尽量避免同已出过书的重复，但重要内容不得不又一次作重复记述。本来，帮理解诗词是叙述历史和传记部分的目的。但是用得过多或许被认为有意把文学作品分解成这些事实。文学作品是从现实生活中浓缩和升华出来的，这无需我来重复。我还是希望把它作为辅助性的东西来对待。

在诗同的翻译上，我努力使译文独立。这种日汉文混淆的风格，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大赞成，但完全译成日文时我又担心会出现与原文的距离（可能

把这种距离看成是译者埋没了诗人的素质)，而且在说毛泽东的诗词时，一般认为读者是在寻求接近原文的东西。所以我尝试性地采用了这种风格。关于译文，我又重读了吉川幸次郎教授的《陶渊明》，坦率地说，想从中得到启示。本书的体裁也学习了吉川幸次郎教授和小川环树教授编著和监修的《中国诗人选集》。在考虑词解和译文时，该选集的《总索引》对我帮助很大。

几乎靠他人的业绩和帮助出版的这本书，也不是没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和工夫。不过，比起这种自负和得意，还是作为一名读者能把仅有的力量（尽管十分有限）献给对象更令人高兴。我的笔记上记载，把原书弄到手是去年1月25日。当时，我哗啦哗啦地翻动书页，预感到里面藏着好东西。在我写信感谢惠赠此书的北京H先生之后，又忙了一时其他事情。实际上开始明白这些诗词的深刻含意是在于起来之后的事。而且即使在大致告一段落之后也还发现读得不够，这是真情。我在写书稿时，心中暗下决心，不把作者“毛泽东”作为前提，想当作无名诗人之作，看究竟能从这些作品中引出什么。果真引出什么东西来了吗？现在有一种明显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惘然若夫之感，我无法说清楚。尽管我作过假设，但作者是谁，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从这一事实出发，对作品进行评价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作为诗人的作者的不幸。而且，不幸的一部分也落到了注释者的身上了。

尽管如此，一些诗词是极为优秀的。想说是全部，但也有读者的爱好问题。首先是《沁园春》两首。这恐怕是谁也下会有异议的。如果问哪一首更好，那么前途尚属未知时代写下的《长沙》这首更让人喜欢。不过哪一首都很长，而且是全身心吟咏的样子。作为在日本生活的读者，不会没有感到心情过于沉重的时候。日常偶尔即兴吟诗的话，举出下面两首略带伤感的诗，表明作为注释者的喜爱。现代汉语中的罗马字母注音是中国现行的方式，在日本也正在普及。

不过，可以举出几首《浪淘沙·北戴河》等以外的难于舍弃的作品，也有脱口而出的佳句。不知多少次返回对象，又从对象那里引出点什么的那种执笔期间的流程，直至今日似乎还在继续。作为公务人员，又作为革命家和革命领袖评价作者那另当别论，而作为纪念中国革命的作品，这个诗集中的几首诗词必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如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的《动仁之乱》那样，中国革命在不久的将来，下一代想深入了解革命家的内心世界时，一定会即兴吟咏这些诗词的。

前面说过从把作者规定为无名诗人开始工作。但另一方面即便从对象那里引出什么来，也不乘势进行说教，这是我的自戒。但是毕竟还应该把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传播出去吧。还有未能发现的，或者虽有些察觉但加注把握不大的，未能充分说明的东西，虽然认为删去没关系，但又觉得可惜的部分，保留下来了。可以想象在注释、记述和译文上一定有些错误，希望给予批评指正，以便修改。

本书所以能以这种形式出版，是因为得到了文艺春秋新社

出版局长上林吾郎、金子胜昭以及青木功一三位先生的特别关照。关于资料，除了武田先生借给的书和收藏的图书外，还给北京的H先生夫妇和内山书店添了许多麻烦。也借阅了中国研究所图书馆和东京都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馆藏的图书。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得到了各位朋友的各种好意鼓励，这里不一一列举尊姓大名，献上本书以作友好的纪念。

（1965年1月）

补写 1

本书曾引用过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讲话，但这是根据苏联方面的材料。今年 1 月 9 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德加·斯诺，据说作为公开会见外国记者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斯诺整理并发表的那次讲话已经公开，它同从论战对方那里介绍的东西气氛不同。

“您以前曾说过中国人口众多，因此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即便其他各国人全都被毁灭了，中国还能剩下几亿人口，可以重新建设。这些报道准确吗？”

毛泽东回答斯诺这一提问的部分，没有用引号把原文忠实记录下来。但现在引用斯诺介绍的内容时，可以看作是回答。

“我不记得讲过那种事情，也许讲了。不过我记得尼赫鲁访华时同他谈过这个问题。确实说过中国不想打仗，我也说过中国没有原子弹，如果其他国家想发动战争，世界将被毁灭。就是说，这意味要死好多人。到底要死多少人，我不知道。没有只讲中国的事。”

“不记得讲过那种事情，……”这一部分与引用的后面谈及赫鲁晓夫常常收回以前的讲话，说“（自己）决下收回曾经讲过的话”一起考虑，是表示对苏联引用和发表的与讲话本质的志向无关的不满。而且毛泽东好像告诉斯诺，在核试验场比基尼岛，大自然又恢复了生机，好像在讲“在大自然、鸟类、鼠类和树木等的眼里，原子弹只是个纸老虎。”而且针对“即便那样，你也决不能认为核战争是好事呀！”问话，毛回答说：“那当然喽！如果一定要打仗，应该使用常规武器。”（重点为引者所加）

在论战的时候，强调了与对方的分歧。对方在引用那次讲话时加进了夸张吧。在外界看来，摘掉这种强调和夸张的眼镜，理解讲话的基本点，这在论战的任何一方都是必要的。

补写 2

1959 年 9 月毛泽东连同一封信和第 29、第 30 首诗一起寄给《诗刊》编辑部，在信中说明了制作这两首七律的意图，写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三封信全文如下：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改。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良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大骂，那就是不可理解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

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泽东 1959 年 9 月 1 日 ”

毛泽东信中讲的意思，如果看看两首诗中的内容就可以得出这种解释：第 30 首讲的陶渊明实际上是讽刺因下台而去农村人民公社的彭德怀。但写这两首诗的日期是在庐山会议之前，诗中的用词是后来亨件的前兆，这叫“诗沧”，也许这里也是一个“诗讖”的事例吧。

(1974 年 7 月 4 日)

补写 3

第七次印刷修改了《七律长征》的译文。在此感谢深泽一幸先生的赐教。

(1974 年 12 月 9 日)

